江青正传

〔美〕罗斯·特里尔 著

江 青 正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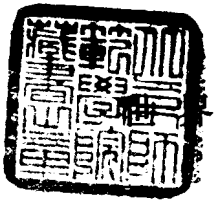
〔美〕罗斯·特里尔 著

张宁 秋同 马元德 王涛 译

（内 部 发 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60003



知 识 出 版 社

1160003

The White-Boned Demon
—— 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
by
Ross Terrill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Yew York 1984

根据美国纽约威廉·莫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王 江
封面设计：施本铭

江 青 正 传

〔美〕罗斯·特里尔 著
张宁 秋同 马元德 王涛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华生印刷厂排版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26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2-0207-9/K·34 定价：3.70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罗斯·特里尔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他所撰有关中国的政治人物传记，在西方颇有影响，本书尤为人们所注目。本书以编年方式描述江青从出生到受审这60余年的主要活动，重点是写其政治生涯。作者在撰写过程中广泛收集海内外流传的有关材料和文献，并专门到我国采访同江青有关的许多人物，这使本书内容充实而别具一格。作者笔下的江青，不是一般脸谱式人物，其政治野心也并非生来就有。作者要写出真实可信的江青其人，因而着意从多角度、多侧面去刻画她这样一个具有复杂心理和性格的丑恶人物。本书文笔洒脱，可读性极强。

基于作者政治立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用语，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某些材料也不尽准确，仅供有关人员参考。另外，书中的人名我们尽量核实，但仍有个别系译音。

本书第一、二章由马元德译，第三至五章由秋同译，第六章由王涛译、张云校，第七、八章由张宁译。

1935年主演《玩偶之家》时的蓝苹（江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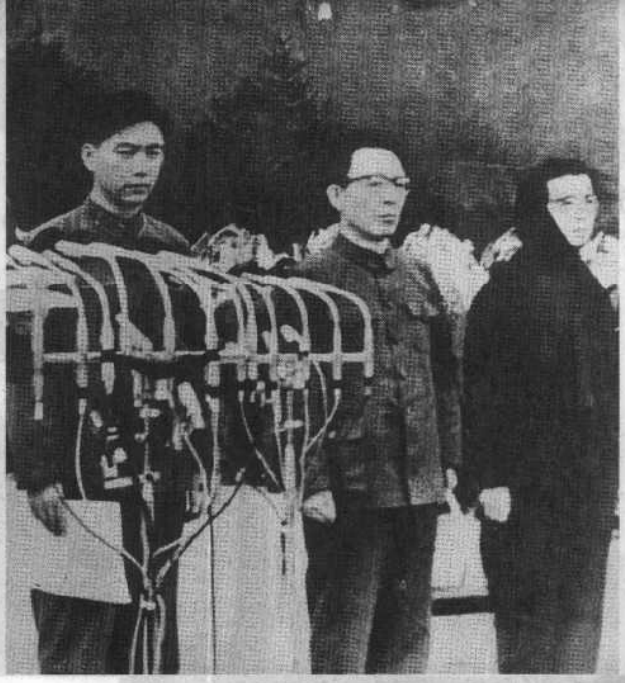
19岁时的李云鹤（江青）。

蓝苹30年代在上海的剧照。

1938年在延安（埃德加·斯诺摄）。

1974年到处抛头露面的江青。

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际，“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步伐(右起：江青、张春桥、王洪文)。



1980年审判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证。

江青在法庭上狡辩。

1981年，特别法庭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DB8713

目　录

第一章　序幕："我是他的一条狗"……1
第二章　长大成人　出外发展（1914—1933）……8
第三章　在上海的舞台生涯（1933—1937）……41
第四章　毛泽东在延安的主妇（1938—1949）……98
第五章　失意（50年代）……142
第六章　康复与报复：以政治为舞台（60年代）……192
第七章　想当女皇（70年代）……251
第八章　"住口，江青！"……315

第 一 章

序幕："我是他的一条狗"

那是11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离北京饭店不远，好几辆垂挂窗帘的黑色小轿车，沿一条叫正义路的狭窄的旧式街道，穿过密密麻麻的自行车排成的阵势，蜿蜒向前驶去。道旁是一栋栋带有华美装饰的大厦；自行车铃响成一片，象蝉鸣声。小轿车悄悄转弯，穿入一座灰砖拱顶门道，那两扇沉重的大铁门平常是很少打开的；这所僻静的院子散发着灰尘、石块、行政机关的气味，它是市公安局的一部分。

九名男子，大部分身穿卡其布军装，但是没佩带现役军人的标志红领章，从车子里摇摇晃晃地钻出来，象驯良的山羊似的，有人带领着走上礼堂入口处的石台阶。还有一名妇女，有人带领着走在他们后面。这女人穿一身黑，戴眼镜，眼镜底下一张乳白色的面孔；她那一头梳得很整齐的乌发闪闪发亮，在表露顽固的嘴角上挂着一丝冷笑。她挺着身躯，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进礼堂。为了举行审判，把礼堂布置起来：铺一块绿色小地毯，设一排10个被告席，还邀请了600名来宾充当"公众"的角色。

毛泽东的最后的妻子，前一个时代的女电影演员江青，要受一个特别法庭的审判，罪名是反革命、残害无辜人民、以她丈夫的政府中高级成员的身份普遍滥用权势，还有一项

相当重大的罪名，就是侮辱毛泽东时代后的中国的务实派新领导。

这位高贵的遗孀最后进入礼堂，因为全部10名被告——四人帮、前国防部长林彪的军事副手们和陈伯达——当中，她在审前的讯问中表现得最恶劣。她不是非但不回答问题，反倒要提出问题吗？她不是有一天脱光衣服，逼迫男讯问员退出房间吗？把她排在第10号位置，是这个清一色男性的法庭对她略示惩戒。把四人帮里最年轻的分子王洪文摆在前面也比较安全，因为他在审判以前已经表现顺从的态度，甚至承认了他没有犯的罪行；而江青就难保不在审判时来一阵不成体统的大爆发，满可能利用她的第一号位置大吵大闹，表示她对法庭、对当前中国政府以及对胆敢反对她的任何人的极端蔑视。

江青66岁了，可是看上去要年轻10岁。她所表露的气焰，胜过全部其他被告合在一起。从遍布室内的军事警卫的脸上，看得出羞怯、局促，和江青的高傲不惧的表情完全形成鲜明对照。没有一丝皱纹影响她那轮廓清晰的阴沉面容。多少年来谣传她的头发原是假发，这种传言似乎可以休矣；哪个假发制造厂也不会制造那么十全十美的假发，不致看来是假发。说真的，江青在做中国的第一夫人时期精心照料自己，每天炖八只鸡来饮鸡汁，这对她的面色和头发的光泽很有好处。

她反驳主审法官的断言，说："不是这样。"嗓音低沉，但是女气；一副狂妄自负的嗓门。她对于难应付的问题，大模大样地声称："我实在不知道。"她猛仰起头来，似乎极欣赏审判室内的焦虑情绪。大家正担心她对习俗惯例的异常蔑视，下一步会闹出什么名堂来。

投影机把一份文件的复印本映在屏幕上，那文件表明江青曾密谋反周恩来总理；于是法庭主席粗声粗气地说："被告江青，你对这项指控有什么答辩？"江青的眉梢这才现出一条皱纹，严肃地向前探身，把头上的耳机压紧些，仰视主席，说："我有点聋；我没听清你的话。"嗓门突然吊高，一副女戏子腔。

"我想上厕所。"她由两名年轻女兵护送着，缓缓走向一个侧间，显得庄严华贵，仪态万方。她在这小间里呆上好半天；那两个护送者怀疑这个不可预测的女人真会不再出来，过一会，别人也开始怀疑了。

北京的官方报刊现在把江青叫作"白骨精"，难道不是她用一种奇妙的手法控制着那惨淡凄凉的局面吗？

"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毛叫我做的。我是他的一条狗：他说要咬的，我就咬。"大家一听她对自己头上的一大堆指控提出这推个干净的回驳，满屋泛起紧张不安的笑声。

江氏的实际观众人数超过这35名法官和这600名应邀的来宾（这些来宾活象从全国各省搜集的许多幅舞台布景，收藏在迷宫似的舒适的京西宾馆内，实际上是封锁起来，与外界的北京人完全隔绝）；在公安大院内别处，一间装设一排闭路电视的小屋里，电视正从每个角度近距显示审判活动，政府高级人物挤在电视机旁观看这个白骨精而不会给她看见。江青也是向电视观众讲话，千百万电视观众，在举行审判的每个晚上，可看到她反对永远不断"围攻"她的又一伙"敌人"，看到最新的、也许是最后的顽抗的选段。

江青从幼女时代以来一直感到自己身上带着某种枷锁，但是比起这一天在法庭上，以往她极少用更冷漠的态度忍受任何枷锁的束缚。她在被告席上恰当处理两腕上的手铐和身

边的围栏，俨然一幅图画。她看上去仿佛不属于公安礼堂中开始举行的这场使其难受的仪式的范围之内。

有的人感到这世界实在可憎，江青便是这样一个人。社会没分配给她一个保留的席位。

这世界竟公然不符合她想象中的理想世界，她真是大惑不解。她太过于自信，不认为问题的任何一部分都在她自己身上。但是她总算认识到这个分歧，消除了疑惑，于是她的人生便是长期努力弥合这分歧的过程——通过幻想、在剧场中、把她的个人意志强加进客观世界、最后在一场只和她本人的迫切需要有关的汹涌澎湃的政治行动中，来弥合分歧。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出戏，江青从少女时代起便深受其影响；剧中那位丈夫对娜拉说："你讲话象个小孩子，你不了解你生活的世界。"娜拉莫名其妙，但是激动起来，坚持自己的主张，回答说："是，我不了解。但是现在我打算进入那个……我必须查明哪方面对——是世人还是我。"

白骨精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看她是否悔改"。在办完这套手续前很久，中国的宣传笔杆、街头漫画家、正直的母亲、本分的父亲和孝顺的子女，就已经宣布她是"叛徒"、"恶婆"、"杀人犯"和"婊子"。这些指控她一样也不承认。

一位高级中国官员带着怒气对我说："我们已经说明了她是个坏女人，你干嘛对坏女人感兴趣呢？写好女人吧！"在江青看来，她所做的任何事决不可能是坏事。

江青出生在一个多纠纷的人家，她曾尽力甩开对凶暴的父亲和她母亲的回忆。她的母亲当老妈子，这份工作接近卖

淫。江氏为自己创造一个幻想世界，所以她进了剧院似乎是理所当然。同样自然，她把自身短时奉献给一连串几个男人，这些男人都感受到她的憋不住的意愿的威力：济南的一个年轻的旧式商人；青岛的一个上等人家的出色的激进分子；上海的一个有广泛文化修养的性格浪漫的戏剧作家。

日本打上海，上海的艺术界崩溃，江青又选择了冒险的道路。她到了一个遍地灰尘的荒原，那里共产党人避开蒋介石的势力，力图在抗日战争中代表中国的民族主义，争取赢得未来。江氏在她的自由放荡生活方式上接受一个剧烈转变，嫁给了毛泽东——一个大她22岁的男子，已经结过两次婚，是八个儿女的父亲，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毛把江青看作“娜拉”、伙伴和支持者。江氏接受这个角色，等待时机。

戏剧和政治——对江氏来说，这两个领域没有很大区别。在这两方面，她的生活重于她的艺术。一旦时机成熟，毛觉悟到他需要她（就象罗斯福总统需要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江青就用当年使她在上海表演艺术界显露头角的同样办法，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她不等人吩咐，主动接近政治。她脸上闪现出捉摸不定的迷惑人的笑容，发表她的意见，而且常常随心所欲，自行其是。

当毛病势垂危的时候，江氏认为她上升为女皇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一千三百年前，武则天已证明“妇女可以治理中国，卓有成效”。江氏不是在超群出众、不可思议的毛泽东身边当过38年的政治学徒吗？她历来认为那些精明而有势力的大人物总觉得她的地位不是自己取得的；现在她可以证明他们的想法错了。

但她没有禁得住她的最大考验。她万万想不到自己会加

入中国妖魔的固定行列。中国群众开始咒骂昨天他们还挺尊敬的这个女人。“中国人不是很文明的民族。”江青这样讲。

在江青的一生经历的故事中，我们注意到男男女女追求那样的目标，结果造成混乱和苦难。我们见到一些那样的事件和风俗习惯，说明中国仍是个单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儿女为父母的罪过付出代价；事实与仪式相比毫不重要；功绩抵不过关系；报仇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最大的犯罪是跟自己一帮人的步调不一致。

中国往往把一个在政治上高居要津的固执的妇女看作一个利用自己的女性妩媚取得了权力的高等娼妓。即使在江青那一代人，性实际上也是妇女能获得权力的唯一途径，它也是一条危险之极的途径。女子的权力只能看作某个男子的权力的延伸。做妓女的可能进入权力的殿堂——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妓女进入了权力的殿堂，干了不少大事，但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人决不可忽略她取得权力的途径属于什么性质。

她的故事是反常意志的故事。恶狼、男人、疾病——她总是在跟一个敌人搏斗。19岁时，她割断一切同过去的联系，独自去世界上一个最大、最危险的城市，在艺术上碰运气。她始终感到自己是在个人意志的绷索上维持平衡。一方面有名望和权力在等待着，另一方面有咒骂和蔑视随时降临头上。

她使自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她象伊娃·庇隆，在她的观众——人民群众面前几乎是作为一名旁观者观赏自己的表演。她象埃莉诺·罗斯福，在恢复病弱的丈夫悄悄丧失的权力方面，表现出专一和自信。

我们西方人惯于把东方古老文明主要看成历史遗物博物馆，可是拿江青来说，我们当面见到的却是一个世界性的活生生的人物，她的精神能打动一切有野心的妇女——及不少男子的情感。

本书是写一个特殊人物，她终于掌握的权力超过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政治历史上的任何妇女。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因家族世仇和个人怨恨竟拿政策问题当儿戏。

本书讲江青的历史，依据的材料是：基层群众中目击者的口述；目前在海外的某些中国人的证词，那些人曾眼见、认识、恨过或爱过江青；还有北京的重要文件，这种文件仅供少数人阅读，但是我在西方接触到了。

在这本书中，历史叙述的至少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

第 二 章

长大成人　出外发展

（1914—1933）

我那时连贴身衣服都没有。

——李云鹤（江青）

中国北方一座县城里有条大街，街两边是低矮的砖木建筑的铺子。大街旁一条小巷，巷内满眼灰尘，到处是狗，街坊邻居爱扯闲话，大车载运的蔬菜浓重的气味扑鼻。小巷中，有个相貌俊俏而神色烦恼的30来岁的妇人生了女儿。这条小巷里有娃娃出世，通常是四周一片喧腾，可是这次却听不见闹嚷。那妇人的一位朋友充当收生婆；父亲并不在场。给母亲吃一种黏小米的稀粥加红糖，走一走喂食仪式，滴几滴水，让娃娃的小嘴张开。娃娃开始哭叫，哭得很厉害。

那是1914年。尊孔的中国最末一个朝代三年前灭亡了，但是并没有出现新秩序。守旧派为一个稳定世界的消逝而悲哀，维新派为走向自由世界的路上有障碍而气恼。国内一团混乱，边境上已有战争的气息。老百姓不能左右国家大事，就闷头搞家庭活动和经济活动。他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和麻烦事已足够占满一整天，剩不下多少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有关

“革命”的奇怪的新空论了。

然而这个女婴孩剑和中国革命要很有关系。她现在的哭叫是纯粹个人的哭叫，终有一天她的叫喊会成为政治战斗的号令。

诸城是个死气沉沉的城市，居民3万，周围有古老的城墙和城门。四郊盛产玉米、花生、烟草和小麦。这些山东人是高个子，面部轮廓分明，对人态度冷淡。他们在作风上总难免固执，他们意识到自己有悠久辉煌的历史，包括中国两位最伟大的圣贤孔子和孟子的生平事迹。

这里的生活比贫穷而人口多的山东省内大部分城市的生活富裕，不过也渐渐恶化，因为20年前在省会济南和海岸之间修筑了一条铁路，绕过诸城。诸城离黄海相当近，不免受对外贸易的影响。本世纪初，中国在专横霸道的国家的利刀下开始被瓜分，那时山东地区受到日本的侵扰，在这个女婴孩出生后不久，日本把德国势力赶出山东。

这个最初取名淑蒙（“纯洁而糊涂”）①的幼儿，生在一个骚乱不宁的奇特人家。几十年后，这孩子成了有权势的妇女，一个尚在人世的传奇人物，童年的真情实况就给虚构的故事遮掩了。有一回，她在访问天津市期间，曾对所接见者的行列中一名劳工表示：“你父亲是石油工人，我父亲是工匠——咱们都属于工人阶级。”但是此话也不尽然。她父亲作为木匠设法开了一个修造大车车轮的铺子，经营一家接待过夜旅客的小客栈，后来又置了田地。

她父亲李德文这人，往最好说也是生性冷酷；酒喝得很

---

① 这是她的“小名”，一直使用到她上学时给她定一个正式名字（“学名”）为止。——原注

囚，在诸城声名狼藉。淑蒙出生时，李已经是60岁的人，对她不大关心，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一个十足的反面印象。他和淑蒙娘的关系自始就不明确；虽有时不算多风波，也很疏远。

淑蒙的母亲比父亲小得多，她是西面约300公里的内地城市济南一个学校行政人员的孩子；她爹有俩孩子，都是女儿。她死心塌地照看淑蒙，比淑蒙爹在女儿心中留下一个好得多的形象。然而对淑蒙这女孩子来说，她仍然是个摸不透的人物。女儿在后期讲的有关母亲的话缺乏情意，也不包含对她的人品的评论。诸城的人把淑蒙娘看成一个纤弱温柔的女子，可是筋疲力尽、饱受折磨。

她不是李德文的元配。年龄相差太大（几乎差30岁）。淑蒙和几个哥哥姐姐的年龄差距也太大，他们当中最小的比淑蒙还大12岁。

有一个时期，这一家包含九口人，淑蒙顶小。淑蒙上小学时，她父亲的一个儿子（李幹卿）当警长，有个女儿已经结婚。淑蒙的外祖父——济南那位学校行政人员，竟准许女儿跟300公里外的小城中一个手艺人姘居，也是怪事。

淑蒙见她母亲不定期地夜间来往，感到迷惑不解，因此她时时提防着母亲的动机。这孩子的反应是可理解的，因为她母亲不是她父亲的正妻。母亲是李德文的妾，或称“小老婆”。直到今天，她的姓名不详，死期和死亡情况也不清楚。

这一家整个说来不算穷。淑蒙的父亲雇用一名全日工、两个瞎子磨粮食和干偶尔有的额外粗活。淑蒙幼年时期，他的作坊十分兴旺，所以几年之后他按合适价格把它卖掉，就能在城外买下一大块田地。

家里，父亲和正妻生的所有儿女全在房中就显得拥挤，但是房子满舒适。这是座灰泥房，粉刷的墙面，褐色木梁，脆纸窗户。共有三四间屋子，包括一个大厨房，厨房里有常年不冷的火炉，沾带油脂的黑铁锅，还有挂在椽子上的干菜。屋里地面是夯实的泥土地，家具是本地木材制作的家具，简单朴素、笨重结实；油灯照明。

淑蒙有时缺食少衣，原因是家庭争吵，也有几分是威胁着全省的社会动乱，却不是家庭收入不足。

中文里一个“家”字包含 family（家庭；家族）和home（住宅）两个英文单词的意义；一家人就聚在一起的观念，原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基本观念。童年想来是人的黄金时代。人生的全部意义蕴含在家庭关系中。一个年轻人跟一般由两家父母选定的伴侣结婚，是件了不得的大事，这一来给一组家族团结的纽带又补充一组新的家族纽带。淑蒙的一生在这些方面都要极不合惯例。

她的首要问题是自己是女孩。旧中国做父母的热切希望生男孩，所以一有女孩，便给她取个什么“小错”之类的小名表示扫兴，这倒也不少见。女儿不象男孩那样，抚养长大留在本家。她是短期开放的一朵花，谁想要都可以摘下拿去，拿到他家。淑蒙曾听到父亲大骂倒楣，生女孩儿。她觉得这可是怪事；她爹自己就是女人生的；做女人真会是大不该吗？

淑蒙的脚是缠过的，这在1920年以前的诸城不算太出人意外。用缠紧的布条压缩女孩子的两脚，是打算使她的模样秀丽，而且也是个信号，表示她注定不要做事，只要嫁人。一个同班学生回忆淑蒙，说：“这种主意她憎恨透了，她去

掉缠脚布！所以我们总是叫她‘革新脚’。当然，给她缠脚留下了丑陋痕迹，而且使她此后一生的步态看来象罗圈腿。”

淑蒙的父母本来喜欢要男孩，而淑蒙的母亲又是她父亲的妾，这一来事情更糟了。别人怨恨这个新老婆，认为她是无理插足者。有了她，在十分重要的继承权问题上产生复杂性。她比李德文的最大的儿女本来也大不了很多，因此她的（及淑蒙的）地位就更加奇特了。

淑蒙既制造暴力，也受到暴力对待。她爹揍她，一个严厉的异母姐姐也揍她。云霞比淑蒙大好多，长着一副和淑蒙一样坚定的、稍长的面孔，但是她不那么蛮。淑蒙对云霞粗鲁无礼，又由于爱幻想，耍的那种恶作剧惹恼了她这异母姐姐。云霞要报复，手持一把鸡毛掸子围绕房子追逐淑蒙。只要一追上她就怒打她的屁股。

淑蒙爹的绰号有“狼贼”、“骂人能手”等。淑蒙大约5岁的时候，一天晚上，她爹的行为甚至胜过自己的名声。那天是元宵节，满城灯火辉煌，喜气洋洋，大家又喝酒又吃特别食品，包括需要两人来抬的特大烙饼。

也许是李对他的小老婆厌烦了。也许是小老婆和正房妻子儿女的紧张关系太严重了，他不能再忍受。即使淑蒙娘不是象中国官方说的那样“不正经”，毕竟她比李小得太多，她满可能同别的年轻一些、脾气不那么坏的男人有过交往。无论是什么原因，当时李勃然大怒，拿着一把铁锹追赶淑蒙的母亲。他猛打她的背，再敲她的手，弄断一根小指头。根据淑蒙的自述，她急忙赶去保护母亲。她父亲手中乱抡的铁锹撞到这孩子的嘴，撞坏一颗牙。

在诸城大街上演完的这出武戏象一场噩梦。淑蒙娘用皮带把孩子绑在背上，逃离这场噩梦，也逃离“狼贼”的生

活。

有人评论这一家人的关系说："父亲受到家庭压力，必须给淑蒙娘一笔钱，把这个小老婆除掉。"这准是元宵节大战的部分背景。年轻的妾跟老头子断绝关系，既不是突如其来，也没有做到彻底。在这场闹到顶点的大打之后，淑蒙又出现在她父亲1920年买下的农场。她母亲同李德文一家仍保持一些联系，无疑问是由于对"继承权"抱着一些希望。

这场巷战中，淑蒙的异母哥哥姐姐并不在场。以往淑蒙和母亲常好象二人成一伙，现在淑蒙是单独伴随母亲了。

母亲慢慢地消沉下去。她尽管和淑蒙爹一家人继续有些联系，但在此后的年月中大部分时间做老妈子，带着淑蒙呆在某个人家，发生过神秘的吵闹后转到另一个人家。对淑蒙来说，同情取代暴力，寂寞取代家庭紧张状态。

妇女很少给丈夫休掉，也很少丢下丈夫，所以淑蒙娘十分悲哀。她独自带着孩子，远离自己的父母和故乡，受尽各种剥削压榨，具有大家闲谈中的流浪单身妇女的作风，成为流言蜚语的方便目标。母女二人跟淑蒙爹决裂后不久，就回到济南淑蒙的外祖父家中。

她们不久又回诸城，因为母亲不愿放弃她继承淑蒙爹的财产（即经济支持）的脆弱权利。但是和父亲一家子打交道实际上困难之极，母亲无论从这方面再得到多少钱，仍然要四处流浪找寻工作。

由于家境窘迫，淑蒙断断续续上过两个小学。在小学里，淑蒙的形象和性格开始成形。她是个高个子女孩，有点腼腆，嘴稍微嫌大些，但是嘴角挂着动人的微笑。她的头发

梳成两条长辫子，这给她惹来很大痛苦，因为平常样式是一条单辫，两条辫子大家认为是标新立异，扯来好玩的东西。

她的衣服更是令人难堪，既不是新的又不是女孩衣服，尽是异母哥哥们丢掉的破烂儿。她上的第二个（社会阶层较高的）学校中有些同学嘲笑她常穿的一双破鞋。她们把一只鞋里突露出的大脚趾叫“大哥哥”。她们大声叫喊“鸭蛋”，嘲笑她的凸出的脚后跟。

她平常很安静，极少高谈阔论，但是畅谈起来却引人注意。她容易心烦意乱，想到什么说什么，或者突然泪如雨下。她的外貌可以一天显著变一个样，因为她的情绪拿她的身体当玩物，疾病开始终生随心情而消长。在学校和在全城中，她都是大家嘴里喊“没爹妮儿”这个称号的对象。

她上的第二个学校，是一所县立的好学校，收比较富裕的人家的女儿，附带收一些象淑蒙这样的“奖学金生”。特别在这个学校，她是个有争议的棘手的孩子。这大概是因为她的家庭背景造成她的神态和举止与其他女孩不同，不符合校方的要求。

她时常跟别的学生打架，也许是由于她的外貌和奇怪的家庭背景，她们欺侮她。几位老师感到有必要打她；一次，老师见她在班上做白日梦，呆呆出神，就拖她到厕所，打了五板手心。

在暴力和残忍问题上，社会没有树立良好榜样。淑蒙学会计算每天夜间枪毙多少名罪犯，听砖城墙下啪啪响的步枪射击声是几声，就是几个人。在离她家很近的小东门，她看见公开执行砍头刑；从学校走回家的时候，她眼看扁担上悬挂着摇晃的人头还在滴血，感到十分恐怖。这一切事都是在国家的合法授权下做的，使有些人怀疑现存国家会不会维持

得久。

一学期后，淑蒙被县立学校开除，大概是因为跟别的学生打架。她后来谈起上学时的经历，说："当时我发誓决不再让什么人欺侮我。"这表示她已经把自己的尴尬的社会境况转化为个人不平的意识。

同时，淑蒙的母亲给富户当某种用人，正过着一种几乎是流浪的生活。即使避而不谈现下北京的官方看法——认为她"不正经"（这实在是无意识的谴责），尽管淑蒙自己后来讲的有关母亲的话是正面话，也让人几乎可以断定，她的家庭服务包含性交。

多少年后，淑蒙告诉一名记者，有个地主"有妻子和几个小老婆，但是还没有男后代，请（她母亲）入他家当仆人"；关于她母亲接受这项请求，她表达出复杂矛盾的感情。她说过几次："我只有五六岁的时候，就学会在黑地里走路，搜寻我母亲。"（这句话让那位精明的记者不禁"怀疑她母亲的夜职业到底是什么"；住家里的仆人毕竟不是夜间常很晚外出）她回想起同母亲住在乡下，想起有时候她独自在诸城，因为她娘"走了"。

究竟为什么母亲夜间常出去？为什么一个与丈夫脱离关系的缺钱的妇女要出诸城走远路？为什么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假定淑蒙娘仅是个家庭女仆，这些就不是好回答的问题。

她多半既干家务活又提供性优待，这是士绅人家司空见惯的事。也许她早先干过好多年这一行，在一场交易当中认识了淑蒙的父亲。

到20年代中期，母女在诸城的日子就难熬了。同淑蒙父亲家的联系——父亲本人大约是在这时候害斑疹伤寒病死的——对这困窘的母女毫无好处。一个既不和丈夫一家人，也

不和自己的父母一起生活的母亲，社会处境是极痛苦的：众口铄金，人言可畏。

在士绅家中的生活也不是很稳定或很宁静的。淑蒙曾和一个扯她的辫子的地主女儿扭打；她因为受侮辱，打过另一个地主的妹妹的乳部。她拨弄骚扰一个士绅家里的狗，惹得群狗扑上来咬她。她在精神冲动的状态下，臆造一套幻想，有一些狼扮演她的幻想中永在的仇敌的角色。

母亲现在身体很坏，自认为已没有希望。她给济南的自己父母写信，表示对淑蒙的前途担忧，说明她渴望回到自己家庭的怀抱。父母愿意照顾这母女两人。一对夫妻对女儿的女儿承担责任，不同寻常。但是他们上了年纪，也需要人照料陪伴。另外，他们只有一个女儿了，所以很高兴“拿桃顶梨吃”——这句话是说，用替换的成员组成家庭。而且他们也有做外祖父母的对外孙女的热烈兴趣，极想看看他们已四年不见的淑蒙出落得怎样。

母亲卖掉一些财产，显然包括她从李德文的地产中分得的一所房子的一部分，买火车票，雇个人帮助打点、运送行李，带淑蒙四处告别后，开始走远路，奔东北方铁路线上的城市胶县。

据说在她们向北的步行当中，过来一辆漂亮的马车，险些撞倒她们，马车窗口一个胖子大声叫喊：“你们找死吗？”他恶狠狠地斜眼瞥了母女俩一眼，又说：“你们就象那边路上的狗。”这个穿着讲究的胖子，对车里坐他身边的自己的孩子冷笑着说：“这是一只母狗和一只狗孥。”淑蒙娘流着眼泪满腹怨气地咕哝一句：“谁叫你是闺女呢？”

在胶县，淑蒙随母亲带上馒头和蔬菜，搭乘下午9点30分的火车，到次日傍晚，便在外祖父母的家里落了脚。和诸

城相比，省会济南可算得一个宏伟的大世界了。

济南位于黄河以南九公里，这个城市中有古代中式住宅和敞开门面的砖瓦建筑的商店。街道名称反映出这个城市的政治作用：刑部衙门街，省财厅街，西长官街。许多庙宇、戏院和“花房”（妓院）分布各处。全城点缀着由于沙岩露头而形成的天然泉，还有中国一个顶美丽的城市湖，叫大明湖。

“一个欢乐的城市，商业中心，也是政治重镇，它在浮华虚荣当中仍不脱前清遗风。”当代的旅行指南中的叙述很贴切，不过军阀势力已经打乱了这个城市的生活。当中国别的城市开始现代化时，济南的手工业经济却在经济方面阻止它前进；40万人口当中如今包含5000日本人。

外祖父的房子是舒适的低矮砖房，建在本城一个安静的中心地区内按察院街上，四面房屋围起一个院落。淑蒙在第一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小学继续受教育，学校就在外祖父家所在的同一条街上一个优美的角落。不是家里就是学校，给她取个新名字，标志她的生活中一个新阶段——云鹤（“云中之鹤”）①，这是俗气的名字。

她的一个同班同学说：“这名字不适合她的情况。她没有什么‘云中之鹤’暗示的平静安详。”这名字还带有一种文学情趣，照那个同学的看法，已超出女孩家狭隘心胸的范

① 中国人很重视给小孩取名字。不象在西方，中国人没有固定的一套名字（琼、比尔、麦维斯、贺拉斯……），可以任选两个字（有时只选一个字）当小孩的名字。这两个字可能出自一首诗、古典作品或家庭传统；可能是按孩子的外貌取的，或是按孩子的出生情况取的。所以，在中国取名比在西方灵活性大，因而选定的名字也有较大的意义。——原注

围；也许是外祖父拟的“云鹤”。

外祖父的帮助在其他方面也很重要。云鹤得以甩下诸城的家庭生活中的骚乱、暴力和闲言，踏上一条大道，最后有可能在一个气氛高雅的文化城市过安定生活。济南的40万人当中只有12000名小学生（2500名中学生）；“云中之鹤”属于济南儿童中的幸运者。

云鹤说她努力学习，然而她个人的受苦经验和她那种突然流露的好恶之情，似乎主宰着她的一生。一次，有个男孩打她，周围站着的一些女孩拍拍他，表示赞成。云鹤知道她孤立，所以尽管感到耻辱，并不还手，而且再打她时也不求饶。她咬紧牙关，眼盯着地面。那天晚间，她家里的人责骂她回家太晚，然后发现她脸上一块青肿，书包一条带断了。但是云鹤就是死不说她遭受的磨难；她的自尊心太强，不肯诉苦，宁愿默默忍受她不适应环境带来的痛苦。

她憎恨道德戒律。孔夫子讲的“三从四德”，在她看来是打算制止自我表现的万恶捏造（她言之有理，因为“三从”是说：女子应“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云鹤照一家人惯例讲，应当感谢家庭恩情，努力用功，但是她对家庭的忠心异常薄弱。怎么说，女孩子要显耀门庭也比男孩难得多。

1926年或1927年，云鹤的生活中更多了一些流动性。她同母亲北上，去港市天津，和云鹤的一个异母姐姐一起住些时候。她在天津没上学，在家帮忙，打扫屋子、洗衣服、买东西。她已经憎恨家务活和20年代的中国家庭禁闭女家庭成员的做法，所以她想在一家烟草公司找一份工作，属于一排排坐着手卷香烟的儿童的等级。但是家里否决了这个计划。

1928年内回济南后，云鹤的母亲从女儿的生活中渐渐消失，以至于好多认得云鹤的人以为她母亲已经死了。看来很可能母亲又嫁人。云鹤跟母亲没有完全失去联系（后来她有了工作，寄钱给母亲），但是母女间的亲密关系宣告终了。

多少年来云鹤的母亲是云鹤保护者。以前，云鹤曾常常坐在家中，孤独凄凉，等待母亲回家，心里惊恐，生怕母亲和残暴的男人起纠纷，再也不回来。云鹤并不是真了解母亲的身世，也不是羡慕自己确实了解的母亲的身世中一些情况。她没向别人表示过她对母亲的什么衷心同情；1928年的再嫁，多半使云鹤对朋友谈起母亲时更加含蓄。母亲曾顽强地履行了她对云鹤负的责任，然而云鹤觉得童年时期没有很多值得深情回顾的事。云鹤母亲是旧中国社会的受害者，不能做云鹤决心要做的那种真正自由人。云鹤对她母亲的苦难的最强的反应，是痛下决心脱出她母亲原先堕入的那种生活。她想要投身于新颖、异常的事。

云鹤14岁实际上就是异乡城市和混乱时代的一个孤儿，一个多幻想的女孩子，没有明确的计划或展望，以适应她生活的世界。外祖父想让她受到更高的教育。但云鹤岂是个喜欢接受训导的人，而且女孩子也不易被中学录取。

山东是以戏剧闻名的省份，省内除有一些地位稳固、有声望的剧团外，还有若干低等的地下戏班子，专演地方戏的生动活泼的折子戏。这种戏班子往往和黑社会有关系，所以从那些注意搜求游荡青年的拐骗团体获得有才能的新手。可弄到的年轻人中顶可爱的称为“金童玉女”。拐子论价供应金童玉女，给需要家庭仆人或寻求可爱的养儿的人家，给大明湖地区为数很多的妓院（16岁这样年轻的女孩子就可以登记

当妓女），还供给戏院①。

1928年当中，云鹤进了一个以历城为基地的这种地下戏班；历城就是济南的一个郊区。也许是云鹤被人拐骗，或者是她糊里糊涂，孤身一人，却又异想天开，渴望奇遇，情愿加入这个戏班碰碰运气，挣自己的衣食而不必依赖外祖父母。

云鹤在入班后好多个月（也许一年多）当中，扮演小角色；她也干体力活，这是新成员应做的事。她和许多人一起生活，那些人性子粗莽，但是也和她以前遇到的什么人都不一样，引人好奇。

戏班里的少年男女，不是以角色需要为借口，把手偷偷伸过去彼此顶住吗？他们在脱下那华丽俗气的戏装的时候，瞥见彼此的肉体，不是比一般中国夫妻在一辈子婚姻生活中瞥见彼此的肉体还多吗？谦逊想来是这些金童玉女的一大美德，可是喝彩没有令他们的头脑发热吗？这全是实情，它改变了云鹤的生活。

她爱新鲜事物，她禁不住陷入幻想，而且她入戏班时期也给她证实另有一个生活圈子，比在家里或在学校束缚少。在这另一个生活圈子中，她可以做外向性格的人，这原是她自身的一时冲动；在戏院中做这种人很自然，在旧式的社会圈子里做，就是那样不自然。

云鹤“象不熟要熟的瓜”，楚楚动人，然而仍具有迷人

---

① 以下是那个时代的一段记载，记述招小老婆、妓女、女童伶和家里丫头的方式：“于是，最后谈了他们的来意，就把姑娘们带进来，她们为这个场面穿得挺好，脸上涂脂抹粉，漂漂亮亮。但是买主是非常狡猾的商人，不容欺骗。他们往往要强迫女孩子提起肥大的长裤腿或长袍，好看见她腿上皮肤的颜色。有时人家要拿块布弄湿，擦掉姑娘脸上的粉，弄清粉层底下皮肤确实白皙。有的时候还要在她的身子上各处摸一摸。”——原注

的天真神态。人家把她看成一个“会讲话”的姑娘，她只要能避免冲动，也做得到雅致。就一个14岁的女孩来说，她的乳房算是很大了，她的眼睛“明亮却无表情”，所以她常给人当成18岁的人。一个评论她的人说：“她自信相貌迷人，才高傲虚荣。同时，若触及她的不良的家庭教养，也容易刺伤她的感情，所以她略微有点奴态，还有对一般人的逐渐增强的恼怒。”班子里的男人有的认为她极吸引人；有的认为她早熟，这朵花不情愿等待蜂蝶来献殷勤，它随风向高远处飘荡，去迎接蜜蜂蝴蝶。

云鹤爱好演戏，从化装、戏衣和明亮的舞台灯光得到刺激，她开始把演戏看成一种可能从事的职业。可是，地下戏班还是透出一点卖淫的气味。班子里的玉女不但不受家庭监督，而且容易碰上赚钱的老板的一时兴起。这就使云鹤对女性那种基本上软弱无力的地位（无论它表面上多么吸引人）及所陷入的困境有了更深的经验。

一天晚间，云鹤的外祖父和老伴抽出一个晚上去看《打金枝》的演出，不再为云鹤的失踪而在附近一带焦急地坐等。《打金枝》是一出京戏，演的是一位公主因为不想出席公爹的寿宴而挨打。汾阳公的这位不走运的美貌夫人，上场时身穿鲜艳的蓝色绸衫，头戴镶饰珍珠的女冠，一张用粉搽成雪白的脸。两位老人一看，原来演这个主角的竟是他们自己丢失的外孙女！

云鹤想过回家吗？近几个星期，掌管戏班的顽恶的经纪人，显然已开始虐待她。在这样下等的社会圈子里，年轻姑娘没有自由，未来前景凄凉渺茫。云鹤初尝演戏的滋味，引诱她入了戏班。但是她也看出戏班乃是性欲、金钱和男子权力的战场。她虽然大概心情复杂矛盾，但在外祖父的劝说下

还是同意回济南。

戏班老板把自己的金童玉女看成“摇钱树”，为释放她索价奇高，外祖父东拼西凑，硬筹足这笔巨款。云鹤向老板这个阴险人物行三鞠躬礼，然后随外祖父默然离去。老人希望她再上常规学校，但是不知怎的，狂蜂乱蝶已经使这朵花扭头，面对新的方向：云鹤已体验到幻想当作解决人生挫折的手段有多大力量。

就云鹤来说，家现在就是济南了，这是个面临革新挑战的老城市。左倾、不随常规、男女平等的新浪潮，使济南的进步的外缘和本城的传统制度形成对立。这种冲突对云鹤有明显的个人意义。很可能她的外祖父母正打算为她安排婚事，让她嫁一个可以把她领走、使她进入殷实可靠人家的青年。有没有方法在济南的现代思想新浪潮中随波逐流，避开这样的命运呢？

云鹤听说有一所新成立的“实验艺术专科学校”，接受山东省的资助，正为青年人提供从事美术、音乐、戏剧专业的职位。她报名申请参加入学考试。她告诉朋友说，这件事毫无损失。这和参加文官考试不同，考艺术考不好不丢面子。而且女孩子比起男孩子失败的危险尤其小，因为大家对女孩子的期望都较低。她被录取为1929年春季始业学期的学生，这使她惊喜交集。

外祖父带悲观情绪叹了口气，说：“煤油就得装在煤油瓶里。”他认为云鹤的性格中某种缺点正拖她趋向恶劣的命运。

戏子在社会上素来受人轻视，然而五四运动的革新浪潮也荡涤一些这种偏见。实验艺术专科学校是个高尚严肃的场

所。学校高年级学生的周末演出成为济南的有名活动。这是学校由省教育厅供给资金，展开新局面的迹象。每个学生不但免学费和膳费，每月还得到六元的津贴①。一个学生回忆当时情况，说："我们吃鸡鸭鱼肉。"没有补助金，云鹤本来就不能入学。她决心谋求进学校，一部分原因是决心摆脱外祖父母的控制，而只有她离得开他们的经济支持，她才可能摆脱控制。

实验艺术专科学校设在一个旧孔庙中，教授古乐和戏剧，但它也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山东走表演艺术新道路的先驱。教师当中，赵太侔是著名艺术家，兼任校长；王泊生的戏剧课对云鹤产生影响。象这类教师都熟悉西方文化，而且相信中国的进步需要东西方价值观的融合。

有一个评论者回顾说："开学那天，她活力充沛、精神兴奋，四处蹦蹦跳跳。她穿一件白衬衫，黑裙子，梳着两条长辫。一个可爱的天真姑娘。别人给她取了一个浑名叫'小兔'。"不久，她就黎明起来练嗓子，利用排练室内墙上的长镜子，琢磨手势和面部表情。

艺专的新学员要求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力"。"小兔"不是中学毕业，是按"或同等学力"的规定钻进来的。一个叫王庭书的同班生回忆说："只有三个女生，云鹤是一个；因为表演艺术女生来源不足，她们的录取标准比男生低。"有两组入学考试，一组在济南举行，一组在北京。北京渠道招收一些最好的学生。这些新生老北京话比济南新生讲得清楚，而北京话是演戏要求讲的话。

王同学讲："云鹤通过了济南考试；要不是有个偶然因

① 云鹤在山东和上海的大部分年代，一元约合30美分。——原注

素，甚至在济南考，她也不会考取。”她一头长发飘垂着，这种发式在中国南方很普通，但是北方极少见。有一位老师吴瑞燕，正因为缺能够演漂亮小姐角色的梳长发的女生而发愁，一见云鹤的垂发极为高兴。这就帮助云鹤“通过”考试。

但是云鹤一录取就把头发剪掉！她受济南的现代社会思想“新潮流”的影响，想表示她和男子完全一样，是个自立职业者，而不是孤苦无靠的俊俏的可怜虫，在局外等着来个男人把她撮起来。

王君是个精神抖擞的时髦男子，瘦而有力，他是通过北京考试考入艺专的。他接着说：“吴老师见她的新学生的长发剪掉了，悔恨得要命，但是李云鹤并不是那种对自己来说不合适也要服从的姑娘。”云鹤本来演现代剧中漂亮的农村姑娘是理想角色，铰掉头发，暂时她演什么角也不合适了。

在旧中国，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待艺术，把艺术看成能使儒家社会制度大厦的砖石各在其位的水泥。戏曲的情节宏扬孝道。说书人是老百姓的历史教师。歌是为干活时唱的。

但是在艺专，“小兔”学的戏是社会变革斗争中的武器——用日后共产党的常用语来说，就是“反封建剧”。她阅读和中国的老一套歌颂形成对照的歌颂个人意志的外国文学。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要使她一生的思想改变色彩。一个同班生回顾说：“她一读它就想演娜拉这个角色，开始把自己看成一个心里分明想要捣毁玩偶之家的家门的娜拉。”

云鹤没学过什么外语，也没受过大学教育，没获得大学讲授的社会知识或科学知识。但是在实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

的科目很起作用，能激发思想，叫学生眼界大开，生活改变，使他们由普通青年转变成具有潜在明星感染力的表演家，成为一个分裂的社会的名士派先锋人物；这个分裂的社会，一边是濒于崩溃的旧传统的枷锁，一边是要求革新的不成熟的热情。

艺专的教育是一种西化教育。在音乐系（另外两系是表演系和编剧系），每个学生必须选习一种西洋乐器或中国乐器。云鹤选钢琴。这表示她一只脚跨出中国传统以外。她是把音乐看成个人自我表现来学习的。至于戏剧，假如没有王泊生和赵太侔带来的西方影响，想教会一个乡村姑娘化装登台表演，这主意本身就是不可想象的。

云鹤并不是出色学生。王庭书讲："唱京戏她经常跟音乐不合拍子，而且唱到一定的音高守不住。那么她就用山东土腔咒骂。"王君向访问他的记者苦笑一下。"说来很抱歉，我们全笑话她。"弹钢琴时云鹤的速度不匀，因此老师用竹棍敲她的手腕子，逼她弹琴时再多有点控制。

云鹤虽然稍有些粗鲁，但在性方面却对许多男生有吸引力。王君热情地说："她肯定是女生里最漂亮的。她和一个叫谭文的音乐系学生有交情，跟一个叫魏鹤龄的学京戏的学生相好。"她曾和一些别的男生大声争吵，包括现代剧专家高永辉；这表示她是个爱吵闹的顽皮姑娘，要不然就是她这人透出一种性感的气味。

庙中建筑群的内殿中央，是一尊宏伟、严峻的孔子塑像，戴礼仪头巾，周围是他的七十二弟子。王君回顾说："我们那时都年轻，对这座古庙不熟悉，这地方迷信气味很浓，庙中建筑使我们敬畏，虽然我们自认为是'新派'，但也有些害怕。"没有人敢进入内殿，尤其在夜间，大家总认

为那里鬼气森森。“一天，有个学生宣布来一场真正吓人的竞赛。他说竞赛的目的是要发现哪个男生真有胆量。假如真有人午夜后潜入内殿，走近孔子塑像，爬上去除下那块礼仪头巾，拿出来到亮地里，向班里同学证明他勇敢，奖金就归他。”几夜过去了，奖金依然高悬，没人领取。没有学生能破除顾忌。然后，一天夜间，宿舍里沸腾起来，大家惊奇万状。一个女生抓着那块头巾从内殿走出来，一副厚脸皮洋洋得意的神气。那就是李云鹤。

王庭书说：“那以后，她成了令人难忘的人物，一个女孩子做出这事真叫我们惊奇。我们男的实在是吓得不能做，万万没想到有个女孩子会做了——毕竟这塑像是孔子啊。但是那女孩真就去做了。她是个令人震惊的人，她挑起风潮，她吸引人注意自己。”

云鹤在实验艺术专科学校的一年左右期间，学到不少东西，发展了她的自我表现的情趣，终于，一些热情的、难免感情夸张的表演为她赢得称赞。在旧戏中，云鹤演的角是“青衣”。这是演严肃的悲剧人物的成年正旦角（和饰演丫鬟、妹子或卖俏姑娘的“小旦”角截然不同）。并不是人人喜欢云鹤的表演；凡是喜欢她的表演的人，都是喜欢她给演悲剧主角的青衣这个角色增添的活泼、放荡情调。

但是，随着自己的前进——而且越前进越甚——云鹤感到自己仿佛是在丛林中生活，斗争特别有价值。每天她准备着遇到下一次侮辱，盘算对付它的方法。她和那个时代的中国几乎任何有才能的姑娘一样，面临一个矛盾。家里人不指望她挣钱或显耀门庭，仅仅指望她抓住一个男人，所以鼓励她显得俊俏，甚至风骚。然而，一个有志气的姑娘弄情卖俏，就容易被误认为爱出风头招引人，使人用恶意眼光看待

她的才能，实际上看成妓女的献媚功夫。所以，如果说云鹤是个难对付的人物，其原因不但在于她自己的性格，而且在于她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姑娘，在一所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的学院上学，有这样的处境。

王庭书说："她显然是相当穷的人家的姑娘。学生大多数每月得到父母给的钱，但是云鹤不然。至于云鹤家里的人，谁也不去打听他们，因为既然知道他们的处境低下，我们便不想跟他们认识。"

三名女生合住一个宿舍房间，这间房和教室一样，也是从前的孔庙一部分。云鹤和两个同房伙伴都打架。在戏里的角色问题上有争执，又因为一些品评自己古怪衣服的话，她感觉受到轻蔑。并且，一个女生是王泊生教授的妹妹，而云鹤素常比另外两人会的男朋友多，这两点也造成紧张关系。

一天晚上，云鹤抓住机会扭转局面，对她的一个从宽录取的女同班生占了上风。在大众喜爱的周末演出会上，演了上海作家田汉写的一个剧《湖上惨事》，主角由王泊生的妹妹扮演。但是本星期一又加演一场，把主角派给云鹤。虽然观众比周末的观众少，她却看出一个好机会，来证实自己正确。

云鹤的身心完全投入这悲剧主人公的角色，礼堂中几乎每个人都哭了。或者是由于一时激动，或者是由于自己以成功的表演回击了对头，感到兴奋，云鹤两眼也开始淌出泪水。在后台，她正擦掉脸上的化装时，艺专校长和她的戏剧老师跨进来称赞她。她禁不住激荡身心的异样情感，又突然放声大哭，疾冲出化装室，她的辅导老师直落得个目瞪口呆。

1930年后期，政局发生变化，砍掉山东省实验艺术专科学校的预算，学校成为受害者，关闭停办。受过一半训练的学生，不得不面对朝不保夕的生活。济南的艺术受着军阀和日本人的排挤和压制。有少数学生被北京戏班聘去，另外一些学生在比较现代化的上海电影界找到事。许多人放弃了表演艺术，另就庸俗的工作。

王庭书回顾说："云鹤和我及一些别的学生去北京了。我们的老师王泊生收下我们。他把我们编入他建立的'歌咏团'，并帮我们争取扮演首都各剧院中的小角色。云鹤尽管在《打金枝》和一出关于一名胸怀大志的娼妓的戏里短时上过场，但在北京并不得意。"王君讲："她就是赶不上北京风格。由于有地方习气，讲地方话，她得不到北京的观众或剧团的认可。"

云鹤回到济南，没有人提出给她一个工作职位。她也没有舒适合意的家可归。她当时知道，她缺乏正规高等教育和可靠的家庭背景，构成了她的障碍。在她看来，只有凭自己的才能、个性或阴谋抓得到的东西才会是她的。

有个姓费的青年，是中学毕业生，爱好京戏和地方戏，到艺专去看《湖上惨事》的演出。可巧云鹤那天晚间上场。费君这个济南商人的儿子，被云鹤的风度和美貌迷得如醉如痴。费君是个禀性孝顺、务实的人，比云鹤大几岁，人长得也很象样。云鹤非常高兴，她在《湖上惨事》里出场，引起了观众当中一个人的激动。她和费君会过几次面。

艺专一关门，云鹤没有事做，而且手头拮据，因为她在艺专呆了几学期，她和留下的家庭成员的距离比以前更远了。不止一个朋友劝她顺从大势，求得保障："不可让金龟跑掉。"这是面临"好出价"的姑娘的座右铭。1930年底，

她和费君结婚，按照社会风俗，去费姓商人家里住下，做一个受拘禁的儿媳妇。

这似乎是非常旧式的落后的一着棋。也许云鹤的外祖父母再度发挥他们的影响——云鹤还只有16岁，鼓励费君能起作用。王庭书回顾说："大多数新娘要付一笔陪嫁费。为这个理由，在艺专我们都认定云鹤不可能那时结婚。也许是家里人给她出陪嫁费，让她嫁这个青年。"

也许是因为在艺术界另开一个大门之前，云鹤简直看不出别的门路，全是由她独自作出这个决定。

这段姻缘只有几个月，最末几星期家里一团骚乱，喧闹争吵不休。人家闲谈议论，说云鹤懒惰，"睡觉睡到日上三竿"（大约上午10点）才起，"象个指别人去厨房给她端来菜的阔太太"似的在那里坐着。人家指责她对费君的母亲缺礼教，受不惯家规的约束，总离家跟一伙人聚会或找不三不四的朋友，她不能理解她已经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处于费家排行最低的新媳妇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

费家的生活按经济说是安乐舒适的，但这对李云鹤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事。

随着紧张关系的加剧，大概费君也对她发过火："你简直闹得鸡飞狗跑。"结婚前，和女演员一起生活的念头令费君兴奋激动，但是后来，他行使他完全占有妻子的特权，要求妻子除掉轻浮，具有质朴的德性。在云鹤方面，此时和在日后生活中，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准许婚姻阻碍她的个性的成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平常的老话，对她的天性来说，禁欲主义气味简直太浓了。

大明湖中碧波荡漾，游船轻轻滑过湖面，鸭子发疯似的乱叫；此时湖边石凳上，这一对不幸夫妻终于化恼怒为无情

的谈判。据说云鹤曾要求建立“小家庭”，这等于说要分裂“血统家庭”（两代家庭），只和费一起生活，成为两口之家。她叫费在媳妇（她自己）和家（指原来的费家大家庭）二者之间作出抉择。

夫妻两口的简单人家，在1930年的中国很少见，由年轻媳妇（而不是由丈夫的父母）提议，实令人不能容忍。费君断定这样的要求是个策略；“他的”女演员不再是他的，她想要离婚。费的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多半云鹤想要费提出离婚，这样在财产分配上就对她比较有利。

在济南社会的现代化的外缘，受过教育的年轻妇女要求离婚，这种作法即使仍然有点鲁莽，也几乎成时髦了。它象反对缠足、卖淫和纳陪嫁费这种习俗，也象支持自由结婚和3月8日庆祝妇女节——是解放的标志。

云鹤请教了一个亲密的女友，那女友是个现代名士派。女友去找费君，代表云鹤谈离婚条件，讨价还价。结果达成“无条件离婚”的协议，就是说，男方不对妻子提出任何要求。张皇失措的云鹤松了一口气。她犯了错误，又纠正了这个错误，开始认识到她被诱入通常禁止涉足的领域。她暂时享有一种令人感伤的自由。她的离婚给外祖父母带来很大麻烦，她比以前更彻底断绝家庭支持。

云鹤的心念转向上海，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娱乐业的中心。谭文已经去那里，而且她挺喜爱他。王庭书也在那里。她知道他喜欢她，她假如把心思集中在他身上，也许会喜欢他。但是上海远在南面650公里以外，而云鹤没有山东省外的关系，自己的钱又太少，不能去什么地方长时闲逛。就一个16岁的姑娘来说，她的阅历算是很深了，但是她没有踏上一条明确的道路，她在济南的日常生活，和她已开始对未

来怀有的梦想之间，出现一段差距。

云鹤打听前艺专校长赵太侔，他曾称赞过她在《湖上惨事》中的表演。她听说他在青岛，在新成立的青岛大学做教务长。艺专同学告诉她，这个海港城市在她的故乡城市诸城东面80公里，是个艺术生活和政治生活很活跃的地方。也许他能帮助她。

她买了火车票，把她的少量财物捆扎起来，把她在离婚时从费君那里接受的钱小心翼翼地秘密夹藏在衣服当中，觉得没有什么落在济南了，这才往东去青岛。

云鹤每次跟一个情夫绝交，都离本城到另一个城市开创新生活。跟费君是这样做的，将来跟第二个、第三个丈夫也会如法炮制①。

青岛是个比济南新的城市。青岛有纱厂，处处见得到德国大鹅卵石。它是个洋气的工业城市，居民约40万，是开"通商口岸"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中国和西方开始有联系；联系的情况是不和谐的，然而很惹人注意。济南是在国民党人统治下迟后开始现代化的，而青岛骨子里就是现代城市。在先锋文化、社会主义思想和鼓动民族精神反对日本侵略这几方面，它都走在山东省会济南前面。按城市的气氛和布局来说，它是个半西方式的城市。

云鹤用明信片给赵教务长兼文学教授写了封短信，说明

① 后来，云鹤有理由怀念她的第四个丈夫毛泽东的童年比她的童年稳定得多。毛16岁以前从未离开湖南省他的故乡村子。到那个岁数，云鹤已经在三个城市中许多房子里住过，离开家人独自生活，交过许多男朋友，还嫁过一个丈夫。毛的父亲作风严谨，不象云鹤的父亲那么粗暴和粗心。他母亲是个虔诚信佛的妇女，比云鹤的母亲纯朴而恬静。20世纪最初10年当中，湖南也不象山东那样有社会动乱和帝国主义者的侵扰。——原注

自己是济南来的他从前的学表演艺术的学生。但是赵没有给她安置工作，也没有让她进青岛大学做学生——这两样哪一样她都会欣然接受的，以致最后她在他的办公桌旁突然大哭起来。她从这位教务长得到的，只是在宿舍里有个暂时居住的房间。她坐在房中盘算着她怎么才可以闯入青岛的文化生活①。

云鹤决定利用后门，去找赵的妻子。她壮着胆子乘马车去俞珊的家，俞是京剧专家，和她丈夫一样著名。俞珊是个文雅的妇女，出身于比云鹤的社会阶级高几等的社会阶级，家庭受到耶稣教的影响。俞珊为这女孩的精神所感动，对这女孩在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社会中做流浪的离婚女子的苦境抱同情。她在两方面给了云鹤帮助。

中国的图书馆常雇用大批小职员，青岛大学图书馆也一样；由于俞珊对丈夫的干预，云鹤很快就当上大学图书馆的小职员。图书馆建在一座小山旁，眼前大海在望。它是德国水泥建筑（校园原先是德国军事基地）；红瓦，美丽的花格子窗户不装玻璃，漆成红色，和屋顶相配。前门口顶部有半月形装饰门廊；云鹤穿一件布料西式女服，坐在门口内侧一张小小的木桌旁，用她那漂亮的笔迹填发借书证。图书馆在校园中央，一边是讲堂，一边是整洁的西式宿舍。云鹤跟人们接触，感觉到校园生活的动向。她是个惹人注意的女孩子。她谈聪明的闲话；她听到新闻，刚从一只耳朵进去，就从嘴里出来。

---

① 若干年后，云鹤谈到她当时对赵的失望，绝口不提她不够资格。她讲赵主张怯懦的改良主义，和她的真正的革命主义相反，根据这一点解释她和赵的冲突。——原注

她做图书馆职员有权旁听课程。她听中外文学史的讲课和讲创作的课，这些课大多由抱左翼观点的教授讲授，他们原先曾在美国留学，回到动荡不定的中国后，现在对有探索精神的一代中国知识青年的思想有极大影响。她写当时的热情风格的小说和诗。她甚至写过一个剧本《谁之罪？》，写一个青年左翼分子，他的政治活动造成母亲的死亡和自己被捕。但是这些作品没一件写得好，能使人觉得她将来能过作家的生涯。云鹤在高攀文学领域时表现出她的厚脸皮作风，哪一门称心如意，不论它超过她的水平多少，她也要碰碰那一门。

和往常一样，李云鹤给一些人留下鲜明的印象，但是她由于跟别人争斗，对小挫折反应过分，毁坏了自己的成功机会；她在对人不公平的发脾气，和对己不公平的忍痛退缩这二者之间，简直不能找出一条中间道路。她说，一部著名小说的作者杨振声教授“羞辱”她。她的戏剧教师嘲笑她是政治傻瓜。赵教务长记下她来，列为捣乱分子。并且，她的许多同学往往觉得她爱寻衅、难对付或没有准性。这没关系，在青岛大学，云鹤的日子就要充满比学术细节更愉快、更重要的事了。

俞珊的第二个帮助就是把云鹤介绍给出色学生、政治活动分子、俞珊自己的弟弟启威①。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尼姆·韦尔斯说：“就一个中国人来说，他的个子算是相当高了；他穿着长袍，有点邋遢。他面目英俊、富于表情，带一副自然大方的笑容。”斯诺夫人和许多人一样，极赞赏俞启

① 俞珊采取这个步骤，可能是出于忧虑，怕云鹤跟丈夫在开头闹僵之后又太友好了，使自己感到不自在；还因为她不愿意跟赵争吵，恐怕赵丢掉教务长职位，给他们两人带来不良后果。——原注

威的人品才干。“他又冷静，又沉着，又文雅，又宽容。他有领导才能——他一走进屋里，这种品质就仿佛弥漫全屋，即使他态度安详，还有点羞怯。”女人喜欢他。

俞启威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个领袖，在青岛和别的地方，这种组织和公开的表演艺术界、文艺界保持着复杂的、不明确的关系。他是上层阶级的青年，屈身降低社会地位，协助共产主义事业。云鹤是个出身低下的姑娘，眼光向上，寻求任何可以使她彻底实现个人抱负的事业。

赵教务长的住家是绿叶茂盛的山坡上一座两层砖房别墅，红瓦、高烟囱、绿漆窗框，使人回想起欧洲的海滨城市。这一对情侣成为赵教务长家里的常客，渐渐亲密起来。

这个城市最诱人的地方是青岛码头。长长的漂亮码头，钢桩与钢桩之间悬垂着巨链，姿态优美，每根桩支着一架木兰花灯。码头尽头是一座中国旧式亭子。日出时，云鹤和启威去那里，那时鱼腥裹着盐的气味冲鼻。青岛城在群山衬托下开始显出象一幅德国油画。他们更常在夜间去码头上。月光照耀下的海面成一片银色的原野，两人倚着栏杆紧紧挤靠一起，眼望那些船只，船上灯光闪烁，象黑暗的柔美夜空中一颗颗星；或者在海边长时漫步，聊妇女运动、社会主义、性爱自由、《红楼梦》和别的小说，以及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危险形势。青岛是个多海滩的城市，启威常下海游泳，然而云鹤不会游泳——她来青岛之前从未见过海，就坐在小船上，注视着穿简单的新式游泳服的启威。他们在海岸美丽的白色沙地上长时间散步。他们双双参加研讨会和进步的文化活动，既是正事也是乐事。

俞启威的一个近亲回忆说：“这一对恋爱上了，1931年当中他们开始同居。”这是新式结婚，不要结婚证书，显然

也不举行什么仪式。

云鹤找到一个胜过费君十万八千里的伴侣。他是一个聪明而有学识的青年，生物专业的大学生。假如他不在政治活动上花那么多时间，成绩等次会更高的。俞出身一个既富于理想精神又社会地位显赫的家庭。他涉足激进的政治活动，在云鹤眼中带上一种诱人的神秘色彩，还有一种使命感。当时，云鹤同他在青岛现代化的、反封建的情调中生活，不是处在儿媳妇的奴仆地位，也没有多少家务杂事。

俞君在大学的共产主义小组中的职务是宣传部长，由于他的介绍，李云鹤进入“共产主义文化阵线”的圈子。她凭仗自己的几篇手稿、高涨的热情、跟年长男子的极力亲近，以及俞的力量，显然能够参加“左翼演员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三省，青岛大学发生罢课和教员斗争（围绕抗日的方式应激进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她参加情绪火热的“反帝联盟”。她投身“海滨剧社”——一个有时代特征的团体，拿戏剧艺术的威力跟日本枪炮的威力针锋相对，把《放下你的鞭子》一类的戏带给乡村地区的居民大众，这出戏演的是东北难民在东京政府的统治下受苦受难的爱国故事。她感觉自己是历史的一部分，卷入一场看来将引导中国——和她自己走到一个新高原的运动。

云鹤的民族义愤强烈而纯真，然而她的政治知识却很贫乏——她甚至不懂得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她渐渐成为有些成就的演员，共产主义阵线的集团中的宝贵人物。然而这种活动没使她得到什么重要地位，还不如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在这两方面她也没有显露头角。她实际是精悍有力的俞启威的附属物。

俞君令她心醉，使她的眼光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相当重要的是认清日益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运动；俞介绍她认识一些值得注意的人物，那些人属于社会精英，可是正走向政治上被遗弃的边缘。过了多少月，云鹤还不知道俞是共产党员；如果他很晚回公寓，她就责备他外出会别的姑娘，虽然实际上他是参加基层小组会去了。但是，俞君这个承担任务的政治活动分子，对顺从的云鹤逐渐产生影响。

尼姆·韦尔斯回忆说："俞实在是一种上等人物，所以我一直认为（李云鹤）也不会相差太多——要不然他就根本不会同她结合了。"

1933年2月里一天，冷飕飕的天气，海港上面白雾弥漫，云鹤正一只手臂勾着一个瘦瘦的男大学生，沿工业区内一条街的碎石道走着，夹在从啤酒厂和纱厂出来往家走的工人们那苍白的拉长的面孔中间，不惹人注意。这一对男女缓缓向前移动，头斜靠一起，情话绵绵。

云鹤为获得这个时刻曾努力工作，也交了钱，虽然她和紧抱住她的这个男人勉强算认识——那不是俞君，而且她也不知道这次傍晚漫步的最后结局如何。那边有一个小公园，园内有柏树和修剪整齐的灌木，有一个亭子里陈列着海洋展品。他们走到这小公园附近，转入一条胡同。那男子往后面扫了一眼，然后他们就消失在一座仓库中。半小时后，云鹤完成登记、宣誓，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青岛支部委员。

虽然这事情蕴含危险，在应付党的重要人物时需要有遁词，但云鹤出于一种模糊的动机，还是走了这一步。固然，她早已开始憎恶中国的旧社会制度——这即使还不足以成为转入共产主义信仰的跳板，也毕竟是一个跳板——然而，假使没有俞启威，她就不会来到这座仓库里，正式参加中国革

命了。甚至当跨过那个门槛时，她的情感仍然倾注在剧院中可以有的自由和幻想上面。在艺术不言而喻是左翼艺术的时代，在那种时代的基调中，一个热情的年轻女子还不必在舞台上的自我表现和共产党内的自我克制二者之间作出抉择。

党员李云鹤有时样子象个叫花子，然而她也不是不讲体面。青年政治活动分子要样子十分邋遢，吃饭没规律，藐视一切习俗惯例；这虽然不是必不可少，但照规矩总须如此，云鹤自不例外。她的腿瘦得皮包骨，穿短衣服，步态活泼，所以人家给她取个绰号“两根梗”。但是在举行特别活动时或在娱乐晚会上，她就穿上宫式高领旁开襟的蓝绸旗袍①露面，突出显得是个异常迷人的女孩子。她低颦浅笑，妩媚动人；她专心致志，带着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静听她的生活圈子里的男子发表热情洋溢的政治言论，时而用洪亮的嗓音插一句她自己的简短、谦逊的评论。

突然，云鹤失去了俞启威。国民党政府开始镇压“50名最有力量的城市共产党人”。青岛大学在压力下要把共产党学生排挤出去；显然，学校给一些人提供50元，劝诱他们离校。一天晚上，俞启威在中山路一个公园里正跟两名共产党同事商量事情时给人搜到，被逮捕。他被关进监狱。俞珊派人叫来云鹤，告诉她这个消息。云鹤彻底垮了。她放声大哭，她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有几个星期她一直心惊胆战，坐立不安，开始怀疑共产主义道路是不是适合她走的道路。

---

① 旗袍是满人（称“旗人”）引进汉人生活中的服装。满人有些象游牧民族，妇女粗野倔强。满人进入汉人皇宫后，感到应当使满人妇女带女子气，结果创制了旗袍。除高领外，旗袍右面有一个新月形开口，从下巴底下直到腋窝，紧身腰（防止不淑雅的动作），侧面开缝，以便妇女碎步轻轻移动（但不能大踏步行走）。旗袍的蓝色代表“忠”。——原注

几个月后，俞君被释放。他的家庭属于那类能施加政治影响的家庭。俞珊曾和启威的叔父俞大维联系，这位叔父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俞大维为了侄儿出面干预。他打电报给俞珊，引孔子的话："心安勿躁。"俞大维认为他侄儿以及和侄儿一道的人"实际上是爱国心切的人……他们年轻，反对外国欺压中国"。他说："我认为他们不该下狱。"

俞启威出狱后离开青岛。共产党显然给他指派了新任务。反正他是去北京了，在北京的激进学生运动中工作。云鹤失掉了他。只有在启威被关进监狱时，她才认识到她深深喜爱他。也许她当时觉得假如他真想呆在青岛，他就可以在青岛呆下去。在启威坐牢期间，她交上一个男朋友——一个学体育的姓乔的学生——来减轻她的寂寞，这件事可能惹得启威跟她作对。也可能是警察讯问云鹤，要她谈启威的情况时，她有意无意地在政治上"出卖"了启威。

或者，也许云鹤开始认为姓俞的这一家子——共产党员启威、文雅的艺术妇女俞珊、在蒋介石政府中当重要部长的叔父俞大维——都是自己高攀不上的人物。

境况衰败了，她决定离开青岛。也象在济南，只要了结一场婚姻，她就想改变她的整个环境。什么事也挡不住她到另一个城市去努力重新做起。为什么不奔自我表现的堡垒、中国的纽约、神女城上海呢？

云鹤的孤独的童年造成一种几乎非中国民族性的个人主义精神。她类似幼年时代的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也是个孤独的孩子，和她父母的其他儿女的关系不亲密，很早（10岁时）就成为孤儿，常常因为穿人家给她穿的不合适的衣服

而苦恼。这两个女子都把早年的心灵创伤化成创造性和独立精神的源泉。

云鹤周围的人，大多数都由家庭教养成和普通人一样，而且自己也这样追求。他们象一般中国孩子，走过一条从幼年期的娇生惯养到青少年期的严厉管教的道路。云鹤则不同。她有顽固的意志，还有保存在记忆中的那些她认为特别倒楣的往事。云鹤最不希望的就是象别的女孩子。

她没有这种经验——或者说这种问题：有个父亲强迫她成一个超级女性角色，把她塑造成一个依赖人的小女孩，训练她做一个玩偶，供未来的主子娱乐。她缺乏一个男保护者给她坚定不变的爱，直到她进入青春期；同样，她也没有关于亲密的兄弟姐妹互相谦让的经验。

云鹤早年受母亲的溺爱，以后她非但没有受到控制，反而一味自行其是。她的自负没有按通常的中国方式，在父权母权的重压下和集体压力下被打消。不管怎么样，她总是独往独来，中国年轻人最不该如此。

随着精神的独立，云鹤又滋长了一个信念：如果她不想被人践踏，她就需要争斗。她的家庭教养中的混乱和紧张状态，使她产生忧虑，担心自己若不警惕就可能出事。她必须抵抗年长的男人（她父亲、地下戏班老板、费君）；她对付暴力，也施加暴力；她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能保护正义而正在瓦解的社会中。在云鹤看来，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和睦、把任何敌意全“咽到肚里”的做法是不正常的，尽管这正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作风。她要把事情两极化，即使没有可两极化的成分也要这样做。例如，她非但不掩饰她的感情，反倒拿感情当斗争的武器。她关于家庭争吵的经验，多半使她的个性带上心胸狭隘、爱耍阴谋的性质。

云鹤感到自己被剥夺了正当权利，她寻求报复，因此当她长大成人、从山东向外发展时，她的性格的第三个基础（连同精神独立和斗争冲动）就表露出来。孝顺和一般对权力的固有的尊重，一般认为能使中国年轻人对生活磨练抱坚忍态度，可是，云鹤却时常反击仇敌：如果她不能这样办，她就把不满记在心里，将来算帐。

云鹤在济南的同学王庭书说："我一回想当时我天天见到的李云鹤，就觉得她的经历真令人惊讶。她终于成为'戏剧巨头'，使中国的艺术生活绕着她的小手指旋转。但是我知道她最初是个天真的人。是的，那时她的性格倔强而热情，但是她的心胸单纯而狭隘。"王君回忆起那个时代他们一起在山东时，眼睛发亮。"我是应当惋惜一枚上等标签贴在一件这样劣等的货物上呢，还是应当因为她自制标签，因为当年我认识的云鹤飞得这样高，而感到安慰呢？"

第 三 章

在上海的舞台生涯

（1933—1937）

我只晓得我要养活自己，我爱话剧。

——李云鹤（江青）

在去往上海的船舱里，李云鹤十分激动，不知她到上海后和这些聪明、漂亮、粗暴的陌生人相处是什么光景。当短粗的火轮终于从东海驰进横穿上海市的弯曲的黄浦江时，她感到自己在疾病和男性这两个长期敌人面前有点胆怯。

她一路呕吐不止，因为波涛汹涌，她又没坐过海轮。更糟的是，济南艺专一个姓王的受山东联合阵线之托陪她到上海来。此人殷勤过头，竟然想利用她生病的机会逼她到上海之后同他住一个房间。真是个讨厌的猪。

火轮停泊在满是航船的码头上，周围挤满中国最大城市的急躁的人群。李云鹤飞步走下跳板，高跟鞋都快跟不上她的细腿了：她急切地走着，把病痛和那个蛮不讲理的保镖都甩到脑后去。史东山会不会按计划来接她？

她在码头上找这位电影导演，急得差不多又要吐了。突然，看到史东山了，还叫了一辆银灰色的出租汽车，一直把

她拉到他虹口的家里。当时李云鹤心神不定，忘了一件行李。

西方人和中国企业家涌向上海的高潮刚刚过去，上海充满各种矛盾：激动人心又令人伤心，享乐至上盛行而到处又是基督教传教士，腐化的同时又是左翼理想主义者的活动场所，充满机会却又处处不公，曾是趾高气扬的欧洲人在远东经商的乐园但在日本攻击下又岌岌可危。这个城市是贪婪、刺激和死亡的万花筒。

如果说北京是政治城市，上海就是金钱的都会了。国民党粗放而有效地统治着这块地方。即使是关心政治的人也不太清楚刚遭屠杀的共产党。实际上，除了共产党的信仰者外，没有多少人知道江西的荒山上有个毛泽东在建立军队。

毛泽东和其他1927年在国民党和军阀镇压下撤离城市的人反对“城市道路”，要走“农村道路”，而上海共产党争论不休的总部是支持通过“城市道路”夺取政权的。不同意毛泽东“游击主义”的上海共产党人倾向苏联，转入地下斗争。但他们和在青岛等地一样，对文学、戏剧界有不小的间接影响。

19岁的姑娘到上海来碰运气，就跟上海本身一样，既不怕过去，也不想将来，只考虑眼前。作为一个“左翼分子”，她是倾向“城市道路”的，因为她分不清小米高粱，也分不清骡子水牛。她年轻，一心想当演员。来到上海了，如果有本事也许会成功；如果不成功，象她这样出身低微又想搞艺术的人只能去当妓女。

和李云鹤同时代从事电影事业的女演员康健回忆说：“看得出她是农村姑娘。她很俭朴，不蓄意打扮，后来骂她的人并不对。她相当动人，但衣服象是吊在身上，腿太

长。”

从南京来上海的康健很出名，她有个男朋友也跟李云鹤交过朋友，所以她谈起李云鹤的演技有点轻蔑：“舞台上不错。但不上镜头：凸嘴露牙。我这样南京来的人都没有上海人世故。李云鹤初来乍到，差得远。要想当大演员就得有上海人的劲儿。”

首先让李云鹤吃惊的是上海妇女。她是北方人，虽然没有北京人的拘谨，也看不惯上海这座暴发城市妇女的举止轻佻，哇哇叫，俗打扮，瞎化妆。她看到她们在大街上扭打叫骂，南京路上的妓女就跟报童一样大声吆喝。她在山东自以为够放荡的，到上海就显得太严肃了。

李云鹤探索在“解放了的30年代”做女人的道理。上海虽是块飞地，但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不可能对它毫无影响。独立固然不错，但上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生来不能平等，许多感到“自由”的愉悦的年轻妇女仍旧处处被男性统治的阴影笼罩。特别是当女演员，那是“明星”（控制男人）和“玩偶”（后台老板或导演的玩物）只有一步之差的工作。谁能到最后肯定不需要男人的支持？

李云鹤到上海的头一天晚上同史东山一起吃饭。这位30多岁的导演兼作家从1921年起就在上海从事戏剧工作。虽不是共产党员，在左翼文化界却相当活跃。

这天在南京路大新公司餐厅里，这位有经验的导演向这位有希望的新手介绍了左翼剧人联盟及其成员。这是个同李云鹤有关的组织，它象一个针眼，许多艺术、政治以及自由派艺术家的线从这里穿过。

他们谈得较多的是剧作家田汉。田汉留学日本，写的《湖上惨事》李云鹤在济南艺校还演过主角。艺校老师王泊生

等都熟悉而且崇拜田汉。两人吃完西餐，走出大新公司，来到李云鹤从未见过的热闹的南京路时，她已决定去见田汉。

田汉是个才华横溢而又固执己见的人，作为剧作家久负盛名，年龄比那些戏剧界的新艺术家大一些。他是个浪漫派。他说："美酒、音乐和电影是人类三大创造。"同时，他又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李云鹤在虹口区中国书店对面田汉家里住过几天，等待他们考查她的才能和可靠程度。但田汉对她不太感兴趣。他事情多极了——演员准备第一幕首演时他还在修改第三幕剧本。他让他弟弟照料李云鹤。

李云鹤大为扫兴。她在一个小剧团为工人观众演出。她还兼教课补贴生活。但田汉的弟弟讨厌，他对她这个人感兴趣，对她的戏没兴趣。李云鹤未来的丈夫同意她对田汉弟弟的贬词，这个丈夫说："他利用哥哥的关系找她麻烦。他总跟着田汉，但不是艺术家，是个白痴。"

后来，李云鹤由于未来丈夫的关系而处于和田汉平等的地位了。当时，她只能在上海左翼戏剧界的外围点缀，但她准备用自己的勇气、毅力和魅力钻进戏剧界的复杂深洞。

她不象她后来说的同"党保持着接触"。经过1927年到1930年之间沉重打击后的共产党是个危险组织，30年代初期很少有人参加，特别是有李云鹤这样兴趣和个性的人。俞启威走了以后，她对共产党的工作已经没有兴趣。

田汉肯定是要小心的。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使共产党接收新党员时特别仔细，生怕间谍混进队伍。李云鹤可以在左翼戏剧中服务，但不是党的组织工作的合适人选。

当时李云鹤的艺术生活和个人生活都不需要入党。她受俞启威影响，对共产党仍抱同情态度，但对正在积极找人、找机会打开局面的她来说，主要注意力不在这里。

不过，她对政治仍有不少兴趣，因为政治符合她自我表现的胃口。她知道田汉不大相信她，她想她可以在舞台上表现得象个共产党人，让他承认。

这阶段她白天黑夜排练，在街上撒反政府传单，参加临时凑合的演出，常弄得精疲力尽。她在虹口的咖啡馆里同年轻艺术家讨论艺术在社会上的作用，还在上海大学旁听。日本蚕食激起的爱国高潮是戏剧界活跃的大好时机，同时他们又有许多时间花在闲扯、多角恋爱及其伤心后果上。

作为一个年轻的外来户，李云鹤是上海戏剧界这个黑暗而又诱人的泥塘里的一条极小极小的鱼。身旁的大鱼闭眼不看她，稍小一点的雄鱼瞅准机会就威吓或戏耍她——出于嫉妒和敌对情绪，她在戏剧加政治的泥塘里不同女性交朋友。分配给她的工作都是池底的日常杂事，最上边才是真正的头等文化鱼。那些上边的鱼在清水里跳跃、回游，每一次扭动都反射着水面的光。旁观者在池边啧啧称羡。

李云鹤在1933—1934年间的政治活动是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引导她的是被她称做“徐大姐”的一位粗嗓子、脸上有痣的普通妇女。徐大姐觉得她很有意思但有点反复无常。两人时好时坏。

1933年秋李云鹤在夜校教工农妇女的工作可能是徐大姐和共青团安排的，不象是田汉和其他左翼文化界大人物的主意。这个有趣的夜校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支持的。工作很低微、辛苦，完全和她真正喜欢的戏剧无关。

她给女裁缝、袜厂和纺织厂女工、烟厂女工教语文，一天两节课，不妨碍学生上班。这些学生很吵闹，身上有味儿，白天累得够呛了，不大好教。

据上海香烟厂一位女工回忆：“没人上音乐课。夜校徐

老师请共产党帮忙。李云鹤来教唱歌，一星期两次，很准时。她教的都是新歌，用二胡伴奏，嗓子很宽，很甜。”

李云鹤知道自己和这些妇女不一样，她们是“无产阶级”，是共产党事业的脊梁。她是受过教育的人，舞台上的明亮灯光还在召唤她。

她不象她的学生那样穿工装，她穿中产阶级或者上海知识妇女的西式服装。她在夜校后边有自己的单间，女工们在前面都是几个人一间。

当时李云鹤虽然没到身无半文的地步，但经济上也很困难。家里没有人资助她，19岁的女孩子不容易。除教课的微薄收入之外，可能离婚时从费先生那里得到过一笔钱，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可能还有点积蓄。

她看戏都是买便宜的座位，偶尔一激动买个特等座之后，连买电车票回家的钱都没有了。一年以后，李云鹤辞去女青年会的工作，当时，同屋当保姆的阿桂还偷过主人的米饭和鸡蛋请她——她正好买了一件上等镶边的丝质蓝旗袍，有一个月付不出顶楼房租，把爱人送她作纪念的怀表当掉才过关。然后她又上高级饭店，占据靠窗的座位，一方面为看街景，另一方面也是炫耀。

她是否象在青岛那样和政界人物有什么秘密的经济交易，尚不太清楚。她先是在田汉家住，后来曾转到左翼剧人联盟另一个成员廖沫沙家。

她住在廖家阁楼里，睡的是桌子，而且成了廖沫沙夫妻口角的根由。她怎么去那里的，不清楚。更令人费解的是，为了逃避令人窒息的环境，走时竟付给联盟头面人物20块大洋，真是个不小的数目。也许是她怕廖沫沙象田家兄弟那样想“控制她”。也说不定是象廖本人暗示的，她对廖有意，

才离开田家到廖家来，结果闹得廖家夫妻不和。

李云鹤尽管政治信仰模糊，还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在政治上也常冒风险。有一段时间，她还参加陶行知把文化送往乡村的活动。陶行知教授受苏联知识分子“到民众中去”的传统影响，坚持为人民做好事。李云鹤常在干完别的工作之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到陶行知办公室来，帮他整理资料，发信，联系车船票。这件事给她的朋友印象很深，其中也包括她未来的丈夫。

有一天，为支援烟厂工人罢工而义演《婴儿杀害》，这是一出伸张社会正义的戏。李云鹤也参加了，演一个勇敢的战斗女工。白天，人们因反对英美烟草公司管理而游行被捕；晚上，演出收入用来支援反对这家公司的斗争。李云鹤一化装，就感到政治性戏剧的危险与刺激。人们都知道，演出过程中，公共租界的红头阿三随时可能冲进来，抓走演员和观众。李云鹤演得很卖力，因为大家看中了她的艺术，而且当时情况危急，也可以由此证明怀疑她“冷血”的人不对。每当《婴儿杀害》的大幕落下，演员和观众涌向街头继续游行时，李云鹤虽然筋疲力竭、饥渴难忍而又身无分文，但心中充满兴奋。

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出演反政府戏剧，按当时既反共又反日的国民党政府的法律都是要治罪的。李云鹤还是相当天真的女孩，不太理会自己的行动对别人有什么影响，也不懂得自己所作所为有多大危险，但慢慢也学会了30年代初上海左翼活动分子都掌握的谨慎和遮掩手法。

她和同伴乘电车或公共汽车，身上揣着违禁品，若是发现警察要找事，她会装着没事的样子下车；汽车要是被拦下来搜查，她知道怎样娇滴滴地同警察周旋，跑不掉时又怎样

大嚷大叫，弄得他们目瞪口呆。

演员涉猎政治，当上教师就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了。她是相当认真的：舒服和安逸不是她的目标，否则她找个商人当太太好了。但在危险的条件下演戏比危险本身还能吸引她，积极投入这个事业比事业本身更令她兴奋。这个事业是左翼的政治，对许多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同时涉及中国的未来，但对李云鹤来说却是作为一个想控制这个世界的人的自我表现的机会。

她在上海和她日后的生活一样，脑子里常把“政治迫害”和对她个人的侮辱混淆在一起。她回忆往事时往往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或者说，在她的直觉中，因共产党的事业跑来批评她的人和来强奸她的人是一样的；国民党的镇压和左翼的内部倾轧是一回事；因政治策略不同左翼文化界内部的纠纷和好色的演员、导演、编剧苦苦追求她是一回事。

李云鹤就是这么个人。电影演员康健回忆说：“她没有太多看法，知道的也不多，但大事小事她都能演戏。”

有个了解她的男演员说：“她要是来吃饭，她走后夫妻准吵架。”

1933年秋天，李云鹤离上海去北京小住。这不知是因为日子太苦，遭人白眼，还是因为感到男人象苍蝇见血一样死缠不休，或者简单因为10月寒天令她在夜校的生活格外凄凉。

她在北京几个月没有演戏，到北京大学听社会科学课——这不是她的兴趣所在，而且始终也没有在这方面搞出什么名堂。她的目的是同俞启威接触。她这个青岛的爱人现在是北京大学地下党的重要人物，可能会帮她在上海找个好些的立足点。她希望他能象在青岛那样帮她打进高层的文化

圈。

她并不想恢复婚姻，也不想找工作。可能是俞启威每月给她七块钱，去了房租就吃得很差了。李云鹤在北京过一冬的真正目的不清楚。她拜访过现在在北京演戏的济南艺校同学，但如果她和俞启威的爱情不能死灰复燃，她在北京的确无事可做。

有一个可靠来源说，很可能她同俞启威有了身孕（以流产告终），但两人吵架，关系终于不能恢复。

1934年初李云鹤坐火车回上海。她面临新的机会和危险。俞启威同她恢复关系不成，便写了几封信让她去找他上海的同志。

1934年年底，李云鹤还是处在下流环境里。俞启威可以帮她在上海找到较好的立足点，但她本人太不适合参与左派政治，特别是她的任性，常常暴露，惹来极大危险。

一个相当大的麻烦是她青岛一个老朋友——一个年轻的邮局出纳员招来的。这个小伙子在街上见到云鹤，马上就请她参加他的“进步”活动。他还邀她吃饭，在兆丰公园溜达。

尽管出纳员对她抱有政治目的和个人目的，而且她后来的回忆也说很讨厌他，但还是来往频繁，而且从他那里拿来一本叫做《世界知识》的激进刊物。正如她的一贯作风，热情和好奇使她追寻愉快气氛而忽视正在发展的关系。

就在她和“老朋友”约会之后，两个国民党便衣猛然扭住了她，把她带进警察局，没收她带的《世界知识》，要她当晚离开上海。李云鹤不怕，只怪自己怎么让这些蛮不讲理的家伙抓来。她被关在警察局二楼女监里。

当时她济南艺校的一个同学上警察局来了。这位在戏剧公司干事的王先生回忆说：“戏剧界左派不少。我一个朋友

被抓进来，所以去看看。”

王先生走进这座灰色大楼，灯光照耀，如同白昼——因为夜里还要处理罪犯。警察局一个职员碰巧正是他的山东熟人。这个职员说：“刚逮来一个山东小姐。”王先生回忆说：“我一想就是李云鹤。”而且很快证明没猜错。

王先生走进阴暗的长廊又犹豫了：“我怕见李云鹤。我知道她是左派，离开济南到青岛受了俞启威的影响。那是很危险的。”他想去看他那位男性的演员朋友，但又必须经过女监。“我怕云鹤认出我，大声呼叫我的名字——她就是那种人，弄得整个监狱的人都看着我。”结果他谁也没看就走了。

在李云鹤后来对这天晚上的回忆当中，戏剧性完全压倒了恐惧和愤怒（很可能大肆渲染了一番，其实政治对她没那么大兴趣）。她说她那天是因为穿得不“合适”，机智的警察发现她“穿的是丝绒旗袍”，那应该是旅行的打扮。

警察蒙住她眼睛时，她脱下西装，穿上丝绒旗袍，又罩上西装。为了显得年纪大一点，还套上一件毛背心。结果警察局就把她放了。她在夜里穿过上海郊区的菜地。

警察是否真把她当革命者大可怀疑。但她为了使后世真把她当成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就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走夜路之前，她从扔掉的内衣里掏出“秘密的入党申请书”，塞进背心的衣角（据许多人讲，1934年上海共产党没有这种申请书，党员或同情者没有任何身份证件）。

她向西走的时候，有几个陌生人“伏击”了她；她坐在稻田里，把申请书“吃了”；她又被国民党便衣绑架了（还是晚上放她的那些人）。李云鹤这些回忆有多少事实另当别论，反正她是1934年10月份蹲过监狱。国民党怀疑她与颠覆

分子关系密切。看守把李云鹤锁进铁栅时李云鹤叫道："你们应当去抓真正的共产党！"这种话很带演戏味，但也有她的道理——不管怎么说，她对被捕是特别感到懊丧、可耻的。

夜校一个烟厂女工回忆说："她突然不来了。徐老师面带愁容告诉我们说，蓝老师被捕了……我们凑了一点钱买了饼干和其他吃的用的，请徐老师送去，表示我们的慰问。"

李云鹤自己对这"八个月"的监禁的回忆是男人和叛徒的暴行和压迫，最终是她"取得了胜利"。她的月经停了，下午发冷发热，看守见她无礼就打她耳光，还拿鞭子抽人：谁叫抽谁。但云鹤大唱京剧片断（这不是告诉看守她不是共产党吗？）；教同监的女犯怎样对付审讯；党组织送她食品、被褥和钱（她从不联系的党！）；大声喊叫"为什么不枪毙我"；1935年春天，经过基督教女青年会负责人保释出狱。

还有一种版本说是李云鹤被押"三个月"，这个说法没那么多英雄故事，可能比较接近事实。她的确总是成功的，但不是靠政治上的机智，而是靠女性魅力的熟练运用，最后以自首被释放。

据中国方面的材料说，她陪看守聊天、喝酒，送他们剧照。她给看守唱京剧的精采片断，但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左派，而是取悦看守以便少受皮肉之苦。她在受审时信口胡扯，结果害得几个人被当作共产党抓起来。她慢慢相信了看守的说法："你还年轻，这么漂亮，好日子在后头。"如果放弃共产党的"胡说"，坚信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保你前途"光明"。她在1934年初写自首书以后被释。

有一个原监狱看守回忆道："我对她说：'你的案子很

简单'，'只要改过自新，什么事都没有了。'"这个看守吹嘘说他不象别的人那样打她，总是讲道理。"我跟她讲如果改变信仰就能得到宽大时，她总是可怜巴巴的样儿。很快她就写了自首书。"

李云鹤回忆往事时带有戏剧性的表述——这也是她的实际体验——并不等于说她没受过折磨和羞辱。月经停了就说明身体瘦了许多。她对自己的严峻考验象是半个旁观者并不等于她不知道疼痛，也不知道发生过的事情。她只不过是不清楚她外在的政治表现在李云鹤内心里有多少是真的，也不清楚她自己一时冲动所卷入的外部事件是要创造出怎样一个现实。

还在关押期间，她托一个被释放的难友去告诉党组织，她的"真正身份没有暴露"。其实，李云鹤自己也没有发现她的真实身份。

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李云鹤不清楚。她模糊觉得自己是，因为她表现了"爱国主义激情"和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她认为，人们事后用共产党是政治和军事组织的苏区（毛泽东占据的地盘）标准来判断实际是宣传组织的上海共产党，这是不公平的。上海的战斗不是观念方面的战斗吗？谁能象李云鹤那样具有本能的对不公正的战斗性呢？

一个日本进步作家代表团访问上海时，李云鹤也参加左翼女演员小组去欢迎。东京的女作家仁志诚子回忆说："她挺苗条、挺文雅，骨子里有那么点刚强。"每个中国人写一句话让他们带回去。李云鹤写的是："请不要拍侮辱中国的电影。"

不管同国民党作了什么妥协，李云鹤出狱后就不大敢冒险了，政治倾向也不明显了。她首先关心的已经不是公共事

务，而是个人琐事了；主要参加的已经不是政治组织，而是演戏艺术了。她的理想主义还存在，但表现方式温和多了。

当时左派互相联系的方式都是单线垂直的，不能毫无顾虑地横向联系。派一个同志去见另一位，要有识别暗号——上衣第一、三个钮扣不扣，帽子按一定角度抓在左手上——活动总是小心谨慎地隐蔽进行。

这是个没有友谊的世界，对李云鹤很冷淡。在她的工作和生活中，除了风险要少，她还要求更多的感情满足。

她不再回那被政治活动包围的夜校，她和一个戏剧界的朋友住到法租界去了。为了开始新的生活，重新塑造角色，她给自己取了个新的名字："蓝苹"，蓝色的苹果。

她原来的老师发现，"云鹤"不仅消沉，表现出同她热情性格不相称的隐晦，而且简直有了道姑气。可能这是埋葬云鹤、重新创造一个更有力人物的过程。

她曾想还用"淑蒙"，但朋友们说在上海用这种名字太俗。她也曾想用同她家有关的"栾"字，但她怕会有很多的电影迷写这二十几笔的字（繁体）太麻烦。

最后，她决定用"蓝"做姓，一方面与"栾"音相近，一方面也是她喜欢的颜色（特别是衣料）。"苹"字可能是联想到他们山东烟台的鲜嫩好吃的苹果。20岁的时候，"蓝苹"出生了。

美国留学的杰出制片人洪深，是俞启威姐姐俞珊的密友，他对上海出名的文艺编辑崔万秋说："你应当去看看她，她是新从你们山东来的。她在青岛听过我的课，表现不错。"崔万秋是个聪明人，和洪深坐上出租汽车就到法租界蓝苹排演《玩偶之家》的破旧的房子里去了。

当时正好休息。演员们在绕圈儿走动，喝茶吸烟，凑在

一起聊天，还有的懒洋洋地躺在观众席上。洪深指着窗前默默背诵台词的女孩说："那是蓝苹。"

崔万秋转身见一个穿蓝旗袍的苗条女郎，留着前刘海。他回忆说："她挺土气，不太象上海人。"洪深把她叫过来。"这是崔先生，《大晚报》的编辑。他是你们山东老乡里的红人。"

蓝苹有礼貌地说："喔，我读过您的文章和书。"崔万秋说她国语讲得不错，但说起她老家"诸城"时还有山东口音。"我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就知道您的名字。"

崔万秋对洪深这个年轻的学生和朋友的礼貌和容貌很感兴趣："祝你成功。"

蓝苹娇媚地说："等戏演完了，我去看崔先生，向崔先生学习，还可以聊聊老家的事。"

崔万秋回答说："谈不到学习。但欢迎你有工夫来玩。"

后来蓝苹对朋友谈起这次介绍说："认识他很重要，他人也不错。"

崔万秋回忆说："她的认真态度一开始就给我很深印象——别人在休息聊天，她还背台词。"至于她的容貌，据这个人归纳："难说是漂亮。但身子苗条、面孔开朗、明亮的眼睛、鲜红的嘴唇，加上聪明伶俐的举止，还是一个不错的姑娘。"崔万秋借用中国形容美人的成语"明眸皓齿"说："'明眸'算得上，但不能再加'皓齿'，有颗门牙有点黄。"

洪深和崔万秋坐下看排练时，洪说："你是山东人，应该帮帮她，想法捧捧她。"崔万秋说很愿意通过他的报纸和其他办法帮助她。洪深说："她很有前途，她有那么点个

性……”

导演章泯宣布演出开始，蓝苹变成了她的娜拉，充满了反抗精神的娜拉。

左翼剧人联盟实际是有政治倾向的艺术家们的掩护性组织，是海派、自由派艺术家、民族主义、青年人的浪漫主义（就是蓝苹从工作到生活过往甚密的20多岁的小青年）和共产主义的大杂烩。

要挑蓝苹毛病的话，可以说看不出她作为“革命者”和“个人主义者”之间有任何不协调的地方，她本人是想兼而有之的。她比联盟里大多数人都要热衷于在演剧艺术和政治目标之间骑墙。

她生活上的反复无常（在上海四年间的后二年更显突出）对她这个想爬上演剧台阶的20岁出头的人来说也不为稀奇。许多导演都是要求“他的”女演员陪着睡觉的。情绪突然爆发、宣布永恒的爱、哭泣与争吵的夜晚——这都是女演员的必修课。蓝苹能把演戏和生活这两个方面揉到一起分不出来，正是她对艺术专注的证明。

蓝苹遇到一个姓李的足球明星。演员和运动员往往互相做伴，今天中国还是这样。他俩都住在法租界的辣斐路，相距不远。

李回忆说：“我在逸园等地比赛，她常来助威，给我加油。”他记得蓝苹是个迷人的姑娘，很苗条，中等个儿，很会交际。她是演员，他是足球队员，所以有些朋友取笑说是“英雄美人”。

他们相会都很短暂，很尴尬，只有一次在南京路一家游乐场里才真正有了个人接触。他们饱餐了一顿，又到静安寺的卡尔登电影院去看电影。这是专供恋人看戏带团聚的地

方。他俩坐在后排看胡蝶和顾美君主演的《美人心》。

李到香港后回忆说："演到动人的地方，她就把奇怪的、充满渴望的眼睛转向我。等到性感场面出现，她就更加靠紧我。"

急于获得精神抖擞的足球队员的蓝苹，没有掌握好向男人进攻的火候。"我是个有前几次经验的人，不会对姑娘爆发好奇的情欲。对她那些古怪的诱惑我没有反应。"

"你没看？"蓝苹缓缓提问往往是一种责备。

李"嘘"了一下说："我正专心看电影，看胡蝶的杰出表演。"

蓝苹伸出"玉臂"搂着李的温暖结实的腰肢，想在电影散场亮灯之前煽起他的激情。

不大会儿，人群涌向了南京路，有的泪眼模糊，有的窃窃私语。李对蓝苹的意图已经很清楚。她还很年轻，刚到上海，急于要出风头。她的野心和大胆连足球明星都瞠目结舌，这引起了他的警惕。

天黑下来，南京路上闪亮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两人吃了一顿中餐，喝了几杯红酒，然后就上了惠中饭店四楼豪华的房间。宽敞的浴室，锦缎灯罩遮着柔和的灯光，把南京路的喧嚣隔得老远老远。"这一切都增添了适于两性活动的气氛。"李按中国人的习惯这样观察。

"我关上门，坐到沙发上，她迫不及待地趴在我身上拼命吻我，说着情话。"

"这个星期有比赛吗？"蓝苹两手勾着李的脖子，气喘吁吁地问。她象小孩一样在他胸前扭动。"跟哪个队干？"她的话渐渐不成句子了。

"这星期没有比赛，不过我要上苏州老家一趟。"

“我一个人等那么久？”

“一个星期很快。下星期天有比赛。”

蓝苹热情地说：“我爱你在球场上的活力和勇敢——特别是你射门的技术。”她的脸蛋发烧，学着《美人心》镜头上的姿势，身子热得象一碗米饭。

“她突然脱得剩一件底衫，跳着跑进了浴室。”浴室门没有全关，在床上还能看得见。李躺在床上，红酒使他的脸发烫，蓝苹的大胆使他吃惊。他从澡盆上面的镜子看着她的身影：雪白、柔软。“茫然、充满深情的眼睛”，鼓鼓的胸脯，右乳头旁边有个豌豆大的黑痣。

蓝苹回到床上，李也已经脱光，“英雄美人”凑在一起了。李开始吻她的“朱唇”时，她又拿出撩拨男性的神秘而冲动的惯技，低声说：“我要让你美不可言。”

仅和蓝苹睡过一觉的李回忆说：“她给我的印象是个破鞋骚货，很快达到高潮。”她表现得过于熟练，反而使造爱兴味索然了。她的“床上技艺”使李“半死半痴”。但她很清醒她所扮演的角色，忙着告诉他，她有魅力，是个够格的恋人。“她给我很大享受但没有完全满足。”

不管怎样，蓝苹是给足球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惠中饭店那一夜至今已有30多年，”李在香港回忆说，“现在她可能已经失去诱惑力。但我永远忘不了她。”

蓝苹在《玩偶之家》中出演娜拉大为成功，对手是大众喜爱的赵丹，后来成了共产党政治文化的红人。这次上台是她步入专业演剧界的突破点。

易卜生这出戏描写娜拉逐渐形成决心，最后脱离同托瓦德·赫尔默律师的婚姻关系。那是蓝苹从济南艺专起就喜欢

演的角色。她排练两个月，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我全身投入戏中。”

开演之日，金城大戏院水泄不通。上海戏剧界的大亨都到了，其中有蓝苹的“大山”史东山。还有不少著名评论家，少不了《大公报》温文尔雅的唐纳。崔万秋抱着希望入席。观众热情絮叨着出自娜拉之口的向中国传统挑战的言词。蓝苹充分表现了她要成为“叛逆女性”的个性（后来她吹嘘说已经“超出了易卜生原来的内涵”，不无道理）。

蓝苹在台上通过角色之口对费先生说：“我们俩都必须彻底自由。这是你的结婚戒指，还你，把我的还我。”她还发泄了对男导演们的愤恨：“以前我活着都是给你玩把戏，托瓦德。”

蓝苹就是娜拉。她后来还老是象娜拉那样，高兴的时候，或者想让人莫名其妙的时候，总是自言自语嘟囔。

《玩偶之家》演了两个月，这在左翼演出里是长的了。蓝苹的演技受到很高评价。由于剧情的需要，台上娜拉和托瓦德斗起来，久负盛名的赵丹也自然相形见绌了。

有一篇重要评论写道：“蓝苹小姐第一次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娜拉。她哭，每个人都感到伤心；她笑，全场都高兴起来。”

还有一篇非左翼的重要评论说：“（在上海剧坛上）1935年是娜拉年。”

崔万秋回忆说：“娜拉使她出名了。但奇怪的是，她把娜拉演成这么个极端的叛逆者。”崔喜欢蓝苹，但不同意她的政治观点：“她还说这都是革命的。”

蓝苹给关心她个性的人的印象也象娜拉。崔万秋走出剧场时对朋友说：“这个小明星不会是个好妻子。谁娶她谁日

乎难过。”一年多之后，崔万秋又向那天出席首演式后来同蓝苹谈恋爱的人重复这句话，劝那人不要娶这个“漂亮的叛逆者”但“不称职的妻子”。

《玩偶之家》的导演章泯，这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代表人物，对蓝苹不仅在专业上而且在个性方面也有了印象。他在许多不乏著名人士的女演员当中挑选不知名的蓝苹出演娜拉，对她越来越关心了。

在吹捧浪潮中，作家兼导演张庚持不同意见，他从演出和蓝苹个人角度都反对她塑造的“女叛逆者”。

张庚也才20多岁，1933年当过蓝苹在工读团的领导。他谈起这位新来的山东姑娘时说：“她是我的，不要碰。”蓝苹对被当作私有物很愤慨，极力“不让他接近”。他排演或开会后常要带她回家，她不去。张庚对这个没本钱的小家伙如此倔强感到奇怪，为打消她的固执竟宣布要娶她。她直截了当拒绝。她用的完全是她那姓李的朋友足球射门用的直射法。

一年后，这位杰出的导演和评论家冷冷地盯着娜拉的剧照，发现了她的生硬决断和讨厌的反抗性格，慢条斯理地说：“太自然主义了。”①

第二个唱反调的是吴湄。吴湄是著名艺术家，试演娜拉后输给了蓝苹。这位满怀憎恨的漂亮演员说：“她是婊子，从头到尾拍章泯马屁。”吴湄是田汉的南社成员，章泯叫她演娜拉的邻居她当然怒不可遏，不去排演。直到首演前一天

---

① 蓝苹同人发生个人争执或艺术上的争端，总要涂上一层政治色彩。她后来说，张庚散布谣言说她是托派并要把她开除出左翼剧人联盟（托派是共产党圈子里的大罪）。——原注

朋友们劝她顾全“大局”，她才忍气陪着蓝苹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蓝苹又树了一个敌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代表当时政治势力的红卫兵上吴湄家抄过五六次）。

由于《玩偶之家》的成功和史东山不懈的帮忙（史鉴于青岛的友谊，同时也喜欢蓝苹），蓝苹同电通签了三个月的合同，月薪25块大洋。

电通是共产党影响很大的左翼组织，它拍的片子花钱不多但很有生气，旨在提高人们的社会与爱国意识。

一位著名评论家认为，“电通制片厂和商业影业公司如明星制片厂之类的区别在于电通是新的，资金不足，但由演员自己经营，为伸张社会正义而工作。”电通的影片是“知识分子的影片”，普通老百姓大都喜爱明星影片那样的“给眼睛吃的冰激凌”，所以不会狂满。后来长期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苏菲说：“你看我的同事蓝苹不是个普通演员。她作为电通的姑娘，和那些流行歌星相比，真正显得单纯、质朴，可能有点严肃。她也不象明星公司的演员那样浓涂艳抹。”当时明星的薪水是电通的三倍：70块。

蓝苹仍然需要争角色演，但她已经是正式的“进步”演员。1935年春到1936年春在电通的这一年，头几个月干些杂活：缝戏装，搬布景等等。有戏就演。为了引起公众注意，她也过着符合她女孩子和演员职业的生活。当时给大家的印象是个爱交际的年轻学员，挎着导演胳膊进出制片厂，在卡尔登影院看完晚场电影又和男演员上饭店整夜喋喋不休地聊。

有一天晚上，蓝苹和一批朋友出去吃饭，其中有著名演员王莹和她男朋友——演员周伯勋。他们在吕班路一家俄式

餐馆大吃一顿，还喝了好多伏特加。后来大家都散了，周伯勋发现王莹和蓝苹都醉了。周伯勋在送王莹回家前，先扶摇摇晃晃的蓝苹到电通制片厂大门口，叫看门人带她去睡。看门老头想，还是找蓝苹一个同事送她上楼好。

这位年轻的演员兼导演把事情干得很周全。第二天清早，蓝苹发现自己全身赤裸躺在床上，衣服堆在墙角。看看身子，肚子上有红色线条。这是一行字！原来这是用她床边桌上的口红写的："下次小心，馋酒鬼！"蓝苹穿上衣服就去找王莹。

王莹说："亲爱的，我也醉了。不知道俄国酒这么厉害。"

"莹，我怎么回的家？"

"周伯勋叫看门的送你上楼的。"蓝苹不相信看门老头会这么恶作剧，就找他问。他说："小导演带你进房的。"

蓝苹把漂亮的小导演叫到房间来，关上门叫道："怎么这样！"

"你生我的气，应该谢我呢。你要真不相信是我写的，脱衣服我来替你擦掉。"小导演哈哈大笑。蓝苹也从怒气冲冲转为风骚妩媚。蓝苹和他的事还没有完。

上海的电影和上海本身一样，既奢侈，又艰难，但是充满感情和异国情调——1929年百分之九十放映的是美国电影。电影这个新兴事业也极受欢迎，无论是商店女店员还是人力车夫，都贪婪地阅读登载明星消息的无聊小报，其注意集中程度不亚于经纪人看行情报告。年轻的男女演员或导演可以在几个月内崭露头角。资金不足，技术水平极为可怜，但大量影迷足以抵偿这一切。

艺术标准不高。由于没有传统，现在应当什么样也没有

定规。政治命令还往往让它参加宣传。许多电影都有点不伦不类——从中国古典取材，同时又刻意模仿西方。

这个领域正好适合蓝苹这样没有专长、哪方面也没有根基的人，在这里她的弱点正好成了优势；她的心理状态经过实践，在这个可塑性强的领域开起花来。

在电影里，微笑和吵骂是双胞胎，贫穷和巨富是难兄难弟，幻想、冲动、激情和银幕上的光闪闪的形象可以把脑子里的现实挤到一边——中华民族在日本铁蹄下呻吟，社会秩序大混乱，蓝苹在上海这座丛莽中的危险处境，统统抛到九霄云外。这正是蓝苹最理想的地方，她能失去的不多，她立志要满足生活从不眷顾她的一切。

但她必定还得在名声和诽谤、自由和剥削利用之间走钢丝。特别是女性，更要准备在演剧这个虚幻世界的骗局和矛盾中受尽颠簸。女演员在银幕上是“玉女”，受尽观众的崇拜、嫉妒和注意，但灯光一灭，她在上海社会里是和游民、小贩、妓女的位置一样的。

女演员真的是妇女中最自由的，摆脱家庭羁绊，和男子平等了吗？这只是她们生活的一个侧面。另一面呢？她是导演的“玩偶”，要演角色靠他，同时她又是企图娱乐的有钱有势的男人的奴隶。

蓝苹很清楚这两个侧面。但她跟丁玲这样的作家和女权运动鼓吹者不同，丁玲似乎也附和演电影的那一套，实际她是不干的，因为演电影实际要利用两性关系。而蓝苹别无选择，她必须忍受只要能忍得下去的东西——往往辱及人格。

上海是农村的、受旧传统束缚的中国当中一块被包围的土地，而上海这帮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则是上海赤裸裸的商业社会包围中的自由的一群。

蓝苹表面上逍遥自在，快快活活，实际暗自决心不让任何男人“控制”和“占有”，如果有哪位男演员或导演想象张庚那样掌握她，马上翻脸：阻碍了她自己的目标。看戏或吃饭时有哪位男性替她付帐，她下次再有机会一定替他付，掏空钱包也在所不惜。

有些人低估了这个漂亮姑娘骨子里的意志力。她虽由于胡乱交际而博得“烂苹果”的绰号（“蓝苹”的谐音），但随和的外表隐藏着明确的目的性。

剧院同事常见她一人坐在高级咖啡馆里，只叫了一杯茶或一碗饭，看来是等男朋友，而且总有人来找她。但蓝苹这种大胆作风只是问题的一面，她又很自信，有自己的目的，不受控制。

许多人喜欢受义务和常规的束缚，宁愿不要自由。这也许是真的，对中国人来说尤其是真的。但蓝苹例外。她要自己寻找快乐。她不想真正依靠一个男人、一个导演、一个老师或者任何人。

尽管蓝苹的同事（和敌人）把她当作自信甚至厚脸皮的女人，但她心里明白，说到底她认识的人都瞧不起她，都拿她当不入流的暴发户看待。表面看来，她属于自己，精于算计而不冲动，实质上她感情很脆弱。她很难同人合作，特别是女的，而且尽管她很刚强，生活上的混乱仍给她带来不少痛苦。

下午3点钟电话铃响时，崔万秋正在他《大晚报》的办公室里看稿子。是蓝苹打来的。刚演完《玩偶之家》，她对《大晚报》增刊戏剧版上的吹捧文章表示感谢。崔约她出来聊聊。

崔万秋约好明星制片厂的编剧阿英吃饭，不过，两人都不讨厌蓝苹。阿英在明星赶完一篇东西的时候，崔万秋带蓝

苹去吃下午饭。

蓝苹穿浅蓝色旗袍，平跟鞋，抹了一点脂粉口红。她象是艺术家、无产者和天真活泼小姑娘的古怪的综合。

三个人在法租界的锦江饭店吃饭时谈起京剧，蓝苹发表了激烈的反传统意见。她说梅兰芳“很保守”。崔万秋和阿英不同意。蓝苹嘲笑《天女散花》一剧中妇女形象，说她们“一会儿偷偷地笑，一会儿歇斯底里大发作”。她不同意美女应是“风吹得倒”的观点，反对“要男人扶着站起来的”类型。

由于蓝苹力争，崔万秋就后退了。蓝苹还有最后一击：“为什么那么多男人喜欢痨病鬼？”

杯盘狼藉之余，三个人又哼了几段京剧。蓝苹胡吹她会唱，有人说她根本不能登台，比崔万秋差远了。

崔万秋问她是否常看电影。蓝苹回答说：“电影是我们的教科书。”她说，不论外国的、中国的，她都爱看。讲到中国两位最大的明星胡蝶和阮玲玉时，蓝苹说胡蝶是“木头美人，完全是个塑像”，但她替不愿做玩物而自杀的阮玲玉说了些好话。

崔万秋和阿英认为她对胡蝶不够公平。蓝苹皱起眉头说：“九·一八事变那天胡蝶和张学良跳了个通宵。”

崔万秋多年后回忆说：“蓝苹是和我同时到上海的。她来自青岛，我从日本回来。”经过洪深介绍他们认识了，一个是大编辑，一个是小演员。个人友谊不错。崔万秋常介绍她见他的日本朋友，她常发表激烈的反日言词，但崔不见怪。

崔说：“她给我们的文艺副刊写过几篇稿，不太成熟，不过她希望发表。”她的稿酬是每千字3块钱。郭沫若、夏衍、

同她吵架的廖沫沙和其他大手笔每千字10块。

热爱娜拉的是《大公报》的漂亮而多情的艺术评论员唐纳。唐纳有一副漂亮的、开朗的脸蛋，人中很长。一双大眼闪烁着幽默和兴奋。他穿一身西服，头发溜光，嘴里总叼着一支烟。在金城大戏院那天晚上，他看蓝苹表演看得直发呆。他完全被她的强壮、刺激、性感迷住了。两人见面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是个温暖的傍晚，唐纳走向他兼任杂志编辑和导演的电通影业公司。淮海路上人来人往，乞丐、食品摊、恋人熙熙攘攘。唐纳突然看见蓝苹跳跳蹦蹦从迷茫中走来，蓝旗袍在霓虹灯下闪光，额上留着刘海。只有非常仔细的人能看出她脚踝特别大，膝盖微向外弯，这是小时缠足留下的痕迹。蓝苹知道唐纳是谁，正如唐纳知道她一样。

两人都停住了。唐纳笑逐颜开，象个大狸猫。蓝苹伸出了手。唐纳大大称赞了她演的娜拉。蓝苹说她拜读过唐纳先生的大作。蓝苹突然对这个上海左翼文化界的荡子脱口说道："我是个革命者。"把唐纳吓得一怔。但是，她这种出奇的自以为是，非但没有让唐纳退缩，反令他神魂颠倒。"来自山东的这个新演员真动人。"

唐纳无论在社会地位上、文化上、经济上都要比蓝苹高出几筹。

唐纳出身于天津一个铁路职员家庭。出生不久，父亲吃错外用药死了，14个月的唐纳被送到苏州一个孀居的地主婶娘家扶养。"唐"是奶妈的姓，"纳"是"容纳"的"纳"，婶娘的意思是让他"宽容"。他的母亲和哥哥仍在天津住，所以他的家和蓝苹一样是个破碎的家。

唐纳回忆说："我第一篇文章发表在苏州报纸上。编辑用这篇稿子时我是多么高兴啊。其内容是反对写连环信。那是迷信。什么如果你不接着写信就会遭大难啦，什么如果写信时封上一块钱就会发财啦，胡说八道！"

血气方刚的少年唐纳特别讨厌婶娘雇的家庭教师教的孔孟之道。"要背古文，背不出就挨竹板。过几分钟我就上厕所，老师知道我逃学就火了。"

后来唐纳问朋友："你喜欢苏州什么？"

"小桥、花园——人也漂亮。"

"我觉得苏州姑娘不象人说的那么好。"唐纳总是从另一面看问题，"你看我好了，我不找苏州姑娘。"①

苏州的小造反到上海成了无师自通的左派分子。他在圣约翰大学上学时，一个美国人教他中国文学。"上海有两件事使我成了左派：外国人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贫富悬殊。"

唐纳没有象蓝苹在青岛时那样参与共产党的政治活动。这个天生聪颖的自由派艺术家说："我从未想过要参加共产党。我们是一群艺术家，我们意趣相投，对当代的问题很关心。我们用笔、用声音、用身体支援中国。不一定要参加共产党。"他一本马列主义的书也没读过。在政治活动方面，蓝苹比起她在淮海路上碰到的这位评论员要认真、刻苦、严肃得多。

第二天，蓝苹去唐纳签有合同的电通制片厂去看他。她是准备谈恋爱的。俞启威走了之后，她身边没有男人同居，

---

① 唐纳现在的妻子陈润寮，既漂亮又有才华，是福建人。她家后来迁到北京，父亲是国民党的驻法国大使，以后升到外交部长。——原注

还在上海的人海里飘泊。她故意叫他“唐先生”，显得冷若冰霜，但这样必定更使唐纳高兴。瞅准时机她又同他打情骂俏一番。

蓝苹故意问他，这么有才艺的人还用这么卖力工作吗？唐纳已经被她攻到无话不谈的地步，告诉她，自己工作很卖力，但也肯玩，蓝小姐也这样吗？

她的确是这样的。这个年轻的女演员努力工作或者就是为了有更多时间调情。不竭尽全力工作的人享受不到最纯粹的愉快。密司脱唐同意吗？蓝苹微笑之后又皱眉，就象一年只有一次春天一样，不能天天都好，这样就感觉出好来了。快乐不是吊在半空中，随时可得或者自动会掉下来的，要不失时机地抓住它，要不就不见了……

蓝苹也许有野心，很美妙动人，唐纳迷上她了。

古时中国姑娘只能暗示自己待字闺中——她三寸金莲挪出房间，傍晚来到走廊里弹琴，以便有个少年经过这里听到。30年代上海的姑娘要大胆得多。

唐纳发现：“即使在上海，蓝苹也是个例外。不要以为她是腼腆的中国姑娘，你碰到的可能都是羞羞答答的，蓝苹可不是这号人。她会毫不犹豫地上前同男人攀谈，主动关心男人的事。喔，她是个大胆的姑娘！”

蓝苹大步走进虹口区的电通制片厂。她穿着蓝色旗袍，衩子开到大腿上边，光亮的长发在午后的阳光中闪耀。三层楼的洋房原来是座中学，现在是专业职工的宿舍。还有办公室和制作布景、行头的车间（左翼的人也住得满舒服）。

出来的时候，蓝苹和唐纳手挽着手，肩靠着肩。这天晚上两人没有回宿舍。公司的人都急了。第二天晚上，这一对还没回来，其他追求蓝苹的人就要死要活的了。第三天晚上

6点钟，两人搂着回来了，满面春风。见人也不搭话，径直奔向马经理办公室。

晚饭时马先生站起来说要报告好消息。“我们的同事唐纳先生和蓝苹小姐经过相互了解，决定在一起生活。”饭厅爆炸了。男女演员都放下筷子鼓掌，围拢来祝贺这对新人，又按中国规矩要他们讲恋爱经过。

这一对新人引起了艺术家们小小的骚动，因为唐纳有点影响，蓝苹是新手有前途，两人都年轻、漂亮，都搞电影。

蓝苹不仅找到一个上海有名的年轻左翼文化人，而且唐纳虽然组织上没有参加共产党，却是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分子。

30年代的上海，共产主义和演戏合流。这是很自然的，国民党压制自由，列强蹂躏中国，使共产党的反帝立场颇有号召力。

共产党人的死敌蒋介石屠杀作家；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一样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要把艺术当作反对日本侵略的武器。由于这种种原因，象蓝苹和唐纳这样戏剧界的许多人虽然不同意共产党的主义，也都成了“自然而然的共产党人”。

唐纳和蓝苹是夜猫子。他们常在法租界霞飞路的俄国餐厅吃得很晚。有不少蓝苹家乡山东来的中国厨师在白俄餐馆里学会俄式大菜后自己开业。唐纳回忆道：“他们比较便宜。两毛钱可以吃一顿，还带罗宋汤。”

两人都抽烟，蓝苹少些，唐纳多些。他们爱抽一种叫“华盛顿”的美国听装烟。他们还喝酒，白酒黄酒都喝。他俩年轻，有的是精神，常常整夜整夜地争辩左翼艺术圈子里的事。

唐纳钱不多，但他和蓝苹都认为自己是名流。有个女佣每星期来搞几次扫除。出外常乘公共汽车或电车，多数坐黄包车，必要时也坐野鸡汽车。

“你常去大世界吗？”唐纳对这种艺术家应当常去大世界的看法嗤之以鼻。他说：“那是下层的人去的地方，那里学不到东西。”蓝苹和唐纳怎么能去看打靶、耍蛇、看相呢？有个同艺术家有点来往的小记者说，他的女用人常去大世界，她们最爱看变戏法。

有个天气很热的星期六傍晚，南京路上买东西的、谈恋爱的都出来了。蓝苹和唐纳站在卡尔登电影院门口，手里拿着赶印出来的传单。“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反对演一部美国电影，那里面充满暴力和资本主义，很腐朽。内容是描写美国人在东方做生意的事。”他俩去那里是受洪深鼓动。这位制片人告诉他们说，这部片子侮辱劳动人民和中国。

穿着朴素的蓝苹激动地喊：“是中国人就别进去！你是真正的中国人吗？”她把传单塞给每一个够得着的人。蓝苹和唐纳都没看过这个电影。唐纳笑着回忆说：“洪深比我们大，他又是教授，在哈佛上过学。蓝苹和我都相信他。”

红头阿三冲进了人群——那是南京路所在的公共租界的印度警察。蓝苹、唐纳和另外一些人被捕了。没有打他们。蓝苹要闹，唐纳叫她不要动。他们在警察局蹲了一夜，但是胜利了。电影两天后被禁演。

唐纳回忆说：“我们老有这类事。我相信我是正确的。”

唐纳回忆这几个月的事时说：“我们当然要去看史东山。”是史东山帮蓝苹走进了上海戏剧界。“一天晚上，他拿着关于妇女问题的原稿来找我提看法。”唐纳英文很好，能了解外国文化，好多人找他参谋。“有位导演要我们去看

白杨，她正在试演《十字街头》。我们到一个会馆的排演场去看这位很快出名的演员。我们觉得她演技不错，但面部表情平淡。”

有一天下午，蓝苹和唐纳去田汉家。田汉那里杂乱无章，但却是年轻艺术家谈论戏剧、探讨国是和做生意的沙龙。田汉已经认识蓝苹。是唐纳抬举了她，她的私生活声名狼藉，大家很注意她。田汉实际并不象她自己认为的那么讨厌她，不过在她演娜拉以及和唐纳同居之前不太注意她罢了。

田汉作为主人要告辞了：“噢，晚上有人约我吃饭。没事跟我去吧。”田汉作为著名剧作家，商界有不少阔朋友。今天就是一位阔佬附庸风雅，要他找几个文化人熏陶熏陶。蓝苹和唐纳欣然应允同去，起码“大雅”是他们欣赏的餐馆。田汉叫了五辆黄包车，田、蓝、唐和另外两人就由人力车夫拉到了南京路。

田汉兴致勃勃地说：“就请来四位朋友。”侍者根据确切人数摆好了圆桌。商人高兴地请他们入席。田汉和这些自由派艺术家在“资本家”的饭桌上开怀畅饮，同时给主人思想上留下若干左翼的影响（丁玲曾谈到过田汉家的情况：“有一天我去看田汉，在中国他算是头号剧作家了……在他家我发现许多人在跳舞，其中有摩登女郎，也有衣服穿得象女人的男人。我看不惯就走了。”）。

蓝苹和唐纳是有剧必看。当时的剧叫“人民戏”。对没有话剧传统的中国来说这是新事物。老年人和上海以外的大多数人都不习惯在台上用平常说话的语言。但对蓝苹和唐纳来说，戏剧等于是战士的肩章，生活的方向，他们进戏院和内地人进庙烧香一样。

《武则天》开演了，蓝苹建议去看。他们在北四川路一家常去光顾的咖啡店吃点东西就上金城大戏院了。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登上皇位的女性。她全靠思想敏捷、处变不惊、不择手段，整整统治中国50年。这出戏把她描写成一个伟大人物，太过分了，反而显得假。

蓝苹比唐纳还要专心致志，但看完之后又烦躁起来。她在演员聚会时指着鼻子批评演武则天的演员，先是客气的，后来就越来越尖刻了。连唐纳都弄不清蓝苹究竟认为哪儿演得不好。其实她就是不满意没让她演，因为她认为她比任何人都能演出个更强、更自信的女皇帝。

蓝苹是外省来的年轻人，没有接触过上海同西方打交道的社会，也没有跟美国人或者西欧的人来往。她一生也没有访问过西方，不会说西方语言，也没有西方的朋友。

但从口味上、脾性上蓝苹有时还特别象典型的欧化中国人①。她穿西式服装，穿高跟鞋，爱看外国电影。西方发起的基督教女青年会请她教女工夜校，这是她到上海的第一件工作。

蓝苹只是表面上现代化和国际化，实质上不是。她崇拜好莱坞，但对美国一无所知。她倾向西方文艺但不了解西方及其语言。戏剧使她涂上一层世界主义的色彩，一点也不涉及政治态度。中国电影实际是好莱坞的标准和技巧在中国土地上的移植——她选择的领域是中国传统最少的地方。她突出的个人主义特性和她童年的经历，也使她更多倾向西方妇女而不象百依百顺的中国家庭妇女。

① 文化大革命中她表现很矛盾，在政治上反西方，戏剧改革却走西方化的路子，用钢琴奏柴可夫斯基式的乐曲，而且把中国的一切传统都说成是“封建糟粕”。——原注

蓝苹象西方妇女还在于她总是向前看，很少向后看。她的社会出身使她无所依恋，除了靠自己别无出路，这都是西方妇女的道路。而且她喜欢孤独，这又是西方妇女和中国妇女不同之处。她知道她最终得靠自己的努力；依赖别人往往使她失望。

唐纳的影响，是蓝苹在上海比较能不太狭隘和不太固守传统的第三个原因。

唐纳在圣约翰大学受过西方教育。蓝苹没有上过外国人办的学校，和唐纳一起，唐的世界主义就多少感染了她。唐纳看出了这种影响，他感觉到蓝苹眼界更开阔了。

唐纳带蓝苹去看他的欧洲朋友。蓝苹从她第一次结识的欧洲人那里学了几句英文，后来她还教过别人呢。蓝苹和唐纳一起也更好地理解了西方戏剧，因为他身上有西方文学熏染的个人主义味儿。

在青岛，俞启威对蓝苹影响很大，使她有了政治意识并且左倾起来。在上海，唐纳也有同样大的影响，那是文化上的，国际化的，使蓝苹脱离了纯粹的中国体系。

开始时蓝苹不觉得中国和西方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她也不需要去选择。知识增长之后，她的艺术世界就成了超越国界的文化综合体。她发觉自己纯粹是中国式的以后，很自然地从1936年起就要穿她的崇拜偶像格蕾塔·嘉宝爱穿的衣服了。

经过几个月相处，蓝苹和唐纳的生活里就不时出现风暴：眼泪、摔门、扭打。有时又和好如初。

蓝苹自己在公共租界租了一间小房子住。楼下亭子间里有个裁缝，经常轧轧地踩缝纫机直到深夜，对她夜里吟诵台

词是很大的干扰。她上边住的是来上海做女佣的阿桂。蓝苹和阿桂成了好朋友，同病相怜。

阿桂心肠好，又勤快，帮蓝苹扫屋子洗衣服，还外带做点饭——蓝苹生活没秩序，弄得是没钱没时间，睡眠也不足。有一天，蓝苹饿了，阿桂上街买来二斤西红柿，洗净放她窗台上就悄悄走了。

和阿桂的勤劳善良完全不同的蓝苹，有时给阿桂讲讲故事，讲演戏的事，有时为酬答她的帮助还把自己的剧照送她。

大约是1936年3月初，阿桂在夜梦中忽听蓝苹房里传来尖叫声。是吵架了。蓝苹叫喊："救人哪！救人哪！"阿桂急忙披衣下楼，见蓝苹和唐纳正扭在一块儿。据阿桂说，她一到，两人就不打了。手上的"武器"也放下了。唐纳走开，蓝苹就"被救"了。

不久，共产党为纪念国际妇女节请蓝苹参加业余剧人组织的演出。这是个临时的工作，又把她抛回政治为主、演剧为副的生活，但现在她身份已经高于这种宣传性的剧团了。这时，她只因同唐纳的关系不清不白而身心交瘁。她还说他俩现在很穷，这真令人难以置信，除非蓝苹大手大脚花得超过了自己的收入。

排演时演员都不来，蓝苹想到是张庚这个家伙捣她的蛋，给她颜色看，证明她离不开他。定好的布景也不来，蓝苹马上火了，冲出排演场就走了。

总算是演出了——蓝苹不能、也不愿砸锅。

就象从镜子里看自己的困难一样，她把苦恼都变成了戏，至少是为她的"工人阶级观众"呐喊了。晃晃悠悠上了台，她有太多的苦难要倾诉。蓝苹自己回忆说："头上象浇了铅一样。"她无法控制地抽泣起来，完全脱离了剧本，提

词的人说什么她也听不见。观众深受感动，也都哭起来。她认为她的苦难比这出戏还感人。

但同事们都批评她。后来她说："他们不了解我当时情况严峻，所以他们不来帮忙。"有个男演员一点也没被她的处境打动，竟脱离自己扮演的角色，佯醉在她背上猛击一掌，说要让她从幻想中苏醒过来。蓝苹发烧华氏104度，又哭又闹，人人讨厌。

36年后她回忆说，戏演完时，一般的感染转成肺炎，朋友们送她进医院，在那里住了几天。但她自己当时写的却不一样。

她写道："我坐黄包车回家。当时我们常在南洋路唐纳那里住。"她说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南洋路，恢复三八节演出的疲劳。

那几天蓝苹有病，心神恍惚，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不去自己的小家，也不去电通宿舍，怎么就来到南洋路。她扶着桌子发现书堆里有封信。身体虚弱的蓝苹想看看是谁的信。原来有两封：一封是唐纳写给年轻姑娘阿霞的——这个姑娘象是因为唐纳有蓝苹而离开唐的，另一封是阿霞的回信。

"天哪！"蓝苹叫起来，"谁能体会我当时所受的痛苦！"生病、朋友的误解、情人的不忠，象铁棍子砸在她头上，她昏倒了。醒过来，她又叫道："我还是蓝苹！"——不知她是解脱了还是在旁观自己的痛苦考验。

要不要给"纳"留几个字，从此一刀两断？不，她不是那种草率行事的脾气。她仔细思量自己的"没地方去"。看来，如果仅仅是离开唐纳，那是有地方去的（比如她自己有房子），但她的志气迫使她要同唐纳苦斗一番。

她给唐纳留了一封短信，坐公共汽车去演员俱乐部，想

到那里找朋友诉苦、听意见。她刚坐下，唐纳就来了。蓝苹又爱又恨。唐纳请她回家，她说不行——“我们不能再走同一条路。”唐纳大哭起来，跟小孩没了娘一样。他颤抖地问她能不能先回去商量怎么办，然后再分手。蓝苹同意了——“我怕在俱乐部闹出事来。”两个坐出租汽车回南洋路。

没法和好，又不能离，两人绕圈子谈判没结果，疲惫不堪。“一早我想走了，但他哭得很凶。我到死也忘不了他哭丧的脸。”唐纳请求她宽恕，她不答应，拔脚就走。

后来，她觉得自己态度很不对，又从床上爬起来。她在会客室桌上发现折着的纸，打开一看，是唐纳写的：他要自杀。

蓝苹穿上简单的衣服就“拼尽一切力量”到人群里去找他。找到之后叫他回去。但唐纳伤心的时候愿意独处，脚死钉着不挪开。他要她立刻安慰他的创伤。她爱不爱他？他在人堆里问她。她能原谅他吗？

而对这个要自杀的人，蓝苹让步了。为避免出事，“我说我爱他！我告诉他原谅他了！”

如果蓝苹拒绝唐纳哀求，则说明她是有性格的女性，不易为爱所动，但她不能当机立断同他分手也很引人注意，应有所解释。是不是她觉得能改变他？是不是指望他在电影界帮她一把？

风波一过，蓝苹又烧到华氏108度，说胡话，无端骂人，捶床板。唐纳小心伺候，无微不至。这样他又获得她的好感，又有一点爱了。经他建议，蓝苹挣扎着离开上海，到苏州他婶娘家去。她在这座古城的柳树石桥中休息和沉思了七个星期。除有婶娘照料，唐纳周末也去看她。

蓝苹因为唐纳的过失而演的这出戏也不完全合乎自然，

也可能是谁也不能满足蓝苹的要求。

自由派艺术家中凡是认识他俩的都有点怀疑。崔万秋说："她太强，他比较软弱、文雅。"不少人认为蓝苹拖住唐纳是因为他的文笔和影响对她的艺术生涯有用。

有人在大家称赞的唐纳背后说："她要做真正的娜拉，她在唐纳那里象在金城大戏院一样演戏！时机一到，立刻离开赫尔默律师。"

了解唐纳、不搞艺术的人更持怀疑态度。《大公报》一位同事说起唐纳时认为，"他是温室长大的，稍强一点的女子就比他强。他完全不懂实际生活，听凭他对女人的热情所摆布。"

崔万秋去看唐纳，委婉地谈及爱情和婚姻。他认为结婚时性格比外貌重要。这位《大晚报》的编辑（当时没结婚）说，鲜花自然招来狂蜂浪蝶……

唐纳对他这位不爱修饰的、年岁略小的朋友说："男女之间的伟大爱情超越其他一切考虑。"崔万秋则想的是蓝苹的任性和在上海的艳史……

唐纳后来对朋友说："我同她生活期间，一直不知道她被捕和写自白书的情况。"不论此话是真是假，蓝苹总比唐纳多一点政治头脑。不管她是怎么随便地接近共产党的圈子，对她生活总会有影响。

"叛徒总归是叛徒。"唐纳后来对朋友说。尽管谁也不知道蓝苹是怎么向国民党当局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的。

唐纳否认他给过去的女朋友阿霞的信是"情书"。蓝苹也否认她从此深夜同《玩偶之家》导演章泯相会有男女关系。这里头不忠实的程度有多大姑且不说，但这无疑是蓝苹和唐纳闹纠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蓝苹和唐纳跟当时20多岁的演员们一样，都是个人主义者，一心想的是工作，充满热情。一个男人不可能满足蓝苹，一个女人不可能满足唐纳，那是当然的事。

蓝苹的举动使人难以同她相处，但她对唐纳的态度又不全是机会主义的。他能为她写吹捧的文章，能给她钱花。说她不是机会主义是因为他们一开始结合就吵。在很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她也疯狂地激怒他。她也关心他。她不愿为她的事业作太多的牺牲；她还要证明她是个人，有自己的才能和感情的人。

但蓝苹对唐纳不公平，因为她要求他忠诚，她又没打算回报。电影界很多人都知道，蓝苹自己也承认，她“感情不专一”，同唐纳不能比。

她对唐纳的苛求不是写几篇文章和演重要角色，她要求他把她当独立的人看，同时又要求他心安理得地受她控制——而且不准多看别的女人。

春天阳光明媚，一列满载旅客的火车呼哧呼哧地穿过稻田，从上海开往杭州。有一节车厢坐的是一批盛装的青年演员，一路上高谈阔论：电影、恋爱、到西湖去什么地方。平时这些艺术家关心的艰难国事都抛到脑后去了，一心奔向13世纪马可·波罗发现的“人们以为上了天堂”的美丽城市。

唐纳的好友郑君里是个外国电影迷称之为“中国的莱斯利·霍华德”的著名演员和导演。因为他没有女朋友，所以大家取笑他。他自嘲说：“我的爱人还在广阔的人海里。”①

① 郑君里很快就同黄晨结婚，她目前仍在上海，为本书提供不少有关蓝苹1936年的情况。——原注

其他人也都很高兴，不仅因为都是成对去的，主要还因为这次去是为了参加一个新鲜的集体结婚典礼。新人有三对：一对是赵丹和叶露茜，第二对是顾而已和杜露露，他们都是演员或导演；第三对就是唐纳和蓝苹了。唐纳志得意满，终于驯服蓝苹的野性来参加婚礼。蓝苹呢？她在苏州休养一段之后心情大有好转。

大家先在西子湖的碧波上乘画舫观光，然后在黄龙泉野餐，最后到六和塔聚会。六个要“和”的人默默地靠在一起。

证婚人是沈钧儒大律师，也是唐纳和蓝苹的好友。后来的史诗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郑君里是男傧相。他两人安排了仪式。三对新人象演戏一样按导演的摆布从山石间、人丛中穿过，完成了现代化的艺术家式的结婚典礼。这次典礼与旧式中国婚礼完全不同，反映了制片厂评论家的技巧和演员们的奇想。

当晚大家回到上海。婚礼立刻成了上海这批自由派艺术家的话题。10天以后，三对新人又在八仙桥青年会宴请亲朋好友。一次婚礼分两处举行。

三对新人中蓝苹和唐纳没有要结婚证书。他们充分讨论过这个问题。按蓝苹的说法，是他们觉得结婚证书对他们不适用。蓝苹说：“如果没有爱情，婚书是没有用的。”

蓝苹结婚很勉强。她几次想起这个问题，几次都否定了。一直到三八节那场大病，她到苏州去，唐家的低调气氛软化了她的感情，这才转念嫁给这个前不久还令她伤心欲狂的男人。

她后来又告诉朋友说：“我们结婚是为钱。没有爱情。”她说她和唐纳当时失业，生病，缺钱用，一结婚唐纳“家里

会给点儿钱”。

这是蓝苹第三次结婚，是在她22岁生日后的一个月。

几年后桂林一次文艺戏剧界聚会还谈起这件“杭州的婚事”。参加者有田汉和著名演员王人美。有人说了句俏皮话：“六和塔前六不和。”确实，三对新人都没有处长久，蓝苹和唐纳最短。蓝苹恐怕从来没想过永久伴侣、安定生活或生儿育女的事。她不认为未来的幸福主要来自婚姻。

结婚没多久她就写道：“当时我虽然原谅了他，但我一想起那晚的事和那两封信，心就跳得象要碎了。”

袁牧之在蓝、唐婚姻破裂后说：“你们俩要是没有一个顺从的，只会出现悲剧。”唐纳爱慕蓝苹，他的生活因同蓝苹恋爱而瓦解了，但他似乎又并没有闭眼不看别的女人，只是为适应蓝苹对他的要求而强压激情。蓝苹个性强，当然不会顺从（下一次婚姻迫于形势又当别论）。袁牧之看出了问题，但没有解决的办法。

有一份电影杂志评论道：“提到章泯，人们必然联想到蓝苹。”章泯是上海重要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代表人物。他从英译本翻译了两种斯氏著作，赵丹等人都尊他为戏剧界的理论家。他同一位小学老师结婚，那是个美丽而文静的女性，有时跟不上他。两人有个8岁的男孩叫科林。蓝苹和章泯同居是1937年春，但相识早在一年前。

在国民党施加压力和观众减少的情况下，电通于1936年年中关歇了。唐纳回忆说：“他们不发工资了。”蓝苹有几个月到处找演戏的地方挣钱，直到后来才进了更大的联华制片厂。她当然很需要章泯的帮助。她达到了目的，章泯导演俄国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时请她担任主角。

蓝苹和章泯私通，气坏了唐纳，急坏了章太太。许多人

背后指责，蓝苹不肯退让。她必定知道她这样做对婚姻的危险，干脆告诉唐纳她有“权”再有个章泯。到1937年春天，章太太出走，蓝苹就搬到章泯家住，还吹她同科林处得不错呢①。

蓝苹和唐纳大吵一顿时距六和塔下结婚才五个星期。章泯是个原因，唐纳的阿霞也是个原因，还有就是蓝苹什么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权利”。

由于失业、精神不济，蓝苹想离开唐纳和上海。她坐火车到了济南这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看了亲友，可能包括头一个丈夫费先生。“情痴”唐纳跟着赶到济南，要她回上海，还要她明确表态说她爱他，只爱他一个。

崔万秋说：“我是认为他们不会白头到老，但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打架、分手这么快。”

6月27日晚唐纳乘火车到济南，住进离大明湖不远的铁路旅馆。他给蓝苹姨妈家写了一封信——估计她在那里。她回信大肆渲染她的痛苦，说不能见这个折腾她好苦的男人。唐纳对这个无礼的答复很失望，当晚在旅馆里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幸亏旅馆老板发现得早。老板很奇怪上海来的出名的评论员怎么这样惨，马上找来蓝苹。她赶到旅舍照料他，接着一起回到上海。

蓝苹和唐纳不能平和相处，又谁也离不开谁。

唐纳想自杀的消息使蓝苹大大出名。7月份专登艺术界新闻的杂志大登美丽、难弄、任性的蓝苹怎么使深情的唐纳寻死的材料。蓝苹的艺术没能使蓝苹的名声登峰造极，蓝苹的

---

① 也许是因为章太太没有小题大做而避开了，所以蓝苹离开上海后章太太就回章泯家了。——原注

风流韵事却弥补了这个缺陷。

唐纳在郑君里家宽大、杂乱的房子里吃饭，郑君里陪他。郑的妻子——演员兼作家黄晨出去住了。蓝苹这星期又不见影了。可笑的济南事件阻止了两人离异，但没有带来长久的和睦。伤透了心但仍旧乐观的唐纳仰仗好友的热心和对戏剧的热爱支撑着。

饭后唐纳和郑君里接着聊天，喝白酒。对唐纳婚事了如指掌的郑君里等唐纳习惯地掏出新写的文章时，停顿一下说："有点东西给你，纳。"

郑君里从写字台里摸出一封信，又坐回扶手椅里，缓缓地说："你知道是谁写的。"他把淡蓝的信封交给唐纳，上面有蓝苹信笔飞舞的孩子气的大字：唐纳。"她叫我在你心情好的时候交给你。"

本来是同好友郑君里很愉快的谈话，一下子转为痛苦的折磨。

蓝苹写了足有两千字："你等这封信已经很久了。我想你是明了我的苦衷的。"她对这个刚为她寻短见的男人说。

蓝苹在信里告诉唐纳她决计离开他，她的抱负使她不可能成为唐纳的妻子，或者成为她热爱的上海艺术界的一分子。

蓝苹写道："自从我跑进影圈，言行不一致的矛盾是日益加深了。"这个曾一度使她临近自杀边缘的矛盾的痛苦，却在遇到唐纳之后"忘记了"。只有他一人使她感到可以兼做演员和女人。但更深的矛盾却也在这时生了根。

她说她曾试图爱他："在我计划回济南的那几天里，我竭力企图和你过几天快活日子。"但她忘不了几次大闹，而且过后总是懊悔的。曾经在雨地里走了很久很久，那种悲哀

是说不出来的，直到昏倒为止。

“我想我和你分别，我想起你所说的，这些使我心跳，象是跳在咽喉里似的一样闷塞，浑身剧烈地抖着，一步都走不动了。”她想起后来是叫出租汽车到赵丹家附近，又绕了好久。她还想着在南洋路和唐纳的结婚生活，想着她是怎样固执地爱着他。

她说“矛盾”折磨着她。她不得不说些什么，但心里想的是另一码事。假装欣赏的价值其实不是她心灵深处依恋的东西。给唐纳一个她可以终生伴随他的印象，其实她知道自己必须面对四方。

她说她不会向苦难屈服。她蓝苹要奋斗，她要重新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她已经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以及知道怎样死得有价值些——离开唐纳，离开和他一起的富有魅力的舒适的生活方式。

她写道：“其实呢，你那些天的坏脾气给了我很大的便利。”否则她不会下决心离开他并计划一个超过上海戏剧界环境的生活。

她和唐纳反复争吵过她要不要安于上海艺术家的生活，要不要同他共同生活。她说：“你是对的，但我也是对的。你的真理在你的世界（赵丹和其他人的世界）里是对的，但我自己知道另有一个世界。我体验另一种生活已有三四年。”蓝苹回忆她的政治生涯，告诉唐纳说，他在她眼里只是能演戏的小孩，她考虑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出发点，即不能否定自己。

蓝苹继续写道：“你不是说我向前跨了一大步吗？”她在信里用了许多“我”字，这在不直接表露感情的中国传统信件里很少见。“你说得对。”她认为没有比朝前跨出一大

步再回头更痛苦的了。迅速投身上海的艺术家世界，这是她已经做过的了，她承认她的天性就是不停地向前跳跃。她告诉唐纳说她要“跳”出婚姻和戏剧界。

她曾希望能够促使唐纳退出影界，这样他们可以找到能够共同愉快生活的地方。“但我对你长期观察之后，发现这不可能。”唐纳听不进去，也等于是不把她放在心上了。“你爱戏剧生活甚于爱我。你的绵绵情话令人怀疑。”蓝苹说唐纳曾讲要照顾她。她问道：“如果这样，你哪来的精力呢？”

对唐纳或者任何人来说，爱这么个女人注定要倒楣。蓝苹也坦白承认这点。她承认：“我没有当过好妻子，也没当过好情人。”这封信尽管充满对唐纳的指责，但她也没有隐瞒主要问题。“我是爱工作甚于爱情人的。”

蓝苹的理想是跳出任何婚姻的约束（或者说跳出任何30年代的中国婚姻）。“你也许会说我太自私”，但她不是“在初恋我的时候”“警告过”他“爱我是要痛苦的”吗？

唐纳却说愿意忍受这个痛苦。蓝苹说她还说过“如果在必要的时候离开了你，可别恨我呀”，而唐纳说“至死都不会恨你”。现在她在写这封告别信的时候，告诉唐纳她深被这些话所感动，一辈子也忘不了。

就一个深爱唐纳而且因同他结合获得许多好处的22岁女人来说，蓝苹这么坚决维护个人独立性是令人吃惊的。如果有可能把事业的成功和作为女性的成功结合起来——就是在影界生活，要唐纳做伙伴是最合适的了。但她说这不是她的生活。蓝苹身上早有个鬼怪在驱使她为更崇高的事物跳出成功（事业和婚姻的成功）。

她写道：“我虽然有许多困难，但自信和对名声的追求

是令我振作的力量。”

“有些朋友说我对你有些影响。是的，开始有过。因为那时你热爱我。”她怀疑他对她的影响。“有时我也想接受你的影响，适应这个世界的形态，但结果反而更糟。”她认为这种想法是错的。

蓝苹说她必须指出唐纳的缺点。有三条，第一，他象“你们男人”一样乱交女朋友。“你老说爱我，但情欲控制你时就全忘了。”

唐纳的第二个缺点是消极。“你总是得过且过。”你的抱负何在？她很怀疑。你的理想何在？你总是拖不过去的时候才动笔，这还不是弱点吗？

蓝苹接着数落唐纳的第三个缺点：“你文过饰非。有时明知错了，还硬说是对的——还说我不理解你。”

蓝苹写道：“这三个缺点妨碍你进步，能否纠正呢？不管怎么说，你要是改不了，你不配说曾经是我的爱人。”

蓝苹笑了，说唐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还是个“真诚的、亲切的小孩”，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心。“有时甚至对敌人也发慈悲”——这可不是她蓝苹的性格。她说：“我相信，你只要努力，只要听我的话，就会干一番大事。”

她继续写道：“那有什么关系呢？你认为我是个刚强的、有个性的女人，从不向男子屈服，是从来不让须眉的女人。”她要可怜的唐纳把这次的事看成某种胜利。

“亲爱的，不要悲伤。在我们以后各自的生活当中，我们将克服以往遇到的矛盾。”他会找到另外一个妻子，这点她敢肯定，她也会实现她的抱负。“未来决不会骗人——你的努力必定获得回报。”就她自己而言，她说暂时还要去当教师。

她也谈到了她难得提起的亲人："我母亲已经安排去乡下我姐姐那里住了，不用为她操心了。"可能蓝苹母亲的新丈夫刚死不久。

"把我忘了吧，亲爱的。走你的路——你已经选定了。我预祝你的成功。再见！你最亲爱的苹。"

蓝苹要唐纳把自来水笔和表留给她做纪念。她说，笔要用来写她的生活体验（不说是写诗或剧本），表是用来促使她生活规律。她也给唐纳留下一个相册，满是她的剧照和生活照，还有一件她喜欢的毛衣，希望唐纳"努力"。

唐纳读了信后完全绝望，又想自杀。蓝苹回济南了，唐纳也没去信——"我不知道她的确切地址。"但是，也不知是唐纳是个"情痴"的缘故，还是蓝苹有欺弄自己的能力，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结束。1936年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俩还是在一起，虽然说不上热烈相爱。蓝苹的打算落空。她写这封信以后，婚姻竟死灰复燃，暂时妥协。

迫使蓝苹降温的一个原因是她同章泯——还有别的男人鬼混使她无法责备唐纳有不端行为。有一天，她在唐纳的书里发现夹着一张剪报，那是她在济南期间唐纳写给他"以前的"女朋友阿霞的诗。唐纳说这诗不是写给哪一个女孩的。但蓝苹的疑心病又犯了，滚倒在地。她回忆说："我就象精神病患者一样躺着，透过窗户盯着在风中摇曳的树和在天上飘忽的云。"这次她没有象往时那样离开唐纳，或者立刻同他大吵大闹。

蓝苹对朋友说，她怕她离开唐纳，他准去寻死，会有更多的人指责她是祸根。

她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如果我下狠心一刀两断，恐怕他经不起，还要自杀。"的确，她和"三个朋友"去劝过

他不要再自杀。她认为应当建立“安详的环境，让他萌发希望”。她知道两人关系是每况愈下了，但她不向唐纳表露，以便他保持“她会回心转意”的一线希望。

两人关系暂时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蓝苹这段时间工作很忙。1937年初她在卧室墙上贴了一张纸条，上写“今年是蓝苹的演出年”。她努力吸收戏剧和表演知识。这年春天她在一个卖座的电影里担任了重要角色。联华出品《狼山喋血记》中的受苦女性正是她擅长的角色。她扮演一个受尽恶狼（日本侵略者）侵扰、同狼（是日本人以外的更笼统的私敌）英勇搏斗的妇女。

几个月前蓝苹在电通没事做而对唐纳再次表示要脱离这个公司另换新鲜空气时，唐纳曾建议她拍一部真正好的片子再走。

蓝苹反复考虑说很难实现。一部好片子会让她摆脱困境，那时就不想摆脱影界了。

她预测的情况果真出现了。继《狼山喋血记》成功之后，她在几个月后的《王老五》中又同样成功。同时，报章杂志对她在这两部片子中的出色表演的热烈赞扬，使她高兴起来，也使唐纳高兴起来。

《王老五》是贫民窟里的悲惨故事。蓝苹扮演一个贫穷但是刚强的年轻姑娘，嫁给了王老五，但不是由于相爱，而是为了报答他在她父亲去世时的关心。贫困、酗酒、日本侵略使生活更加悲惨，但这个女人在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她胜利了，因为她活了下来，而王老五死了——对这样生活的人唯一实际的目标就是活下来。影片结束时蓝苹伏在丈夫尸体上，强忍血泪痛斥她个人和全中国的敌人。

人人都夸蓝苹象王老五的妻子一样“有骨气”。蓝苹来

劲了。但对唐纳却是个打击。“一部真正好的片子”使蓝苹脱离的不是影界而是唐纳！

唐纳写了一篇文章称赞《王老五》和蓝苹在其中的演出，但他的评论对她不象先前那么重要了。正如1936年她遭遇挫折使唐纳同她难以相处一样，到1937年她在两部电影中成功时，她事业上、感情上都已不再需要唐纳这个靠山了。

193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金城大戏院门前人山人海。这座上海第一流剧场首演夏衍的剧本。夏衍是田汉的老朋友，也是蓝苹的熟人。海报宣称：“一张利嘴使北京数千人得救。”

《赛金花》是关于义和团时代一位勇敢的妇女的故事。当时对妇女的要求是“笑不露齿，行不露趾”。赛金花原来是个妓女，后来参与政治，最后穷困潦倒。她的一生（1874—1936年）是中国人常用来结合历史和爱情故事的传奇。

赛金花在性格上也是宁愿做独立自主的妓女也不愿做普通男人服帖的附属品的女性，这和蓝苹一样，宁愿寻找担风险的职业也不愿做济南费先生的三从四德的妻子。赛金花和蓝苹后来的政治表现一样，具有一种天赋的政治才干，不懂理论，但不妨碍她精于策略，周旋起来游刃有余。

蓝苹争演赛金花的劲头是自己很少有的。她跟唐纳、章泯都说了。她急于要出演这个有声有色的女性，丝毫不顾她的生活和赛金花有多大距离。赛金花这个女人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坏名声斗争，但仍然对当时的政治和中国人的想象力产生影响。男主角是金山，上海舞台上的克拉克·加布尔。

但留学日本的著名左翼剧作家夏衍并不欣赏蓝苹。他让漂亮的王莹饰演赛金花。王莹在夏衍不少剧本和电通的影片

中担任过主角。蓝苹听到这个消息，想演的迫切心情立刻转为“气愤”：赛金花这种“叛徒娼妇”还配一出戏的主角！妓女怎么能代表中国？怎能让她去贬低义和团“英勇的群众运动”？她攻击这出戏到了发狂的程度，以致出演这出戏的“四十年代剧团”威胁说要置她于死地。

过去的几次大闹伤透了蓝苹和唐纳的脑筋，都不愿再闹了，默默地等着离婚。他们的婚姻生活是由几百次卿卿我我和反目为仇交替组成的连台本戏，每星期换一次花样。

倾诉衷曲被互相争执权利取代了。自由派艺术家们指责蓝苹愚弄唐纳。蓝苹说唐纳懦弱，犹疑不决，但她承认已经不爱唐纳，找了章泯。

有一天，唐纳冲进蓝苹的住所，他受够了，要跟她了结。他掏出刚从日本回来的阿霞的来信，这位先前的女友在信中埋怨唐纳抛弃了她——为了蓝苹。哆哆嗦嗦的唐纳把信给蓝苹看，证明自己的专一。

但不能指望蓝苹专一了，这天她已表明立场：“我不再爱他。”她说她愿意和他做个“好朋友”。

唐纳听这话比什么都难受。

她问唐纳要不要在报上登离婚启事。唐纳说如果蓝苹要就登，他不要。她也不要，所以决定不登。唐纳准备离上海一段时间。

过了几个星期，唐纳又找上门来骂她跟章泯睡觉，为了“提高自己地位”而“骗”他。

蓝苹把话说得更清楚了：“你已说我们的问题解决了，那我还不能爱别人吗？告诉你，就是没解决我也有爱别人的权利！”

蓝苹回忆说："他骂我，我不理他，让他骂。他骂够了就走了。"她决定他要是再来就打他。

他真的又来了。她回忆这晚上的情况说："我房里只有一把水果刀和一副剪子。我什么也不怕。让他来！我决不退让。"

她把门一关，上去就是一拳。他打她的背。女佣和朋友听到吵架赶来，但门被蓝苹锁死了。唐纳走时拿走他写给蓝苹的信，还有蓝苹记的两人生活的笔记本。房里打得稀巴烂，但她保住了自尊。

她说："他讲要去登离婚启事，但没登。"

唐纳绝望之余跳进了黄浦江。大白天有人看见，把他救起来。《大晚报》等简要报道了这件事，但没提蓝苹的名字。

1937年5月，他们正式离婚了——没有结婚证书，容易一些。蓝苹在上海银行欠的帐也不去还，让唐纳还。她还把唐纳的表和自来水笔当掉了。

蓝苹在和唐纳闹纠纷的过程中，全力以赴投入了戏剧活动。结果很不错。钱的问题解决了。电影公司给的钱虽然不能令她致富，但也不再穷了。人们眼看她多买起衣服和化妆品来。她也不那么绝望了。她的一切烦恼、孤僻和任性，在舞台上和摄影机前都变成使观众满意的表演了。

尽管在共产党人的词汇里"艺术和文学"是并提的，但30年代上海象蓝苹这样的演剧界走卒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是有天壤之别的。

鲁迅坚持要把宣传和文学分开，但宣传和演戏的艺术不大好分。纯粹的感情可以掌握戏剧观众，但印在纸上的纯粹感情就没有那么大的效果。蓝苹在舞台上可以运用她的强烈

个性有效地感动观众，但在青岛写小说写诗却没这么成功。

演员的生活和作家也不一样。演员要当众朗诵，三天两头换角色，和各式各样的人交往——这些正好对蓝苹的胃口。作家的生活方式要求坐着捧一本书，孤独、耐心、一贯。

在蓝苹脑子里，观众和群众分得很清楚，这个令人吃惊的认识日后对她的政治观点影响很大。她认为，看她的戏的人是“人民”，意思和共产党认为工农选民是人民一样。这两者都是她的中心人物，她应加以指导。她常谈起她的“基层工作”，指的不是政治组织工作，而是艺术工作者对欣赏自己表演的观众的教养。

蓝苹把戏剧和政治上的激情结合在一起，这在若干年后推动她去争取和运用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是《狼山喋血记》里那头恶狼对她的追逐，还是她小时逃避黑暗里的动物的记忆，使她产生这种激情？也许是她把日本人比作狼，或者把“资本主义阶级敌人”比作狼。这很难说。

蓝苹是个有自然倾向的人，不大听命于概念。她以激情投入的角色形成了她在30年代作为妻子、爱人、公民的价值。《狼山喋血记》中的狼也成了她生活中的狼。她在舞台上、银幕上苦斗的敌人很容易变成她政治斗争目标中的“阶级叛徒”。很可能她痛恨日本侵略和经济剥削的感情不是出自她自己的生活，而是从演《王老五》体验到的。

她确实是将自己体验的激情投入了她的艺术；但她的生活也深受她难忘的艺术实践的影响。

观察象蓝苹那样从演戏转向政治的人时，不能局限于演员和政客的个人观点，须知，他们都习惯于用激情表现各种人的观点。人们可以看蓝苹30年代的电影而意识到江青在60

年代的活动，就象从80年代的角度去看罗纳德·里根的旧电影一样。这时人们会问："哪个是真的？"两个都是真的。那是同一个女性（不仅指同一堆血肉这样那样活动），因为两种情况下掌握她的是同一种激情——追求平等，逃避淫猥的男性，运动群众，坚决消灭她的敌人。

崔万秋在看蓝苹演出娜拉时曾对朋友说："她不会成为一个好妻子。看看她在指斥赫尔默和维护自己独立性的时候是多么刚强，多么自信吧！"他看了蓝苹的娜拉就对蓝苹有了某种理解。

蓝苹在联华影业公司的杂志上写道："我不能再忍了，我要说明真相。报上大登唐纳的朋友有关蓝苹虐待唐纳的消息后她憋不住要讲讲自己的看法。"这时是1937年5月，她和章泯在一起，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唐纳了。

她说："首先，我对这种麻烦事是忍耐的。上苍作证，我还值得为唐纳的事操心吗？"接着，她说如果她不吭声，别人会以为是她的过错。"他们会更加恨我。"

她作为爱人和妻子没有什么不配的地方，错全在唐纳。"他爱我是怎么个爱法？那就是热切地爱着别人，同时又在爱（？）我。这就是他的爱法。"

她说她太天真了。"谁都知道他在和我认识的时候正爱着另外一个女孩。"她没有问过他关于阿霞的事。直到很久以后她问起时，唐纳说那是为了掩盖他和蓝苹的关系而放的"烟幕"。蓝苹写道："事情就象流星一样从我脑中消失了。"但唐纳没有同阿霞断。"这伤害了我的自信。因为我总是相信爱我的男人不会欺骗我。"

她同唐纳结婚实际是怕伤害他。她现在肯定："他和我

对结婚都不认真。”他在济南第一次自杀之后也是如此。她讲起那天晚上在大明湖附近旅馆里的痛苦经历：“我的主要想法是要让他自爱，然后好离开他。”她说她在济南心肠“太软”，对他让步了。她说，“出于同情和怜悯，我做了我一生中最可耻的事——跟他回上海。”

在1936年年底他俩婚姻出轨期间，她就是这么做的。“我的要好朋友叫我离婚不要太突然，说是不然唐纳会疯的。”其实离婚的过程本身对唐纳刺激就够大的。“他没有决心改过，”蓝苹解释说，“请注意，我不是说他改了我就跟他好！不，蓝苹不会再爱他了。伤痕太深。”

蓝苹说她和章泯同居后唐纳又要自杀。她说他的一些朋友因此威胁说要对她施行暴力。蓝苹对此有如下评论：“天哪，他们把勇气用来对付日本侵略者多好！那样的话中国就有救了。这帮可怜虫只会把气撒在小姑娘身上！”

《唐纳和我为什么破裂》是一篇蛮不讲理的文章。蓝苹是打的防御仗，如果她真的自信没什么对不住唐纳的地方就不用讲那么多。她不提章泯，却一反常态，大讲另一个制片人怎么帮她进了联华，这未必全是实情。她说为了她的身心健康必须抛弃唐纳。她说她多次想自杀而没有干，唐纳是真干了。

她在唐纳第三次自杀后回忆说：“我告诉他，‘你要是自杀，我会比以前更坚定地生活。’”

当然，蓝苹不是会自杀的人。“我要关心自己！”这是她的战斗宣言，不论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对手。“我在攻击面前决不屈服，这是我生活中值得自豪的事情之一。”

她拿自己同阮玲玉比。阮玲玉这位漂亮的女明星在25岁时由于“人言可畏”而自杀了。蓝苹写道：“我决不学阮玲

玉。”她显然意识到人们在议论她对唐纳的态度和同章泯的关系，很不舒服，“我不会因为‘人言可畏’而自杀。我不屈服，一步也不后退。”不论是唐纳的拳头，他朋友的舌头，还是小报上的笔头，她都不在乎。

“他们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踩吗？不！蓝苹是个人，永远不退缩，尤其是在这种蹩脚的把戏面前。”

她需要一个意志坚强的男人。不过，她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恐怕也是两只老虎关在一个笼子里，精力过剩。他要唐纳“改过”，但是，唐纳如果再自负一点，再倔强一点，能同蓝苹相处吗？

政治压力，特别是在1937年夏季日本全面进攻之后，越来越大，电影业奄奄一息了。蓝苹在联华拍的反日短片《两角钱》中担任主角，但联华很快就歇业了。

蓝苹的私人生活也到了一次循环的末尾。她离了婚。《唐纳和我为什么破裂》使她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艺术界也有议论。都认为她挎着章泯的胳膊当上《大雷雨》的主角“太过分了”。章泯剧团里的人也说她目中无人，利用她同老板的关系吃小灶，其他人都在食堂吃集体伙食。

尽管她愿意，但同复杂、繁忙的章泯鬼混是没有前途的。更重要的是，上海的戏剧、电影业一天不如一天。所有演戏的人都在考虑压倒一切的政治了。

上海对蓝苹在政治上也不安全。同蓝苹挺熟的一位女演员说：“国民党黑名单上的人都知道自己处境危险，1937年都想另找一种政治环境。不走的人都被捕了。我想这是蓝苹离开上海的一个原因。”

在和唐纳几次“告别”中，有一次蓝苹曾建议为唐纳应付社会关系而采取一个补救办法——“就是说我死了。”这个怪念头符合她的戏剧性格和她对自己软弱的意识。她写道：“反正我是离开这个环境了，就算死了吧。”以此来自圆其说。她叫唐纳发消息说她得脑膜炎死了。“我还活着的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她表示相信他能保守秘密。

现在用不着这个怪念头了。蓝苹确实在她上海的世界“死了”。1937年7月，她收拾行装离开上海，带走一大堆剧照。唐纳知道她走了，但不知为了什么——现在她关心的应该是章泯，跟他无关了。

蓝苹在上海这四年的奇遇和矛盾是什么原因呢？同党的关系总是不好，同唐纳和其他男人的关系总是忽冷忽热，既放纵自己又有自己的活动模式，这一切疑团都要从她内心目标中去找答案：不让“大人物”利用，要做环境的主人，作为一个人要自由自在。其他什么组织、观念、人民，只不过是她自觉的个人奋斗的舞台。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四年是她的黄金时代。她后来说：“我不是个出色的演员。我在新演员中也不算杰出，但已经突出了。”确实，在史东山的影片中，在唐纳的评论中，在章泯的派角中，在共产党领导的艺术团体中，她的成功主要靠她自己的意志、干劲和本领，靠她对生活的“激情”。

她后来的生活中缺少这些，尽管她的地位上升了。30年代尽管窘迫，但她在上海舞台的那几年是值得炫耀的。也许“蓝苹”是江青最得意的一段。

离开上海之前，蓝苹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的生活》，其中概括了她在上海得到的价值，表现了她个性的若干不变

性质，预示了她将来第四次结婚的方式以及这婚姻最终带来的政治生活。

她按一贯作风，开头便把自己放在与一般看法不同的位置。人们常说“演员多了不起呀”，蓝苹认为不对。人们还说：“啊，她是个糜烂的演员！”这使她很生气。

她坚持戏剧是改良社会的手段，在1937年的上海还必须是反帝的。所以剧人自然会受到各方面的攻击和侮辱。“依恋旧世界”的“帝国主义魔爪”必然把目标指向“新剧运动”和“盛开的鲜花”。

在这样冷酷的条件下男女演员都应当训练和培养自己，身体的训练和哲学、意志的培养都不可偏废，要把自己锻炼得象“钢条一样坚不可折”，“他们不是玩偶。”

她这里似乎指张庚，也指章泯（虽然不太气愤），指她不仅靠脸蛋，还要有和男人一样的意志和思想。

戏剧要想完成真正的社会功能，编剧和导演必须深入分析社会。即使剧本不错，导演社会分析不足或者不对，也会把演出弄糟。但蓝苹坚持说，这个创造过程中，男女演员是第三个同等重要的成分。他们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也应当对社会有第一手材料和正确的分析。

他们不能象“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是有漂亮脸蛋的玩偶。他们不能只是背诵编剧笔下的台词，应在演出时注入自己的精神，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价值和编剧意图的混合物。他们和编剧、导演同样光彩。他们参与编剧、导演的“共同努力”，都应当用“同一把尺子”来量。

这篇文章词藻华丽，情绪激昂，态度主观，观点分明左倾。

蓝苹写道：“许多人认为演戏很容易。那不过是背诵台

词，这儿笑，那儿哭，哭和笑都要运用自如。谁不会哭，谁不会笑，谁不能运用自如呢？”她虽然年轻，对演出技巧也不算老手，但还是要驳斥这种胡说。“演员可能有天才，如果她不投入活力，意志不够坚强，天才也会萎缩乃至成为废物。”

她认为没有活力和意志，“美丽活泼”是不够的。这也许是指阮玲玉等漂亮的年轻女演员最后的悲剧结局。蓝苹正是在告诉大家，她不仅有“美丽活泼”，还有她赖以活下去的“活力和意志”，而且能在任何未来面临的领域中加以利用。

她这个只有23岁的人认为也有资格指导那些有抱负的男女演员。她建议，如果发现自己有演戏的天才，就要下决心多受教育。她似乎是总结自己以往经验，这样写道：这件工作“要使用思想和身体这两个条件，这里用思想，那里用身体，完全适应你们所处的各种情况。”

她以往的生活正是如此，她给人的印象就是不管在什么方面——演戏、参加左翼活动、结婚，她的眼睛总是不只注意近期目标，她的本色总是凌驾于当时的任务之上。

信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蓝苹又进一步解剖了演技问题。她说，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上台不能简单地照自己的样子演。A角可能比B角更适合某个演员，但一个人演两个角色是个创造性的活动。

她写道：“演出是艺术，不是生活手段。”

于是蓝苹责骂把她当玩偶的导演，拒绝“糜烂的女演员”的陈旧观念，宣扬女演员是“创造者”。

她在鞭笞上海戏剧界环境“罪恶”的时候，端出了主题：她将不顾相反的压力，坚持把她的戏剧艺术和生活分

开。演戏时她将投入她的活动技巧，但她的生活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变成演戏。她在娜拉、《狼山喋血记》中斗狼的妇女、《王老五》中的王妻身上注入的本事是她蓝苹的本事，但她本人有别于这三个女性。她手中掌握她们当中有差别的配方。

她在革命的中国的大旋涡里是个年轻的、爱追逐的、可塑性强的个人。她的“艺术”这些年是在舞台上发挥，以后不一定局限于舞台。

蓝苹想坚持个人权利的动机压倒了她对任何艺术、任何事业、任何男人的依恋。正如她在《我们的生活》中拒绝女演员是半个妓女——供观众娱乐或陪伴导演的玩偶——的观念，她在生活中也拒绝担任半个妓女的角色。她所谓“这里用思想，那里用身体”适应各种面临情况的争斗，远远没有结束。

唐纳对朋友说：“她知道她应该离开上海。她的《我们的生活》是她去延安的饭票。”

蓝苹对唐纳来说是太强了，她的野心也膨胀得戏剧容不下她。她的下一个男人必须无比强大，她的下一个领域要使她超出言语和形象，超出观众那稍纵即逝的感情，她要真正控制大事情。她说过：“不要忘记，美丽不如权力重要。”

第 四 章

毛泽东在延安的主妇

（1938—1949）

两性关系只是头几个回合起作用，能长期保持利益的是权力。

——江青

延安这个小城远离上海，是黄土山下盆地中一个饱受旱灾和风沙侵扰的地方。弯弯曲曲的小河边盖了一些木头和褐土结构的房子，窗户是纸的。小鸡在大街上不紧不慢地溜达，背上驮着东西的骡子耷拉脑袋走着。蒸小米饭的煤炉冒着袅袅炊烟。最高的山上有一座宋代（960—1279年）建造的宝塔，整齐细长象支铅笔，为周围增色不少。

只有砖墙上高悬的标语，学校操场上摔跤舞刀的强壮士兵，山脚下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住房边上挎毛瑟枪的卫兵，才告诉我们这个中国西北部的安乐社会不是简单的四周农村的中心，而是一批坚毅的政治流浪者的前哨。

夕阳西下，群山抹上深红色，一个姑娘坐在延河浊浪边的石头上。卡其布裤子卷到膝盖上边，叉开的两脚没在浅水里，她一手拿块肥皂，一手拿着脏衣服。她没注意有个男人

站在旁边，那是新到延安的画家陈杰克。当陈向她打招呼时，这位俊俏的姑娘脸上掠过一丝笑意。她站起身来，直直腰，皱起眉头盯着洗过的衣服。她若有所思，也不同陈搭话，拿着衣服回新同志接待站去了，她就住在那里。

对蓝苹来说，前几个星期是重新考虑的时间。上海被日本攻陷之后，共产党想把政治上有影响的艺术人士聚集在一起，重新组织一个民族救亡剧团，为苦难的中国人民演出抗日剧目。但由于她的男朋友章泯领导的业余实验剧团坐火车往西去国民党首都南京了，于是蓝苹就考虑要不要去四川，许多上海人都去了那里。

蓝苹因为信口开河以及同唐纳分手而给人留下坏印象，树敌不少。她既不是通行无阻的名角儿，自己又不甘心什么角色都演。史东山态度暧昧，她总怀疑他瞧她不起。袁牧之是武汉创建的中央电影制片厂的大人物，现在已经公开诽谤她（唐纳在他眼皮子底下把蓝苹从电通制片厂抢走，他不会高兴）。

她到了上海、四川中间的武汉，在那里停了一两个星期。“蓝苹想见我，找个工作。”后来当了这个长江边城市的中央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郑用之回忆说，“她是通过郭沫若的秘书阳翰笙介绍来的。”郑用之不能帮忙，所以两次未见。“1937年的7月我没有空位子给女演员。第二个问题是唐纳在我们公司，他特别恨她——我没法考虑用她，唐纳不想再见她。我想她很快会离开武汉。”

眼看电影业不景气，蓝苹感到自己可能失败。

她同别人一样能吃苦，而且至少也受到日本侵略之害。她同时也是爱出风头的人。有些朋友已经感到她脑子里有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个人作用的思想萌芽——这点与纯粹

的艺术家不同。唐纳曾对一个朋友说："你看吧，她一定会离开上海，而且决定之后会同延安的人挂钩。"个人看法不一定准确，但她确实向往一种新的冒险。

蓝苹有把艺术和生活结合起来的想法，这样成就会大得多。在延安她将在剧院工作，同时可以在剧院之外，在共产党的政治活动中，努力实现自我满足。

有两个共产党高干可以帮助她。一个是她青岛时期的丈夫俞启威，这时也来到西北，他们有联系。一个是同乡康生，当过诸城小学校长，他们那时相识。康生在蓝苹母校青岛大学毕业后去苏联学习，现在回西北来了。这肯定是蓝苹可以依靠的"大山"。

她于是面向黄土山，要在那里施展她的天才，开辟一个有希望的、不同的局面——不同于上海，正如上海不同于诸城。这里起码是个不同于上海的有趣的地方。

西安是一座古城，笔直的大街很宽，带庭院的房子很矮。佛塔在低平的街道上耸起，似乎是在看守中国腹地和欧亚洲边沿之间的这个战略门户。日中战争真打起来之后，来自中国各处根据地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假设的抗日"统一战线"中互相接触，西安成了政治桥梁。它是蒋介石的"白区"（西安在内）和毛泽东的"红区"（1937年1月起首府在延安）之间的交通转运站。

1937年7月底的一天，蓝苹走下闷热的车厢。她带着两个包，手提包里装着积蓄，叫了辆马车直奔八路军办事处，这是毛泽东的中国在蒋介石的中国地界的一种使馆。远去北方红色荒漠朝圣的人必须在这低矮简陋的大房子里接受检查。

和蓝苹同过一段路到西安的女演员李丽莲，也准备脱离

戏剧中心。她很快就同奥托·布劳恩结婚了。这个退休的德国人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莫斯科控制中国革命的工具。未来的布劳恩太太看出了蓝苹的易兴奋、爱聊天、好奇、使性子的特点。

蓝苹不是个普通的朝圣者，正如她不曾是一个普通的女学生、费先生的普通的主妇、普通的女演员、唐纳的普通的妻子一样。没有人派她来西北。她来这里，身上没有党的命令，也没有规定的任务，只是一种冒险，看看苗头。她承认："是我要求去的。"

在共产党中国，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个人都在单位这个茧子里生活和活动。人们谈起单位来就象西方人谈论一个牢固而沉闷的大家庭一样。蓝苹总想占据几个单位的模糊地带，以中国人没有的活动性在单位之间游动。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不论是结婚还是单身，不论有没有固定工作，蓝苹基本上总是一个人的单位①。

蓝苹在西安两星期，不与同事往来，不和外界接触，令人感到奇怪。她独来独往。她的飘忽不定引起一些人的怀疑，也引起一些人的兴趣。

蓝苹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招待所里遇到她在上海的政治启蒙老师徐大姐。徐大姐为人直率，有点凶，在新的政治条件下她把一冰这名字改成了明清。她有一段时间没见蓝苹烦躁的絮叨了，一见面笑得不太自然，很奇怪"小妹妹"李云鹤怎么成了有名的女演员蓝苹小姐了。

大姐看出了蓝苹机灵的一面，而且引起了蓝苹的盘算。蓝苹要逐步改变角色，但又担心自己过惯放荡生活而不适应

---

① 多年以后，她自己说她是"一个人的单位"。——原注

新的严肃环境。延安对她的狱中生活了解多少呢？她脆弱时候曾写下该死的《自白书》。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新建的统一战线可能有利于她同上海的国民党人接触。至少她希望这样。不过有些人会指责她糜烂。她能让无产阶级道德的裁判相信她的童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吗？

徐大姐和蓝小妹虽然性格不同，却互相靠近，都意识到互相帮助的可能。她们拖着凉鞋，披头散发地坐在闷热的屋子里，一面吃瓜果，一面瞎谈着将来的计划。蓝苹离政治旋涡越来越近，她先前的“组织领导”对她的义气是她成功的必要条件。

招待所许多女同志都是矮胖身材，蓝苹很苗条。大家都不注意外表，蓝苹很修边幅。仲夏使人疲乏，她却象个女童子军激动不已，（象《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向自己提了100个有关西北生活的问题。

她很爱笑，似乎充满生活之乐，要找机会释放，隔10分钟总要格格笑一阵。脸上露出笑容的时候，一对明亮的大眼睛使她全身发光，她那平稳而带颤动的声音也很引人注意。

和革命女战士截然不同，蓝苹在舞台上学会了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能产生什么效果这样一套本事。来西安时还穿着旗袍，现在是脱掉了，但她并未脱掉那穿衣服的技巧。她在男女不分的衣服裤子上拦腰围一根带子，立刻就俏丽起来。头发还是很长，不管徐大姐怎么动员，一个人不可能一夜之间什么都改掉，但不是散乱地披在肩上，而是梳了两条辫子。辫子上用了不太显眼的蓝带子。即使不化妆，她的脸蛋在女朝圣者们当中也是突出的。

在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环境里，作为潜在对手的女性互相

仇视，但没有竞争关系的也能凑到一起，徐大姐总是热心地听蓝苹讲她在上海的崇拜者怎样怎样向她喝彩，给她写信，送她鲜花。蓝苹尽量利用自己的风度和魅力为自己服务，同时又中断话题，谦虚一番，强调她虽然偶然当了演员（可能徐大姐正是对此感兴趣），但她的生活目的是革命政治。这两人在一起吃饭，一起坐在硬板床上设想战争和革命的前途。得到去延安的批准后，她们决定一起走。一天早上6点钟，天还没亮，她们爬上卡车，开始了这次旅行的第一步。

蓝苹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新鲜。黑山羊成群。农民穿老蓝布，戴墨镜挡沙土，头上的毛巾都是陕西打法。在上海的时候，中国这块地方简直跟月球一样远，在蓝苹的脑子里，肯定不如好莱坞近。和她童年的山东比，这里的农民看上去比较脏，牲口比较瘦，尘土飞扬的田地不长庄稼。

暴雨一下，山上红黄色的泥土成了糖浆似的洪流，石头和泥泞挡住了车道，没法往前开了。他们想骑上紫铜脸的农民喂的骨瘦如柴的马儿前进。有些人上了马，但蓝苹出尽了洋相。村民甚至能同马儿谈话，蓝苹却不知道怎么跨上马背。

“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骑。”几年以后她坦白承认——这时她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而且“特别爱骑”了。

她骑的那匹马脑袋耷拉到地，似乎被这外来的负担欺侮了，一动也不动。她不会吆喝——这正是她这个奔放不羁的人与中国这块严肃土地上的人的区别。她发怒了，但没出声，爬下来折了根柳条。她又象头一次爬火车上铺的小孩那样爬上马背，拿柳条抽它屁股。

“这一来它发狂地跑起来了。”她就象在数落她的某一个丈夫一样说道。

但抽打没有多大用处。在瓢泼大雨中，被蓝苹的柳条激怒的马没跑多远就筋疲力尽了。

暴雨过后，蓝天下又恢复了可怕的静寂，路也好走了，浑身红土的这行朝圣的人又上军用卡车赶路。1937年8月下旬，他们到了洛川。

在这个小镇的荒凉小山边那低矮土屋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围着一张长桌子抽烟。扩大的政治局正在讨论屋子里最有权力的人毛泽东写的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

徐大姐能护送蓝苹过洛川是因为她丈夫王观澜也在参加会议。他也来自上海，现在是统战部长。夫妇见面了，女人们被安置在一个土屋里等待会议结束后去延安——长桌边上只有男人。

第二天，蓝苹醒得很早。这是个难忘的早晨。四周很静，能听到几英里外驴子叫。明亮的太阳光给黄土山抹上颜色，就象霓虹灯通了电一样，一点也不难看。蓝苹觉得空气有一种古怪的蓝色，似乎能碰到。

早饭喝小米粥（不象上海有烤面包）的时候，消息来了，政治局会议半夜结束了。7点钟，大家（包括蓝苹等随从）就要开始那去延安的50英里路程。

政治朝圣者们挤在卡车里。蓝苹和徐大姐及其丈夫王观澜坐在一起，等候开车的命令。几个重要人物走出土屋了（他们那一看就显得重要的口袋里插着钢笔），他们不慌不忙地聊天，钻进一旁等着的轿车。蓝苹被这些共产党领导人的自信镇住了——他们正在反复排演政治戏剧，舞台很粗陋，布景和服装都很简单。她想理理头发，但卡车上没镜子。

有一辆轿车还空着。卡车上的人眼睛都盯着矮土房，看

最后一个出来的人。毛泽东象最后出台的明星一样出来了，很高，瘦瘦的，头发很长，脸象个满足的副教授。

“就是他。”王观澜悄悄对蓝苹说。盯着看，指指点点，都是不允许的，但这个随从很想这么做，因为对毛泽东的出现她感到兴奋、崇敬。蓝苹突然为自己的幼稚和政治上的无知吓坏了。看来在这个共产党领导的世界里有她永远不懂的微妙和秘密。她的能力够吗？是不是不该去延安？

多年之后，蓝苹坚持说，在洛川“所有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都出来欢迎我”。那是扯淡。但当时在场的毛泽东同事和对手张国焘也只说对了一半。他们说蓝苹“当时只不过是个演员，没多少人注意”。虽然谁也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但她也招来一些羡慕眼光的扫视。领导同志可能没有欢迎她，但可能有人看见她了。

眼光扫过，卡车开动之后，蓝苹想学认真的观察家那样看看陕西农村。她的眼光投到山上浸蚀的大裂缝上，那里因此很少树木。但她的思绪又回到开完神秘会议的安详自信的共产党人。她在沉思：毛泽东看来过40岁了，配她23岁的人太大了。他妻子在哪儿？她自言自语地说。

蓝苹还沉浸在她细心但活跃的思考之中，歪歪扭扭的车队已经到了延安郊区。她在县城南门看到一块旧碑：“安澜”。安谁的澜？这安抚的力量哪里来？

延安这座5000人口的不热闹的市镇是共产党抗日游击队的临时协调中心，有些设施是超过欧洲农村的。没有工业，汽车少得象剑恐龙。飞机场上一片尘土，大多数头缠旧毛巾的延安老百姓不知道那是什么。

陕西省周围的村庄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据说那里

老百姓一生只洗两次澡：出生和结婚。1928—1929年大饥荒，陕西省饿死了300万人。剩下的人许多是啥也不知道，不知道北京在哪儿，日本侵略者是什么，甚至自己生日也不知道。

蓝苹不得不在泥汤一样的小沟里洗衣服，这里没有上海那种很自然的娱乐和应酬，她每时每刻都要掩饰她的焦虑和痛苦。

在延安应当为精神的东西活着。蓝苹和大家一样，只是出于自己的动机和用自己的方式，透过脏衣服、脏毛巾和床上的虱子，看待那模糊的满足和长远目标。

她到延安来的动机是复杂的，其他许多人也同样。有些人因国民党区域很危险，没有人身自由，上学没有前途。许多年轻人来延安是逃避婚姻，脱离家庭，在上海上不起大学，或者只是出于好奇。

30年代末期到延安的青年人当中，蓝苹的意志力比较突出，但政治上很不老练。她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只是一些词句、零碎的观点和对战争的看法。她谈起革命和战争问题来就跟讲京剧里的正、反面人物一样。“我们是对的，他们是不对的。”这是她了解的一切。她只有热情和斗争意识，但一点也不懂历史。她的头脑还不够进行社会分析，那是成天想小计策的脑子。

后六个月她有两个打算。在“艺术”领域，她需要党为她重操旧业——去工作或学习开绿灯。在“生活”领域，她想树立女人的形象，以便给单调的延安带进点上海的刺激。

在接待站食堂里，蓝苹以麻利的无产阶级热情吃下她那一份饭菜。早上吃小米粥的时候，她说好吃极了，其实她嫌小米粗，而且没有上海粥的甜味。她参加人人都参加的军训

时，敏捷地转动身子，表现出演员的优美。她很有兴趣地摆弄枪支，难免也流露一点做作。

她平常就象个乡村姑娘，她经历上海的动荡、竞争、风流韵事之后还没有丢掉在这里受欢迎的单纯的一面。在延安，质朴的红军战士从香烟牌子上收集到一些上海电影明星和白俄芭蕾舞演员的相片，但都不知道蓝苹也是一个明星。

总的来说，蓝苹并不太合乎延安的要求。在西北，有个人专长，以及较好的至少过得去的政治历史，是受大家拥护的关键。她1933年到上海，投身之处是一个按个人愿望奋斗的颠簸的大洋。1937年来延安，她叩的是军营大门，这里任务是固定的，一切都必须有共产党的批准。

蓝苹不是当然的党员，她和参加过长征的人（例如毛泽东的妻子，虽然只参加一小段；还有红军首长朱德的妻子，女英雄康克清）以及二三十年代在国外学习和做过工人组织工作、教育工作的人（例如李富春的妻子，勇敢的蔡畅；周恩来的妻子，忠于革命的邓颖超）不能比。

蓝苹也不能作为当然的知识分子，象丁玲那样被派去当编辑或教师。丁玲当时出版了许多小说，担任了共产党报纸《解放日报》的文艺编辑①。蓝苹必须从头干起。她认为自己是个革命的空想家。但她有两项主要财富到处可用：上海派，以及招引男人注意的天才。

和初到上海时一样，部分是由于环境，部分是由于她想独立的性格，她决心依靠自己作为一个有明显个性的动人姑娘的特点。如果她认识不到她的“生活”比她的“艺术”要

---

① 当过演员的陈波儿也使蓝苹很苦恼。蓝苹这个对手一到延安就进了党校，因为她过去搞过政治工作。蓝苹则在接待站呆了好几个月。——原注

紧，蓝苹作为女人有比作为演员或共产党员更大力量的话，她就不能算人，不，就不能算是蓝苹了。

有一天，蓝苹遇见在宣传部工作的27岁的朱光，恋爱故事就开始了。据一位延安人回忆："他们老在一起。1937年秋天没有人不以为他们是一对。"面孔漂亮、能说会道的朱光是上海大学的学生，老师之一是田汉。蓝苹跟他很谈得来。

"蓝苹请求恢复党籍的时候，"一位开始处理她的申请的干部说，"她常同她朋友朱光一起来我办公室。"那几次，蓝苹穿的是普通的中国裤子，广东式的工作服。蓝苹和朱光那副活泼的面孔和随便的姿势，正是倒在延安瓶子里的上海酒。

同朱光的恋爱史不长。有人认为他还够不上她想依靠的"大山"。我们不能肯定她有什么想法。但恋爱故事结束之后，蓝苹还在接待站，还在等着党批准和分配工作。

冬季到来，两座更高的"大山"来帮助蓝苹了。徐大姐的丈夫王观澜向李富春说了蓝苹的情况。李富春是杰出的女革命家蔡畅的丈夫，现在是处理新从上海以及其他白区来的人的高级领导。俞启威也对李富春讲过蓝苹"参加革命"的愿望。俞启威现在胖了，已经不再是吃不饱的学生运动领袖的打扮，完全象个要人。他不在延安住，但经常来向毛泽东和其他领导报告白区共产党人活动的情况。

蓝苹需要王观澜和俞启威说好话。她在西安对徐大姐流露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她在上海的政治活动可以算是不太清楚。最坏的情况就是那些年她同国民党合作，臭味相投。但俞启威只能介绍蓝苹在青岛那几年的

工作。蓝苹确实在1933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她在上海的情况，俞启威的确不甚了解……

李富春办公室的事情慢慢发展的时候，蓝苹去找了张国焘。据一位延安人回忆："她去找他是因为他地位高。"但张国焘现在被毛泽东打败了，虽是边区政府头头，却没有权力。一个老手和一个童星之间关系没有开花结果的第二个原因，是张的妻子——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杨子烈突然在1937年底到延安找丈夫团圆来了。

"蓝苹是个放荡女人！"杨子烈骂道，"她就是没有男人活不成。"

杨子烈回忆说："我丈夫的办公室是延安唯一的西式砖房，有床有炉子，非常舒服。"她介绍了一个奇怪的情况："蓝苹常带一个姓王的男演员去，而且明知我丈夫不在还要带去。他们用床和炉子取暖。"也许杨子烈到延安正是时候。也许蓝苹正在搞什么名堂，敲门，卖弄风骚，让人觉得她是上海送给延安的最新礼物。她对张国焘了如指掌，反正可以自由出入他的办公室。

李富春作出了决定，准许蓝苹去党校。有个协助李富春办事的人说："李富春开始有点犹豫，是俞启威影响了他。"蓝苹前进了一步。党校后来才成了党员进一步深造的尖子机关，在当时只是短期改造还在审查的人的地方。但不管多差，蓝苹总算有了个地方。党校的教室是原来的天主教堂，300个学员中她是10个女生之一。她在熟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贪婪地接受军事战术训练时，有点象鳟鱼群里的金鱼。

据教她的女干部说，"蓝苹不多说话，她不行，因为她对政治的理解很肤浅"，老革命或者有文凭的女同志"都瞧

不起她”。

有一天，编在12班的蓝苹在党校教室里和几百学员一起等候“领导同志”讲话。大家准备好笔记本，在寒冷的午后跺着脚等讲话的人。当毛泽东两点钟准时从左边上台时，大家都站起来，欢呼鼓掌。有人说，蓝苹为引起毛的注意，特意指点毛泽东，并且比别人多鼓几秒钟掌（但她本人事后的回忆不太一样，她说“毛泽东认出她来，还给她一张在马列学院听课的票”）。

当夜蓝苹就给毛泽东写信。她谈了对他的印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还诉说自己理论水平太差，必须当面求教。

骂蓝苹的人说她是自己闯进凤凰山毛泽东的三间房窑洞的。蓝苹不等回信，就跟房子着火一样跑去，跟警卫象老朋友一样开玩笑，不等允许就大声向毛泽东问好。据这些人说，后来她见到毛泽东时，毛很冷淡，一面看文件一面听她提问题，而且只就她“理论水平太差”提出了应当读的书的名字和文章的题目。

如果毛泽东在1938年春这一天同蓝苹谈了话，那就是他的意愿。蓝苹固然是个胆大的姑娘，她经常直闯男同志宿舍，但毛泽东的住房不是公共汽车站，这是延安人所共知的。那里有毛瑟枪严加把守。

1938年春季蓝苹还没有把目标集中在毛泽东身上，她还是希望演出。在争取演出的过程中，她又遇到了一个上海派的新情人。

延安有个鲁迅艺术学院，这是蓝苹自然要去的地方。几年后她说她没想去，但此话不属实。她曾为从党校转鲁艺作

过努力——当然，她对去鲁艺工作也有怀疑。她能从上海辉煌灿烂的剧场转到战时延安的舞台吗？她那些过去的敌人和对手能不打她吗？

蓝苹知道袁牧之和她以前大都因个人关系而看不起她的同事在西北建了一个共产党主持的电影制片厂，没请她参加。该厂到延安开展工作时，走红的女演员是陈波儿。蓝苹对陈是很嫉妒的。她很怀疑自己在左翼电影厂能否成功，甚至是否受欢迎。

她对鲁艺的看法就象一名受了伤的芭蕾演员对自己喜欢的舞鞋一样。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她日后不承认自己曾很想去鲁艺。

蓝苹参加《被蹂躏的人》演出后，一位观察者说："她很不成功。"这出戏是"一·二八"晚上延安为反对日本侵略而演的抗日剧。蓝苹试演后只担任了一个小角色。女主角是刚从苏联回国的孙维世，她在那里学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看演出的人回忆说："这个漂亮姑娘美极了。"

有些目击者说："'一·二八'晚会之后，观众对蓝苹评价不高。她后来再也没上舞台。"也许角色不适合蓝苹演。也许是比她漂亮、比她小七岁的孙维世压倒了她。也许她长久没有接触舞台，或者不适应延安环境。

尽管有种种疑虑，1938年3月或4月，蓝苹还是要求上鲁艺，也许仅仅是因为受不了党校的严格生活。同她谈话的是陈云——一位有能力、办事有条不紊的人，后来成为北京的高级经济决策人。他不喜欢蓝苹。蓝苹犯了一个错误：她怕陈云误认为她只会演戏，便谈了她不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她为了表示她渴望当天就开始学习，谈话时把行李都带去了，显得很有想法。

一座重要的“大山”来帮助蓝苹了。从苏联回国的康生当了党校副校长。在中国，同一个地方来的人有亲和力，暗中互相帮助。如果在大团体里占少数，他们就会象兄弟姊妹一样。蓝苹和康生也是这样。据山东的人讲，蓝苹的妈妈曾在康生家当过女工。两人关系是否有这么早，这么亲密，不得而知，但在青岛时康生曾将蓝苹介绍给左翼活动分子和她的爱人俞启威。

蓝苹去见康生。两人用诸城话闲谈山东的事，可能还在一起睡过一两次。很快，蓝苹不仅进了鲁艺，还当上了助教。有人听她说，“有康生这么个可靠的朋友，哪个敌人也不敢碰我。”没象康生那样开后门的陈云，对蓝苹不经正常途径到鲁艺就职很不满意。不久，陈云就找到一个机会批评蓝苹在鲁艺内部演出的表现①。

据接受蓝苹重新入党的一位党的干部回忆：“她在鲁艺的时间是1938年夏季，那段时间她同徐某谈恋爱。”徐某是搞艺术的，人很漂亮，爱打扮，是鲁艺的高级教师。他是蓝苹喜欢的那种男人，蓝苹也是他喜欢的那种年轻女演员。据这段短暂的恋爱史的目击者说：“蓝苹同徐某在一起总是撒娇。”这说明她爱他（后来她同毛在一起就比较沉默，说明她对他主要是敬而不是爱）。“徐某是类似唐纳和章泯的人，比朱光强多了。”

由于蓝苹的烦扰，徐某越来越注意孙维世这个在“一·二八”晚会上压过蓝苹的可爱的小演员了。吵了几次之后，不管蓝苹是否有成家的想法，不由她做主了。徐某对孙维世

① 后来蓝苹和陈云在政治上接触都是关系很僵的。陈云和康生也是多年的仇敌。——原注

的迷恋不可遏止，不久便结了婚①。

蓝苹振作精神，投身于她的助教工作。鲁艺是什么都在一起的：女高音、胡琴锣鼓、低音提琴、民歌、欧洲戏剧都各显其能。蓝苹在现代戏剧部。她给上海一位朋友的信里说她在教戏，也当学生的“生活参谋”。

有一份专登她的恋爱新闻的电影杂志根据她的来信介绍了新的蓝苹，似乎她的生活已经稳定下来，主要热衷于“革命艺术”。事实并非如此。蓝苹决没有满足于在鲁艺当个低级教员。她也不是靠自己力量去的。她又想找一个男人当“可以依靠的大山”了。这是女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吗？

在旧中国，这当然是对的。女人想出头露面只有靠丈夫或儿子。但现在是在革命的中国。在新社会，置身于延安的红色山峰中，女子真的能够自我实现，成为自我，有一个专长，愿意结婚就结，不愿意就不结吗？

蓝苹可能有一天不用再“依靠大山”，但这一天还没有到。

她在鲁艺戏剧部的工作受到批评，因为对戏剧并不精通，讲的课不如她的演出。不过没关系。

毛泽东认为艺术对政治很有用（虽然他个人喜好从中国的传统取材），有一天，上鲁艺讲课来了。当他象牧师一样站起来讲话时，蓝苹脸上露出笑容。她比大多数学生皮肤白一点，因为他们都是农村的，在西北农村呆的时间也长。鼓掌的时候，蓝苹故意引人注目。讲话结束时她提了几个很幼

① 多年以后，蓝苹报复了孙、徐两人。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无端受审，孙维世死在狱中。孙的后半生（她比徐活得长）是金山的妻子。金是上海舞台上红极一时的小生，1936年主演过《赛金花》。难怪蓝苹在60年代要折磨孙维世。——原注

稚的问题，而且跑到前面跟毛泽东讲了几句话。

她必须有座靠山的话，找中国西北的最高峰吧！

延安是个小地方，按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的说法，是“胳膊碰胳膊的世界”，而且，蓝苹在洛川、在党校见过面的毛泽东也不是隔着面纱的上帝。老百姓常见他夜半工作之前走出窑洞呼吸傍晚的空气，眺望谿谷里的商业区。人人都认得他的汽车（本来就不多）和他写的超现实主义字体：“野战医院：纽约华人洗衣工民族救亡协会赠”。大多数想见他的人都能见到。

现在蓝苹认识他了。的确，她两次见他时都引起他的注意，这是她的一贯作风。但毛泽东如果愿意，完全可以采取别的办法。以后几个星期当中，两人在凤凰山坡属于吴姓农民的毛泽东的窑洞里见了几次面。不是普通女子蓝苹选中了毛泽东，而是这座小城最有威望的人毛泽东在孤单的时候选中了蓝苹。

也许蓝苹特别喜欢毛泽东。这一点即使在爱情与婚姻很少一致的中国也不可排除。但蓝苹只有24岁，毛泽东已经45岁了。热衷于政治和军事艺术的毛泽东完全不同于蓝苹在上海和延安初期所倾心的那类浮华、浪漫、能言善辩的浪荡公子。很难想象沉思的毛泽东和爱显才华的唐纳这两个中国人以及毛泽东同蓝苹那唐纳之后的所有唐纳式情人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大。

1938年8月，蓝苹接到调令，从鲁艺转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附近，任军委档案秘书这个美差。

唐纳事后在很远的地方猜测：“我不认为是毛泽东主动，我想蓝苹是用对我的办法对付他。她有吸引力，而且把自己装扮成革命者，两方面一结合就欺骗了毛泽东。”蓝苹

的前夫还说："我相信如果不是蓝苹脱离了上海的世界，毛泽东一如既往是不会上当的。你们知道，我们的上海生活，和毛泽东在农民把他当神看的内地生活，是两种不同的世界。"

九个月以前，1937年年末的一个寒冷的傍晚，正当蓝苹还在延安接待站等待党的信任和分配工作的时候，一个28岁的妇女走进西安的八路军招待所。她是贺子珍，毛泽东的五个孩子的母亲，而且还是毛的理论上的妻子。她虚弱而且愁苦。她和三女儿一起跑出了延安。

几个月之前，这个招待所是另一个年轻妇女的转运站，她进来了，是那样地活泼，抱负不凡。贺子珍是那样地疲劳，凄楚，而且是走出去。在充斥着政治间谍的这座典雅的古老商业城市里，蓝苹之后是贺子珍，走在同一条街上，做着不同的梦。蓝苹是要寻找冒险事业和男人；贺子珍是吃尽了冒险、男人和生儿育女的苦。

贺子珍同毛泽东1928年结婚时是个精神焕发的18岁姑娘（当时毛的一位指挥员说她的眼睛象"一对水晶"，同她接触"使人感到蜜一样的甜"），现在她面色苍白，眼神发呆，瘦得象稻草人。她身体因长征时轰炸开花弹留下的伤痛而悸动。她要回忆这两年的往事，有时脑子就不好使，考虑下一步去哪儿也没有头绪。

她在离八路军大院不远的房子里坐着，想着她的丈夫，努力使感情和理智统一起来……第一次见面是在永新的山上，毛泽东刚在政治动员会上讲完话，他们闲谈，还吃了两只鸡，喝了两瓶酒……几天之后，毛泽东向几位同事宣布"贺子珍同志和我相爱了"……在毛泽东热情组织那某一天

将要进城的农民队伍的日子里，贺子珍很崇拜他……她脑子里经常盘旋有关毛泽东1930年被杀害的头一个妻子杨开慧的问题，但毛从不提及……接下来就是这几个月的可怕争吵。

贺子珍在绝望中从小凳子上站起来，瞒跚地走向床边，哭着睡着了。

她醒来时有两个妇女走进屋子，有一位提着行李，放到空着的那张床上。贺子珍回过头来，认出不拿行李的是邓颖超——周恩来的朴素、敏锐、兴致勃勃的妻子。邓颖超是护送拿行李这个人来的。

贺子珍从床上坐起来，微笑着表示欢迎。邓颖超向新来的高个子体面女人介绍说："这是贺子珍同志，毛泽东同志的妻子。"那人是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贺同杨握了握手。张国焘同毛泽东已经到了决裂边缘。

第二天早晨两人同时起床，一同梳洗，吃馒头稀饭的时候还聊天。如果按她俩丈夫之间的关系，这次见面可能是爆炸性的。但相互同情的心理把她们凝结在一起，一上午都愉快地闲谈。

贺子珍很难理解杨子烈到西安来的目的（她是去延安找七年未见的丈夫）。杨子烈问贺子珍："你上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去延安？"

"我身体不好，想去莫斯科治病。"

"安排要花好多时间，不能在这儿等。回延安不是更好吗？我们可以一路走。"

贺子珍兴奋起来，有点窘，对毛泽东的抱怨又撩起来了，对杨子烈说起周恩来夫人不要她讲的话："我永远不回延安！……啊，我们吵嘴了，打架了……"

"不要这样想嘛。事情总能过去。你们都是党的好同

志，还是艰苦年月结合的。不要这么悲观。两口子吵架是常事，这你也知道。”杨子烈很厚道，天真地（她没去过延安）自告奋勇说有机会要劝劝毛泽东，“我叫他写信给你，接你回去。”

贺子珍低着头不吭声。

杨子烈悄悄走出房间。后来她找到长征老干部、高级领导博古的妻子刘群仙，了解延安的情况。她们谈起贺子珍来，刘群仙告诉杨子烈：肯定有个女青年插进来了，“她穿着时髦，还会演戏——名字叫蓝苹……”

贺子珍身体不好，去了苏联。女儿跟着她。她肚里还怀着1937年夏天在延安得的孩子。这男孩在莫斯科出生不久便死了。

于是，毛泽东的婚姻在1937年结束了，但博古妻子在西安对杨子烈讲的情况并不准确。蓝苹碰到毛泽东的时候，贺子珍已经同他分居。

1938年开始有几个月毛泽东独居。

杨子烈真的照她在西安答应贺子珍的做了，她批评毛泽东：“都是你不好。你应该给她写封信。”毛泽东没有责怪杨子烈，几天后找她说：“我给贺去过信，她不回来。”杨子烈没法肯定毛泽东劝过贺子珍，但据支持毛泽东的人说毛泽东在1938年1月中给贺去过信（或电报），贺答复说不跟他过了。

这象是贺子珍的为人。她属于要毛泽东去求她回来的女将一类。而且甚至他去求了也不答应。贺子珍后半生对此有无后悔，不得而知。

蓝苹说她没见过贺子珍。她有关贺的言论往往杂有机会

主义色彩①，而且一点也不懂贺子珍的做法是同中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结婚这种激动人心但充满危险的命运的自然反应。

蓝苹说贺子珍背弃毛泽东是因为她的地主商人出身使她“习惯城市生活”和“看不起体力劳动”。贺子珍的确出身于比蓝苹家富有的家庭，但她是个刻苦、贤惠、有政治斗争性的女性，1927年就入党的党员，她的“城市生活”经历同蓝苹相比真是等于零。

蓝苹真的认为有人比贺子珍对毛泽东还要温顺吗？蓝苹真的想从女人阶级出身发现某些因素吗？这些因素同她自己的生活就联系不起来。

但蓝苹这话说得对：贺子珍“不能理解毛主席的政治世界”。

我们无法精确断定是什么因素造成毛、贺婚姻的决裂，恐怕当事人也说不清。

贺子珍有点象共产党员式的娜拉，但蓝苹一点也不象。贺子珍是家庭妇女，她在妇女组织中工作，她完全不是一个红歌星。她是毛泽东的革命伴侣；她不愿成为政治上的妻子。

毛泽东随着自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发展，个人的发展超过了贺子珍。她也许能撵上他，做一个政治上的妻子。但在新时代，是蓝苹更能“理解毛主席的政治世界”。

---

① 她对维特克说贺子珍在共产党到西北不久（1935年底）就离开毛泽东了，还说自己1937年8月到延安时贺、毛已经离婚。这都不符合事实。她把这些事情的时间提前可能出于不让别人怀疑她在两人决裂中起过什么作用的考虑。——原注

蓝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男人，如果是个真正卓越的人则更好，手里要有很大的权力。她看不起软弱的人，她对唐纳的态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是康生这个来自蓝苹山东老家的政治混子帮她最大的忙的时候了。

康生是个机灵、瘦脸、浮躁、狡诈的人，生来象个骗子。41岁的时候他已是秘密警察工作的专家，利用他担任党的组织部领导的有利条件，很快就成为毛泽东周围的人。

康生为了捞到潜在的利益，担保这时有人追究的蓝苹历史没问题。他介绍了蓝苹在山东的情况，这是别人无法同他争辩的地方。对于蓝苹在上海离奇地与党“失去接触”，他认为道理很简单：形势恶化。他炮制了一些有利于蓝苹的材料，把控告材料都毁掉了。他让走狗把蓝苹在毛泽东身边管档案的表现大肆吹捧一番。

康生大为称赞蓝苹的聪明和演剧技巧。有一次，蓝苹在晚会上演唱《打渔杀家》里的段子，康生积极为她打鼓伴奏，这可算是马屁拍到家了，当时在高干中对蓝苹的演出水平还是有争议的。

斗争很艰苦。象周恩来、刘少奇这样的人物都感到不能太支持蓝苹，他们给当时上海党的领导人、后来的驻苏大使刘晓发电报，要求澄清蓝苹在上海的事实。刘晓答复说她被怀疑是国民党的“秘密代理人”①。

后来达成了妥协——蓝苹成为毛泽东的正式妻子，对毛泽东私生活的压力消除了。但是有代价——要求蓝苹竭尽全力照顾毛泽东，而且30年内不得参与政事。也许当不成第一

---

① 蓝苹同崔万秋有联系。——原注

夫人了。

蓝苹不属于女将之列，党不同意她在政治上起作用。党的那两条规定是中国政治的定时炸弹，因为蓝苹对此结毒在心，一旦她在60年代初冲出党设防的《玩偶之家》去报复那些囚禁她的人，一旦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正好30年期满，定时炸弹就爆炸了——这是蓝苹的政治表演，蓝苹的第二职业，蓝苹的报复。

“他们压了女皇20多年！”蓝苹回顾延安给她定的框框时哭了。

康生帮助蓝苹步入内庭，同时自己对毛泽东的影响力也增大了。康生和蓝苹在一段时间里结成了有利可图的联盟。玩弄权术的能手同出类拔萃的学生携手建立完美的联系。蓝苹被康生的邪恶政治手腕迷住了，康生则利用蓝苹为自己获取更大权力铺路。他们巧妙地互相利用。

蓝苹平静下来。尽管没有永久平静，也不能说当时就是假的。她没有象对待唐纳那样用不可能实现的挑战去折磨毛泽东，也不去训诫毛泽东怎样才配当她的情人，她的确由于成为哲学家兼“国王”的爱侣而昏昏然了。

成为主席的“爱人”，无论怎么说，在人前也是愉快的。说不定这还是通向自由的捷径呢！当时就可以有不象对待其他男人那样自我保护的自由，也可以暂时不怕那些嫉妒她的人再挑剔了。

蓝苹同毛泽东结婚之后，放弃了演出的艺术生涯。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回忆说：“我们很奇怪，她在延安舞台上不很活跃。”毛泽东认为这是因为他，她也同意这个看法。她同鲁艺保持联系，但她跟伯德·约翰逊关心公园、南

希·里根关心精神健康一样，是一种兴趣，而并非职业。

蓝苹必定意识到她牺牲了自我表现的目标和她珍爱的独立性。她知道，战时延安的社会距离放荡的上海无限遥远。她认为，嫁给共产党领导人就跟牧师嫁给教会一样，有出息的女性是不干的。

她从一开始就冷眼看待吗？24岁的人不可能这样。也许，她起初总是误以为自己行，能够影响别人，所以想着有可能制伏毛泽东，越过党的权威，在电影界干个轰轰烈烈。

总之，1938年蓝苹成了延安的灰姑娘。她和邓颖超、康克清这些既是党的高干又是周恩来、朱德妻子的人不一样，和当时没结婚的作家、党员丁玲也不一样，她是彻头彻尾的妻子——是领导的“爱人”，不多也不少。

毛泽东娶蓝苹为妻，他对结婚仪式或合法婚书都不在乎。这是适合蓝苹口味的现代做法；她和唐纳也没有这一套。

任何婚姻的一方对对方的期望都是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的，有的时候，期望能较多地满足。蓝苹从她同费、俞、唐等人的离合中不明白这点吗？毛泽东也不懂得吗？毛泽东和蓝苹相互之间的期望很快就发现分歧，但在几年内又是一致的，因为蓝苹什么也不问，对这种婚姻生活默默忍受，甘心依附。

“女人少的地方，女人权力就大。”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调查延安后发表这个看法。对蓝苹来说，考验绝大部分是在前一阶段。但她的权力只在谈恋爱期间有过。现在成功了，她后面的门已经关上，她只能做毛泽东的不出声的媳妇了。

说不定嫁给毛泽东是抬举了她，使她有机会表现自己，

这也许是她依旧异常珍惜独立性的胜利。

嫁给毛泽东，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她暂时实现了她到西北来的期望。

做高层领导的爱人有它的好处。毛泽东和蓝苹可以实际生活在一起，这在延安是很稀罕的。延安结婚的人除非在一个单位工作，大都只能在星期六见面。有警卫员和其他人帮女工做事。吃的比较好，学生和战士一个月吃一磅肉，高干吃八磅。

1938年秋蓝苹开始和毛泽东同居后，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到杨家岭的三间窑洞里。窑洞在山脚下，房间深15英尺，砌上石头，刷上白灰。前面是木结构，窗格子上糊纸，可以透进少量光线。门外有一小块碾过的地，摆着简单的桌子、石凳。还有一小块菜地是毛泽东经常干活的地方(蓝苹不干)。

三间房（起居室、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蓝苹卧室，后来添了个小孩）地上都铺砖，桌椅都是木料锯的。没有电灯，用蜡烛；没有自来水，用的是警卫员从井里打来装在搪瓷盆里的水。但床上有蚊帐，可算奢侈品的是一个木制浴桶和一架老式留声机。

蓝苹东西很少，房间尽是毛泽东的特色。毛的房间里有个书橱，那里面，蓝苹在青岛和上海常看的外国的、现代的文学作品一本也没有，全是毛泽东的有关政治和古典文艺的、历史的中文书。没有蓝苹的相片，也没有她以前喜欢的小摆设，当然，也不象她上海家里那么乱七八糟。

毛泽东和蓝苹研究取一个新名字，来纪念蓝苹的新生活。要全新的吗？文雅的还是豪放的？要同毛泽东的名字相配，还是表示处在毛之下呢？结果，蓝苹取了个新名字："江青"。这可能至少有一部分是毛主席的意思。这两个字

来自吟咏毛泽东家乡湖南省的湘江的唐诗。

新名字的格调是确定的，明显的。当时，许多人喜欢以江河湖海为名，而且“青”的第二个意思加上发音使人联想到它的内涵为“清纯”。也许其中还有那么一点抱负：有句古老的成语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许多人来说，“江青”从意思到发音都很适合一个有野心、有诱惑力、迷人而且深不可测的女性。对于毛泽东这位喜欢向他估计能取胜者挑战的人来说，也能接受。

江青的生活在延安条件限制范围内还是愉快的，不过，这是家庭主妇的生活，对她有点生疏。后来她谈起延安那几年的生活时，四分之三都是谈毛泽东和他的工作，剩下的主要是一大批家庭成员（只有一个不是）的生活。

在开始发胖的毛泽东旁边，江青显得很轻巧。她的长发已经随上海生活的结束而剪成短发，和大多数延安妇女一样。她的黑而闪亮的眼睛沉稳多了。毛泽东和西方来访者谈话时，江青很少开口，只是等着介绍（毛泽东常常干巴巴地介绍说：“这是江青。”）和握手。有时，她进去装一碟花生或一盘炸辣椒就出来了，毛泽东不停地就茶吃。据见过她和蒋介石夫人的罗伯特·佩恩说，她比蒋夫人漂亮多了。

据一位常去拜访的苏联官员说：“江青料理毛泽东的健康、日常工作、衣着和饮食。”在毛泽东卧室吃晚饭时，只要毛想说什么，大家都肃静等着。据斯诺讲，江青开始帮着买和洗，后来学着做菜，不久就“很内行”了。她不象毛泽东那么爱吃辣的，但访问者常发现满桌子都是辣味菜。

有朋友时，江青常常手脚麻利地给留声机换上老式78转的唱片，一般都是她和毛泽东都喜欢的京剧名角的唱段。她很快就热衷于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喜欢的桥牌，而且玩得很

精。

毛泽东突然让江青到荒地上去劳动两三个月。南泥湾在延安东南35英里，共产党人成群结队去那里开荒，空手要从无到有地生产出东西来。毛泽东没有对同事讲怀着他的孩子的江青去了南泥湾。毛泽东在1939年1月派江青和她的战友出发，吩咐说，如果他们不能从荒地上弄回粮食和布匹就要受惩罚。

这些人在山上挖住房，用山羊毛做衣服，把庙里的供器熔化了做农具。江青在南泥湾期间一直裹得严严实实，由于本来不会干活，手上都打了泡。她不同意“女同志只能干力所能及的轻活”的观点，她坚持说，男的能干的，女的也能干。但事实上是因为她病了，或者机灵的队长知道她是谁，想到她回去时模样不能太难看，所以不让她干重活。她大部分时间是编织，离开南泥湾的时候，她名下已经记有10件厚厚的绒衣。

江青生了一个女孩，这是她四次结婚的头一个孩子，是毛泽东四次结婚的第九个孩子。这件事适时地巩固了他们的关系。

生养孩子对差不多所有延安妇女都是讨厌的包袱，这增加了她们谋求独立和男女平等的困难。在延安的条件下，生孩子就不能工作。星期六晚间舞会上的确是女的请男的跳，但要看孩子的妇女就参加不了星期六的晚会。江青的情况不同。她从事艺术的职业已经过去，而担负政治工作还不合格，所以孩子不但不会给她造成损失，反而有好处。

女儿的出生改变了江青作为一个在毛泽东办公室深夜工

作的小姑娘的形象。她对毛泽东的畏惧心理一点也没有了。毛泽东已经不再看来象她父亲，他逗孩子和向客人介绍时，已经很象丈夫了。她怀抱里的孩子比党的100条决议还要有力地巩固了她作为毛泽东“支持者”的地位。

在中国，给孩子取名是件大事。女儿姓李，用江青的姓而不用毛姓是很不寻常的。“讷”这个名字有多层含义：从《论语》上找来的这个字是“慎于言”的意思，因此一定是毛泽东选的，另外，读音和江青前夫唐纳的名字一样（写法略有不同）。

江青同毛泽东结婚，走进一个旋转木马式的家庭。毛泽东的前几次结婚，有战争和革命的动荡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以及中国家族关系的传统力量——甚至在延安这块按中国文化标准看属于现代和个性主义的地方也不例外。杨开慧生的两个孩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在延安长大，但毛泽东不让他们进家住，毛岸英很快去了苏联。开始，江青和岸英关系不错——她只大七岁，但毛泽东在江青到来之后想要岸英避开。

贺子珍也有两个小孩，1937年初生的小女孩和一个两三岁的儿子。

江青谈到贺子珍的男孩时说：“很不错，《国际歌》他能从头唱到尾。”但他很快就跟贺子珍的大多数儿女一样“丢失了”。按党史材料的说法是“给老乡家了”。

这时贺子珍在莫斯科所带的女儿，是江青家庭生活中的主要角色。奇怪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在给李讷取名时也给贺子珍的女儿改名。李敏的名字和李讷一样，取自孔夫子的一句话：“君子慎于言而敏于行。”毛泽东同贺子珍的末一个女儿要敏于行，和江青的头一个小孩要慎于言。更奇怪的是，这个“敏于行”1945年从苏联回国后从贺子珍那里转给

江青抚养，姓的李字既不是妈妈的也不是爸爸的，而是她继母江青原来的姓！

这两个女孩的名字不但同孔夫子有关，还同江青的恋爱史有联系。李敏名字的读音和江青最后一个上海男朋友章泯一样（写法不同），而江青自家女儿李讷的名字是江青上海丈夫名字的同声。

1942年，由于安全的原因，毛泽东和江青从杨家岭搬到枣园，去过他们家的人都会看到李讷这个活泼的、全家都喜欢的孩子。她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玩，毛泽东停下来和旁边的人聊天或吃点心，她也参加一份。1942年常和毛泽东一同熬夜的副官说，毛泽东比江青还要关心孩子，教孩子怎么叫来访者“叔叔”，同江青一起下山送客人。

布里顿·罗伯特·佩恩谈起江青时说：“她直率而且客气，很象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佩恩走进窑洞，毛泽东上前握手，但毛不喜欢这一套，显得有点笨，伸手时肩膀要抬起来。“毛夫人这位先前的演员握手就自然多了。”佩恩说。他们让李讷、李敏都来握手，小孩都很认真。江青流利的官话、“愉快的歌喉”和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相比是漂亮多了。吃饭时她主要是随其他人的话题转，顶多提点问题。她问许多人的身体怎样。“听说好，她脸上放光；听说不好，就显出同情的样子。”

一天晚上，这位住在延安的苏联官员被请到毛泽东家去。毛泽东请年长的俄国人坐他自己的皮圈椅。江青赶忙拿出个木椅子放在旁边让毛坐。警卫员送上一杯当地的白酒，江青穿着西服裤和运动衫，前前后后地给毛泽东剥花生。俄国人问，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他准备怎样，看来这个问题引不起他的兴趣。江青在留声机上不停地换唱片，以应付场面。

毛泽东讲完话，吩咐上辣椒。他拿烈性的白酒送辣椒，一会儿脸就红了。他打哈欠，伸懒腰。江青换了一张京剧唱片，毛泽东按唱片里的板眼打拍子。在江青尽女主人的责任时，毛泽东缓慢而有节奏的拍子把自己送进了睡乡。

另一个俄国人发现1942年毛泽东生病时，“江青不在，毛泽东任性到不肯量体温，不肯吃药。”

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记述他和毛泽东、江青夜晚相见的情形说：“他们穿得很普通。她是大肥衣裳，细腰上束一根带子；他是普通衬衣和短裤。”福尔曼觉得窑洞里很安静。“唯一的光线是倒扣着的杯子上的蜡烛发出的。为给我提神送来了茶、点心和当地的糖果、纸烟。毛泽东一支接一支抽着延安产的劣质烟，小姑娘不停地跑出跑进。”

福尔曼回忆李讷和李敏说：“她们站着看了我一会儿，拿了一块糖就走了。毛泽东不管她们。”

延安中央医院儿科主任常给江青带李讷，他妻子是医院托儿所的所长，也带过李讷。他们说江青不太关心孩子。他们不会有意攻击江青，都认为她不大管女儿。

革命的延安母亲们都不娇养孩子，而江青是天生不会这样做的妇女。她和大人谈得来，对自己或别人的孩子都不溺爱。她认为孩子应当独立生活，太疼爱了不好。这个态度符合她的观点。

1939年江青还腼腆得很，没过几年就趾高气扬起来。过去毛泽东在场她不发表意见，现在也敢了。她开始给喜欢的人以好处并且挑出应当歧视的敌人。

有时她还抽烟。遇到不如意的事，放声大笑，转过头去，或者是紧皱眉头。看来，蓝苹的个性又恢复了——这回

更执拗了，她相信她已经有了一定地位。房间开始象女人住的了，她哪怕穿一件普通的衬衫也派头十足起来。

奥托·布劳恩发现，她出去时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装备讲究，有四个人跟着。他注意到她是在开始推翻“延安的简陋风俗”。有一天，在中国住了50多年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在延安城外跪着看宋代的碑文，“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是主席的新夫人。”

江青骑马和美国妇女驾车一样，是从家务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象征。骏马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奔驰，少女稳坐在马背上，发辫上束着绦带，白嫩的脚上套着木凉鞋。这只有上流社会的妇女才能玩，因为延安马很少，妇女极少骑马，偶尔骑了也没有江青那么快，那么神气。她从独特的骑马习惯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的途径。

一位苏联电影师——罗曼·卡曼，沿延河骑马去见毛泽东，被一匹急驰的马赶过了。令他吃惊的是骑手是女的。他回忆说：“她勒紧缰绳，和我们并驾齐驱，以豪放的姿态表示欢迎。”这就是江青。她沉默不语，令人难以捉摸，但表现出从马身上传染来的活力。她是从山上住房里下来欢迎苏联客人的。“我去告诉毛主席：你们在路上了。”她缓缓地说。她突然调转马头，策马时身子向前一倾，右手在尘埃中一挥。

有一天下午，周恩来要去党校上课，江青建议毛泽东让她一块去。她想骑马，也可能想让听众看到她同周恩来一起来，她认识毛泽东之前，在那里是谁也不注意的普通一兵。两骑马回来时，周恩来和江青沿河岸走，周在前，江在后紧跟着。比周恩来小15岁的江青不象周讲了那么长的课很累，

图痛快，非要快跑不可。江青的马多挨了鞭子，突然，前蹄踩住了周恩来坐骑的后蹄。周的马直竖起来，把中国未来的总理摔在硬实的地上，右臂折断，落了终身的缺陷。

1943年重庆有篇评论延安的文章说："自从电影明星蓝苹嫁了毛主席，共产党堡垒里过去沉闷单调的生活发生很大变化。资产阶级的跳舞、封建主义的地方戏、好莱坞的情歌，都涌进了延安。"这些东西对领导人从艰苦工作中"恢复革命斗志"没有帮助吗？

一个美好的星期六夜晚，天蓝无云，全延安的人都聚到梨园来参加周末谷仓舞会，这是江青对中国西北所作的"巨大贡献"。果树上挂下红、绿、黄色彩纸，遮着微弱的烛光。音乐声响彻夜空，一会儿热情，一会儿感伤。乐队象是各国音乐学校凑起来的志愿队伍，有中国胡琴、美国提琴、广东式的筝、英国口琴、陕西农村式的班卓琴，还有已故传教士留下的脚踏风琴。

跳舞的土地夯过，约翰·谢伟思回忆说，扭秧歌还差不多，跳圆舞曲差点劲。"江青很会跳，地上高低不平也不在乎。大多数人不会跳，也就无所谓平不平了。每个人都穿着布拖鞋或几根带子的凉鞋，小孩钻在中国革命领导人东倒西歪的舞伴当中，地面的差别还有什么意义呢？"

乐队伴奏跳狐步舞的时候，毛泽东来了，他穿着白衬衫、黑裤子，嘴里喷着烟，面貌慈祥。江青穿延安妇女穿的大肥衣裤束腰带——她早来一小时。树底下有三个姑娘，江青快步过去，拉住国际和平医院的护士的胳膊，带她到毛泽东跟前。喜气洋洋的小姑娘恭敬地叫道："主席，请和我跳。"小辫子在烛光中闪亮。

乐曲转为《蓝色的多瑙河》了，毛泽东和护士转向一边，

江青扫视一下后飞快地找到周恩来，准备跳下一个曲子。毛泽东跳得不好，好象在进行体育锻炼。小护士一直陪着他，乐队改奏速度快一倍的《叮铃铃》了，仍然陪着。江青向周恩来打个招呼，扭回脸去看她丈夫和舞伴，发出一阵骄傲和宽松的微笑。

周恩来跳得特别好，既轻快又优美，丝毫不比他25年前在法国的舞技差，他和江青一跳，乡村的谷仓舞简直就跟上海盛大舞会的劲头一样了（如果唐纳在场，是为她骄傲呢，还是感到愤怒？）。江青为自己受众人注意而陶醉，她很得意在这种场合能够知道怎样掌握毛泽东。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握着朱德将军的手，这一对就象两只大象，把法国的小步舞跳成了坦克出动。史沫特莱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好象全中国的军队都在我脚上踩过。"这时江青同一个年轻的美国兵一起跳，他是谢伟思和戴维·巴雷特上校领导的使团的成员。接着，江青又同叶剑英跳一番。叶在军事领导人里算是跳得好的。"他们是党的核心。"一位参加者说。

这一晚江青一直没有跟毛泽东跳。休息时江青从神气十足的林彪将军和朱德夫人中间穿过去，帮毛泽东物色舞伴。江青是个满不错的政治妻子。她喜欢给丈夫一点自由，希望丈夫也给她一点自由，她不愿意跟他象种在一个盆里的两棵豌豆那样。

毛泽东和江青家的三个服务员之一回忆说："江青教我们。她教课之外，告诉我们怎样记日记，还拿去改。"江青愿意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好为地位低的人的师长。"不是这样的……瞧你多笨……照我说的做。"

江青同毛泽东一道去延安的临时剧场看戏，她就跟陪总

统访问她领地的大使一样。遇上演现代戏或外国戏，江青特别欣赏，而且要向毛泽东谈观感①。但大多是京剧。小李讷是戏迷，这是江青和毛泽东对传统的共同爱好的反映。

京剧里的好人穿绸衣，坏人描画可怕的脸谱，锣鼓震天，唱声刺耳，江青和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江青最怕人在她看戏时打断她。但刘少奇常要在演出过程中找毛泽东商量问题。刘少奇是个面无表情的组织工作者，在延安位居第二，不爱看戏。一天晚上，刘又去找毛，他的长脸一本正经，手里捏着文件。江青扫了刘少奇一眼，厌烦地耸起肩膀，朝天花板大声嘟囔说："乡巴佬又来了。"

有一天午后，毛泽东和王明在起居室谈话。王明是毛的老对手，现在不行了，但毛泽东总喜欢有机会说他不对。这次谈的是王明比较熟悉的苏联问题。江青缩在屋角，沉默不语，怕自己受不了他们的激烈争吵。王明夫人进来，脸红红的，直喘粗气。她对丈夫说："我到处找你，你们又在吵。"江青从角落里出来掺和："你来得奇怪。这两个老公鸡没法治，见面就斗。你带你们家的吃饭去吧，我要带我们家的去吃。"她去搀毛泽东。

当毛泽东这样有权而又奇特的人的秘书，自然慢慢就爬上延安的政治舞台。并不是她处心积虑要往政治里钻（除了极少的场合），其他人总认为她对毛泽东的一切决策都可能有影响。

这是对的。毛泽东和到家访问的来客谈话时江青不吭声，但她竖起耳朵听，完了就对毛泽东摆自己的看法。

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在延安期间，每天清早，江

① 江青开玩笑叫毛泽东"土包子"，毛回敬她是"洋包子"。——原注

青都到张住的窑洞旁边去。她问："睡得怎样？今天我们应当为你做些什么？"她很有礼貌，而且很认真。"但人们总认为她是代表毛泽东说话。"

曾经批评过江青的袁牧之，建议拍一部反映毛泽东和江青延安生活的文献记录片。江青想拍电影，而袁牧之是延安电影厂的领导。毛泽东不愿意。军务繁重，大生产运动经常要检查。江青极力怂恿，拿袁牧之很有说服力的话去打动他：群众想知道领导人的生活；干部了解毛主席和夫人参加体力劳动后斗志会更加昂扬，人人都会学他们的榜样。毛泽东同意了。

江青忙碌起来，活象初次登台的演员在准备向外界介绍她的舞会——订做各式衣服，给袁牧之规定镜头，教毛泽东如何在摄影机前动作。这不是她的电影生涯的继续，她不时告诫自己责任重大，这是为毛泽东的政治利益服务的，是对人民的深入政治教育。

延安没有制片厂，袁牧之就在延安南门外的学校操场上拍记录片。每天毛泽东和江青由车子送到学校，在许多好奇的老百姓的围观下，踱步思考战争和革命的问题，或者象真正的工人一样挖沟、磨面，还有和人民代表在一起这样的1949年以后记录片常见的场面。

毛泽东不如江青那么满意。他不想拍特写，他对江青的微笑和姿态研究过多。他不想穿特为拍电影做的衣服，江青却和在上海一样换装。江青活象参加竞选的政客，毛泽东象竞选人的丈夫暂时放下研究工作。

这部片子从来没有演过，没有人记得看过，也许一直没有编完和拍完。江青多年后回忆："毛不喜欢拍电影，他从延安时代我见他时起就是这样。"

江青从担任毛泽东秘书起在开拓自己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遇到过挫折。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领导人李六如，这位革命老干部兼知识分子认为，江青对毛泽东施加影响，妄加判断，生活作风同延安的严格环境格格不入。

1942年的某一天，在毛泽东身边的人对江青大为不满，李六如在这种压力下走进毛的办公室，犯颜直谏。他把大家对江青的意见一一谈出来，还说江青破坏了毛泽东的形象和威信。李六如哪里知道江青正在她的房间，自己的话多少被听到了一些。不得了，她气急败坏地冲进办公室，紧皱眉头，大眼直瞪李六如，把木头桌子拍得震天响。她嚎啕大哭，埋怨丈夫和秘书处长合谋拆她的台。她气愤地叫道，李六如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给她脸上抹黑。

毛泽东当秘书处长的面斥责了江青。据同情李六如的人讲，毛泽东叫江青“闭嘴”。毛泽东指出，李革命工作经历比她长（这是她的疼处），而且在李小心地走出屋子之后明确要江青道歉，至少突然干扰他的汇报是不对的。但江青不听。从这时起，江青就对李六如冷淡（她有权之后就设法免了他的职）。

毛泽东和江青还为许多事当众吵过不少次，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间极为稀罕的事。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就从不如此，顶多私下里争吵。毛泽东和江青都是个性极强的人，动不动就对着干，他们的生硬程度超过了其他共产党人。江青虽是女演员，生气时也象个母老虎；毛泽东则始终保留着湖南家乡人的火气。

苏联官员符拉基米洛夫发现：“江青渴求独立。不熟悉的问题，她能很快想出自己的办法。她好打听事，有野心，但能控制自己。”符拉基米洛夫从江青谨慎的家庭主妇式的

文静中察觉一点苗头，发现她正在施加她结婚头几年不想有的影响："江青巧妙而有分寸地推动她丈夫去解决完全不属于家务的复杂问题。"

1942年12月，符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评论了江青的秘书工作以及江青同曾帮她获得这个位置的政客的关系："现在，她丈夫的全部秘密函电都在她掌握之中。她了解他的所有计划，而她是受康生崇拜的。"

这个俄国人触及这个象在上海一样了解怎样利用自己各种才能的女人的核心问题："象弹钢琴一样轮番使用她的10个指头，这个那个，但目的性极端明确是她的天性。"

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重访了鲁艺。这次是毛泽东作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报告，多次报告后形成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凡是同文艺沾点关系的都去了，准备好铅笔。毛泽东用他那平稳、有力、煽动性很大的语气讲课，一支接一支抽烟使他不停咳嗽。这是1942年春天开始有电灯的几个晚上。江青骄傲地坐在靠前排的位置，她特有的气派对毛泽东向西北知识界讲的观点是个讽刺。多年后她说她对《讲话》有影响。

毛泽东到鲁艺宣布"为艺术而艺术"是错误的。他嘲笑丁玲和其他西北优秀作家的"独立性叫嚣"。那些人大多直接受鲁迅影响，但在他们作品的核心价值遭到攻击时都退缩了。毛泽东大讲这一套之后坚持说，每一件创作都必须为加速中国从日本奴役下解放服务，为共产主义的任务服务。江青似笑非笑地听着。似乎她的上海时期全算是白过了，她信奉冷冰冰、干巴巴的延安共产主义了——我们不知道她能理解多少。蓝苹艺术世界观里存在的那些重要原理，在江青充当夫人、对摧毁艺术保持沉默的时候，全都烟消云散了。

江青后来的政治同事说："江青同疾病斗争象进行政治斗争一样坚定。"的确，她对自己身体好坏疑神见鬼到了犯疑心病的程度。但她在延安得结核的时候，不大谈自己的健康。倒是党的监护人常谈论江青的失调。

巴雷特上校回忆说："南方代表团在延安时被告知江青患结核病，极少露面。"美国人对江青身体不好和不公开露面作了表面的联系。巴雷特和他的同事约翰·谢伟思从重庆回延安时还带去罐头奶粉和可可让她"保健"。

但毛泽东向美国人介绍妻子（"巴雷特上校，这是江青"）时，巴雷特吃了一惊："她完全不象是在病中。"事实上江青以自己的"风采"使上校倾倒了。江青的苏联医生奥尔洛夫博士谈及这时期的江青和毛泽东时说："他俩都很健康——我希望象他们那样健康。"谢伟思同毛泽东、江青在他们家里吃过饭，谈了好长时间，回忆说"江青看来身体不错"。

在共产党的政治中，生病或所谓的有病，包括精神疾患，可以是斗争的工具。江青后来成为这种可怕的政治战术的可怜的牺牲品和激烈的参与者。在延安她是第一次尝到它的滋味。

1945年，她在上海的相识、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和崔万秋的一个同事访问延安。左舜生自然要求见江青，但毛泽东告诉他"江青病了"。他只好设法求见江青的女儿（他认为她是妈妈的"小一号模型"）。毛泽东也许是认为江青在上海那一段生活忘掉的好，也许是怕江青在公开场合露面过多——忌讳党有所反应。

后来江青谈过她在延安生病的情况，但那纯粹是她个人的"斗争"。希望她老实做家庭主妇的人宣布：是健康限制

她“公开露面”。

1945年夏季，毛泽东到国民党首都重庆同蒋介石会谈防止两党重开内战的问题。美国密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飞往延安迎接毛、周和共产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几星期后艰难的谈判开始时，江青和女儿李讷出现在雾城重庆。

她和毛泽东住在叫“桂园”的两层楼的张治中公馆里。她在那里会见人时说：“我是来看牙的。”

在这次——也是江青仅有的一次随毛泽东外出办外交的机会，她只是个私人助手，党要求她不得在公众事务中起（明显的）作用。到处找新闻的报纸也很少见她的消息，而有关毛泽东的消息很多，毛泽东甚至把自己的咏雪词透露给《新华日报》。外国人都没有看到她，迄今为止西方没有人谈及她出席重庆高峰会谈的情况。据见过她的中国人说，那是个“标致的青年妇女”，一点也不象其他领导人的妻子。在张治中将军家的会客室里，她“穿一件短袖上衣和裙子，挺象大专女学生的制服，短发没有烫，只留着前刘海”。

另一位客人说：“她不象刚从窑洞出来的人。”

她在会客室里应张将军夫妇要求作了简短的谈话，她很有礼貌。离她10排远的听众觉得她官话讲得特别好，一点不带山东腔。她显然意识到不可过于突出，一再声明她到重庆来只是为了看牙。对有些听众来说，她的解释莫名其妙，不必要。

江青在重庆红岩的“桂园”里踱步。她和李讷在富丽堂皇的会客室里玩。她逗张将军的四小姐张素秋玩（张素秋36年后很高兴地回忆了这段经历）。江青怀着奇怪的监禁感

觉，望着山城。从自身的理想来说，她是很矛盾的。一方面，高兴的是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的第一夫人（如果丈夫运气好，不久还可以当全中国的第一夫人）；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中国人在坚持苦干，重庆就有许多被日本人从上海赶来的豪放不羁的艺术家在拍电影、演剧、写小说。

江青决定给唐纳挂电话！据很熟悉内情的人讲，江青想以新的、毛夫人的优越地位，找现在是重庆记者兼英国使馆顾问的唐纳再谈一次话。

江青追踪唐纳，就象1933年在北京和1937年在延安追踪俞启威一样。除非对方坚决割断关系，她是不会舍弃她同前夫的联系的。但她没有见到唐纳。也许如唐纳所说，是江青没有找到唐纳，或者是唐纳不肯再次相见。

政治谈判即将结束的一个晚上，国民政府大厦的接待室里挤得满满的。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来了，点头，微笑，重庆名流呷着酒，吃糕点和花生，伸长脖子看主席和他的敌人。部长、商人、重要记者排成行，等着和中国两个敌对的领导人握手。唐纳也在其中，他穿着便装，头发溜光，手里夹着香烟。毛泽东照习惯慢吞吞地向每个客人问好，微微躬身，握住对方的手提问或说笑话。唐纳离毛泽东只差一个人了，他瞧着毛的宽阔、安详的脸，听着毛的平稳、近乎女人腔的湖南口音，突然绕到摆满食品的桌子对面，步出大厦，没入傍晚的浓雾中。江青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丈夫终于没有握手。

1947年3月的一天，一枚国民党的炸弹落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附近，家具设备剧烈震动了。毛泽东继续看他的文件，但很少看到过打仗的江青吓坏了。第二天她就和李讷挤在防空洞里，唱歌壮胆。国民党在和谈失败后向一度很安宁的共

产党前哨猛轰，大家只好疏散。

毛泽东尽可能拖延不走，他想选好一个时机，开始运动战的新阶段，但有些同志神经紧张起来。江青告诉毛泽东说，大多数意见是必须立刻疏散，这时，毛泽东大声训她："你是个胆小鬼，你胆越来越小，为什么不跟他们走？"

一星期后，毛泽东和江青（穿着伪装服）、李讷、两个警卫员挤进一轻型吉普车，慢慢开出他们住了10年的城镇，大雪覆盖着荒芜的街路。延安时代过去了。后来的两年中，同蒋介石的最后搏斗使江青出乎意料地摆脱了家务劳动，适度地参加了战争和政治。

她被委派为共产党部队第三支队的政治助理员，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中，她和毛泽东、周恩来负责的一半陕北战役指挥机关在一起（朱德、刘少奇指挥另一半战役）。

这项工作破坏了党规定的结婚协议，但暂时谁也没有提出异议。

生活是在路上、马背上，在老乡的窑洞里，这个村子呆一周，那个村子呆一月，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国拉锯战。空袭很频繁。有一次过河，江青是拆了河边一座庙，拆了材料造桥过去的。因为好几天只吃菜豆，她的胃病经常发作。

江青有时和毛泽东同乘一骑马，这使她大为满足，在艰苦斗争中和主席肩并肩作战。这几乎和在观众鼓掌声中出现于舞台灯光下一样。

开始时带着李讷，经过几次惊恐，就把8岁的孩子托给住在比较安全的村子里的邓颖超了。李敏和其他孩子早就分散在更安全地方的人家了。

江青回顾往事时，认为1947—1948年是她作为"一个战士"值得自豪的激动而大开眼界的时期。她同意妇女彻底解

放包括获得“镇压手段——武装”这种观点，她对史沫特莱谈起农村妇女时说：“我们跟男人一样强，给我们枪！”

经过艰苦的几十年之后，江青激动地说：“我是主席在陕北战役中一步也没离开过的一个女同志，唯一的女同志！”

但她的政治助理员的工作性质不太明确，她完成这项工作的方式也有点离奇。

她给村民讲共产主义的优越性，逼真的表演连她自己都感动了。她以无法遏制的热情动员群众，完全跟每一个政治家的妻子一样，坚信她丈夫的事业是正义的。她应邀在忆苦会（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提高斗志）上讲了过去受的苦，“是个典型”。她的回忆使听众都落了泪。

眼泪的确是她努力的标志，她现在处于摆脱家务束缚、发挥戏剧天才、充分调动自身感情的过程，她体会的任何感情都立刻和听众有效地进行交流。她以极大义愤教育国民党战俘时，他们都哭了，当场要求参加红军。这都是她后来说的。

但多年以后让她介绍陕北战役时，她却狼狈不堪。她要别人提供地图和简介来重新反映事件，在处理这些材料时活象猴子见到一大堆象形文字的文稿。只有在谈到个人轶闻或被征求看法时她才表现出自信。她在群众中找到一个有病的妇女，“帮她梳了又长又乱的头发”。红军到达爱打扮的回民居住的地区时，当地妇女都高兴地来看江青的衣裳质料。

有一天，他们在怀朱河宿营，她看见一个战士戴着国民党军队的帽子。统一战线破裂之后他应该仍旧戴有红星的共产党帽子，因此她愤怒地喝叫他把帽子扔掉。为了让他了解自己的错误，她把国民党的帽子重重地扣到自己头上，转脸瞪着他。

她的干预一定引起了不满，可能是战士受不了妇女的指责，看的人都火了。她为了平息纠纷，提醒他们必须服从她这个部队的“政治指导员”（实际不是指导员，是助理）。

毛泽东不让江青参加领导会议。中央委员会在王家湾为进攻方向问题发生争论，她还是“间接听来的”。嘉县紧急会议修改战略，她被“排除在外”。这本不奇怪，但使江青很苦恼。

有一次休整，四位领导（毛、周、陆定一、任弼时）想开个会，毛泽东的窑洞最合适，江青就搬出来了。她住在骡圈里，和驴一起住了几天，瘦了不少，浑身虱子和跳蚤，脖子上还鼓了一个包——可能是气的。战事结束前，毛泽东有一天晚上发了一份电报，江青认为她应该看，结果没让她看，她暴跳如雷，竟说女同志应当受尊重。

她在陕北战役中一阵阵地自以为是，很使毛泽东伤脑筋。

这个时候，在另一方，唐纳离开重庆，到左倾的香港《大公报》工作。有个同事见他在报馆办公室很晚还用“漂亮、正规的字体”写情书。他遇到一个诱人的上海记者——陈润琼，快要结婚了。他再也没有回中国大陆。

江青对陕北战役的工作虽属外行，但在解决作为毛泽东妻子的矛盾方面还是成功的。她作为政治助手的工作被广泛认为只是她作为毛泽东安慰者的遮羞布。不可能安排她什么独立的政治工作。她在毛泽东身边，不断有新的任务。没有人把她当专业人员。

在紧张的战斗中，她为毛泽东找酸苹果当药用。毛泽东患帕金森氏病不能手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由江青笔录毛的口授。战役快结束时，江青放下政治工作，出去找

回李讷，交给这孩子的父亲。

她作为政治助手是不成功的，也可能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助手，她充分意识到她的首要任务是做毛泽东的妻子。这种情况对她有不利影响。当成熟的梨子落到共产党手里、蒋介石的中国变成毛泽东的中国时，江青感到胜利的喜悦，但也为自己将来扮演什么角色担心。

第 五 章

失　意

（50年代）

我们在一起生活，但他沉默寡言，从不多说。

——江青谈毛泽东

毛泽东的胜利是江青的失意。共产党在1949年取胜之后，江青开始她的生病和消沉的10年。她有时象是着手某种公众活动了，但最终还是无声无息，更令人恼火的是她的位置始终不明确。革命是平静下来了，但她很难平静。

3月25日，北京小胡同里传说毛泽东的飞机从石家庄下来了，大家都在设想新王朝是个什么样子。江青坐在丈夫旁边，完成了从共产党华北部队集结的前哨到帝都的短暂旅行。飞机降落时，《人民日报》在尘土飞扬的人行道上发行号外，四英寸的红字标题：《毛主席抵达北平①》。人们渴望得到任何能暗示未来的线索，号外15分钟就卖光了。

毛泽东精神焕发，信心十足；江青瘦弱憔悴。四年没见

① 毛泽东很快将其改名北京（北方的首都），北平（北方的和平）是1928年国民党取的。——原注

面的朋友对毛泽东说："你长胖了。"毛泽东幽默而不无沾沾自喜地说："反动派把我搞瘦了，现在他们跑了，我又胖了。"江青脸色苍白，眼神恍惚，体重不到100磅。她在京城的复杂旋涡中发现两年的陕北战役给她健康造成很大损害。

毛泽东和江青关系的气氛仍然对江青不利。不安定的战争年月过去了，江青在共产党里的敌人还会挑唆毛泽东来整她吗？

"这些衣衫褴褛的人能改造北平吗？"毛泽东在沉思，现在全北平都在开展农民运动，"改造会走向反面吗？"江青也在考虑运动的方向，也许她能运用她的各方面才能在北京露一手，也许革命后的北京建设对她有妨碍，要她偃旗息鼓，成为不适合同褴褛的士兵合作的人。

1949年4月初，江青坐在火车上，与北京、与她丈夫、与新中国诞生的激情背道而驰。她带着保姆和警卫员去苏联医院。六个月后，毛泽东穿着新衣服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检阅全部共产党精英沿长安街进行节日游行的时候，江青还在莫斯科，孤独而忧郁，害怕会不会成为50年代的贺子珍。

几年后，江青闪烁其词地谈了她的首次出国旅行。她说，她病得很厉害，战斗年月"摧毁了大多数医院"。但她只需要一家医院，而且北京的大医院都没有摧毁。一个病重的女人为什么要坐几千里火车外出呢？而且，去的还是她和丈夫从未去过的陌生国家。

江青的确有病，扁桃体炎，身体也不好。但不是很重，她不在中国治而要到苏联去治，不是身体原因，而是个人的和政治的原因，反映出在毛泽东的中国作为毛的妻子的为难

局面和她复杂的个性。

2月28日，毛泽东打电报给在香港的诗人柳亚子，请他回北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3月25日，毛泽东从石家庄到北京，就在北京机场接见了柳亚子。第二天，共产党人决定同国民党人“和平谈判”，柳亚子写了一首诗来庆祝此事和他家乡解放。一个月后，4月30日，毛泽东和了一首。这时候，我们从江青对紫水晶号事件（涉及英中在长江的冲突）的反应可知江青在苏联呆的时间很长，现在到南方的雅尔塔去了。第二天，5月1日，柳亚子正在瞌睡，有人敲门，说是毛泽东。他们去颐和园还碰到林彪和他妻子，一块吃了饭。

了解江青的人认为，她宁去苏联也不愿在北京。在延安常见江青的苏飞回忆说：“延安时代很严格。50年代初去苏联和80年代初去美国一样，我认为她想去。她认为苏联人会盛情接待，到达后斯大林会同她亲切交谈。”唐纳也是同样看法。“她不是真病，她想出去看看。一直没机会。50年代去苏联是自然的事。”

到莫斯科车站接江青的是救护车。但她在苏联的最大手术是切除扁桃体。大部分时间是休息、养膘——在黑海的雅尔塔和莫斯科的老房子里。她病虽不重，感情却的确很脆弱，一点小事就又哭又闹。她对访问克里姆林宫的回忆也很奇特，她可以说是处于催眠状态，或者说在苏联一直是孤独的。

她说是斯大林请她去的，但她到克里姆林宫时工作人员奇怪毛泽东怎么没来。简直难以置信：中国革命取得新胜利的领导人、斯大林培育四分之一世纪的毛泽东在不在苏联，苏联政府会不知道！也许斯大林从来没请她，或者她当时情况不好，苏联副官认为她见斯大林不妥。

显然江青在1949年是让消沉和病痛折磨着，她的第一次去苏联也令她失望。

回北京后，在一个清新的11月的早晨，江青坐着毛泽东的车到北京站，毛泽东让她去送一个重要客人。宋庆龄，这位孙中山的遗孀参加建国大典后和随从回上海。江青穿藏青的纯毛料裤子，蓝白条上衣，戴一顶中国专业人员、干部都有的便帽。她有点瘦，但没病。她声称是“毛泽东的代表”后同中国最高位的党外女性在铺着绒毯的专列车厢里闲谈。她对比自己大的这位在她11岁时就死去丈夫的妇女很尊重。在开往上海的途中，宋庆龄对工作人员说：“江青很懂礼貌，讨人喜欢。”

江青常在这样短暂的社会活动场合露面，给人印象不错。

毛泽东和江青家里很讲究。毛泽东说要取消一切旧东西，但自己保留一两套。把宫墙、城墙、牌楼都拆了，使馆都搬往荒郊，但毛泽东和江青并没有盖斯大林主义的平房，他们搬进了中南海西侧的帝宫。这里有碧绿的湖面，明朝的亭榭，红柱雕梁画栋，金檐掩映在虬曲的梧桐树丛之中，汉白玉台阶两侧盘舞着青铜龙形，强烈散发着历史的气息，象征着统治阶级的至高无上。

当局在叫做淑香居屋的建筑里给主席和夫人找了一个“分开但有联系”的住宅。每个房间都比延安的窑洞大一倍，木屏风，丝窗帘，一切都符合身份。在上海阁楼、延安窑洞、陕北战役的农舍之后，这一切都很宽大，但江青在这里却不松心。

“分开但有联系”不仅指房间，也描绘了他们的婚姻。毛泽东和杨开慧生的大儿子毛岸英，一天晚上争吵时指着江

青骂道："你一点也不爱我爸，你成天冲他唠叨。"至少在担任总部俄文翻译的毛岸英眼里，这个婚姻的浪漫色彩已经烟消云散。另一次家庭争斗之后，这个28岁的人对江青说："你不爱我爸，为什么不走？"

毛岸英当然知道他父亲的位置，父亲的个性，父亲在延安为江青闹的乱子，明知道赶走江青是不可能的。可能希望她自己走。但江青没那么笨。她不是贺子珍。她不会因为浪漫情调消失这种小事就离开毛泽东。

江青看出，毛泽东对杨开慧的家属关心说明毛对她的感情倒退了。杨开慧的哥哥在家乡长沙解放后给毛泽东发贺电是很自然的事，但毛泽东的反应异乎寻常。他五天之内给杨大哥写了一封长信，很带感情地详细介绍了杨开慧两个孩子的情况，而且很快让两个孩子去探望杨家。他请杨大哥和他妻子李宗德在中南海长谈怀旧。他对杨开慧家属的关心（再加上后来为杨开慧写的《蝶恋花》词）显得毛泽东更象杨开慧的鳏夫而不象江青目前的丈夫。

婚姻关系的疏远其实不是毛泽东的错，也不是江青的错，是环境变了，也可能是单调生活的代价。毛泽东的生活高度组织化了，有大批工作人员，会见很多，离不开办公室。以前在延安，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是同伴加助手，去看毛泽东的人等于就去看江青，在内战的路上同乘一匹马，甚至卧室也要让给政治局开会。这一切都过去了。

长征结束时，毛泽东让他的警卫员和贴心用人陈昌奉去学校，这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就因为延安新的形势而中断。陈昌奉要去读书，就得与长征的岁月断绝关系，他哭了。在某种程度上，江青在解放战争结束时的想法和陈昌奉在长征结束时的想法一样。

不管毛泽东待江青多好，她是不会甘心当家庭主妇的。她希望有个工作。看来每个人都分配了工作，只有她例外。和其他领导人的妻子一样，她往日演戏的同事也都忙着新的工作。但她只能是位置特高但无能为力的娜拉。

她在人民解放军里的位置已经失掉，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使她很失望。她在苏联期间，全国文艺界联合会成立了。稍有名声的文化人都是会员，包括田汉、周扬这样的上海时期的人，还有孙维世这位在延安鲁艺夺走徐某对她的爱的美人。但名单上没有江青。

50年代江青的每一个位置都是花大劲夺来的。官僚机构——或者毛泽东，或者这两家，都要把她捆在个人生活当中。

江青这些年离开唐纳，单身到延安，成为共产主义北京的无用的装饰品，她也不全去斗争。她还是那个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同时又做实际工作的蓝苹，还是那个想到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有兴趣就去做的蓝苹。

江青不满足于象其他人的妻子那样，在舒服的中南海当个夫人样的消费者。她向往虚荣、奢侈，认为那是她的天然权利。但她也想推开讲究的桌子，戴上帽子，穿上一双粗鞋投入中心工作。把富人的土地重新分给穷人——土改，不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吗？她在内战时期有过这方面经验。

毛泽东不让她去土改，别人也不同意。她一直坚持到对方让步。

她选的地方是无锡周围的丝茶区。官僚机构安排她先去上海，在那里，党的领导人饶漱石诚心要把事情做好，但却因为“要控制她”而使她大为动怒。她想上南京路过去常买东西的地方逛逛，饶漱石非要同去不可。她要求马上去丝茶

区时，饶漱石摆了许多困难，警告说“个人安全无法保障”。

饶漱石碰到的问题跟其他接待江青的人一样：觉得江青的计划出奇，但还要表示尊重，还不能出事，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也许他是怕江青照老习惯去同过去的男朋友接触，告诉毛泽东可不得了。

她一会儿埋怨饶漱石把她拘在上海，不让她同群众打成一片，一会儿又诉说党组织安排的胜利大厦太冷，不朝阳。这趟土改从头至尾都是这类牢骚。她本想搞点农村调查，官僚机构总想控制她，妨碍她表现自己。

江青认为，她想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当然对社会主义革命很重要的，所以她认为妨碍她的人（比如上海的饶漱石等人）不仅是她个人的敌人，也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她竟会说饶漱石监视她，使她感到别扭，感到就象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随时“可能被绑架”。这说明在江青的脑子里，普遍的政治制度一文不值，她个人的好恶高于一切。

江青只上无锡湖边上的桑园茶场去过几天，但她好多年反复强调“我在土改中的作用没有正确地告诉公众”。

江青对官僚机构来说，一直是个问题。“裙带政治”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不能因为是谁妻子就给她工作。周恩来妻子邓颖超有个地位是她多年从事政治工作应得的。但江青对靠边站表示不满时，官僚机构还不能简单地压她，因为她不只是个领导的妻子，而且是某领导的妻子。

许多妇女乐于专心搞“妇女的工作”，但江青不行。她一生都看不起这类工作。虽然她也被作为妇女歧视，但她不愿意承认形成妇女工作的妇女特殊性。她不承认她同男性有任何差别。她不能忍受在妇女组织中存在的羞辱。

江青个性的反复无常加重了官僚机构的困难。她不具备

做高层次政治工作的背景，但又不屑做下层的政治工作。她的眼界并不宽。她爱发动新的事情，但很快就厌烦。舞台上不断变化的工作作风确实不容易适应官僚机构刻板成章的工作。

冬天到来时，江青有了两件不大不小的工作。因为她去过苏联，所以成为中苏友好协会的干部，但她和其他许多成员一样，没有去干例行公事。还有一个位置比较合她的口味：文化部设立电影指导委员会，专门审评电影（这个委员会显然在电影局之下，该局领导不是别人，正是袁牧之，他在武汉奚落过她的能力，在延安拍过她和毛泽东的记录片）。毛泽东确实没有为她弄这个职位，他希望她再少露些面更好。是周恩来糊弄的。

文化本是江青的专业，在受苏联影响而又有自己特色的共产党政权开始改造中国文化生活时，江青这位文化领域的前实践者自然想插一手。她同改造的主建筑师毛泽东的关系也必然对她的努力产生不利影响。

江青在1949—1951年间对电影戏剧的指导简直跟三级厨师走进一级厨师的工作室一样：馅饼里肝太多，羊肉太焦，巧克力奶油冻发苦。这是必然的。她在偶尔参加的电影委员会顾问工作中和她能插一手的一切文化领域都挥舞打掉传统观念的扫帚。

对江青来说，把周围每个人的艺术成果斥为“资产阶级的”甚至“封建的”，是企图在她认为被排除在外的领域逞能的必然做法。审查吗？越多越好，因为她对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电影每踢一脚都有助于她的权势凌驾在艺术之上。

江青正如她在30年代给唐纳的信中所说，实在看不起这

帮艺术家，这也是真的。她曾想挤进艺术圈子，但她并不愿意自己在上海的生活局限于艺术。50年代这种疏远感情日益增强。她认为自己比这帮艺术家高——正如一个有权势的人认为自己比谋士更了解事物的本质一样。

江青从无锡土改回上海的一天下午，躲过饶漱石的监视去找吴湄。江青曾对吴湄这个女演员跟章泯调情不满。当年江青在章泯导演的《玩偶之家》中担任主角，吴湄是个配角，很不高兴。江青的黑色轿车沿南昌路开到136弄，找到23号。她穿着旗袍，戴着黑边太阳镜。吴湄热情接待。吴害怕现在已是主席妻子的江青，但发现江青友好的态度后就放心了。两个人有14年的故事好说。

江青向吴湄提了两个要求。吴大姐在上海住，和商人关系熟，能不能找个真正好的牙医治治她的断过的“黄”牙？她的演员朋友能不能替她弄点化妆品来？要北京没有的高档货，也许有去年进口的存货。江青要求吴湄办得周全些。吴湄利用自己在电话公司的婶娘完成了江青的委托。

江青现在有了很高的有利地位，很想在过去的对手面前炫耀一番，就象1945年作为毛泽东夫人去重庆要见唐纳一样。但她可能也妒忌这些人的自由，吴湄和其他艺术界朋友从30年代以来都很自由，而她则是被监禁的毛泽东的政治娜拉。

江青还去看过赵丹和郑君里。赵丹曾是她在《玩偶之家》中的对手，他们很熟，有一次她同唐纳吵架还上他家去了。郑君里是她在杭州结婚的傧相。她请这两人在锦江饭店吃饭。在法租界的这个过去常到的地方，江青对两人又热情又尊敬。她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端。我想我们在新时代可以一起干，把演出艺术推上新的高度。”

但江青从未实践诺言。后来她去上海请这些戏剧界名流搞小型聚会，又是热情问候，又是真诚地探讨未来的合作。但这都不过是为了告诉赵丹和郑君里，她现在是作为什么人演出。与此同时她还暴露一个希望：她还可以是蓝苹，和两位导演一样可以创造和表现自己。

江青的“一起干”如果有什么具体内容的话，那就是想让这些上海老同事为她效劳。了解江青和赵、郑二人谈话内容的人说：“她只需要走狗。”江青唯一能医治自己痛苦嫉妒心的办法是把舞台上这些美丽的鸟儿关进她控制的笼子！

但赵、郑二人也很清楚她含糊其辞的“合作”的含义。他们参加周恩来主持的文化工作会议和参加周指导下的艺术委员会的时候，江青火了。她复杂、微妙的感情一下子变成单纯的仇恨。如果这些老同事不来拍她马屁，不来医治她嫉妒的苦楚，她就同他们作对。

在所谓的京剧改革问题上，江青在1949年末已经放过几炮。在延安，丁玲等人探讨过在程式化旧唱词里加进现代精神的必要，但这项工作不太容易，而且战事吃紧，所以没有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领导在节庆日享受中国传统既有的荣光，认为只要由共产党领导和监督，这些传统照样适合新时代的需要。所以，当代最伟大的京剧演员梅兰芳积极投入使传统节目尽量满足大多数人的活动。

但江青不满意。她找个机会就给梅兰芳扣上“迷恋旧事物”的帽子。用的名义是“新秩序”，她认为她丈夫是新秩序的掌权人，所以可以代表。按中共法庭的典型做法，她召集一帮听话的知识分子写备忘录批评梅兰芳的“封建主义”，然后由她来协调和利用。梅兰芳对此大为不满，因为他本人20年代就试行过京剧现代化，更新剧情，穿着现代服装，但

结论是老琴弹不出新曲子，帝王将相的剧应当是帝王将相的剧，历史和当前主题不能在中国戏剧里结合。

江青的影响还不足以贬低梅兰芳，更不用提打倒了。她禁演了两出戏，梅兰芳在爱国主义抬头的50年代仍旧风靡一时，江青很恼火。

这时出台一部很卖座的电影叫《清宫秘史》，描写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的故事，声、色、情并茂。1949年春天，上海、南京的观众热烈欢迎这部片子。《清宫秘史》是香港昆仑影业公司根据1943年姚兴农的本子拍的。共产党掌握了全部政权，但没有一夜之间改造中国文化的力量，还不能消灭旧社会和进口的电影、书刊和一切事物。

但对江青来说，“外国的东西”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成果仍是理想的目标。颓废的香港拍出来的电影！这个电影美化清王朝的阴谋，认为1900年外国干涉是合理的，诽谤义和团年轻起义战士！这部片子完全经不起阶级分析！

江青也不对任何艺术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也不认为她30年代所在的上海不比香港颓废。她用来攻击《清宫秘史》的话并不能打中要害。人们可以从江青对两个重要政治概念的翻译来理解她的“左倾”：共产主义就是权力；阶级斗争就是复仇。这是江青在1949—1951年间打倒传统观念的实质。

她从不考虑她这样做对喜欢《清宫秘史》的普通男女的影响。英国查尔斯王子和他的新娘戴安娜婚礼那样铺张，他们会考虑几百万英国人的经济困难吗？江青在权力的顶峰发现普通人民的生活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有权力斗争的现时目标是至高无上的。

江青利用毛泽东夫人的位置，经过说服，1950年成功地

召集了一个文化界领导的会议。会议由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主持，“讨论”《清宫秘史》。作家、历史学家和艺术界的领导都提心吊胆地到中南海江青的住地来了。大家都知道她是倾向禁演这部片子的。

文化界人士一个接一个大讲电影的历史意义和娱乐作用，还说是刘少奇这位仅次于毛泽东的首长认为情节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大为恼火，先是一声不吭，最后说《清宫秘史》不是爱国主义的，实际是“卖国主义的”。

江青“指示”两个历史学家写文章攻击这部片子，但他们照中国的老办法——泡，始终也没拿出个定稿来。可能江青没有能说服任何一个人相信《清宫秘史》是毒草。但江青批评了这部片子，让参与发行它的下层干部都觉得害怕，给片子的未来画了个大问号。这部电影暂时不演了，但后来又重演，1954年出现了内容相似的京剧。1957年再次上映《清宫秘史》。

江青反对《清宫秘史》是唱独角戏，而且毛泽东表示冷淡，所以成效不大。毛泽东没有怎么过问这事，1954年他还说：“我们没有批评过《清宫秘史》。”——这对江青来说是很刺耳的。但江青1951年又去反对另一部电影《武训传》，这回有毛泽东撑腰，她取得相当大的胜利。

武训是江青家乡山东省的一个著名的乞丐，他后来成为慈善家，建立了许多学校。武训向有钱人乞讨施舍来办教育。这部描写他的成功历史的有趣的片子，是1949年以前香港制片厂拍的。审查这部片子的是江青30年代在上海艺术界的高级同事、现在的文化决策人周扬和夏衍。片子放映之后，上海、北京、天津观众无不称赞，1951年年初的几个月里，三地报刊上发表了四五十篇表扬文章。江青见了“很不

安”。

她对武训的反感有一部分是真情，她最恨片子宣扬的家长统治和奴性。她把这部片子叫做装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垃圾桶（按共产党的用语，这是指吹捧改善而不宣传旨在进行结构改革的阶级斗争）。

尽管这些日子“没有一个听”她的，江青仍决心给武训的名字和介绍他的电影抹黑——这次她考虑了上次《清宫秘史》的斗争经验。

她开始的努力不顺利，这可能是因为方法生硬，也可能是有些党的领导人再一次发话说她应当完全不公开露面。她去找文化部第二把手周扬并告诉他，《武训传》是改良主义的，这时，周扬象对一个讨厌的孩子那样拉长声说：“我可以搞一点改良主义。”然后又提高嗓门，严厉地问：“你是谁（敢发动这次攻击）？”江青火了：“干你的改良主义去吧！”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按江青自己的说法，毛泽东开始不支持她，所以周不同意讨伐时她只好愤然离开。但1972年江青谈话又夸大了她自己的力量，贬低了毛泽东支持的分量。

她说她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这部电影。文章一出，“就解除了敌人的武装”，而且判了这部片子的死刑。没见有江青写的文章发表，1951年只有她授意别人写的文章。后来，她的确解除了敌人的武装，因为她让毛泽东1951年5月在《人民日报》上撰写了一篇社论：周扬和夏衍没有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标准倒退吗？儒家改良主义的武训不正是未来集体主义时代毛泽东思想培养的新人的对立面吗？

这个时期很少离开最高的一般原则来评论当时一件具体艺术作品的主席，居然批评一部电影，埋怨“我国文化界”

中“思想上的混乱”，并令人不安地要求了解“某些共产党员掌握的是哪里来的马克思主义”。周扬退却了；江青继续进攻。

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文化界决策人对江青不满：她自己没有高级职务，又要按自己的口味和野心在某些事务上利用毛泽东的影响。在延安和内战时期，江青为取悦毛泽东埋头做事。现在她第一次对公共事务使用毛泽东的特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和全世界一样，中国也是对权力和地位的追求压倒了在电影、戏剧、书刊中玩的惊人把戏。江青要求用新的态度对待《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正如第一夫人搬进办公大楼时决定重新布置家具一样，也和新当选的市长要给本市的桥梁、公园改名一样，目的是夸耀或加强自己的权力。

几百年来，中国的政治中也经常出现宫廷和官僚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白宫班子与华盛顿各行政部门之间关系差不多）。特别是新王朝正在建立的过程中，宫廷往往实际是个人。由于江青的闲不住、天才和野心，武训事件重建了共产党中国的模式。周扬正确地估计到，即使同江青谈判电影时他作出让步，中南海的家庭讨论总要凌驾于组织的公正之上。

从50年代到60年代，再到70年代，“宫廷”和“官僚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也许这是必然的，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倾向于派别活动。总之，模式演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是江青，反对《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战役是她皇冠上的第一颗宝石。

江青的特点是：为了加深人们对她的胜利的印象总要多做许多事。一旦毛泽东表了态——其实只是就事情的原则，

不是支持她的每次出击，她就决定组织调查组去武训老家，去县里专门收集有关这人劣迹的生动材料。她说毛泽东不同意，但她坚持要干，她的让步是出去用假名，以免她犯出错误来影响他的声誉。文化部门只派两个人参加调查组，一方面是看着江青，万一出事还好管管她。

但这是江青的机会。结果当然是战果辉煌。这情况使她想入非非了。江青从小就富于狂热和梦想，后来到上海娱乐圈找人生真谛时发现，做一个抗击一切艰难拯救人类的妇女领袖是最激动人心的。她对当地县的领导郑重宣布："再崇拜这样一个人，最终会毁掉我们党和国家。"

在中国，地方势力（以及真理）对来自北京的这种新诡计是无能为力的。对付武训的这场牌已经有人作弊，江青的笔记本上很快就记满吓坏了的老农的第一手证词："武训嘴上淌着口水，说明他极贪心。"以及诸如此类的新编的事实。

江青在谈到《武训传》的有关事情时从不提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的关键性文章。她把他作为阻力，其实他基本同意发动攻击才是江青成功的主要原因①。他在《清宫秘史》问题上保持沉默是江青的最大障碍。

江青在世界上、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个独特的角色，但有时又有点象伊娃·庇隆。如果说那位前阿根廷第一夫人的政治生涯比当代任何妇女都象江青的话，可能是因为在这两个女人的不可遏止的意志背后都有名妓和演员的癖性。江青在去山东找武训的劣迹和为自己政治职业上升的旅行中，表现

① 江青多说了她在山东的时间：她说是八个月，其实她在北京好长时间，而且调查报告发表在1951年7月，离她去山东顶多三个月。——原注

出同样的自我戏剧化、极端主观的特性。而且，在现实和文稿之间来回穿梭才使伊娃·庇隆（可能也使江青）获得那样的狂热欧捧、切齿痛骂，那样引人注目。

毛泽东不需要江青在身边，或者说江青不想在他身边。江青对武训的尸体射完最后一箭不久，又开始了离开北京的新事业。1951年年底，她有三个月参加中国中部湖北省武汉附近的深入土改。

这次毛泽东没有反对江青去，可能是觉得她在山东干得不错，或者是他希望她走远点。但其他人反对。结果，她只好用假名李进，而且一到村子里就发现无法行动。

那不是她的土改队，是高级经济官员李先念领导的大工作组。工作组再细分的时候，她上头有好多监督，她那个组就是警卫员和她自己。由于不让她去斗地主和听贫农诉苦，她冲警卫员喊道："你们让我脱离群众！"但后来她因为伙食问题又对这个警卫员甩话说："太油腻了，我在家是不吃的。"

农民痛哭时，这位北京来的夫人也坐下来哭泣，她的眼泪象是对湖北农村的特大恩赐。她尽管得了气管炎，还是参加查恶霸、分土地浮财给从未有过这些东西的农民的活动。她深为农村的落后所感动，不时以恩赐态度对待农民；她说她必须教他们"开阔眼界"。但她并没有神经病，她对妇女问题的分析是清晰的，而且有启发性，

同时她并不奇怪人们认为她是个谜。她总是穿着皮袄，而周围老百姓中只有被杀的地主穿绸缎，其余都是破布片。她带着照相机，在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怀着希望而激动的时候，她却在为相册寻找不寻常的题材。她甚至恬不知耻地介

绍说，有些农民见她不熟悉农村生活，质问她“你把你当谁啦”，因为她在参加土改的同时又是个她本人表演的茫然而快活的观众。

老虎和狼常是中国幻想故事中的形象，江青介绍自己在湖北的经历时包括说自己不怕老虎。当地传说跑了一只老虎，她毅然出去给大家打气，动员大家带根棍子。她躺在床上听到可怕的吼声，警卫员挺害怕，但她安慰他：“不用怕。”她瞎编一个她有作为高贵的人应当有的自信的故事。

在农民中生活的三个月快结束时，江青“不敢参加”最后的土改庆祝会，显然是认为人们已经兴奋得“近乎发狂”，他们的感激之情会使她受不了。她回忆说她离开那里回北京时，农民敲锣打鼓围拢来。有人哭了，江青也哭了。

江青说她要“接近群众”，但实际她要的是群众对她的奉承。她虽是认真参加了土改，但她看来只不过象一个名演员在稻田里排演了一场土改戏。

1951—1952年之间的冬天，江青的地位大大上升了，但很快又摔下来。党中央办公厅的名称虽然平常，但握有大权，江青从湖北回来不久被任命为秘书处的处长。这是她曾经得到过的共产党内的最高职位，也是她60年代中期以前这段时间的最高职位。办公厅秘书处掌握着统治中国的重大决策有关的秘密文件。江青作为秘书处长和毛泽东的夫人就不再仅是看看文件了，她已是办公厅和毛泽东个人办公室之间的潜在的重要联系。有关传送毛泽东的指示的问题，要给他看的材料，他同来访客人会见的安排，手稿的去处，这些都要江青负责。

但这个差事她只干了几星期。她后来说，工作比她原来想的要“劳累和压力大”，结果开始发烧，肝也疼了。但危

机主要不是医疗上的。江青离职是因为她的上司——不止一次同她闹别扭的办公厅主任、有能力的四川人杨尚昆的“建议”。同时还免了江青电影指导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的职务，说明她碰到了困难。毛泽东不能支持她，他同意杨的“建议”，只是和和稀泥，用保持面子的办法解决这场危机：江青另有重用。但实际后来江青干“自己的事”去了。

问题是双重的。周扬说：“江青一来，事情就难办。”政府机关很多人有此体会（文化大革命几年，周扬这句话常被用来刺他）。江青犯主观主义，好用戏剧手法，特别敏感，所以跟人很难合作。

她这个人在桌子边坐不上四小时，也不能按部就班料理文书。她甚至一口气10分钟、15分钟读完一个文件的本事都没有。她需要戏剧性、刺激性、阴谋诡计，有了这些，才能提起精神。否则她会百无聊赖，消沉，生病。

同人不好共事还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许多人讨厌她倒不是因为她自己的表现，主要是因为她象代表又不象代表毛泽东的意思，使官僚们很难办。

周扬因江青的问题去看刘少奇。周扬不喜欢江青，他也没有象江青说的那样在上海“整她压她”。她这样讲，就如同想出芽的种子埋怨土地“整它压它”一样。种子为出土而斗争，土地对种子的不满现状感到惊讶。

周扬对江青在文化领域的“建议”或“请求”感到棘手。周扬对国家首脑说：“江青有一大堆意见，造成混乱，不知哪些是她的意见，哪些是毛主席的意见。”刘少奇按向来的习惯仔细倾听，好久才叫周扬找毛泽东本人摊开问题。周扬照办了，当然非常小心，看来江青失去位置和毛、周的谈话有很大关系。

可能江青在办公厅的任命一开始就是错的。她太想做“真正的工作”即男人的工作了。党的监察干部认为她破坏了延安的结婚协议。而且到1952年，毛泽东同党和国家的蜜月早已过去，他不能再为江青的行为招惹是非了，想这样也不成。1950年、1951年毛泽东接见时江青还时常在座，至少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夫人随丈夫出场的机会多，到1952年就不大有了。

江青的身体还不是很坏，所以，1952年初尽管有关她工作的危机还没有过去，她仍向党提出要参加“抗美援朝”。表面上理由是冠冕堂皇的：事业是正义的，一切有用的力量都应用于赶跑“帝国主义者”。

江青如此难缠，以致皮球踢到了政治局。第二把手刘少奇说：“江青同志目前的工作极端重要。她是在为党照顾我们伟大领袖的身体、营养和家务。”刘少奇枪毙了江青的请求（刘少奇自己的妻子王光美是个精明强干、生气勃勃的人，在外面工作，以后还要介绍她的情况）。刘说：“什么工作能比这个更重要呢？江青同志没有理由不顾党信任的最重要的工作。”刘少奇两次提到江青对毛泽东的责任是对党的义务，他这是有效地向大家提醒延安的结婚协议。

1952年是江青困难的一年，而且还有将来更糟的预兆。“自己的工作”成了“毛泽东的秘书”。这个职务很含糊，但又常用到，因为江青最恨自己只是个家庭主妇，而且在无产阶级吃香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每个人必须有工作。在这段期间，毛泽东从不公开提及江青给他的帮助，只是江青说自己担任了研究工作助手。她找报纸杂志，把她认为毛泽东应当注意的题目送去。她休息的时候让他坐在床上，大声把电报和背景材料念给他听。

毛泽东有时派她去看他自己想看又没时间的人。1952年夏，她带着毛泽东的问候和礼物去张治中家，看望这位站到共产党一边的前国民党领导人。

“噢，你们是双胞胎。”江青见张将军两个女儿，很高兴地说。

小素秋说：“不，毛伯母。我们俩穿的衣服一样。”“毛伯母”是很习惯的叫法，抹杀了女性个人的特点，但江青不感到奇怪。

江青说：“我很后悔没生两个孩子，只有一个女儿。”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历史性访问时和江青住在张家。现在，张家的人仍旧觉得江青和当时一样不摆架子，对他们很尊重。江青有点瘦，但不弱。

去中南海访问毛泽东家庭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平静而“贤良”的江青。195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毛泽东过去的副官翟作钧来看老首长，江青正在同毛泽东亡弟的儿子毛远新打桥牌（毛远新从延安时起就归他们照看），她热情欢迎翟作钧，还叫13岁的李讷和15岁的李敏出来问好，把这个老兵吓呆了。全家都穿普通布衣服和布鞋。准备晚饭时，毛泽东从北边他自己的屋子过来。孩子们大口吃蛋、肉、菜，和毛泽东一样咽得很快。毛泽东和翟作钧聊天，江青扮演的角色完全是“贤妻良母”。

江青对李讷抱的希望很大，但这个13岁的女孩不太吸引人，方方的脸，长得很结实，象爸爸的地方比妈妈多一些。江青还没有看出李讷的天才和兴趣所在。她有时不敢肯定女儿长大了有没有她希望有的干劲（毛泽东对女儿不如对儿子关心）。1949年以前，江青在路上经常同李讷分开，现在江青有病和去苏联也妨碍母女团聚。

有一次，江青陪毛泽东去天安门城楼检阅，在客厅里碰到了李六如。这位毛泽东的前秘书处长自从1942年那次可怕的冲突以后，让江青恨死了。江青还不具备用拂袖而去来抗议李六如出现的地位，但她的态度很不客气。毛泽东和江青检阅时又看到李六如。后来，领导人从圈椅上站起来绕场走动的时候，李六如走过来高兴地说："江青同志好吗？"江青愣了，盯着他，没开口。毛泽东过来说几句客套话，解救了僵局。

1951—1952年冬季的风暴没有过去，江青在1952年"被解除了"在家为毛泽东工作的权利。她说"有些领导人"决定她应当再去莫斯科治疗。

我们发现，还发生了一件事，可能是江青突然去苏联被放逐一年的导火线。1952年，她又想重复告发《武训传》的胜利，在消除文化传统方面建立丰功伟绩。她想编一出现代京剧，描写山东盗匪宋景诗的历史。武训不造反，宋景诗造反，江青在调查武训的时候赞扬了宋。但周扬认为水平太低，不让排演（后来有一部关于宋景诗的电影，但与江青无关）。

她帮助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另一部军事题材的电影《南征北战》，但引起了争论。她还想搞"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都让周扬及其同伙枪毙了。周扬对将著名的解放战争题材搬上京剧舞台发表了干脆的意见："太粗俗，完全不合适。"

江青在这许多冒险事业中丝毫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却处处遭到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反对。她实在没有牌了，她发现迫使她离开北京"治病"的势力是不可抗拒的。

让江青脱离政治生活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是50年代让全

中国妇女回家带孩子的压力的一部分。男女有一定平等的不安定的革命年月过去了，社会问题——包括妇女问题的压力已经被要求组织上稳定的压力所代替，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保守的家庭观念。

可能这是革命进入中年后的铁则，因为苏联20年代也出现过类似的男女平等运动低潮。认为男女关系不过是喝杯水的亚历山德拉·科隆苔的独立性先锋观点，被斯大林时代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取代，以致科隆苔本人成为苏联第一个也是迄今最后一个女大使。江青从来都不是男女平权主义者（当然也不是科隆苔的追随者），但她受到50年代情况变化的影响。

中国妇女有突出的地位，那不可能是杰出的个人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的结果。共产党制度下权力非常集中，私人专业实质上是不存在的。而且不论哪朝哪代，中国文化都不明确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1949年以后天真地幻想能找到私人专业的专业人员，不是受掌权者信任后变得暧昧起来，就是他的领导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后牵累他也成了“资产阶级分子”。

就这样，文化和共产党制度共同使政治成为非家庭妇女能出人头地的唯一道路。而且这样的政治女性通常只有三种类型：挂名首脑（比如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妇女组织的首领（邓颖超）和靠丈夫势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例如林彪的妻子叶群，下面还要讲）。

江青算什么呢？作为演员的私人职业已经没有。甚至为建立适宜的50年代毛泽东夫人的形象而必须打破她以往职业的形象。有她演出的影片、有关她演技的评论和有关她演员生活的文章，一律遭到追查、销毁。

江青不可能是名誉首脑，这种人是天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实在很少。江青的气质也相去甚远，她比较象手头有工作的、挣扎中的妓女，完全不是斟茶喝的高傲的挂名领袖。

江青也不容易列入靠丈夫参与政治的第三类。这有三个问题：党总是不让她占据太显眼的、太有权的公共位置；江青很讲面子，也不愿公开通过丈夫博一个位置；50年代毛泽东也从不鼓励她担任公职的愿望。刘少奇没有因王光美公开活动而不安，周恩来、邓颖超也没有这个问题，但毛泽东在这段期间由于党的看法和其他种种原因，不想让江青有个正式工作。

周恩来和张治中将军的一个女儿谈起她的工作计划时，建议她找邓颖超在妇联弄个工作。张素秋撅嘴说不愿干妇女工作。总理说："你是妇女，不喜欢妇女工作吗？性别在你脑子里也不平等！"邓颖超早年不仅要求与男子平等，而且认为已经得到。正是她丈夫对张素秋讲的那些话，使她不感羞耻地投身于妇联工作。她认为男女平等是不言而喻的，妇女组织的工作只是理理那些松掉的结子。

江青小时过的日子比邓颖超苦，认为男女平等不是事实。由于缺乏这种平静的自信，她想的远不只是整理整理现成的大厦。她感受不到平等，所以她的目标远远超过女性的理论上的平等。她受个人野心煎熬，缺乏平等，只能用武断的、复仇的欲望来补偿。

有时人们感到中国有两种女性：保姆式的是大多数，温良顺从；还有一种女皇式的，性格极端，飞扬跋扈，充满渴望，似乎要在她的有生之年替几百年来的每个保姆报尽冤仇。江青就是女皇式的。

从衣着也能看出问题。江青不象那些“妇女运动”的战骑。那些好汉穿着破烂市买来的鼓鼓囊囊的裤子或者黑裙子，一件灰色聚酯上衣罩住身上的一切，塑料凉鞋，短袜套，没有任何显眼的颜色。短头发也跟衣服一样朴实无华，全身没一点装饰，和男人没一点区别。

而江青总是要在共产党中国文化允许的范围内设法从外表上显出她的个性。她穿高跟鞋、西式上衣，戴着围巾。她认真涂抹高档化妆品，头发总是梳得光溜溜的。她流露出个人奋斗的内心状态，看不出有参加集体妇女运动的倾向。江青的穿着不随大溜，她要突出于大众。

江青回忆她少年时期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说：“我那时连贴身衣服都没有。”她很穷，和大多数妇联领导不同。她有大家闺秀所没有的弱点——奢侈。在为外表自鸣得意的江青身上出现了快活的小云鹤。

江青必须就她作为毛泽东妻子的处境作出反应，正如邓颖超的感情必定受周恩来这样的人的影响一样。毛比周要老谋深算，雄心勃勃，江青当然会面临比邓颖超所临更强大的风暴。江青不得不投入男女关系和权力斗争的旋涡。

玩弄男女关系和权力斗争的把戏，肯定意味着对妇女团结不感兴趣。江青在对罗克珊·维特克讲的自传中，一字未提武则天、慈禧太后或其他中国的女领袖，也没有提尼姆·韦尔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其他江青很熟悉的同中国革命有关的外国女名流。江青玩的游戏只能是为了她自己，不是为全体女性。她想在男人堆里运用她的女性技能来争取男人得到的东西，象男人一样。

在她自己眼里，江青是“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的眼里，她就是“毛泽东的女人”。

由于江青的个性、毛泽东的巨大权力和共产党中国不时要翻腾的政治，只要她不在床上，不在苏联，她的处境就很难稳定，总是反反复复出现紧张。

力主安排江青第二次去苏联的刘少奇和周恩来认为，问题来自江青的个性、她在内战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安排最高领导人的妻子这一客观难题。

如果江青愿意做妇女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事就要好办些。如果江青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事情也要好办一些。最好是江青安心做毛泽东的家庭助手，但刘少奇和周恩来明白她是不干的。江青毕竟是江青。她是潜藏着的“一个人的单位”，她的目标是坚定的。毛泽东的这些同事需要一个适合江青的盒子，但除了那个有礼貌的、可怕的“生病”盒子，实在找不到。江青必须在苏联长期养病。

1952年秋，江青由于肝痛和发烧去莫斯科。特别是冬天，中国人很少愿意在苏联度过。江青痛苦已极，衰弱、极端孤立。在那里11个月一直是治疗、用药。病的时间很长，精神状态更是糟糕。

江青发烧，俄国医生用了青霉素，肝疼，用了有毒的注射剂，结果她的胆汁都发黑了。她又去了一次雅尔塔，回来就住在克里姆林宫围墙里的高级皇宫医院，有时还去郊区的疗养院、带网球场的乡间别墅、附近的松林以及上放映室去看她喜爱的电影。

有点病，但生命不至于有危险，主要是想家，不知道往下是什么情况，也许不同意她回北京的请求——这是她最不愿意的，因为她的病并非要死要活、非要苏联医生治不可。

江青周围尽是女人，这也使她很不开心。除了有时能见

到的一个男医生，每天总是那个俄国翻译陪着，这人按江青的说法是除了一头黄发，完全象斯大林。还有一个30多岁的温和得似乎有些迟钝的助理翻译，一个中年的中国医生，有时还闹点别扭。还有一个女职员来来去去，完全由北京驻苏使馆和访苏代表团情况决定。

这些人都是围绕着给江青治疗身体与精神疾病的目的在活动。医生看病之后是打桥牌，吃饭，在乡间别墅的松林里散步，再就是私人放电影。总是这么一小撮妇女，互相揣摩对方的意思，考虑有什么新鲜事，怎么小心地说出来，互相猜测对方是否和自己一样厌烦对方。

在这样的温室里，江青很容易发现人的缺点。她感到这个人是在背后嘀咕她了，那个人很懒，还有的打牌时从她身后看她什么牌。

江青与苏联社会隔绝，而且失望地远离中国社会。她在皇宫医院的白色真空中远离她喜爱的小动作、诡计、斗争。她在苏联不到两年的期间，最厉害的评论家也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多愁善感的表现。她的独生女李讷没有陪她去苏联；李讷放假去苏联时，情况也不允许母女多接触。

如果她能热爱读书，日子还好过一点，但江青喜欢从经验中学习，不从书本中学习。尽管她桌上有司汤达的《红与黑》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本，但她哪一本也翻不了几页。中国大使馆也送些小册子来，但那都是关于外交政策的，引不起她的兴趣。

她不会讲俄语，每句话都得依靠翻译，这使她厌烦和产生幽闭恐怖的感觉。她抱怨说成了聋子、哑巴。苏联翻译和中国翻译谈点什么，她就会不安，咳嗽起来，责问什么事情那么吸引人——说不定是在商量整她呢！中国宫廷里孤立的

人有个传统：怀疑外国话是反对他们的工具。江青和半个世纪以前的慈禧都有这毛病，认为身边的人说她不懂的话就是在说她，孤立她，攻击她。

江青在漫长的冬日特别怀念她在上海的活跃年头。她跟身边的人讲30年代的电影，这是她们从未见过的。对在上海住过的年纪较大的中国医生，她说不能光看表面，她的电影都有革命意图，不光是艺术。她还回忆一起工作的演员和导演。她对比上海时的活跃、爱交际、成功和现在的死气沉沉，说是这都怪她的病和她同杨尚昆的冲突。

江青在苏联看了许多电影，大都是西方的，她拼命吸收它们的浪漫主义以及个人特性的勇敢表露（中国电影都是社会道德故事，没有这些）。江青几乎忘了自己有病，她要去进行她从电影上看来的强悍而激情的西方女性式冒险。江青想成为那样的女性。

有一天，中国大使馆送来一个箱子，这是江青让从北京带来的，其中有她托王光美挑的衣料。这期间江青同刘少奇这位漂亮、自信心强的妻子关系还是真诚的（两人的丈夫是中国最高的两位亲密同事）。江青的助理翻译打开箱子拿出东西来，刚展开第一件衣料，江青就嘲笑地叫起来："鸭蛋黄！根本穿不得。"她把这块衣料扔到一边，又去翻第二件，第二件是桃红色的。"天哪，这么俗气！"第三件虽是她最喜欢的苹果绿，但还是不满意。盛怒之下，她说王光美"不了解世界"，还按她不根据前提就推理的老习惯，骂王光美入党还不到五年，而且是因为同刘少奇结婚才入的。

江青还喜欢表现自己的宽宏大度(不能触犯她的目标)，人们围过来看她从北京带来的东西，她以一种胜利者的微笑姿态宣布，桃红色的衣料归助理翻译，其他的东西给俄国服

务员。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时，江青是在疗养院收音机里听来的，周围只有病人和医护人员。医生和护士对她说，毛泽东一定会来参加葬礼。这个说法刺激了她，因为她对北京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不会有人告诉她丈夫来不来。她只好有气无力地回答说，这样的事须由中央委员会正式决定。

毛泽东如果来，会来看她吗？也许会找她，把她带回北京。也许要命令她在这个白色的寂静里再呆几个月。

江青从广播里得知，毛泽东没有来。她那身居远地的丈夫写了一份悼词，称斯大林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但他是苏联集团中唯一没有参加葬礼的共产党首脑。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前来，担任了唯一的非苏联籍的抬棺人。看来，总理滞留莫斯科期间没有去看江青（肯定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窗槛前度过严寒的葬礼期，奇怪苏联人和不表露感情的中国人不同，很快就互相窃窃私语“天才”死后世界上留下的空隙。

江青的思想异常活跃，情绪也象疗养院窗外披着雪衣的树枝一样脆弱。她花了很大力气来克服斯大林逝世以后给她造成的不愉快，她认为许多到莫斯科来的世界共产党领导人不久都会因受冷死去。结果不是如此，但很多迹象使她感到毛泽东不来、她和他分居都没有发生多大问题。

她在别墅里越来越歇斯底里，或者暗自干生气。一点小事，风声、人声、耀眼灯光，都能使她激怒。哪儿有一点响动，她就兴师动众去搜查，房角有个虫子叫也能引得她大动干戈。吹起一点小风，也会让她停止森林里的散步，要不就让随从赶快张伞什么的。

光线太强，她也会认为是对她的统治的挑战，在暗屋子

里她才安得下神。到户外时，戴上墨镜她心里就安定得多。在雅尔塔，一望无际的海滩使她惶惶不可终日，她必须戴上大草帽，坡上能覆盖她全身的大披巾，还要打一把伞。她从未下过水，似乎无垠的自然界对她的灵魂是个威胁。

天天伺候病人的人很容易发现人的弱点，江青的助手也是这样。但对自己不满意的江青，对她无法对付的四周一切事物很可能也都不太满意。

江青从来不向宗教寻求慰藉。她嘲笑中国的宗教传统，在苏联她看到东正教教堂葱头一样的尖顶也是怀疑地嘲笑。毛泽东晚年谈起过上帝，江青则认为谈论什么上帝、死后的世界、最终的秘密、宽恕之类都是愚蠢的。

江青脑子里没有宗教，说明她只有个人意志。她不承认超自然的关系，她也不作超自然的号召。事物本身的意义到她的意志面前黯然失色，她都要重新加以解释。

江青认为苏联腐败了。医院的工作人员伸手要小费；她的护士戴着首饰；有一批贵族向往西方，说话用法语。但江青自己的本能至少也是爱虚荣，也是资产阶级式的。她对在皇宫医院治病感到满意，因为这是苏联上层人士治病的场所。她还喜欢说她住的别墅是斯大林自己的。她谈论斯大林个人下令为她做她喜欢的绿色晚礼服一事，还说周围病人一色都穿白的，对她能穿喜欢的颜色和她的苗条妒忌、羡慕已极。

她带随从去百货商店买东西，答应给每个人买一块衣料（至少不用大家自己出钱）。但她付帐时发现她的助理翻译挑的衣料比她自己的还要多几个卢布就火了，粗声粗气地说："天哪，小任。你今天买的衣料够穿一辈子了。"后来，裁缝来给大家设计样式，她又说，天哪，她真怕小任挑的衣服

会把自己打扮得“象一只熊”。

江青从内心喜欢许多她匆匆看到的苏联文化——实际是东西方文化的汇集：浪漫主义音乐；各色服装，特别是长上衣和高跟鞋；对有欧洲传统的个人的压力。但她与这种文化无缘，她知道她无法分享，她因此就加以谴责（80年代的中国青年也是这种精神状态，羡慕西方，但在爱国主义游行时提出反西方口号）。

江青讨厌苏联秘密警察的行径，因为在她脑子里，中国的秘密部队都是些喜气洋洋的侦察员和在中南海管空调、在北京站给她拎衣箱的有礼貌的青年。

有一天，她在拥挤的大街上忽然听见上面传来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观、进取的激昂曲调。一个过路的苏联人停下来，走近她，很友好地要她转达对毛泽东主席及其同事的问候。他刚说完，后面就有个秘密警察把他拖上汽车。

江青在苏联学会了反西方主义，这对于她对苏联的反应实在是一个讽刺。

江青60年代的许多敌人都是多少有点国际经验的。他们或是在法国呆过（比如邓小平），或是会英语（王光美），或是受过日本教育（夏衍）。人们可能认为江青看过那么多西方和日本的音乐、服装、戏剧，心里一定是倾向西方的。但相反，她唯一的国外经验，唯一对欧洲的了解，是在世界共产主义首都、后来很快成为“修正主义”和“反华”的苏联得到的。她在莫斯科学会了怎样反对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对王光美的欣赏西式服装，反对夏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防御体系。

按中国的传统教导，政治家为了搞好国家，首先必须管

好自己的家。但毛泽东意志太强，不可能有个平静的家；江青意志也不弱，再加上野心，就不可能为平静的家作出任何牺牲。江青1953年秋天从苏联回国以后，她的有限能量都用在家庭计策和争吵上了。

毛泽东对家庭成员的态度比较超脱。他可以跟他们玩，指导他们，放任他们，在他们身上花时间，他是把他们当作自立的个人看待的。江青不同，对她来说，家庭成员不应是没有联系的个人，而应是特别忠贞的部队。他们必定是拥护她或反对她。毛泽东不大关心亲属，江青是对大家都过于关心——把自己弄成了中南海永无休止的家庭风暴的中心。

作为世界上最有威望的男人之一的第四个妻子，她的处境很难：四周有前几次婚姻遗留下来的关系，还有好多象暗娼一样的政治监护人在设法利用两性关系博取权力。内部的不满加重了她的困难。

毛泽东本人没在苏联多呆，但他很多亲属都在苏联呆过很长时间，他们几乎已经有了两个基地：北京和莫斯科。贺子珍和江青一样，也到苏联“治过病”。贺子珍病有多重，我们不清楚。但1948年，即她与毛泽东分手去苏联的10年后，被认为完全可以回国：在第四任妻子第一次去苏联的前几个月，第三任妻子离苏联回国①。

现在，贺子珍头发白了，面容更加慈祥。她从离开延安就不看护毛泽东的孩子了。贺子珍独自坐火车回来，面对的是中国领导人前妻的生活。过去，人们总认为贺子珍同50年代毛泽东、江青的生活完全无关，其实不然。她住在哪儿，干什么事，都是江青暗中关心的棘手问题。

---

① 朱仲丽说是她和丈夫王稼祥在1947年安排贺子珍回哈尔滨。——原注

贺子珍希望住北京，江青不同意。毛泽东作为当然的裁判，决定贺子珍去上海，上疗养院去治精神病。上海市长、后来的外交部长陈毅出面干预，保证加以精心治疗和提供经济资助（他对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及其丈夫都加以照顾）。

这时，贺子珍至少在600英里以外。但在中南海自己家里的江青，必须认真对待逐渐成人的贺子珍的女儿了。从延安时起就同李讷一块儿长大的李敏，现在上了大学。江青亲生的小两岁的女儿也在大学读书。但江青和李敏处得不好。江青另眼看待李敏。据亲属讲，李敏必须自己洗衣服乃至床单，李讷则由服务员代劳。不知是单方面的仇视，还是李敏这个少女也不喜欢她的后妈。江青感到李敏的名字虽叫行动敏捷，实际不怎么样。

比起毛泽东的第三个妻子，第二个妻子对江青的折磨更厉害。杨开慧是人人都夸的“党的女儿”。毛泽东越来越关心湖南老家杨家的亲戚。杨开慧的两个儿子更是不断在毛泽东这里住。

毛岸英和毛岸青都不是毛泽东带大的。1927年共产党人遭难后，两人离开他10年之久，到处流浪，一会儿在上海卖报，一会儿在破庙里讲故事要钱。有几年，跟前继母贺子珍在苏联上学。岸英比较上进；岸青爱惹麻烦，成天下棋，追一个俄国女子。40年代中期回国后，毛泽东让他们去僻远村庄养猪，赶驴车送粪。

但他们毕竟是毛泽东仅有的儿子，这在中国是相当大的事。毛岸英在党的机关工作时，官僚们请他在高干食堂吃饭。毛泽东知道后大发脾气，要他到职工食堂去吃。

个子高高的毛岸英是个很热心的青年，他甚至毫不迟疑地叫江青不要干扰毛泽东，而且可能受苏联影响，还批评

毛泽东身边的“领袖崇拜”。江青把这些都告诉了毛泽东，结果毛岸英受到质问（周恩来总理参加），作了书面检讨。

毫不奇怪，江青讨厌起岸英来了。作为长子，他在中国文化上是毛泽东的“继承人”。比江青只小七岁的岸英现在长大了，对她“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是个威胁。

毛岸英同在部队做敏感工作的聪明姑娘刘松林结了婚。林语堂在评论中国家庭时写道：“对女人来说，讨好男人是高尚的事，但讨好别的女人就是英雄行为，许多人做不到。”江青和刘松林都不是英雄，所以完全不能相互使对方满意。按松林的说法，江青一开始对她就是“藐视、讽刺、凌辱”。

1950年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毛岸英被派往前线，几星期后遭美军空袭阵亡。松林说，岸英之死给江青带来“无限欢乐”。也许是这样，江青没有参加他的葬礼。而毛泽东明白地对松林说：“岸英死了。我怕对江青来说跟死条狗差不多。”

刘松林说是江青策划让岸英上危险的朝鲜前线，这未免说得过分了，必定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江青对噩耗没有悲痛和同情是事实。松林说江青很“快活”也不无道理，而且据贺子珍的女儿李敏说，她后妈不参加有关岸英死讯的谈论，也从不谈他的生平和性格。

江青把她姐姐李云霞接到中南海来住，以便壮大自己力量。李云霞比江青大许多，有点象江青：高高的个子，举止文雅但有点凶相。但不象江青戴眼镜，也不爱好文艺。她丈夫解放前就死了，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在山东时游泳淹死了，另一个叫王博文，带到中南海来。给了李云霞一间不错的屋子，但毛泽东对刘松林抱怨说“是江青让李云霞来的，

住在我这里。”

李云霞没有江青的资质，但听江青的，江青就利用她在家维护自己的利益。自然，李云霞要多关照李讷了。原来这一家就相当紧张而复杂，李云霞的到来正是火上浇油。

两极分化了。江青和李云霞娇惯李讷。李云霞瞧江青颜色，对李敏不好。在两位女儿的斗争中抱中立的毛泽东特别喜欢刘松林，这使江青和李云霞不能容忍。逐渐地，松林和李敏往毛泽东这一边靠拢，同江青疏远起来。

有一天早晨，毛泽东干完通宵后走出书斋，说要全家一起吃饭。由于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和家庭界线分明，这种事情不常有。这是毛泽东的建议，他的话就是法律。这天天气不错，阳光照射在宫殿的黄瓦和中南海的碧水上。松林回忆说，每个人都“特别高兴”。但是，在哪间屋子里吃呢？毛泽东偏偏到松林和李敏住的房间来坐下聊天。

吃的东西跟着主席端上来了，不一会儿，大家就坐在一张大圆桌周围了，但这个地方被江青视为敌占区。就座的有毛泽东、江青、两个女儿、松林、李云霞、毛远新。香酥鸡和清蒸鱼上桌时气氛有点不对头。毛泽东在闲聊，江青不做声，似乎李云霞成了目标，神情严厉，一听李敏和刘松林说话她就顶。突然，李云霞把椅子往后一推，筷子掷向毛泽东，跑出去了。毛泽东气坏了，但没说话。后来，松林问他，李云霞为什么发那么大火，他说：“很简单，我上你和李敏房间啦。”

江青是个意志力很强的人，受到身体不好所限和党的压力，只好蹲在家里，处境很难。在中南海，她要应付毛泽东前几次婚姻带来的亲属，这是她的大问题，何况中国是这样的文化规范，她又有自己的野心，再加上毛泽东有儿子，她

没有。

在中国，外表平静的家庭、社会或政治关系常掩饰着内部的紧张。派别斗争在中国就象美国的苹果馅饼那么普遍，因为在中国每个人都十分有必要参加某一派，而且妒忌心随年龄增长而日益顽固。毛泽东掌握无限权力，权力往往被纷争围绕着。比起世界其他各地，中国最没有可能在最高领导人的家里没有权力斗争的旋涡。

美国家庭同住人口很少；中国家庭是个社会实体，触角伸向社会。“公家”常用来指“公众”或“国家”，“公”就是“公共的”，“家”就是“家庭”。用词完全合乎实际：家庭同公共领域犬牙交错。从“家”里伸出来的关系网、不言而喻的义务和轻微的腐化现象，在江青决定怎样在“公家”即广大领域出名时都是有力工具。

既然共产党把她关在家里，她就要使用她在家里的权力。中国妇女都是这么来弥补她们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处境的。而且，因为这是毛泽东的家，这个家的范围从内容上讲几乎跟公家的范围差不多，这是个广阔的施展本领的天地，可以使毛泽东的娜拉不再是娜拉，而且不再仅仅属于毛泽东。

因此，以江青为主妇的家里，正如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权力结构当中一样，充满了力量的平衡、政治上的站队和阴谋诡计。

不论内心对毛岸英之死是什么感情，江青在家庭的权力在他死后是上升了。她认为照顾寡妇刘松林不再是毛泽东和江青的责任，她不断施加压力让松林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想没收松林进出这个家的通行证。

刘松林偶然听到了毛泽东和江青对她的前途的争论。江

青坚持取消对刘松林的补贴。毛泽东发火了："我只要有一口气，都要照顾她。"毛泽东在书房同松林聊天时说，江青特别爱"唠叨"，对岸英一点没有怀念。毛泽东在充满冲突的老房子里来回走着，停在古书橱前，抽出一个大厚本来。他朗读其中一段关于树和河的浪漫诗篇。树老了，叶子掉了，朽了，倒在地上；旁边的小河是它多年的朋友，对树的去世十分悲痛，逐渐衰竭，干涸了。毛泽东是告诉松林，树和河相互之间的感情比江青和这个家的人的感情还亲一些呢。

经毛泽东规劝，松林最后又结婚了。毛泽东认为这样能解决她和江青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到了文化革命爆发，离开中南海的松林及其丈夫和江青的冲突更严重了，这一点以后再讲。

江青对中国最有名的小说《红楼梦》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公开攻击。这是1954年的秋天。江青身体好起来，毛泽东受党内批评意见的影响，对江青关心一点了。

江青躺在卧室沙发上，看到她老家山东一个大学的校刊上有篇文章批评《红楼梦》是含有错误意识的坏书。这部小说历来被中国人看作是有关阴谋和情欲的无害的故事。江青同意不应当只当小说看，要用政治分析。她看到这是同周扬以及文化界其他敌人作战的好机会。

她把小说找来看，开始挑毛病。她在字里行间发现了罪恶的匕首和正义的权威。她感到作为消遣来看这本书是不行的，它是阶级斗争的手册。

第二天她兴致勃勃地把山东不知名人物的文章和她自己的看法告诉毛泽东。当时毛对北京的机关不满，很想听听来自外省的声音。他说这篇文章在怎样读这本书上有新的提

法，叫江青去找《人民日报》转载。

江青怀着为“伟大事业”不惜病躯的心情从床上爬起来，驱车到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编辑说收到过对《红楼梦》的攻击但拒绝刊登，所以在山东发表了。江青说她和毛主席认为象这样的“不知名作者写的有生气的批评文章”应当在北京第一大报登载。编辑说准备摘要刊出。

江青想让周扬处在对《红楼梦》问题的“错误”地位，又用她的山东方式将文章送给周扬，而不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对《人民日报》施加的压力告诉他，只是叫他读这篇文章。周扬和他在党的宣传部的熟人分析：“那是这么小的人物写的。这些小人物怎么敢（批评对这部小说的定评）？”

江青说是在她推动下，毛泽东后来才著文告诉政府要员这书是有害的，不批评这书的支持者的做法是“毒害青年人思想”和“大资产阶级镇压小人物”。毛泽东的话很严厉，而且引人注目的是，他把《红楼梦》的批判同《清宫秘史》、《武训传》的事件联系起来，后者正是前一阵江青的讨伐对象。但结果这场“文学”战争达成了妥协：这部分是因为普遍对江青不满，部分是因为毛泽东也不愿尽全力反对他本人十分称赞的《红楼梦》。

《人民日报》最终也没有登这篇批评文章，是《文艺报》这份比《人民日报》影响小些的重要刊物登了，而且只是告诉读者要警惕这部小说，并没有从中国经典名著中将其剔出去。

江青在有可能的时候总要关心关心文艺政策。周扬流露了官僚们对江青的不满。毛泽东对江青有时冷淡，有时又支持。

在《红楼梦》事件当中，重又精神焕发的江青意外地出现在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这是毛泽东政权建立的五周年，

尼基塔·赫鲁晓夫前来观礼。

领导人都在长安街的红墙上站着，赫鲁晓夫就象一个看着庄稼的农夫。毛泽东微微皱眉，心事不少。江青谦逊地站在一边。

周恩来把江青介绍给赫鲁晓夫，但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动作异常迅速地走到妻子身边，把她引到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老远的地方。周恩来也许在想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失误。毛泽东和江青默默地看着广场上的人群。

不可能是毛泽东怕江青向赫鲁晓夫泄漏国家机密，赫鲁晓夫也不可能通过江青让中国在满洲问题和对美政策上倾向苏联。可能还是毛泽东对他们结婚时党对江青地位的规定十分敏感。总之，毛泽东不喜欢赫鲁晓夫，不愿意苏联领导人同他妻子在一处闲谈。他可能听说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晚会上称江青为“毛的美丽的夫人”。但江青还不是够格的“毛夫人”——即可以在全国性场合扮演突出的、自然的中国领导人之一的第一夫人角色。

如果江青想迫害毛泽东，这位主席的侄子毛远新必定能看出一些迹象，但这位有礼貌的青年同江青不错。50年代江青常带李讷和远新去颐和园划船，玩儿童游乐场。在家里江青独独表扬远新，并让李讷拿他当兄弟。

江青和毛远新接近的道理很简单：力量平衡，远新是她的天然盟友。毛远新的父亲不是毛泽东，他的母亲也不是江青的前任。江青总是想着有一天摆脱毛泽东而独立，远新便是她的“王储”。她没有儿子，但眼下毛家这个男孩又不是外人，有可能培养成她的人。

现在的江青和毛远新的联系有朝一日也许是统治中国的政治联盟。

毛泽东接待了一个使江青头疼的客人——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贺怡曾在延安同她丈夫为贺子珍的事闹过。贺怡现在建议毛泽东到江西寻找贺子珍失散的儿女！

贺怡这样做有几种动机。但对江青来说，这无疑是破坏她的位置。因为江青没有儿子，毛泽东两个儿子一个死了，一个精神不正常，找出一个贺子珍的儿子必定是毛泽东家庭权力斗争的王牌：毛的“继承人”。找出一个孩子，不论男女，对贺怡他们肯定没有坏处。

对贺怡的建议，毛泽东有多大热情不得而知，但没有泼冷水。到毛泽东和贺子珍丢失两三个孩子的江西地区多次探访后，找来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但到北京盘问、检查的结果不是贺子珍的孩子。江青对贺怡发火了：“今天你带个儿子来，明天再来一个，天晓得你要划拉多少来！”结果，中南海没有添加贺子珍的孩子，情况依然如故。

刘松林最后是走了，1955年去苏联学习。江青姐姐的儿子王博文也去了莫斯科。毛泽东听松林说出国人员服装不包括苏联必需的厚大衣时，就自己出钱给松林和王博文去买。江青从姐姐那里得知时大动肝火：“她是她家的，博文是我们家的！”工作人员都听她喊了。毛泽东说：“是我给钱让她买大衣的！”

家里最使江青难办的是毛岸青。岸英死时他26岁，本来个性就有问题，1951年秋天急转直下。他俄语讲得好，在党中央的马列学院当翻译。他在机关同人吵架，失去理智打起来。

毛泽东和江青把他带到中南海（他从未在家住过），叫他检讨。据岸青的未婚妻讲，江青把他关在她养猴子的小屋里。是否如此，不清楚。她同他吵了好几次，后来毛泽东决

定送他去外地治精神病。由于种种原因，由于从小没有父母的爱、哥哥的死、涉及家里每个人的紧张和阴谋、江青的敌视，岸青从27岁起就严重精神失常。

岸青在大连医院里不积极治病，却同漂亮的小护士谈起恋爱来。江青怕他乱交女朋友，不同意岸青和那小护士的关系。江青自以为是，认为迟钝的人不会挑对象。

岸青由于长期生活在苏联，中国话讲不好，很痛苦。面对江青的猛烈攻击，他只能耸耸肩或者微微一笑，但愿江青讲的不是什么要紧事，结果江青更加生气。

岸青从大连转到苏联去治。不满江青的人说这是江青为了撵他而强迫他转走的，就跟江青说她的敌人强迫她去莫斯科治病一样。也许岸青去苏联是象江青两三次去苏联一样，是官僚的安排、医疗上的需要、毛泽东的同意等因素的综合。江青成功地阻止了小护士陪岸青去莫斯科的计划。

岸青从莫斯科给小护士写信，但大半被江青扣下了。1954年，官僚机构又安排小护士去找岸青，被江青破坏了。第二年，这个可怜的小护士身体已经弄垮，同一个大连人结婚了。同时，岸青又迷上了莫斯科的护士。

中国人同外国人相好，对方哪怕是友好国家的，中方也会反对这种结合（刘少奇的大儿子同苏联姑娘相爱，结果遭到刘少奇和党的反对）。但江青却极力赞同岸青娶苏联护士！

江青希望岸青永远留在苏联，不要来惹她生气，所以送首饰和衣料去莫斯科给还没肯定的新娘。使江青遗憾的是，这件婚事没成。党对此事不满，而且由于岸青看中的人太多，苏联护士不理他了。

毛泽东总是把家务事委托江青处理。江青肯定对岸青的

乱交际批评过多。她的敌人后来说是她的“迫害”招致岸青精神失常。岸青1951年危机之前的不幸历史说明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当然，这个年轻人也不用感谢江青。

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别墅里招待张治中全家吃饭。张治中和张的妻子、四个儿女都出席了。毛泽东、江青、李讷、李敏都穿得整整齐齐，很高兴。毛泽东和江青很少这样热情过。

吃饭时，毛泽东一个个问张治中的孩子的工作或学习情况。江青情绪不错，但很少说话，她的主要任务是传菜。她那象鹰一样的眼睛一见毛泽东面前盘子里的菜堆减低了，立即拿好吃的添上。张治中的大儿子说他刚刚入了党，毛泽东高兴地微笑。

张治中的女儿回忆说：“江青很有礼貌，很热心。毛泽东的两个女儿在吃饭时比她说得多。”

饭后毛泽东带张治中看他的房子。当大家走进一个带大木床的宽大房间时，毛泽东说这是“我的房间”。床上有一边全是报纸和书。江青的屋子在走廊另一头。

这一年江青身体有好转，但一年之后，到1955年年中，又感到不行了。发烧不退，体重锐减。她从避暑的西湖别墅飞往北京检查，妇科诊断是宫颈癌。

江青极为悲观厌世了。她回忆起一位女医生，一位朋友，以及她在济南学戏时在田汉的《湖上惨事》中担任主角的往事，她凄惨地设想实际生活中的惨事快要临到她头上了。

江青并不急于回苏联，但集体的决定是可想而知的。1955年7月，江青又回到苏联医生手中。这次她的随员中只多了一名18岁的护士。江青又一次离开女儿李讷。

江青也许是真的病了，所以毛泽东和官僚们觉得应当再送她去莫斯科。但在她去之前的6月17日，有个人去他们家访问，发现没有什么危险。这天下午3点钟，毛泽东的一个先前警卫员来到中南海，呆到吃晚饭。他陪毛泽东游了泳，回到屋里时，毛泽东介绍他认识江青。江青同他握手，教李讷喊叔叔，然后坐在毛泽东旁边。他们一起吃饭，还喝了酒。

江青在苏联首都提起精神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岸青和松林。岸青这时在疗养院，松林和博文一起在莫斯科大学。

江青告诉已经结婚的松林说，岸青的精神病不轻，不要去看他。同时，她又向毛泽东介绍有关岸青的好消息。其实，她亲自体验过生病是什么滋味，在苏联医院有多少自由。完全是欺骗。

四个月以后，松林从莫斯科大学毛泽东以前的医生那里得知岸青的病情恶化。她写了一封急信，而且设法确实送到毛泽东手中。对她很信任的公公毛泽东急了。他不顾江青的乐观信息，把岸青接回大连。

江青回北京后听到了大连的烦人消息。想不到她希望娶苏联姑娘的岸青竟跟松林的妹妹韶华热恋上了。没有比这件事更令江青难受的了。这件新的婚事将加强松林的势力并且增强“杨开慧派”在中南海的实力。

江青开始监控岸青去中南海的信件，大部分扣下来，有些烧掉。但现在毛泽东已经警觉，不容易放过有关岸青的消息了。他给岸青写信说：“你给我写信时不要托其他人。”其他人显然是指江青，因为他还说“最好让松林、韶华和李敏把你的信转来”。岸青和韶华结婚了，但自从他俩在大连谈恋爱起，江青许多年都没有同岸青说过话。

岸青对江青是个难题。这个年轻人患精神病，毛泽东管不了那么多麻烦事，江青则推不掉。但她处理得很糟。比岸青小15岁的韶华也许正如江青所说，嫁给岸青是为了打进中南海。而江青先是猜疑，后是紧张，最后酿成白热化的战斗。

在家庭纠纷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他母亲文氏家乡的干部。每年照例都有文家子弟来北京探望毛泽东，他听说这些人回去就吹牛，而且说当地的人待他们家好是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亲戚。

毛泽东要求县里干部："不要因为文家是我亲戚就给他们特殊照顾。我的态度是，我爱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工人队伍的一部分，同时也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

江青当然看到这封信了，她往往是第一个看到。但她认为这完全是唱高调。她跟毛泽东不一样，她是艰苦奋斗的破落家庭出身。毛泽东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待亲属，她没有本钱。她认为自己如果不集聚各方势力来抵御要打倒她的人，她就得不到平等，只好垮台。而且，她认为毛泽东如果放弃家庭责任，她必须设法解决问题。

1956年6月，江青和毛泽东在华中的武汉过了几天安稳日子。毛泽东畅游长江，江青坐在江心小艇的甲板上。毛泽东还写了一首词：《游泳》。

这是个亲切的上海的秋天黄昏，宋庆龄官邸灯火辉煌。苏加诺总统进行国事访问后要从上海回雅加达。孙中山的遗孀正在细心准备政治聚餐会，请来许多中国要人，她的许多仆人在老房子里忙着招待这些满是烟味的无产阶级专政领导人。

上海市长柯庆施来了。不一会儿，毛泽东走进来，象是

一位教授走进图书馆。江青在他旁边。宋庆龄同他们简单寒暄几句，就去招呼刘少奇和王光美。宋庆龄喜欢王光美的眼界开阔，但对江青印象也不错，这一晚上聊了好几次。苗条的江青穿着中山装，一直到退场都很少说话。她认真同她的对手谈话，不跟着毛泽东在屋里转，但眼睛盯着他，自始至终尽职。

江青在武汉和上海都不舒服，和毛泽东回北京不久，宫颈癌就恶化了。她不愿手术，但又拒绝植入放射物钴60——中国医生的唯一选择。几周以后，她又回到苏联的医院。

到莫斯科时江青病得厉害，很虚弱，情绪低沉，苏联医生怕她死在那里，不敢放手治疗。转了好几次院，都不愿负责，或者是因为她身体承受不了有效的措施。白血球降到3000，有点感染就很危险。不断输血，用钴治疗时还吸氧气。

江青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吗？苏联医院常是政治惩治和仇杀的场所，当中苏关系恶化时，人们不能排除江青会成为克里姆林宫和北京政治赌博的一张牌。她说曾要求回国，莫斯科和北京都没有同意。

但江青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对国外生活的不习惯是她感到不适的主要原因。1957年1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会谈时，仔细翻阅了江青的病历，认为江青需要的是幽默、好朋友和娱乐。他给她带去许多客人，一起说笑话，还带她出院吃饭（忙得周恩来都忘了把邓颖超的信交给她）。

1957年春天，江青脱离危险，让手下人给北京挂电话要点适口的东西——苏联尽是大块肉。一架飞机给她送去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都是李云霞从中南海选来的。在别墅里，江青眼睛发亮，踱来踱去看

着工作人员在厨房里忙碌。她宣布她的切鲤鱼理论，申斥竟敢不看钟表而蒸菜的小翻译。做好之后，江青大嚼起来，同时还要不停地指出不足之处——这里调料不够，那里煮得太老。

有一天，苏联领导人的夫人请江青赴宴，江青身体不错，欣然接受了。她穿着米色的西式服装，外穿皮大衣，戴一顶皮帽子，让翻译和她同坐一车，医生另坐一车，前去克里姆林宫。铺着白色餐巾的黑色长桌子上摆着俄式餐点。前厅按花色摆着沙发，在这里，四位苏联领导人的难对付的夫人接待江青和她两个随从。在一个大沙发上，赫鲁晓夫夫人坐在江青左边，马林科夫夫人在右边；莫洛托夫夫人、冈卡诺维奇夫人、中国女大夫和其他人都坐在旁边。江青微露笑容，有点坐立不安，找不出话说。每个人都小心地询问江青的健康，瞪大眼睛，发汗的手里绞着手帕。

吃饭时马林科夫夫人对江青说，俄国和中国虽说文化不同，但如果你康复以后到苏联电影科学院学习，一定不虚此行。江青假装吃熏鲟鱼，生硬地说，严格的学生生活她受不了。刀叉叮当响起来。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夫人正想说什么，马林科夫夫人却找到了话题：毛泽东夫人年岁多大了？江青气得差点噎住，停了好一会儿才说："不老也不年轻……"

江青回到别墅，把大衣一脱，在屋子里走起来，脸色阴沉，说叫她去当学生和问她年龄是"瞧不起她"，"西方没有这么干的。"

知道江青愿意听好的，中国医生（俄语很不错）说，饭后夫人们各奔东西的时候曾说江青是"有教养"、"时髦的"中国女性。江青高兴起来。她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吃多少，就坐下玩牌，使心绪平静下来，然后又大嚼了一顿可口

的中餐。

江青第四次去苏联回国后，说她死期将临，精神状态也不比身体好。毛泽东不大关心她。李讷现在18岁了，有时简直对她象外人。而且，作为工作人员，她已经退出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的政治处境也很困难，大跃进走上歧途，其他政策也不成功，多年的老同事都批评他了。但他不跟江青讲。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在40年代还算和睦。当时江青什么都听毛的，心甘情愿做党命令的助手，现在却不行了。江青不满足现有位置。互相疏远是当前解决僵局的唯一可能。

毛泽东心里越来越怀念杨开慧。岸青出院以后，毛泽东派他和韶华去长沙探望杨家的亲戚。1957年夏天，毛泽东四次会见20年代伺候他和杨开慧的女佣陈玉英话旧。毛泽东说："看见你就象又见到了开慧。"说罢泪水流了下来。他还写了一首关于杨开慧的词。

50年代后期，江青有好长时间离开北京，离开丈夫和女儿（上了北京大学），在外地同大群护士、保姆住。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江青一直没有在北京。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同他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发生冲突，而且说出了很伤感的话。毛泽东去他老根据地长沙休养，江青就飞往北京——过去，毛泽东在的时候她就走。她不顾毛泽东生气，把毛的医生找来，要他开医生无权开的药。

江青哪儿都去，就是没去过湖南。她讨厌毛泽东的家乡，尽量不去。她"憎恨"几千万中国人景仰的毛泽东出生地韶山。她始终没有涉足这个村庄，哪怕60年代她有义务对它表示敬意的时候。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兴趣和口味也大相径庭。毛泽东出

门坐火车，江青爱乘飞机。在文学和戏剧上，毛泽东爱好古典，江青喜爱现代的。毛泽东夜间工作，起得很晚；江青起得比较早。毛泽东狼吞虎咽，不挑食；江青要新奇的，要时鲜，而且要等毛泽东放下筷子才进餐。毛泽东不准家里有花草、装饰品和小动物；江青特别喜欢兰花，还养猴子。毛泽东有什么穿什么；江青每个星期都要花几小时在藏衣室，她有的颜色喜欢（比如咖啡色），有的很讨厌（比如黄色），有时一天要换三套。

毛泽东不爱看病，也不听医生讲，而医务人员是江青生活中的常客，她的病和她的敌人一样多。毛泽东对她这一类人曾猛加抨击："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多高血压和肝炎。一个人不锻炼，光吃好的，穿好的，住得舒服，出门就坐车，他的病少不了。"

有一天早上，毛泽东刚熬夜写完东西，江青在李立三家陪他苏联妻子说话——她俩是好朋友。毛泽东捎信来说，要同她一起吃饭。江青当时正在玩扑克，没有马上走。等她回中南海时毛泽东已经吃完上床了，对她不满。她反过来抱怨他，因为她只好一人吃，她还不如在李立三家再玩一盘扑克呢。

1958年盛夏，毛泽东在河南农村，江青陪着。江青很少一起去的，但由于毛泽东带上两个女儿和毛远新，她就跟去了。下午和农民代表长谈之后，毛泽东突然让他们进宾馆餐厅。毛泽东介绍说："她们是我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介绍过毛远新，毛泽东转向江青，笑了，对河南农民说："她就是我的爱人。"

当地人只吃米饭，很少有鱼有肉。毛泽东和江青直往客人碗里夹鱼夹肉，农民感动得什么也吃不下。上苹果的时候

也是这样。客人呆住了。毛泽东、江青和孩子们自己吃。吃完饭，他们全家五口人送出农民代表，江青很客气地说“再见”。

半夜来了消息，46岁的俞启威死于心脏病。江青没有参加葬礼。毛泽东送了一个花圈，只署了自己的名字。后来，江青看报上的讣告，说俞（这时叫黄敬）是“杰出的革命战士”，没有提到她。从延安以后，江青很少看见他。她回想他在青岛怎样教她、在上海怎样帮她了吗？也许她脑子里想的全是俞的继室——记者范瑾，恐怕俞启威对范瑾讲过她什么吧？

江青极度消沉时总上广州。她在政府宾馆里同大兰花和小猴子在一起。她有病，处境困难。她周围伺候的人不少，但她是自我中心，不能平等待人，也不关心人。

她的嗓子哑了，出声很小。她不准屋里人说话声音比她大。她不停地变换主意，早晨想飞往济南，饭后转向北戴河，晚上又骂工作人员不知道她其实想留在广州。她叫医生来急诊，医生来到时她又不看了。

出于厌烦和任性，她把猴子骗出来扑向一个老服务员，吓他取乐。她要工作人员白天黑夜陪她玩桥牌和扑克。她精神好的时候，教导每一个人怎样玩牌。大家都希望她瞌睡过去，大家好轻松轻松。但她突然又叫起来：“我没睡着！”大家正在高兴盼望她上床呢。

她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她30年代在上海剧院的事。她强调说，当时她就“真正是红的”。她很怀念她当时能够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每天都精神焕发地建立她自己的女人的生活。

1958年和1959年，赫鲁晓夫又两次到北京，要求见江青，江青都因为生病或认为生病而没有见。别的外国人也没

见过。与此同时，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陈毅的夫人张茜，却作为大人物的妻子活跃于接待、晤谈和出国外交旅行当中。

毛泽东主持的一个上海会议即将举行，据安排，江青应当同去，然后一起去杭州别墅。江青从广州到上海时，等着她的竟是个惊人消息：毛泽东同前妻贺子珍会面了。江青气得发昏。毛泽东坚持辩解说，贺子珍是“老战友”（但江青不是）。

锦江饭店为党的领导人举行舞会，江青和一个护士晚9点到场。她选了一个远离领导人的角落坐下，面色很难看，不知是病的还是气的。毛泽东10点半到，但他没找她。

毛泽东不同意去杭州。第二天，江青一人去了西湖边上僻静的别墅，那是他俩秋天休养的地方。那是湖边一座塔式建筑，红瓦顶，绿树掩映。那里非常寂静，只能偶尔听到大雁远鸣和浪花拍岸的轻微声响。

江青决定重新装修一下，立下了很多规则和要求：双层门窗玻璃挡尘土；卫生间、电话间都要一色苹果绿；设备要没有响声；起居室里要有电影银幕；必须用老式丝绸。她和毛泽东的房间之间有会客室相连，还有餐厅、洗脸间等。装好之后，她挺满意，在那里住了好长时间。

很熟悉中国的美国人珀尔·巴克（赛珍珠）对我说过：“我在中国住久了，婚姻在我生活中只是附带的事，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江青也是这样的。在山东，她象扔破鞋一样扔掉丈夫。在上海，她以利用男人著称。在延安的“爱情时代”，她结婚有比爱情更复杂的原因。毫不奇怪，她在50年代看轻了浪漫主义。还有许多人也是这样的。

“两性关系只是头几个回合起作用，能长期保持利益的

是权力。”江青说道。50年代末，她这两项都不具备。毛泽东已经不再拿她当伴侣。她完全有条件成为毛泽东的妻子，但她不愿意。表面光鲜的死气沉沉的生活不是她这种只相信自己的女人所追求的归宿。

她似乎已经不行了。60年代的崛起只能说明她自己相信自己，别人是不相信的。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毛泽东政治上越来越困难，需要对他沉默的妻子的被压制的天才另眼相看（就象罗斯福得了小儿麻痹以后只有找埃莉诺帮忙一样）。

第 六 章

康复与报复：以政治为舞台

（60年代）

我是医生，不是护士。

——江青

把他们揪出来，让他们挂起来。

——江青（关于她在文化革命中的活动）

周恩来在绝望之中又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1957年的一个冬日，他离开了江在莫斯科医院的病房，在同赫鲁晓夫进行一轮会谈之后，和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一起来到了江的病房。当时，程砚秋作为文化代表团成员正在苏联进行访问。如果说医生对江青的病已经无能为力，那么作为中国的总理，他在冷静下来时则是无所不能的。曾在天津业余剧社扮演过女角色的周恩来，把文艺带进了江的病房，以使她的注意力能从病痛上转移。当江青穿着绿色睡衣躺在病床上时，聪明的程边唱边舞，模仿着丑角的表演，周则讲着笑话。这样一直到深夜。江精神焕发起来了。

两年之后，真是鬼使神差一般，江青在上海的医生们“为了让她的注意力从自身的病痛上转移，突然建议她去看

看演出”。她照办了。除了针灸疗法，她每天还打太极拳、台球，游泳150米，打20分钟的乒乓球。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促使她恢复健康。江青开始对舞蹈、戏曲和电影进行干预。

江青康复的另一个契机是那位60多岁的男人对其40多岁的妻子在感情上发生的变化。他近来认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江青把一帧珍贵的照片放在床头，步入了60年代。那张照片正是她自己拍摄的江西庐山仙人洞。照片的背后，有一首毛泽东手书的充满激情的诗。1959年，她是不受欢迎地登上了庐山，而拍下了仙人洞的照片。当时毛泽东在庐山正同国防部长彭德怀就毛的不成功的大跃进问题进行论战。1961年，江与毛的关系再次缓和。一天夜晚，毛提笔写了一首基本上没有提到庐山的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将这首七绝亲自题写在江青拍摄的那张照片背后，下题“赠李进”。这是江曾用过的笔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江的这张照片拍的并非庐山仙人洞，而是有御碑亭的锦绣峰。

60年代初，江青奇迹般康复的第三个原因，是她自己决心要从病痛和令人沮丧的情势中挣脱出来。的确，她的这一决心不能说与她想在中国文化界出名的野心无关，也不能说与毛的鼓励无关。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在其40多岁且患子宫癌、肝病以及其他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决意开始新的生活，不能不说需要巨大的胆量和决心。

“我是医生，不是护士。”江青对一个戏剧组的人说。当时，她正在对他们大肆兜售治疗艺术病的良药。这就是那个在山东上学时曾坚信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能办到的江青；那个为唐纳设计蓝图，使他完善自己以确信无愧于曾是她的情人的江青；那个撰写《我们的生活》一文，声明女演员不是玩偶而是与导演、编剧完全平等的人的江青；那个在延安决计要与毛平起平坐，认为自己能得到毛的江青（或如丁玲所说“把他骗到手”）。

没有那种精神，没有那种毫无羞耻的自信，没有那种坚韧的、对自己决不怜悯的性格，江青是决不会在经历了50年代的消沉失望之后东山再起的。

1962年9月，北京秋高气爽，气候宜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来到了北京。她的这次来访是中国试图密切同印尼的关系的一个步骤，以便把印尼作为毛式革命的年轻伙伴。中国共产党热情招待了这位总统夫人。从宴会、茶会，到各地的参观访问，一切安排都在官方新闻中进行报道。在当时同毛地位实际上旗鼓相当的刘少奇，自然就成了新闻报道的中心人物。然而他的妻子、那位颇有魅力的王光美，因为地位也比较突出，一时引起议论纷纷。通常，《人民日报》上的每一段话，每一幅照片，都涉及政策问题，新闻则是次要的。9月24日，刘少奇、王光美同漂亮的苏加诺夫人谈话的照片登了出来。第二天，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的照片单独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上，此后，这两位夫人经常在一起合影。

对江青来说，这一切实在难以容忍。中国有句话，把敌人叫仇家。在中国的政治中，两个旗鼓相当的家庭间的仇恨

更能掀起狂澜。江对王光美产生了妒忌——王处在重要地位，她却没有。为了同毛对刘少奇的不尊重相一致，江青想借助毛泽东的力量把王光美压下去。五天之后，毛、江、苏加诺夫人的大幅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而在第二版相当次要的地方，却安排了一张刘、王、苏加诺夫人的小幅照片。

如果说，苏加诺夫人弄不明白她何以成了中国报刊史上照片最多的一名外国妇女，那么，对外国妇女不甚注意而对中国上层妇女间的竞争极感兴趣的《人民日报》的读者，就会马上知道，他们手中拿到一份意义非同寻常的报纸。江青的照片过去从来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七年前，甚至连她的名字都难得在中国报刊上一现。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江、毛合影的照片从未正式发行过。

毛泽东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举动作出了强烈反应，那就是把江青推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地位。

在西方，如同在毛泽东的中国所发生的那样，一位领导人的配偶是很难成为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主要因素的。因为西方国家首脑是选举产生的，而他的不参加选举的妻子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无足轻重，决不会影响领导者的所作所为。或许只有在一位美国总统罹难、患病之际，他的婚姻安排带来的种种后果才会在政权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中国，无论领导人的身体状况如何，总是很容易产生的。如果卡特总统病得很严重，但还没有宣布离任，可以想象，罗莎琳·卡特会掌握主要权力。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半身瘫痪而遭受折磨时，他的婚姻情况出现的某种微妙的变化，也会使得那位受丈夫支配、默默无闻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跃居前台，即使不直接掌握大权，也会在

大部分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施加重要影响。

对江青来说，也如同埃莉诺·罗斯福一样，丈夫的挫折为妻子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当毛突然觉得需要他那位精明能干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妻子的时候，江青多年来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结束了——对毛来说，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不是身体需要方面的原因。在江青的面前，道路已经打通。她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充分利用良机。

由于江是毛泽东政治上的妻子，而政治上遇到麻烦的毛现在又需要她。所以，江青顺理成章，成了政治人物。她愿意做英雄，喜欢崇拜，也愿意被人崇拜。很快，她发现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局面。

这不是说任何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妻子都会象江在60年代那样行事。她是一个具有特殊本事的女人，被她自己的特殊的魔鬼附身。她既文静又刚愎自用；既粗野又精明。一位丈夫或一位来访者向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提出一种想法，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江青对类似这样的问题则一定会有明确的答案的，她或是接受这个想法，或是表示反对。她也会把自己的想法摆在桌面上，她总是会知道怎么办。当一位访问者走出邓颖超房间时，很可能会喃喃自语："她是一位不错的女人。"这样的评语通常却很难给予江青。但是她又确实象是一位"有些名堂"的女人。她能争能斗，也能使自己永远出名。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不得不在60年代初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其他主张整顿政治和经济效益的人分权而治。他在书中曾抱怨："他们把我当成祖宗供着。"

60年代初存在着政治权力均衡，毛泽东利用江青和一些新的组成"小朝廷"的人，发展了一系列左的思想——断言

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要求对文艺进行改革，使文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发挥作用；反对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会影响共产党的领导。他以此来向日益上升的刘邓权力机构进行挑战。“小朝廷”的成员在国家权力机构这条船上并不掌舵领航，但他们却可以躲在船舱下积极活动，尤其是舞文弄墨。

毛泽东的左的观点，使刘少奇、邓小平感到困惑不解；但只要这些观点作为看法而存在，这两个务实主义者是能够忍受的。江青对这些观点感到兴奋。这些观点中有反对迷信、反对墨守成规的内容，而对她来说，反对墨守成规，正是她搞掉周扬及其他文艺界领导人、爬上文化界高位的锐利武器。真可谓琼浆玉液，沁人心脾。

十年文革开始时，70余岁的毛泽东受到帕金森症的困扰。他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客人说，“医生也不能保证我能活几年。”有一次，他对军队干部说：“每个人都必须准备好接班人。”他提出了在脑海萦绕已久的问题。当意识到自己也会死的时候，他更加容易接受某些传统观点的影响。

50年来，毛信奉英雄意志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并以此作为生活准则。现在，他严阵以待，看到自己的妻子能在下一次运动中发挥作用，而过去他妻子身上所表现出的强烈欲望曾使他非常恼火。

毛泽东知道江青的能量有限。她擅长煽风点火，却不会扑灭火灾；她能从掩体里面向外射击，却不懂如何在战场上调动千军万马。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文化革命”将主要是煽风点火和开枪射击。

在未来的推翻刘、邓，整顿、清洗共产党队伍的战斗中，军队是重要的同盟军。对这一点，毛泽东和江青的想法是一致的。那个一年四季用帽子遮住秃头、尖着嗓门说话、

身体羸弱的国防部长林彪，为达到个人目的，决定完全“忠于毛泽东”。他吸取了前任国防部长彭德怀说话直率的教训。毛开始把林彪而不是刘少奇看做他真正的第二号人物和接班人。林彪命令全军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作为回报，毛号召“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

1961年的一个夏日，江青视察了广东某部队，这个部队过去曾为毛、林屡建战功。江青发现第一警卫连自己种菜省钱，士兵们的床铺干净整洁，蚊帐吊挂有序。尽管离营房两百来米外就有一家备有电吹风的理发馆，战士们还是相互帮着剃头。

江青在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报告中总结说：这些战士“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他们是“人民真正的儿子”。不管怎么说，战士们的勤俭节约，不是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而更多地是由于他们本身的需要——这与江青的奢华无度形成天壤之别。对此，江青似乎根本不在乎，她关心的是通过掌握政权来进行自我表现。吹捧毛和他的副手林彪，则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江青使出浑身解数，不放过任何一个良机。她支持毛，有时还奉承他。当她的身体状况好转时，她还从文件和报刊杂志上筛选出一些文章，编好目录呈送毛。标出一件事或一个观点中赞成或反对毛的地方。她希望周围的局势能激起毛的愤怒，她希望这种愤怒不仅表现思想体系方面的分歧，而且更能变成个人之间的恩怨。

“我喜欢打炮弹。”江青曾这样说，脸上显然带着微笑。“倘若一朝屠刀在握！”她喜欢借用京剧中的台词喊着说。正是这种好斗的性格，体现在她的第二条策略中。她力图把局势推向极端，这种策略基本上得到毛的支持——这种思想倾向体现在他的著名的《矛盾论》中。象剧场中的引座员

那样，江青迫不及待地把人分成左派和右派。她把闹派性的年轻人看做是产生极端的突击力量。

江青的活动舞台是为了争吵或为了战斗而建立起来的。江青的第三条策略就是把自己包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里面，断言在中国有一半的政治家和文化界人士是黑线人物，因为他们是反毛的。她要以毛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爱国主义、争取妇女权利或其他任何借口，打倒他们。她需要一帮年轻的、有野心的而且会谄媚巴结的知识分子的帮助，来完成这项任务。

当她越来越多地公开露面时，她经常在考虑，究竟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最合适。

象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那样的中年人，可以穿建国前那种做工考究的丝质旗袍。可是江青不顾别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脱离时代的人。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穿鞋子、戴军帽，也不合江青的口胃。她要求独立，但又要避免看上去象个男人。她的确决心闯入属于男人的政治天地，但这需要不妨碍她保持女人的气质。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是一位革命的模范女性，她身着列宁装，很不起眼。而江青则不愿被人群湮没——她想为世人瞩目。曾在美国居住过的女艺术家们爱穿戴饰有花边的衣帽，江青也觉不妥，她不想过分女性化；玩偶形象与她想掌权的“雄才大志”很不相称。

她认为最好的打扮，还是穿上庄重严肃的套服，脖领部位稍稍露出内衣的色彩，并且尽量把自己的头发收拾得漂亮些。

中国的京剧进行传统的道德说教，认为英雄完美高大，坏蛋丑陋矮小，成了意识形态专政的重要工具。江青把毛式京剧作为她爬上高位的梯子。象包括一百年前的慈禧太后在

内的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统治阶级人物一样，她要以艺术保护人的身份出现，借以表现自己的权威。京剧改革成为她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工具。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温斯顿·丘吉尔推上首相之位；而需要加强国防又使罗纳德·里根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一样。

江青着手戏剧改革是在1962年。当时，毛泽东号召开展阶级斗争(这对江青来说，就是指两极分化，然后斗争)，他断言：推翻政权或巩固政权的关键是造舆论。毛的这番话使江青更加无所顾忌地改动剧本和唱腔，使它们“更闪光”。驱使戏曲界人士象小学生一样围着她转，是完全符合江青盛气凌人的性格特点的。她的确认为应该改造表演艺术，使之适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

江青从心眼里喜欢“要么使它革命，要么禁止它”的口号，同时，这个口号从政治上帮助了毛泽东。中国人总爱这么想，听天由命和随遇而安已成为人们遵循的规范、准则。江青和毛泽东都坚持认为，中国传统的戏曲内容应成为过去，自从20年代以来，传统戏曲曾经历过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而其他时候，都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对新中国的人民毫无益处——至少对现政权没有政治价值可言。

在1962年和1963年这段时间里，江青大都是在上海临场观看或翻看剧本，接触了1000多出戏。她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建立了密切关系。柯是出身工人家庭的左翼，对艺术并无特别的鉴赏力，但他敬畏毛泽东，同时也是当年支持毛、江联姻的寥寥无几的领导人之一①。他特别忠于江青。

① 柯庆施告诉上海的干部，每人应有三本毛泽东的书。一本放床头，一本放办公室，还有一本放在口袋里—— 柯在文革之前提出了这些要求。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江青一起赶到杭州，参加在湖边别墅举行的舞会。——原注

在上海，公演了一出以毛泽东1957年为纪念前妻杨开慧写的词（“我失骄杨……”）为基础编写的短戏。令这一海港城市戏曲观众大惑不解的是，这出戏没演几场就被停演了。这是江青授意柯庆施下令禁演的。江说，赞美杨开慧是对她本人无法容忍的侮辱。

江青在上海住在前法国俱乐部，市长要竭尽全力地保证“我们的女贵宾”感到舒适惬意。江青在这个远离北京中央机关、充满左倾气氛的基地如鱼得水。上海当时那种奇特的左倾主义，是上海与北京进行竞争的副产品，一部分原因也是上海在共产党领导时期为抵消自己曾经是帝国主义统治保垒（“罪恶之地”、“东方巴黎”）的影响所做的努力。

江青在60年代初期就同上海两个左翼理论家组成了“一女二男”帮。他们几个在后来的10年中曾左右中国政治。张春桥也是山东人，30年代曾一度是《大晚报》编辑崔万秋的副手。江青第一次见到张春桥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张春桥是一位很能干的人，那时已是上海市委书记。姚文元比较年轻，名气也小一些。30年代，江青曾经见过他那位商人兼作家的父亲。姚是一位笔头流畅的作家，很快就象仆从对女皇一样对江顶礼膜拜了。张、姚对江青的忠诚是因为她的魅力，她在文艺方面的左倾观点，以及她能接近毛泽东。

江青在自己崛起的时候，利用参加到她的同盟中的姚和其他一些年轻作家，这在中国王朝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利用人们对麦卡锡式的政治迫害的恐惧心理。事情的过程正是这样：某位通常是无足轻重的记者或学者，写了一篇不唯书、不唯史的文章，而这篇文章的读者们知道，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无风不起浪，据此来看，这位作者不是孤立的，而是某个极重要的大人物雇用的笔杆子。但是，是

谁呢？她或他的目的是什么？人们的恐惧心理增长了，于是开始研究作者的“背景”，最终，整个事态逐渐演变成政治上的勾心斗角。这也是预期要达到的目的。江青可谓精于此道。作为毛泽东妻子，不但有助于她招兵买马，而且更能使她拉大旗作虎皮去威吓对手。

1963年5月的一天，上海《文汇报》的读者发现有一篇文章，严厉批评田汉的一部戏，这出戏在此前一直受到欢迎和高度赞扬。这篇文章是江青搞的，是她向那些30年代在上海瞧不起她的人进攻的第一枪。这篇批判文章的作者是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是江青和柯庆施指定的人。当时的市委书记兼《文汇报》主编张春桥下令发表了这篇言词过激的文章。

在北京，江青不请自来，跑到北京京剧一团施加高压政策。她对演员们说，他们正在荒废年华，为什么不为将来服务，而要在历史废墟上找戏呢？她指示他们排演她一直参与的新戏《芦荡火种》（后改为《沙家浜》），这出戏讲抗战时新四军的丰功伟绩。

剧团乱了套。一方面，毛的妻子要他们诅咒自己极喜爱的东西，投身到不知效果如何的实验性戏曲上；另一方面，北京市长彭真，要剧团继续排演传统剧目，他认为江青根本无权插手并干预北京市上演的戏曲。彭真如果听到江青需要场子排练，就设法使这个场子总是排得满满的；他要是知道江青打算自吹自擂，就指示城市的新闻媒介不予报道。

彭市长没把江青当一回事，他把她改造京剧的所作所为看成是一个无聊夫人的嗜好。当《沙家浜》上演时，彭真说：“象一杯白开水。”

“你只有喝了白开水，才能喝茶、喝酒，谁离了白开水也没法活。”江青反唇相讥。这表明，她现在已无意把戏剧

看成娱乐形式。

但是，江青知道她正在进行的是政治活动，而不是艺术活动。她带着几箱书来到剧团排练场，每个演员手中都分到一本作者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江青象一个帮头给自己的手下发枪一样把书发了下去。“你们别以为我只是来推销新戏，我是来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战斗的！”她尖着嗓门喊道，对彭市长讲话也象同演员们讲话一样尖刻。

毛泽东突然赞扬了《沙家浜》。这出戏艺术上象白水，政治上却是一杯醇酒。市长错就错在认为戏曲不过是戏曲。他似乎忘了，不管江青干什么和说什么，她还是毛泽东的妻子。而周恩来对此总是铭记在心。

江青曾在上海说彭真是“大北京主义”，这句话在上海很受欢迎。她决定对另一出戏《智取威虎山》进行改编。这个戏讲的是1946年共产党的军队在东北与土匪战斗的故事。江青看了脚本之后，大步走到后台，对演员说，这出戏“大部分地方一团糟”。在这块比彭市长的北京稍微友好一些的地方，江青着手加深《威虎山》的寓意，以便将其据为己有。

江青在她的寓所一边吃饭一边听排练录音，然后带着新灵感跑到剧场。她认为要突出剧本中“恨”的寓意，要喊出来，就象投向敌人的手榴弹。她告诫演员，戏曲多用降调不够完美，即便1000年来习惯如此也不行。“决定战斗”最好用升调来表达，她示范如何念“春天”——尖声叫道——以表达“政治内涵”（表示正义的力量取得了胜利）。

“别忘了”，她教戏中女主角如何表现阶级仇恨的时候，告诉她“更重要的不是外在的美，而是意志和力量”。

她叫男主角不要口吐不雅之词，让他身披翻毛大衣，从

而把英雄造就得更加英武不凡。她把土匪装扮得衣衫褴褛，并要求他们决不能出现在舞台中央！她告诉这个戏的主要演员童祥苓，英雄不应该“走路摇摇晃晃”，“说话咕咕哝哝”。她爬上舞台，拍拍这位英俊的演员的膀子，教导他“不要走老路子，应该站着威武高大，唱起来雄壮有力”！英雄怎样下马呢？江青对童说：“不要只轻轻从马背上滑下来，那样看着没有力量。”这位从不能容忍她的角色显得软弱无力的女人补充道：“从马头上跃过去。”她下起命令。

剧本没修改前，童把手枪挎在皮带上，放在前面。“把枪挎到旁边。”江青关切地对童说。童不解其意。江青觉得如果他“长时间把手枪挎在前边”，他的生殖器可能会受伤害。

江青没有导演所谓“她的剧本”，只是凌驾其上。象学校校长参观低年级老师授课，她视察、指责或是完全予以否定。她这么做不承担任何工作义务。从事影剧的经历使她深知如何确立威信。她总是扭动着腰向懒散的女演员示范高雅的艺术女神应该怎样走动才对，要不就是向男演员解释工人阶级不应该抱头痛哭，而应该站起来，蔑视一切。

有些艺术家认为她发疯了，另一些人被戏剧成为政治力量的富有刺激的气氛以及她戏剧性变化的个性征服了。她带着刚从毛身边而来的气息，他们很自豪地说：“我们成了她的工具。”

在开始对她最喜欢的一出戏《红灯记》进行改革时，江青就对演员定下了座右铭：“演戏就是战斗。”可是北京戏曲学院的人对她的要求消极对抗。她要求把剧本中英雄偶尔喝醉酒的场面去掉；她认为工人阶级要穿上活泼艳丽的衣服，“在现实基础上加以改造”；男演员的一举一动应体现

出军人的姿态，一丝不苟，健康有力（“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周恩来经常打电话询问改革的进展情况。江青对他的“鼓励”感到非常激动，不过这位颇有心计的总理的目的似乎是为了了解这个自封为“玛丽恩女王”的女人与戏院专家之间的关系是否能维持下去。关系维持下去了，江青胜利了。《红灯记》突然出笼了，令戏迷们大为生厌。

江青说：“我看过西方戏剧，在这些戏里演员什么都唱，象什么‘你想喝茶吗？’‘是的，我想喝点，这茶非常好。’”她的脑子里现在完全不能接受艺术无国界的观念。“我们中国的戏剧只应集中表现积极的情感，重要的情感……”

1964年夏，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沉闷的政治气氛下拉开帷幕。江青应邀到会讲话。她的一些改革作品在这一期间上演。但出席这次观摩大会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化部的重要官员和戏剧专家，他们反对她的活动。

江青的这次讲话是她一生中第一次重要的对公众讲话。她在讲话中赞扬了上海市长柯。赞扬他在上海戏剧界支持“领导、作家、群众三结合”，还了柯庆施的人情债。这个主题她曾在《我们的生活》一文中表述过，即：可以怀疑导演；要允许演员和观众提出见解，修正导演的职业偏见。这回可以说是老调重弹。

“你们要吃饭吗？”她对戏曲界人士大喊大叫，“粮食是农民种的！那么你们的戏曲就要为农民服务！”

有一天下午演出休息时，江青来到了一群不同寻常的人中间，这里有她的故旧，也有她的新敌，他们正在休息室内悄悄地谈着话。其中有《赛金花》的作者夏衍，江青曾很愿意

在其中扮演角色，有一度非正式向她求过婚的张庚，有早年在上海对她不够重视的田汉以及曾喃喃自语说“江青在场，事就难办”的周扬。

她面带微笑加入了谈话。文艺界这四个人不得不提防着江，不过他们也感到没有必要去考虑她会怎么想。他们对她打招呼，然后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去。江青还想对别人施加影响。她冲着他们大喊一声：“为革命而改革！”戏剧界的这些著名人士全都哑口无言地站住了。

尽管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讲话都发表了，但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没有发表。毛泽东给了她最有力的支持，他刚刚宣布由周扬、夏衍等人领导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她决定试试这个支持究竟灵不灵，有一天，她悄悄离开观摩大会，来到首都医院，在那里有位年轻的男演员动完手术正卧床休息。这位英俊潇洒的男演员将在这次观摩会上演出的《奇袭白虎团》中担任主角。她仔细安排记者到场记下她说的话。她来到那演员住的病室，同医护人员打过招呼，认真地询问了有关这个演员病后恢复的方案。她握住他的手说：“毛主席希望你继续成为京剧改革真正的勇士，又红又专，为革命文艺服务。”

江青的对手也没有沉默。刘少奇在谈到江青的新戏时说她是“瓜没熟就摘了下来”。彭真市长则厉声批评这些戏是“穿着露裆的裤子上台”（指中国小孩子的开裆裤）。

当一些报纸正式把八个新戏称为“革命样板戏”的时候（其中有五个是江青在上海培植起来的），彭真说：“这些戏到底是什么样板？我在这儿主管文艺，我不知道什么样板，谁也不知道她的戏是不是样板。”脾气急躁的邓小平说：“你只能看到一群乱哄哄的人在台上窜来跑去，没有一点艺术可

害。”

1965年的一天晚上，江青出席一个宴会，彭真也在场。江青走到市长桌旁，问他是否可与她私下谈谈。他同意和她到旁边的屋子去。她要求彭给她在北京拨一个剧团作为她的工作基地。江青拿出一本新戏谱给彭看，为使理由更加充分，她还提到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曾在她抓《白毛女》和其他戏时给予了帮助。不提张春桥犹可，一提他比提江青的艺术计划还要使彭生气。彭拒绝了江青的要求，生气地从她手里夺过戏谱，气冲冲地回到宴会厅。

“她要这要那。”彭对一位朋友抱怨说，“她难道不知道北京市长除了帮助她玩还有其他事要做吗？”

如果是在一个比较清平和谐的年代，刘少奇评论江青的革命样板戏的话是没有错的。在说到反对通过样板戏强行向人们灌输政治观点的理由时，刘少奇说：“现在人们有能力自己判断事物。”然而那时却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代。

江青从京剧又转向舞剧。她观看了反映热带海南岛上一支娘子军活动情况的《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这两个舞剧是中国式的舞蹈与西方式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江青不喜欢当时的芭蕾舞，比如《天鹅湖》，她说那里尽是鸟和野兽，芭蕾舞应充满人类的精神。她让演员同部队生活在一起，这样他们在动作和面部表情上能更好地体现出战争气氛和斗争精神。从《红色娘子军》原脚本中删掉了性爱和生孩子的情节后，江青为这一舞剧的主题加上了一个近乎崇拜的结尾——颂扬毛泽东。

《红色娘子军》引来邓小平一番牢骚话：“工作了一星期，人们想到戏院来轻松轻松。相反，你走进戏院，看着这玩意，还是发现自己在战场上。”刘少奇说它是“勉勉强强

反映出那一时代生活”。至于周扬，则在《红色娘子军》排练过程中命令参加排戏的演员到香港去演《天鹅湖》。

可是毛出来说话了——“大方向是正确的，改革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这个芭蕾舞很快跻身于样板戏的神圣殿堂。《白毛女》在江青掏空了其中爱的成分加上阶级仇恨之后也成了样板戏。

1965年冬，一日，江青突然往访中央交响乐团，并宣布说：“资本主义的交响乐没有生命力。”音乐家们客气地提出异议，说她对音乐知之不多。江青则反驳说，她会给这些音乐家带来更大的革命激情。“你在用小锤敲我啊。”交响乐团的指挥抗议说。一想到自己是令人畏惧的主攻手，江青再也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了。她后来借用这位指挥的话说：“只要锤子在手，我就要去敲掉所有的旧框框。”

她抓住保留剧目中的所谓“不健康成分”大做文章。她派一名钢琴家沿着当年毛指挥的一场军事战役的路重走一遍，以使他能更生动地演奏出《黄河协奏曲》。她完全凭着个人意志，不去仔细体会作品的主题思想，便匆匆忙忙从京剧《沙家浜》中摘出片断拼凑成一个样板交响乐。一位惊讶不已的小提琴手情不自禁地说：“我简直不能把《沙家浜》看成交响乐。”周扬代表交响乐队表示反对说：“我们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插不进这个东西了。”

江青力排众议，一心想到的就是《沙家浜》是她的。这好比李讷是她的孩子一样。当她不时用华丽的乐章和音符为《沙家浜》增色的时候，便如同为小李讷穿上一件色彩鲜艳的外套，希望按自己的形象来打扮这个小姑娘。后来，她的两部音乐样板《黄河协奏曲》和《交响音乐沙家浜》问世了。音乐将要为“革命”服务，为江青的政治生涯服务。

江青相信自己的意志，但不相信人民大众的意志。她厚着脸皮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该成为戏剧改革的“加工厂”（就好比让白宫根据下届总统选举的需要而为百老汇安排节目一样）。她说她不能为反面角色叫好。在戏剧政治化的运动中，反面人物是毛泽东思想的敌人，而在她个人控制的戏剧领域，也是她江青的敌人。她只能为英雄人物欢呼、喝彩。这个英雄须是性情开朗，衣着大方漂亮，长相也无与伦比，随时准备拜倒在江阿姨的裙下。这种观点与小学生对光明与黑暗、忠诚与背弃、欢乐与悲伤的看法一样幼稚可笑。

到江青完成她的改革之时，中国戏剧观众的脑子变成了一团浆糊。江青对此并不在乎，因为毛是欢迎戏曲改革的。电台广播节目变得枯燥乏味，以至于你很难用原价的四分之一把一台比较好的收音机再卖出去。江青在新闻界的御用文人则对新京剧、芭蕾舞以及交响乐有不同的评论：“它们是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一串闪亮珍珠，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

60年代中期，江青得到了毛的支持。他公开赞扬了江青搞的剧目。中国各主要报纸均发表社论，大肆宣扬。

她开始出席重要会议。她甚至可以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她坐在角落里作记录。就象吉米·卡特在白宫时的罗莎琳·卡特一样——她虽然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能量和这种能量的来源却是众所周知的。江青成了中国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名议员，代表着她的家乡山东。她成为代表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靠某些摇旗呐喊、阿谀奉承之辈的努力，他们认为现在是给江青亮相的机会了。人们再次看到毛、

江在公开场合一起露面，包括国庆节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1949年以来，江青只参加过一两次国庆庆典。

江青赞同毛泽东的思想，模仿并采纳毛泽东的表达方式。她曾劝一位学兽医的学生要“学会当一名给人看病的医生”，这也是毛泽东很爱引用的孙逸仙的一句话。孙曾研究过医学。她在看到一份关于四川发生武斗的报告时，用毛泽东的意思解释说：“有一点武斗没什么关系，至少也是实践嘛！”

毛在一首词中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江青说：“不必等一个人死了之后才去把他描绘成一个英雄。事实上，活着的英雄比死了的英雄要多得多。”江青是一个绝对以我为核心的人，她崇拜毛泽东的智慧也许只是下意识的。当谈到早年经历时，江青有意把自己经历编造得跟毛相似。比如，说她曾从上海的一位朋友那里借了件大衣（毛泽东曾借过大衣）；她曾在一个图书馆工作过（毛也曾在图书馆工作过），等等。

江青的书法，也从30年代那没有特点的女性字体变成了60年代粗犷的男性字体，这也体现出毛泽东的影响。毛去世时，江青宁愿说自己是毛的“学生”（而不是妻子或同志），这也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关系。

毛和江互相的期望又趋于一致，如同在延安时一样，但这次比较平等，因为毛需要江，而江则不必总是服从于毛。

40年代，毛与江的婚配完全是生活上的需要。解放以后，他们之间的生活关系基本上淡化了。50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他们分居。对江青来说，是她在感情上受到毛的冷遇的时期。到了60年代，他们的夫妻关系又有所缓和，或许并不是生活的需要，而是在他们的孩子们都独立生活之后，一

对感到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的成熟夫妇的合作关系的需要。江青让毛泽东了解在文艺界普遍流行的不忠于毛的情绪，毛的做法则便于江向文化现状发起攻击。

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夫妻生活变得轻松愉快了。江青强有力的意志引起毛的注意，但毛本人的更加顽强的意志也使毛决不会总是同意她的意见。林彪几乎每次都和江青意见一致，至少给她的印象是如此。当江向林提出一个意见的时候，林总是说这个意见非常好。而江向毛提出时，毛会经常同她争辩，并且嘲笑她，使她十分泄气。

1965年秋，毛泽东和江青离开北京，在上海和杭州住了很久。这次旅行表明江青对毛泽东的影响正渐渐增强。这些年，她总是长途旅行到一些省份，而毛泽东几乎总是呆在北京。毛泽东不太关心的上海从1962年起就成了江青进行戏剧改革的重要战场。按江青的意愿装修的杭州别墅成了江青的特别基地。这个别墅毛已多年不曾住过了。

在上海，他们住在前法国俱乐部的一套公寓里，江青有一间电影放映室，毛有一个游泳池。江青是文化领域的主要参预者，但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她既无任何知识，也没有实力。毛准备在这两个领域部署使用他的两股力量：林彪政治化的军事力量和“左倾小朝廷”。那年秋天毛泽东和江青在上海时，林彪曾随行了一段时间。“左倾小朝廷”在上海有一些同盟分子（尽管柯庆施已死）。

在文化界，为将要到来的风暴制定的计划，很象是江青发动的推翻当权者运动的继续。在她的领导下，她要扫除文化界陈旧的主导思想和方式，代之以新型的、政治化的、童子军式的新文化。江青执笔改写的一篇戏剧批判文章，刊登在11月10日的《文汇报》上，开始向混乱和意识形态进行自我

批判迈出了明显的一步。这种具有毁灭性的行动，任何一个大国的政府都不曾采取过。

《海瑞罢官》是1961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出戏，讲的是明朝一位正直的宰相直谏皇帝致使龙颜大怒而被罢官。两个月之前，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说这出戏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江青的门徒姚文元写的一篇评论文章登在《文汇报》上，反映了这一观点。北京的报纸没有刊载姚的文章，首都的文化界人士仍坚持认为吴晗的戏是好戏。

后来人们才渐渐得知，毛泽东和江青之所以把这出戏的讨论提到政治高度——而不仅仅是艺术上的争论，是因为由此推断，剧作家似乎是在影射毛泽东罢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官，后者在大跃进失败以后曾对此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不过，这件事是江青搅起的茶杯风波（喻小题大做）。毛曾在1959年赞扬过海瑞，而且吴晗的第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也是受到毛泽东赞扬海瑞的启发而写成的！

但是，到了1965年，出现了新的局面，江青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

江青讲："有一天，一位同志给了主席一本吴晗写的《朱元璋传》，让他看。"而江青出于个人的原因，总是反对吴晗和他所写的文章，包括这本明朝皇帝的传记。她接着说："我说，'不行，主席太累了。作者不就是为了稿费和出名吗？给他出书，出了之后我们可以讨论、批判。我还想批判他的另外一部作品《海瑞罢官》。'"江青正策划向吴晗发起突然袭击。

江青把副市长吴晗（还有他的保护人彭真）看成是北京文化部门的代表，50年代，他们把她当成了一只嗡嗡叫的蚊子。而她则认为他们是她爬上宣传机关和文化部领导地位的

障碍。在海瑞和彭德怀将军之间进行类比（也许作者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迎合了他感到周围尽是些爱发牢骚的人和小脚老太太的心理。

官方后来介绍的关于海瑞这篇文章刊出经过，也足以使中国知识分子不寒而栗了。《人民日报》称，姚文元的文章，是应毛泽东的“要求”，在江青的“正确指导”和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的“具体帮助”下写成的。

60年代，江青又从30年代停止的地方重新振作起来。这一段历史似乎由于她的独立性受到压抑以及疾病缠身等原因而不存在了。她又回到了艺术天地！这次不是作为玩偶，而是以一个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她做着男人们做过的事情！她一直反对孔夫子的传统说教，什么“女主内而男主外”，现在，她可以用象坚硬的石头一样的权力去敲掉那些过去曾啄过她的肉的鸟，那些乌鸦和鹰。

在30年代的上海，江青曾奋力维护过自己的独立性，消极地避免受到更有力人物的任意摆布。1965年至1966年冬，江青逐渐进入权力中心，这时，她完全不会被别人支配，而且自我表现得更加随心所欲。

在北京，彭真市长竭力把姚文元关于海瑞的文章的影响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可是江青却有意把文学、政治和外交政策问题搅在一起，变成不可侵犯的圣旨。任何人要反对她，反对她对一出戏的赞扬，甚至小到企图从图书馆借一本禁书，都要被冠以“阶级敌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受迫害的高级领导人是一位军人——总参谋长罗瑞卿。罗是国防部长林彪的对头，林当时正在上海与毛、江频繁接触。罗将军不合潮流。更不值一提的

是，江青觉得罗反对她。她也不喜欢罗的妻子。经过几个回合的激烈较量之后，罗被免职，江青感到非常高兴。

林彪在一次部队文艺座谈会上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在文学艺术方面，她的政治感很强。"这话听上去就象罗纳德·里根在宣布任命丽塔·海伍德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用的腔调一样。国防部长继续说："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都要送给她看。"

1966年是江青人生道路上最得意的一年。这一年，她在军队中有了职位，更使她有理由自我标榜为战士。她将要成为一支由300万戏曲、舞蹈、音乐和小说等领域人士组成的大军的统帅；她将和男军官一样，穿上黄军装。这一职务使江青进入了通向政治权力的主航道。

此外，江青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又使林彪成为毛泽东副手和接班人的愿望得以实现，林、江之间的交易又为毛反对刘、邓和当权机构助了一臂之力。

毛泽东开始对付敌手。他到长江游泳，暗示任何人想要成功，成为他的接班人，都必须静候良机。他写了一张大字报，说中国的每一件事都令人不快，要求群众利用他们的大字报附和他的观点。最后，毛回到北京，在10次大型的集会上宣布支持红卫兵，指出他们的任务就是"造当权派的反"。江青步步紧跟，对每一项决定似乎都能专心领会。她自豪地自称为"一名战士"，成为那年夏天中央全会和其他会议上的一股势力。当毛求助于年轻人时——他们学问不多，但手中握有真理——她积极做准备，帮助毛在中国主要学府视察了一个月。

江青比毛泽东传统意识少得多。她特别醉心于同"旧事

物”进行“战斗”。她煽动人们去捣毁庙宇，去抄知识分子家中的旧书。总而言之，去查禁一切自江青从火中涅槃再生之后不该出生的东西。

她太喜欢所发生的一切了。打破正常的秩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认为枪杆子、笔杆子是造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更完美的社会的两件工具。在一次黎明的集会上，她站在毛的身边，懒懒挥动一臂向成千上万她的“观众”、毛的“群众”致意，强调要把舞台当成政治，政治当成舞台。一位居住在北京的英国人回忆当初在机场的一次政治集会说：“江青向人群挥动着红宝书，红卫兵呼喊着口号，打着拍子。她眼睛闪着光，几乎是有些失态地听着奉承之词，眼珠子快要从脸上掉下来了。”

江青愿意从天安门城楼上看到她的名字写在颂扬她戏剧改革成就的旗帜上。这比当年在上海演娜拉时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招贴牌上更激动人心。最重要的是她知道，由于“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光辉给她带来了比在莫斯科医院进行各种化学治疗更充沛的精力，她现在有权力置所有令她过去过得不愉快的“卑鄙小人”于死地。

江青与文化大革命之间心灵上的默契是许多人的不祥之兆。这种预感已经被60年代中期的疯狂所证明。出身传统的保守家庭的人们认为她不懂得欣赏，也不会克制。一个到农村去的红卫兵曾说：“农民们认为如果这个国家让一个女人掌握一定会垮台。”

江青提倡钢琴艺术，是她反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钢琴艺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是很自然的。就如同牛仔裤、太阳镜、贝多芬的乐曲以及其他许多东西一起被视为无聊的、不适合中国人的一样——这种非中国化的

乐器经过文化大革命却能劫后余生，是因为它表现的西方式独立个性曾使少女时代的江青获得了一种自由。尽管它是西方式的、表现个人主义的乐器——也正因为如此，钢琴才在江青的“革命艺术剧目”中被允许占有一席之地。

江青亲自建立了三条重要的政治联系渠道：第一个是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原来总觉得与他不太容易坦诚相处；第二个是与上海左翼的“掌权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些人的出身及气质都与毛泽东格格不入；第三个是与她的同乡和老相识康生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场大规模的玩弄阴谋诡计的运动时，康生玩弄阴谋诡计的本事是不可缺少的。

1966年年中，江青担任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笔杆子陈伯达）。这个职务比几个月前林彪给她的职务更为重要。在1966年那个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天刘少奇、邓小平被迫交出实际权力后，作为文革指导委员会的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中国政府”。

在文革小组内，江的上海伙伴张春桥为第二副组长。成员中还有康生，此人50年代一度失意之后又回到了权力中心。姚文元，是江青一年前到上海时介绍给毛泽东的。对江青的这种提升实在令人不解，她甚至不是中央委员，却进入了政治局，和其他政治局成员一道，帮助毛泽东掌管这个国家。

要想了解文革小组在多大程度上并不代表这个国家，以及它带有多大偏见，只需设想一下美国发生以下情况会是什么样子：里根总统解散了内阁，只留下白宫内少数忠于他的人，在南希·里根监督下任命“行为端正的多数派”首领组成美国紧急政府，部分时间由他亲自领导。

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限制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他们在为时已晚的情况下还想挽救局面。但是，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无法满足毛泽东和江青对他们的要求了。面对江青罗织的罪名，刘少奇带着愤怒和迷惘的混合心情喊道："我的错误就在于我是国家主席！"他认为江青是想取而代之，他想对了。毛泽东打算进一步深化他的革命运动，以此解决官僚问题。同时，除掉一贯同他唱反调的人。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在同两个幽灵搏斗：一是社会主义没有能取得他认为应该取得的成就；再就是他自己不可避免的逝世命运。这两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尤其没有政治上的答案。

文化大革命既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产生新的领导规则，只是出现了一批统治者的新助手。这批人当中的首领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位候选人既不是政治家出身，又没有革命功绩，仅有对毛"无限忠诚"的决心——这就是江青。

江青介绍自己时说："我是一个传令兵。"她的影响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每个人都好象知道她是谁的传令兵。当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她的椅子旁接受命令时，江青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奉承她。她深知这一点，也总是厌恶这一点。当那些英勇无畏的年轻人称颂她是"毛泽东的忠实学生"时，她清楚，这不是因为她本人是一位领袖。

但是，可以这样形象地说，她目前手中的半个面包要比50年代她仅依靠手中的面包屑生存要强100万倍。

不断追逐的青年云鹤，女演员蓝苹，50年代中期屡遭挫折的家庭主妇，所有这些角色都在业已成熟的江青的公开活动中体现出来了。

那个要求女芭蕾舞演员走男步，从而打破了中国舞蹈中

长期存在的男女舞步之间有界限的舞蹈"改革家"，那个身穿军便服亲临排练现场指导的人，就是当年认为不存在"男人们干的事"的年轻的李云鹤；那个梳洗打扮准备在5000多人的红卫兵大会上讲话的人，就是当年在金城戏院精心打扮以取悦观众的蓝苹；那个坚决认为一个当官的被打倒则他的妻子也该一起倒楣的文革政治家，就是50年代在中南海与毛泽东前妻杨开慧所生的两个儿子的妻子吵架的家庭主妇。

在艺术问题上喋喋不休的女主人就是当年告诉姓费的一家如何掌管家务的李云鹤，就是当年指出唐纳性格缺点和改正办法的蓝苹，也就是50年代告诉她的护士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教翻译如何切鲤鱼的江青。

可是现在，这位教师爷教的不是几个仆人，而是成千上万公民。禁止一切电影、戏剧和书籍，就如同看门人关上了住宅内所有电灯。素来善于制造家庭不和的专家，现在正在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内点燃了战火。其后果不仅是亲戚双泪长流，而且毁灭了全国成千上万官员和演员的事业。这位时髦的演员不再仅仅是戏迷们欢迎的人物，她是一个样板，她的艺术风格就是法。

石油部一位高级干部在一次讨论江青"最新指示"的会议上说："江青是个女同志，她喜欢自吹自擂。"结果，她被打倒了。实际上，她只是公开说出了北京政界许多男性领导人关上门后悄悄说的话。

江青视红卫兵为自己的私产。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是毛泽东领导的，但在文革时期，江青开始把中国革命视为她和毛泽东两个人领导的。她的这种理想主义一直是她自我表现的动力之一。自从到延安参加革命后，她几乎没有什么自我

表现的意识，而更多的是不断抱怨受到了压抑。现在，她把全部力量都倾注在文化大革命中了。

宋庆龄在她的上海寓所中等待江青到来。这正是这个城市中红卫兵造反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些好斗分子打算冲击孙中山遗孀的住所，剪去她的长头发，没收她的书籍。周恩来出面制止了这次行动。毛泽东让江青去拜访宋庆龄，亲自向她解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江青象一名司令官，大步迈进宋宅。宋庆龄一时未认出这就是她50年代曾款待过的那位有礼貌的年轻夫人。宋庆龄象斯芬克斯一样静静地坐着。江青滔滔不绝地讲毛泽东的敌人是多么可恶，她本人是多么地喜欢不受传统习俗束缚的年轻人。“但是，应该有更多的控制。”宋庆龄插话道，“伤害无辜是不对的。”江青的态度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的了。当她以无言的带有敌意的目光盯着这位比她年长一辈的名门淑女时，她脸上仿佛戴上一个面具。在场的一位宋庆龄的助手说：“江青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红卫兵与她关系重大，她简直不能想象有人会认为整个运动是错误的。”50年代曾喜欢过江青的宋庆龄，对江青公开争权夺利感到厌恶。宋的助手评论说：“宋庆龄和其他人一样，喜欢不介入政治的江青。当发现江青热衷于权力之争时，宋便讨厌江青了。”

“陶铸压迫我！”江青回到北京后，在人民大会堂面对一大群满头大汗的红卫兵喊道。她想了想，又加了一句：“他还压迫文革小组！”她怪里怪气地慢慢对狂热的年轻人解释她怎样不遗余力地挽救这位从华南来的政治局委员。“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劲去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这话听上去象是蓝苹在责骂唐纳。那些被政治动乱鼓动起来的、以到北京见国家领导人为荣的青年人，不可能知道江青

的激动情绪中既包含了政治因素，也包含了个人因素。

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妇女被押上了工人体育馆的看台上。她虽然披头散发，双臂被一名红卫兵高高地反扭过来，但仍然露出蔑视的目光。江青无动于衷地望着这幅景象。在1966年12月这个寒冬的夜晚，她的一批仇人将受到惩罚。然而再也没有比目睹这个妇女痛苦挣扎的样子更叫江青开心的了。这个妇女叫范瑾，是《北京晚报》编辑，与剧作家吴晗同为彭真的副市长。

范的罪名之一是在60年代初那个“反毛泽东思想”的时期出版了一本邓拓的杂文集，说是其中暗示毛泽东“狂妄自大”。她还主编了一本邓拓诗集，其中在一个对“云雨”的复杂注释中（在中国文学中，“云雨”可解释为两性关系）暗示江青是企图从枕边攫取权力的暗娼。范的另一个罪名，极少有人知道，江青则耿耿于怀，这就是范战胜了江青，成了俞启威的爱人，并且作为合法的妻子和俞生活在一起，直到俞1958年去世。

对同俞启威的个人关系，江青一直怀着深深的惋惜之情。或许，她感到1933年俞前往北京的真正原因是不愿再同她生活在一起了。因为她在俞被捕入狱后与一男朋友同居。1934年她到北京看俞时，他们未能重修旧好，这一点或许更令她痛苦不已。甚至可能有这样痛苦的愿望——范给俞启威生一个儿子，而江没有儿子。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江青希望看到范瑾倒楣。

工人体育馆批斗之后，江青仍然不放过范，给她罗织了大量罪名。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组织，在空军内部搞秘密活动，要范现在的丈夫——一位空军干部与她离婚。

范瑾没有供认什么，但她的事业和婚姻完结了。1968年

春天她被抓，此后不久便去世。她没有来得及看到李敏1968年5月24日那张攻击聂荣臻元帅的大字报。聂荣臻曾与俞启威共事。大字报说他企图“掩盖”范在机关内的一些可疑的丑行，以便“保护”她。

强迫人们承认过去受到了刘邓的“压迫”，这是文革的一个特点。在这一期间，江青创造出一个奇特的口号。在提到1966年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时期和自1949年以来整个“官僚统治”时期时说：“我们不但必须考虑50天和17年，还要考虑30年代”。江青想把30年代“文艺黑线”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对象。为什么？因为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对付那些曾在30年代的上海“对蓝苹采取不公正态度”的人。

50年代，江青对她过去的舞台生涯采取轻松的态度。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所以从来没有人把她当成女演员。确实如此，并为此禁演了《王老五》、《狼山喋血记》以及其他她参加演出的影片。可是她总是以怀旧的心情向她的工作人员讲起当年的舞台和银幕生涯。1962年，她在北京私下观看影片《王老五》。

可是在60年代，那场似乎已经熄灭的火现在烧成了熊熊大火。江青被30年代文化的罪恶以及现在还活着的当事人所困扰。她30年代经历的任何一点沟沟坎坎，现在正堆积成一座复仇的火山。

文革期间，江青又把她在1937年《我们的生活》一文中阐述过的论点搬了出来：艺术的社会作用；反帝；意志的重要性。在战前上海那个混乱艰苦的环境中，这些观点出自一个女演员，一个苦苦争斗的年轻姑娘之口是了不起的。现在，她毫不修饰地给这些观点加上了更深刻的政治含义。

外壳是政治，里边包含的核心却是个人的动机。在上海，

张庚曾强要和她同居；田汉曾对她不屑一顾；夏衍把《赛金花》的主角给了王莹而不给她；周扬却不帮她说话。为了修改这段对自己不利的历史，江青在60年代宣布说，30年代上海的共产党是处在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之下，“现在才揭露出来”。在江青的授意下，这四个人被一群30年代根本还没有出世的小狂热分子戴上高帽，拉上大街示众。他们失去了工作，他们的家人也同遭厄运。全国都知道他们是“牛鬼蛇神”。江青高兴极了，她对一群电影工作者说，夏衍“整天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做”。

她与周扬有过一番谈话，表明她对所谓她在上海时曾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的说法是多么地深恶痛绝。她对周扬说：“你知道那时（3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找什么来着？”周扬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她的对手，回答说：“我知道。”江青特别强调了对她的事业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我在设法找共产党。”周扬低头不语。

就好象江青手中掌握了那些年所有反对过她的人的名单，现在她把名单拿出来，寻踪找出当中的每一个人。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将军1952年曾帮着说服毛泽东把江青送到苏联，那时她不想去。现在杨也从家里被揪出来，低着头，喘着气，一块大木牌挂在脖子上，上边的名字被打上了三个大叉。这叉表明他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被一笔勾消了。在工人体育馆，一万多根本不懂什么叫资本主义的红卫兵，谴责杨是资本主义分子，一名士兵将杨按下去。江青在看台上冷笑着。这已经超出了报复的范围。

她忘了自己曾主张妇女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在朱德和陈毅被指控为“走资派”后，江青默许批判他们的夫人康克清和张茜。她修改一份号召斗争陶铸和邓小平的文件，把他

们的妻子也划入挨斗之列。当徐向前和聂荣臻两位高级将领成了文革牺牲品时，江青跳出来，指责徐的夫人是“叛徒”，聂的夫人是“特务”。

就连王观澜也上了她的“黑名单”。他的妻子徐大姐曾和江青是多年的朋友，也是她政治上的良师。1937年，江青希望到延安去，徐大姐很快帮她达到了目的。这么多的人在江青煽起的愈演愈烈的自我标榜为主持正义的报复风潮中毁灭——其中许多人因绝望而自杀——以至于1966年8月北京的火葬场人满为患。一年之后，经过长长一个冬天的武斗、极度的痛苦和怀疑之后，1967年的8月成了这个城市众所周知的“死亡之月”。

江青一个人是无力进行这些清洗的。如果没有她，有些事件可能也会发生。但是她在很多这样的清洗活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利用运动达到个人目的，为这场运动注入了自己强烈的感情和戏剧性效果。

在上海，郑君里家中的电话铃响了。这位电影导演曾做过江青与唐纳的证婚人。电话来自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的办公室。这位上海市委头头想马上见见郑先生。张向郑解释说江青想追查30年代的“材料”，其中也包括有关她“私生活”的材料。因此要求电影导演将他的信件、像片、剪报、手稿以及他手中所有涉及江青历史的东西统统交到市委办公室来。他尽力去做了。他和也是电影导演的妻子黄晨把早年那些材料包了一包交给了市委组织部。不过，随后郑君里就感到担心了：提到的要求含糊不清，涉及的范围很大，还反复提到与江青的“一封信或信件”。这几年，知识分子因言行而在政治上受到非难。在这种时候，这些迹象说明了什么？

郑第二次同张春桥谈话后对黄晨说："谁知道呢？说不定哪天我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在北京，江青对张春桥办事拖拖拉拉不满意。她是认为郑手中有一封她1936年6月写给唐纳的炽烈的信的复件呢，还是担心有她和崔万秋及其他非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分子交往过密的记录？

几个月前，由于同国防部长林彪达成的交易，她同军人以及一批达官显贵的夫人建立了非同寻常的联系网。她与林彪那个提升很快的第二个妻子叶群谈到她的新处境。叶群因为知道在林彪希望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件事上，江青的作用是多么重要，所以很尊重她。江青认为，如果要成为中国的领导人，难道不应该必须考虑形象问题，必须纠正任何不良印象吗？

第二天，上海的一名军官江腾蛟，接到胖胖的空军司令吴法宪的电话。吴现在已成为江、林圈子的一名主将。吴司令对江腾蛟说，叶群要他去北京接受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叶群代表江青解释说，需要从郑君里、顾而已（与江青、唐纳同一天结婚）以及其他活着的30年代左翼影人家中找回有关言行记录材料，特别是"来往信件"。江腾蛟飞回上海执行这项计划。

与此同时，郑君里1966年10月7日直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有礼貌地解释说，"我不记得还有你的信，也不记得你给我们或给赵丹和他夫人写的信。"不过，郑君里还是从抽屉里找到了照片，"这里有几张30年代旧照，请你处理。"

10月9日下午7点，郑君里和黄晨在家，一伙只露出两只眼睛的蒙面人破门而入，他们并不是自己所声称的真正的红卫兵，而是江腾蛟选出来的"可靠的"干部和军官的子弟，

到郑、黄家和另外四个人家里彻底搜查那些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使江青深感不安的证据①。

整个晚上，这些冒牌的红卫兵，喊着虔诚的政治口号，把郑、黄公寓的角角落落翻了个底朝天，一页一页地翻书，寻找纸片。他们把屋子翻得乱七八糟，大喊凡与“首长”江青有关的东西都要找出来。郑和黄说，他们什么也没有了，但这些强入人室者最后带走了所有可以拿得走的纸，包括郑的草稿、日记和黄的部分剧本以及儿子上学用的笔记本。第二天早晨5点这伙人离去时说：“如果你们住在北京，或许在这之前早就被枪毙了。”

第二天一早，叶群给江腾蛟去电话说江青“非常满意”。显然“信或信件”以及别的东西都找到了。

江青不仅关心她30年代的风流韵事，而且也关心自己那段政治历史。1966年春，江青召见上海市公安局干部王济普。她对王解释说，关于她1934年被捕入狱后又被国民党释放的历史，显然有误，最好把现存上海的有关材料取出来交给她②。据王的妻子说，王对江的要求迟迟未照办。

“王济普为什么不把我要的东西送来？”1966年底，江青恼怒地问一位官员。她让吴法宪出面，施加更大压力，找

---

① 江腾蛟那天晚上给这些蒙面搜查者定下五条“军纪”：一、除了信、笔记本、照片和其他文字材料外，不允许抄任何东西；二、有人询问，就说“是上海红总司的”；三、队长可以暗带手枪，但未经上级批准不许开枪；四、必须去掉军车牌照或用纸罩上；五、对警备部队战士和选出的子女只说“是到这些人家里查找丢失的空军机要文件”。——原注

② 江青把她的被捕称之为“错误的被捕”，她的目的无非是否认她是在自首后才被释放的这种指控的可靠性，否则，她的表白是非常奇特的。——原注

回那些文件（有些可能不在上海，国民党把许多文件带到了台湾）。吴法宪好使唤，而且调动飞机轻而易举。吴司令可能受到康生支持，把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的一些关键人物抓了起来，有20多人，其中包括倒楣的王济普。这些人被送往北京，投入监狱。就在同一天晚上，又继续搜查有关江青1934年同国民党政府发生联系的文件。但结果不尽如意，找到这些材料很困难，想证明没有这些材料也是困难的。

1967年寒冬的一个夜晚，江青、叶群和公安部长谢富治（此人这时同吴法宪一样对江青卑躬屈膝）一起在钓鱼台国宾馆吃饭，讨论如何处理收回来的材料。最后决定“一劳永逸”。叶群给空军司令部打电话（叶作为吴法宪的密友，毛的副手和接班人的中国军事头目的夫人，实际上掌握了空军大权），命令把装有材料的箱子立刻送到林彪住处毛家湾来。

三位领导人乘坐黑色“红旗”轿车来到毛家湾。门铃响了，门卫验过通行证，记下车号。江青、叶群、谢富治从车上走下来，来到住所后的一个小院里。空司一伙天真的小伙子把装有文件和照片的箱子抬进来时，林办的秘书上前帮忙。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将院子角上服务人员的小厨房的煤球炉点着了。江青还是紧张时的老习惯，双手交叉地放在胸前。升腾起来的火焰把几张脸映红。叶群脸上显出胆怯、紧张的神情。江青毫无表情。谢富治则异常兴奋。这位公安部长走到开封的箱子前，开始往炉子里添纸片，叶群上前帮助他。江青在离炉子10步之遥的一隅慢慢地踱着步子，一边用眼角瞟着炉子。她不时停下来，盯着叶群和谢富治用发抖的手将一片纸或是一张照片塞进火中。谁也没有说话。

几个月之后，郑君里被捕入狱，于1969年死在狱中。上

海市公安局的王济普则继续坐牢，五年后也死在狱中。演员顾而已和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演员赵丹，他俩也都是1936年江青和唐纳结婚时举行的婚礼。顾死在狱中①。

假如江青不是毛泽东的妻子，那么她肯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革命对象。她会因为欣赏“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曾写过悔过书被国民党释放而在1956—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受到巨大冲击。那么，10多年后，当红卫兵运动高潮起来时，她将会遇到更大的麻烦。唐纳在流亡法国后说：“1956—1957年间，我或许会被抓起来。到1966年，我可能会被杀掉。”在巴黎，他感到文革给他带来的最大痛苦莫过于他那个前妻给昔日影剧同仁制造的巨大灾难，他对此悔恨不已。许多过路人拥向他开的餐馆，惊奇地看着江青曾经爱过的男人，使他不得不卖掉这个地方。“有许多中文报纸传说我专门在餐馆留了一个房间，里边全是江青的照片。”唐纳苦笑着回忆道，“很多人相信这个可笑的说法，他们到这里来看我在那间专用房间究竟放了哪些照片。”

“你们大家一定想知道毛主席现在怎么样。”江青大模大样地在一次群众大会讲话时喊道。人群中大声回答：是的。他们的确很想知道。这群人热衷于搞破坏，却被近乎宗

① 1968年以后，江青还在努力洗刷自己的过去。1968年2月23日，她给了吴法宪一份上海干部孙某的档案材料，并说想见见这个人。吴法宪把孙用专机送到北京后，3月1日江青便签署了一份文件，孙被捕入监狱。1968年3月2日，江青让吴法宪把一位以前的上海仆人找来，江青怀疑这个人可能知道她与唐纳的事。后来吴法宪写了一份报告，讲这个女子同江青在上海的敌人及“香港派”人士的“黑关系”（这是极易破坏一个人的名誉的），江青在报告上签了名。这位妇女被捕，后死在狱中。——原注

教式的虔信煽动起来，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善事。“我来告诉你们，他身体非常健康。”江青说。声调慵倦，象是刚刚度过新婚之夜。

“我们一直认为她很会修饰。”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回忆说，“她的声音低沉但很柔和。”另一位曾见过江青发怒的红卫兵情不自禁地夸起她的性格来，“她当年年轻漂亮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江青喜欢听人群中此起彼伏大喊“江阿姨，我们爱你！”只要她能够威风凛凛，处在大动乱的中心，即便是暴乱，她也会感到非常痛快。经常讲蠢话也无关紧要了（资本主义只会产生“腐朽”的文化，“对人民没有吸引力”，仅仅是“脱衣舞、印象派和野兽派——淫秽下流的东西，无穷无尽”）。

在北大，她遇到了一批反对她的学生。学生高呼“我们要绞死你，我们要油炸你！”与其说她害怕危险，不如说因这种戏剧性的场面而激动万分。江青以少有的幽默口气回答说：“我实在是太忙了。只要腾出时间，我马上请你们来绞死我，油炸我。”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江青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开头这么说，“多年来，都是给毛主席当秘书。”这话听上去既谦虚又显得她的地位之重要。她说可以肯定他们比她更了解毛泽东的为人，这种说法使这些军官消除了对她的戒心（“我向来是尊重老红军的”）。然后，她详细地谈到毛，给非常崇敬毛的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喜欢“小道消息”，而江不喜欢；他喜欢孩子们同他“顶嘴”）。她说她不过是个小学生，但在第二次大集会上，她声称她教毛泽东懂得了文艺方面的事情。

“你们知道，可能是我太自信了。”她小声说道。她承认自己不能忍受敌人得意洋洋，必须要加以反击。在讨论彭真如何阻挠她的戏剧改革时，她说：“如果一旦你们知道了详细情况，你们会气愤的。”中国的影片和舞台上，是不是应该出现更多的军队英雄？“当然应该有，但有人从中作梗，他们不听主席的话，也不听我的话。”在给军人们谈了半天他们知之不多的文艺问题后，江青却要他们务必纠正会使她“误入歧途”的观点。

在这个坦率的讲话中，江青讲到自己的一些事。虽然这些事近些年来被当成笑话，但却是真实的。她叹着气说她有很多弱点，虽然尽力研究，但研究工作不够系统。“不过，要说我的长处，那就是我一但熟悉了什么事情，就坚持不放，一做到底。我会把这件讨厌的事做完。”她又拉回话题，头侧向一边，以加重语气。

为表示她对过去受到的迫害有多么气愤，她对战士们说：“你们知道，在延安，我戴军帽也遇到了麻烦，有人命令我不要戴。”现在，她讲话时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帽。她很欣赏这个借口，因为她毕竟并不是真正的士兵！

在她的权力达到顶点的时候，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她出席一次中学生们的集会。这次集会的议题是请她谈谈专政和民主的“相互关系”问题。她说是要斗倒一批“做坏事的人”，以儆效尤（未举例说明）。

江青精神亢奋，时而抬高声音，以致体育馆外很远处亦能听到；时而低声细语，把学生的注意力完全集中过去。她说，年轻人做了坏事，应根据政策进行处理，“治病救人”。但是，中老年人做坏事的，就应“斗倒、斗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江青在台后侧等着两个被突然打倒的对象——

一个是国务院秘书，一个是北京市著名的政治家。

她象过去在上海舞台上曾将她指挥得团团转的一个导演，举起手来指着这两位过去是著名的官员而现在则成了她手中木偶的人，向台下如醉似狂的年轻人喊道："大家愿意让我把周荣鑫和雍文涛带出来瞧瞧吗？"人群发出尖叫声："好，我们愿意！"江青转身冲着低头的两人喊道："到台上来！"她带着得意的微笑命令说。人群大喊："低头认罪！"周和雍被人推搡着出现在台上，等待7000名"革命小将"的审判。

为了取得最佳艺术效果，江青投其所好，让学生们恣意妄为。然后挥手示意："好，现在静一静。小将们，小指挥官们，你们已经认出了这两人是谁，可以让他们退场了。"

"让他们滚回去！"人群大叫着，就象当初让被斗的人出来一样，非常听话地顺从着江青的指挥。然后，江青讲起这两个人应负的罪责（实际上，罪名就是鼓励某些知名人士的后代组成红卫兵，来反对更左的亲江派红卫兵）。她知道运用心理战术："软硬兼施，从心理上讲，这是好事。"

生长在1949年以后和平年代的许多年轻人，非常尊敬江青，除了因为他们以表现忠诚为乐外，还因为江青善于迷惑人。又有谁能象她那样，在一次集会上大哭，而在另一次集会上管自己叫"老娘"，并解释她江青有权可以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呢？

"真好象毛主席在讲话。"一位上海演员在谈到当年江青来剧团的一次讲话时说。当时她从北京赶来帮他们改编《白毛女》。她穿着一件华丽的风衣，象一阵风冲进上海展览馆的一间会议室。"她很有说服力，对自己充满信心，她说她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候，毛主席要她祝我们演出成功。当时，我

们真受感动！”

年轻人并不了解江青的为人。假如他们了解了她，可能会发现她是不可信任的。可是，参加活动的她居然给人印象深刻，令人激动。

1967年夏天，北京大学一名学生给毛泽东写信。参与学校内造反派和工作组之争的小陈，想给最高领袖提些建议。小陈和他姐姐坐公共汽车来到中南海党中央接待站，他们打算问问那里的干部，可否请江青把这封六页纸的信转呈毛主席。

“我并不太看重作为政治人物的江青，但是那时她相当显赫有名——看起来通过她找毛是条捷径。”就在前一天，江青曾到北大对一小批人说：“这样吧，如果你们有什么事要对主席或我讲，就告诉我——我会安排的。”当时小陈也在场。

在接待站，陈的姐姐要求见见一位小干部，此人是她和她丈夫的邻居。不久，江青的高级顾问戚本禹出来接待了这两位年轻人。“江青同志想见见你们，我们开车送你们去钓鱼台。”

江青满脸倦怠但很兴奋，从她的私人办公室走出来。戚本禹挥了一下手，带着陈的姐姐同江青往里走。陈不揣冒昧，对戚说：“江青同志在这儿，她能决定让不让我进去。”

“两人都来吧。”江青大声说着，抓着陈的胳膊，领他走在前边。

江青翻了翻陈的信的前几页，露出了冷笑。陈局促不安地坐在藤椅上。他给毛泽东的信上说，江青对北京大学干预过多。他后来解释说：“我并没有要求见江青，只是想把信递到毛的手里。”江青对陈的反应只是把他看成一个充满渴

望的漂亮学生，而不是给毛泽东写信的人。这封信很快就被搁在一边了。

三小时之后，江青结束了谈话。她同他们谈到了家庭、精神、身体健康情况，并以挑剔而又轻蔑的口吻谈到北京大学的形势。不苟言笑的戚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坐在一旁，就象女王身旁的侍从。陈的姐姐则完全被江冷落在一边。江青对惊讶不已的陈说："以后再来，我会安排你去见主席，看得出来，你比你姐姐更勇敢、更有知识。"

"只有江青才会凭一时冲动接见我们。"陈说，"周恩来和康生决不会这么做。我现在还是认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江青不可靠，容易将人引入歧途。但她确实精力充沛，富有鼓动性。她爱同下边的人接触，爱利用年轻人，总是倾向于反潮流——戚本禹以为只有我姐姐才能进江青的私人办公室，江青把他的想法推翻了。"

陈接着说："当一个人对江青说'我想做你的追随者'时，她不会表示反对。如果有人说：'江阿姨，我们能不能和你合影留念？'那她不仅不会生气，还会非常高兴——她会疾速走到附近，马上找一个摄影师来。"

7月的一个闷热的晚上，北京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停了课，都在写大字报，闲聊着，争论着政府派到学校来指导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的功过是非。江青出现在校园里，校园里更加热闹了。她从一个活动中心走到另外一个活动中心，时而露笑，时而蹙额，时而又挥动手臂，"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

那时文革达到高潮。在上海和杭州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毛泽东于10天前回到北京，江青则于8天前就到了。首都

笼罩着一种期待的气氛：最高领袖和他那令人激动的妻子好象正在预示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

北大校园东面有一些明代风格的亭台楼阁，江青来到其中的一个高台上。一排排的灯挂在高大的树上，照亮了江青得意的脸。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还有那个正从江青的保护人变为其奉承人的老奸巨滑的康生，也同时在场。“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高声喊道。喊了几句政治口号后，她的脸渐渐阴沉下来，并宣布说，这次会实际上是“辩论会”。当学生们得知会的主要议题之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她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儿媳妇！”周围的树好象都惊讶得抖动起来。江青到这个高等学府，是和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第二个儿子的妻子“辩论”来了，她是江青的眼中钉，肉中刺。“她妈是个政治骗子！”她给个人恩怨冠以政治大帽子。她把韶华和资本主义“文艺黑线”以及世界反华力量联在一起。她再次提高嗓门：“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在这里能扯上韶华是因为韶华曾在北大文学系念过书。

江青的话似乎滔滔不绝，“韶华趁毛岸青神志不清和他发生了性关系——骗他和她结了婚。”过了一会儿，陈伯达从高台上站起来，从后边走到江青跟前，靠近她。但她继续横扫一切。这会儿又开始攻击起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来。刘是韶华的姐姐。毛岸英死在朝鲜。江把家事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扯到了一起。陈伯达轻轻碰碰江青的肩头，江中断了她那喋喋不休的诽谤。坐在前排的人听到陈悄悄说“我想你现在应该停下来”。江青生气而又吃惊地盯着他。偌大一个场子，坐了上万人，人们甚至能够听到针掉地的声音。

“我的确非常烦恼。”她昂起头，好象是要把眼前这位

忠心耿耿的陈伯达也当作她的敌人。“10年来，我一直受这女人和她家的气，这就是我烦恼的原因。”她声音渐渐提高，麦克风把她的声音清楚地传了出去。“要谢谢她啊，我的心脏病又犯了……”大多数学生缄口不语。少数人在悄悄反对她。一位挨斗干部的女儿大声说：“你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上！”

可能没有人敢告诉毛泽东，江青那天晚上在北大讲了些什么。毛泽东没有采取行动制止江青在政治性集会上展示家庭私事。

江青在家庭生活中的其他战场上也发起了进攻。她同毛主席争吵，说不应该允许已经又结了婚的刘松林在中南海随心所欲，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在与杨开慧的家庭有关的一场电话战中，江青发现杨开慧的哥嫂“企图趁文革动乱之际为杨开慧正名”。于是，江使他们两人既丢了面子，又失去了工作。

当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女儿结婚时，江青也要吵，就如同松林结婚时的情景一样。江说“嫁出的女，泼出的水”，李敏现在也应该分家另过，自食其力。当提出为李敏送结婚礼物问题时，江青对她的私人秘书说：“给她条被子。”这使人议论纷纷。本来人们以为，李敏本人也希望能有两条被子、两个枕头和一件象样的外套。

江青与毛泽东的侄子——那个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毛远新关系仍然很好。毛远新这时是东北地区的一位年轻的政治领导人了。

江青同李讷的关系并不牢固。但她想提携自己的女儿。李讷在北大文学系读书时不住在家里，而住在宿舍（她1964或1965年从北大毕业）。不过，如果母女俩相互都关照的

话，江青是不会亏待李讷的，包括让她看外国影片，而这些片子通常是不让李敏看的。

1967年8月，一个闷热的下午，吴法宪接到叶群的电话，对方问他能否马上去见江青。这位空军司令二话没说，立即赶到钓鱼台。江青、叶群和李讷正在为一条大标语最后加上标点。这条标语显而易见，是在攻击《解放军报》的犯错误的人。

标语写好了，江青带着疲倦的笑容转身对着吴法宪，开始提出将她那唯一的孩子任命为《解放军报》主编的事。江青要吴做三件事。她想利用空军的器材，把刚写好的标语在当天下午贴到北京各处。她还想从空军、海军和二炮要30个做过记者工作的人，让他们准备那天晚上到解放军报社去，并要求吴法宪“百分之百”地支持她的女儿走上军事出版单位领导岗位。

“我完全答应了她这三点要求。”吴法宪后来回忆说。第二天，李讷便接替别人，成了中国军事喉舌的总编。李敏就没有这样的职位。至于李讷是否感谢母亲将她推上这样的高位，无从得知。但这种经历无疑给她思想上造成了压力，促成了她后来人生道路的种种波折。

在山东，江青不时地去信和去电话，关心她的异母哥哥。早年在诸城的时候，李幹卿曾赶走了两个欺侮江青的母老虎。现在，江青向李幹卿的众多敌人宣战了。

早在1959年，山东省公安局就开始调查，以便证实是否象广泛流传的那样，即李曾与日本人勾结并从国民党手中领过津贴。“你最好提高警惕。”1965年5月12日，江青在给李的一封信中出谋划策，告诉他如何防身，“不要因小失大”。她建议她的哥哥保持镇定，不必在气愤时破釜沉舟。“别

怕，天塌下来有人顶着。”对李的调查一直死气沉沉，不了了之。

在1968年4月的新的政治气候条件下，山东一位官员，毫无疑问是因为看到了江青在权力和名望上的高升，便开始整他省里那些调查李幹卿的人。王效禹同陈伯达见面之后，山东就有六名曾敢于了解李幹卿背景的官员被捕入狱。

50年代，江青和王光美曾有过真心诚意的交往。江青总是步行到刘少奇和王光美住的宽敞的院子去（刘少奇与第四个妻子离婚后于1948年同王光美结了婚）。一般情况下她们聊聊家庭、服装，以及作为政治领导人家庭中的主妇的问题。

王光美的家庭富有且受过良好教育，家庭成员遍布世界各地。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40年代她曾在军调处工作过，和许多美国人打过交道。王还获得过北京某教会学校的学位。王光美可能不象江青那样吸引人，但气质风度却要比江青更高雅。王无需着意修饰也姣好动人。尽管王光美比江青晚入党15年，但在北京政界名流中，她比江青人缘要好，而且在社交场合更大方得体①。

60年代，当两位妇女感到40多岁了，极想干一番大事时，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两人的丈夫发生了分歧。中国的政治变得混乱了。以苏加诺夫人访华时的照片为导火索，江青开始向王光美发难，表明她要伸手夺取政治权力了。

---

① 苏加诺夫人发现，从外表看王光美比江青更漂亮，“王光美的头发自然地弯曲着，而江青的头发是直的。”这位非常温柔的印度尼西亚妇女又补充道：“江青从背后看更象个男人。”——原注

1963年，王光美与江青的关系比以前冷淡多了，但两个人见面时还是彬彬有礼。有一天，王光美给江青打了个电话，请她为自己的服饰出出主意。王和刘少奇将要到东南亚去访问，她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她知道江青爱看小说，能记住小说中关于服饰描写的细节，或许能出些好主意。

江青建议她穿一身朴素的天鹅绒套装，“就象《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角穿的那样。”这样看起来既“高雅”又“不同凡响”。江青从来没有访问过东南亚，也许她并不知道，在那些地方，王光美穿着天鹅绒套装会热得要命。“总的来说，我不主张戴首饰。”江青补充道。

王光美很重视江青的意见，但是陪同刘少奇进行国事访问，是一件时间冗长而又引人关注的事，因此，自始至终，王光美总是不断更衣换装。在仰光，缅甸的奈温总统送给王光美一串珍珠项链。到雅加达后，有一天晚上，王光美便戴着它出席了苏加诺总统和夫人的庆祝宴会。到处是欢声笑语。整个宴会充满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谊的气氛。在介绍庆典的电视片中，人们看到王光美凑上前为苏加诺总统点烟，然后挽着总统的手臂从宴会厅走到另一间屋子去欣赏音乐。

在北京，江青收看了新闻片，发现王光美戴着一串项链。

王光美和江青互相见面的机会更少了。不久，她们之间的关系便趋于恶化。王从事的农村改革与同一时期江青的戏剧改革是一个较量，或者简直就是对着干。王光美住在河北省一个公社的桃园生产队，在那儿搞“四清”运动。这场运动成了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进行的一场政治皮球战。

王光美在上海作了一篇7万字的报告，讲述她在桃园取

得的成就，她丈夫将这篇报告转呈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江青也就她戏剧改革的成就在北京戏曲观摩会上发表演说。当王光美告诉管农业的干部，什么是最适合河北贫瘠土地的肥料时，江青则正对演员讲如何挎枪才不至于伤了生殖器。

毛泽东刚刚告诉江青，她将代表山东成为人大代表，江青就从国务院一份记录上看到王光美被指定为她的家乡河北省的人大代表（农村政策取得胜利的桃园就在河北省）。在此之前，王光美对这种橡皮图章式的人大并不象江青那么感兴趣。但作为人大代表，这同过去坐在中南海大院里谈论不争气的孩子、废寝忘食的丈夫以及清扫明代大瓷瓶总要出岔子的服务员，那就大不一样了。

江青最不可告人的一个肮脏的想法就是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可以并且应该利用家庭关系网。如果她在想把某个领导人赶下台时遇到了麻烦，那么她会寻找机会，让这个人自己的孩子来反对他。当一个男人倒台时，她会让这个男人的妻子也跟着倒楣。

“应该把王光美揪回清华大学做检讨！”（王光美领导工作组尽力使该校运动走上正轨）当1966年后期刘少奇被打成“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后，江青在一次群众大会上高喊。

江青在红卫兵大会上说：“王光美不老实，她去印度尼西亚之前来看我。我当时正有病住在上海，她说她想戴项链，穿花衣服去访问。”当江青迎合年轻人反特权的思想情绪，第一次在讲话中提到王光美三年前的雅加达之行时，听众都急切地想知道下文。“我告诉她是应该准备几件衣服，还告诉她我主张穿黑颜色的。她是一个党员，不应该戴项链。”

“她听了我的意见后，虽然几夜没睡好觉，但还是按我的意见办了，还说去东南亚不会戴项链。”

她安排大家看王光美东南亚之行的电视片，这是她对王光美多次进行攻击的材料。她向大家宣布：“这部片子宣传了资产阶级宫廷般的生活。”她很希望大家除了对刘少奇和王光美不满外，也向文化部和她的死对头、剧作家夏衍开火（片子是在夏衍授意下拍摄的）。不用说，影片中出现的镜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夫人那天晚上戴项链的场面。

“电影就这样上映了。”江青声音中充满痛惜之情，以期引起公愤，“千真万确，这女人戴着项链，她骗了我！”人群中顿时附和声四起。

王光美和刘少奇在中南海住处的电话铃响了。王光美去接。电话中传来女儿刘婷婷抽噎的声音，她说姐姐平平出了车祸。刘少奇和王光美急忙奔到医院，结果是一场骗局。婷婷可能是被迫那么说的。清华大学的左派红卫兵把王光美作为“专政对象”。从头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5点，象开斗争会一样，对她进行了审讯，宣布她为“走资派”。

每隔一小时都有人向江青报告斗争王光美的情况。在清华大学主楼七层一间房子里，王光美和看押她的红卫兵用毛主席语录展开了辩论。王光美有时还在地板上静坐以示抗议。经过一番对持之后，三个女红卫兵强迫第一夫人（刘少奇当时仍然是国家主席）去穿一件丝质旗袍，一双高跟鞋，戴上一顶英国贵族式的宽边草帽——这是她“和苏加诺调情”时的那身打扮。现在，王长胖了，旗袍显然太小，结果被一个红卫兵把两边撕开了。

一帮子嘻嘻哈哈的红卫兵头目，象戏弄笼中雀一般对王光美进行嘲弄。由江青导演的压轴戏开场了，红卫兵拿出了

最主要的道具来对付王光美。一串乒乓球串成的稀奇古怪、丑陋不堪的项链挂在王光美脖子上，每个球上都打了叉子。这是一串江青进行报复的套索。为了留作纪念，江青还让人拍下了当时的照片。一天一夜的人身侮辱就这样开始了。

王光美措词激烈，不断说："你们无权这么做。"似乎中国的权威还不如她那串被糟蹋的项链值钱。高台子上，王光美背后站了一群陪斗对象，在那儿听着，记着，想法指控最新出现的斗争对象，以便保自己过关。

在中南海大院的另一次集会上，李讷亲自坐阵，准备让王光美坐两小时的"喷气式"。在一群欢呼叫好的人面前，王光美弯腰低头，双手被扭到背后。刘少奇当时也在场，而且是大会的首要斗争目标。这似乎是在暗示江青就是有权先让刘少奇受20分钟的痛苦折磨。中南海大院有很多大门，江青坐守其中之一，鼓动人们进来看她女儿的"表演"。在另一侧大门的周恩来则不停地接着电话，他正竭力限制大会规模，并尽力减少伤害行为。

1967年初，江青仍不放松对王光美的攻击。一次政治讨论会上，在谈到刘少奇家庭情况时，她说："你们知道吗，王光美的父亲跟国民党有勾结。"江青开始策动刘少奇与王前（刘与王前在1947年离婚）所生的女儿刘涛造反。对她进行了一番威胁利诱之后，她在一次集会上说："我认为我父亲就是党内头号走资派。"

江青认为刘涛反对她父亲的讲话太软了。为了满足强烈的复仇心理，江青安排刘涛和她的母亲王前见了一面。刘涛第二次谴责她父亲的言词就比较合江青的口味了。王光美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漫画像上又被加上了一笔重彩，很快就在中国家喻户晓了。

在很难得到真实新闻的当时的中国，一点点真理（或谬误）稍经加工、渲染和反复强调，便成了伟大的真理（或谬误）。有关王光美的大字报和漫画铺天盖地，她简直象是从婴儿时起就是一个“美国间谍”了。

1967年9月，一天晚上，江青同康生在钓鱼台吃饭。在谈到王光美时，江青想知道，现在将王光美逮捕入狱是否条件成熟。康生打电话找到“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命令他即刻赶到钓鱼台（这个专案组是在江青、康生支持下于1967年5月成立，以便为刘、王定罪的组织）。

“今天晚上，你们必须拿到逮捕王光美的逮捕证。”江青一边从沙发椅上立起身来，一边对专案组长严厉地说道。“我明天一早就要。”主管公安工作的康生死死地盯着专案组长。康还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道：“王光美的间谍问题现已正式定性。”

专案组长第二天一早拿着一份文件来找江青。文件上写着：“王光美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间谍，基本上可以定性了。”江青在文件上方批道：“非常不妥——退回专案组。”江青非常清楚，在中国共产党的专用政治术语中，“基本上”这个词可以被看作一种搪塞的用语。专案组长去见康生。康看了江的批示后说，他要亲自签发逮捕证。在康所拟定的起诉书草稿中，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王光美便不单成了“美国间谍”，而且还成了“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江青也在起诉书上签了名。

据王光美的孩子们证实，要不是毛泽东在送呈他批阅的起诉书上写了“刀下留人”几个字，王光美恐怕早已命赴黄泉。她在狱中度过了12个春秋。

一辆小车驶进王光美和刘少奇住处的后门。两名在

“刘、王专案组”工作的公安人员从车中走出来。刘少奇家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离去，只剩下戴白帽、穿围裙的郝苗还在那儿。一小时后他被捕了。当专案人员逼他详细说出王光美“为美国做间谍工作的情况”时，他说：“我不过是个做饭的。”“给我们讲讲你所记得的有关她解放前的活动情况。”他嗫嚅着说，那时他在上学，什么也不记得了。公安人员反驳说，他的烹调过于讲究。还说这些年他一直在腐蚀刘少奇和王光美，为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作准备。比如他掠夺人民的财富，为他们制作奢华的佳肴；虽然季节已过可还是让他们吃上时鲜的上海螃蟹。

由于专案组的努力，单在北京就抓了64个与刘少奇、王光美案有牵连的人。郝苗也被捕入狱，一呆就是六年。

11月的一个傍晚，两派红卫兵在进行辩论，他们的观点并不明确，但个个慷慨激昂，就好象“9·15”、“9·16”两个组织的孰是孰非将决定中国的前途。江青当时也在场。她的军装褶皱，脸上却因为斗争的喜悦而放光。她听着双方的辩论，没有说话，而她的出现却又确确实实为这场辩论定了调子。最后，她站起来作出裁决 。

“你们两派都是革命组织。”她大声宣布，“你们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不过，两个组织内部都有一些坏分子，特别是‘9·16’内还潜藏着一名外国间谍！”

江青经常这样完全不考虑政治后果而进行无端指控。但是在1966年底这个寒气逼人的夜晚，江青却是胸有成竹，而且想要大获全胜。

在航空学院，一位青年一言不发，心情紧张地坐在他的屋子里。他是“9·16”的一名成员。但他认为参加今晚的会不合适。青年长着白皙瘦长的脸，很象他的父亲，他叫刘允

若，就是正在挨批斗的共和国主席的儿子，也是江青所说的“外国间谍”。

刘允若被关押了八年之久并于1974年被释放。这时他已经得了精神病，他得知父亲已去世，后母也在狱中关了多年。1977年，44岁还依旧孑然一身的刘允若死于肺病。他的朋友说：“他最终还是会遇到政治上的麻烦的，但是真正决定了他命运的，是江青说他是‘外国间谍’。”

1968年，王光美已经成了中国最不幸的人之一。江青还是接二连三在讲话中以忿忿然的口气讲到王光美。在1968年3月一次会议上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时，江青说：“他那个了不得的老婆王光美，是个美国特务。”同月，在没有受到冲击的中国领导人的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江青出语惊人，道出了她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宿怨。

“刘少奇在延安的时候反对我。”她说。此时周恩来和康生就坐在她旁边，谈论着四川的危急局势。“他实际上是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柯老(前上海市长)去世前把这个情况对我讲了。”凭什么说刘少奇在延安就反对她？在延安时，江青并未在政治上发挥作用。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除了项链事件，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问题，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与江青的京剧改革之间的竞争，以及关于“资产阶级宫廷生活”的絮叨外，真正使江青耿耿于怀的，是刘少奇在同王光美结婚的前10年，就反对江青同毛泽东结婚，而且在党中央作出决议以限制江婚后的社会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个大叛徒，真应该千刀万剐！”江青在1968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说道。

至于王光美，作为正式的第一夫人，则是江青个人的最大对手。不论江青有没有项链，她都不能作为第一夫人出台

亮相。

因为左倾路线造成了混乱，毛泽东从他的文化大革命中退缩了。但江青却不愿做得象毛泽东那样明显。由于心情不好，江青开始三天两头地生病，公开场合也显得爱发脾气。她始终不忘在开场白时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很健康"或"毛主席要我向你们问好"。当她将越来越多的仇敌斥为"小丑"时，她的舞台风度依然可见。坐在她旁边的姚文元则拍着巴掌，象鹦鹉学舌一样，尖着嗓门喊道："小丑！小丑！"江青扭曲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但是1966年的那种振奋人心的情景到1967年初已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江青的忧虑和不安，她可能要为文革中出现的恶果负责。

一群纠合在一起乱吵乱嚷的年轻人围着江青，要求她为势不两立的两派评理。江青感到很恼火。她说："时间到了，我还有一个约会。""我急急忙忙地赶来，不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她脾气暴躁地对安徽的一个代表团说："康老把我拉来，不知道我没作准备，能给你们讲什么。"除了她脆弱的身体原因外，主要是左派小朝廷的威望下降，军队的作用在上升。这位叛逆的"玛丽恩女王"已陷入危险境地。

在一次大型群众集会上，讨论的问题是枪杆子是否应该介入政治斗争。江青一时间得意忘形。当时毛泽东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绝不能动用枪炮。而江青，则象当年的蓝苹，总是由于自身的原因，使她扮演的角色黯然失色。在那个灼热的夜晚，她的讲话有些离谱："要是我，如果有人抢我的枪，我一定要反击。"停了一下，她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话与新的政策不符。"当然，开枪不好。"然后，她又离题了。

“但我还要保留我的观点。”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其他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能左右江青的意志，不管那人是导演，是编剧，是“资本家”，还是她那位丈夫。

对立的两派视欺诈为家常便饭，这使江青总处于神经紧张的状况之中。到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场救护运动，一开始是反对右倾官僚主义者，后来又反对“极左分子”。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极左分子只会破坏，不会建设。红卫兵返回课堂；号召联合代替了号召造反。毛泽东给上海那种从公社跳跃到共产主义的设想方案（最初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策划的）泼了一盆冷水。一些紧跟江青的“小朝廷”的重要成员也因“极左罪行”被捕。最重要的是军队进驻机关、学校和工厂，帮助恢复毛泽东和江青刚刚破坏的“秩序”。所有这一切，等于是在挖江青的墙脚。

江青犯了错误，她忽视了把一些重要的当权派拉拢到自己一边的必要性。在文化界施行报复将她推到了危险的边缘，她不加区别，对红卫兵组织一概支持，而其中许多组织已经不得人心了。

在大家普遍相信“母鸡打鸣，国不太平”的社会，江青的突出表现，也成了反对她的依据。她不甘心守在家里织毛衣。然而她在家务以外的一切活动都被视为是一个泼妇的阴谋诡计。现在，她感到传统的反妇女的观念象一阵冷风袭来。

虽然无法区分开她的错误，也无法区分开象她这样重要的女人的偏见，但她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场混战，仍然是她最大的过失。不过，即使是在60年代中期的顶峰时期，她拥有的权力也不过是当个副手而已。她到处赠送《毛泽东选集》，却没有人赠送她的选集。有人总在她耳边提醒：

“别忘了，你的作为会有损主席的名声。”她开始意识到，主席的行为也会对她造成不利。

一天深夜，毛泽东和江青在中南海住所旁的一间客厅里召开了一次紧急战略会议，同文化革命领导层中的两派、两个组织、两代人共同讨论当时中国暗淡的政治形势。红卫兵领袖的关键人物在场，他们显得疲惫、困惑，但仍不失傲慢和狂妄。与会的还有那些在1968年的仲夏帮助毛泽东和江青控制中国的人。从午夜到黎明，他们以一种怀旧和忧伤的心情议论着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武斗和冲突。其间也不乏互相指责。

那天晚上，江青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解释法律和秩序。但那个晚上，似乎给人们这样一个暗示，即江青的观点，无论怎样乔装打扮，都不能使她时来运转——因为毛泽东总是有意识地向她发火。

在这次会议上，江青始终未能博得毛泽东的欢心。他总是打断她的话。甚至当江青引用一段她认为很适合当时形势的“最高指示”时，毛也厉声喝道：“别提那个！”

晨曦微露，这些中国的老少精华们倒在椅子里，热得直摇扇子。江青好几次指责一个她不喜欢的红卫兵头头。“韩爱晶，我多次指出你的错误，对此你有何意见？”这时，毛泽东突然站起来说：“不要批评他。”毛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非常严厉地指责江青：“你总是责备别人，从来不做自我批评！”就在这次会议结束前，江青又批评韩，认为韩只考虑了遥远的未来，而从未考虑眼前的情况。毛打断她的话说，“想的远一些好嘛。”“他不错！他不错！”

毛泽东认为小将们一定非常困了，他们应该到韩的屋子里去休息。江青再也无话可说了。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并非一个。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也与当初毛和江所设想的不一样，与设计的蓝图相差太远。文革后期事态的发展完全被始料所未及的事件牵着走，而不是象初期想象的那样。此外，没有江青，可能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可以肯定，毛也不会将这场运动叫做“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事业上处于低潮转而将江青作为他的同盟并在思想上受她前所未有的影响时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将意识形态和艺术问题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反映了她的特殊兴趣。文化大革命戏剧般的表现形式同样体现了她的风格、特点。令人厌恶的个人崇拜，将毛从一个政治家变成了半人半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江青坚持要求毛泽东成为“乔治王”。因为她感到，把毛泽东抬得越高，她就越光彩。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党组织受到谴责和被解散，是与江青强烈要求报当年在延安立下的婚姻协议的一剑之仇分不开的。

没有人能理解文化大革命①。或许根本没有什么需要人们理解的东西存在。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虚荣、挫折和复仇的欲望是不会有理性的。当时，确有许多人在诚心实意地关心着他们所支持的事业。但是江青知道，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深刻的意义。她几乎根本不关心对于人们象精神食粮那样的问题（戏曲除外）。她在政治上确实无知，但这不是关键，起作用的是她和别人的关系，以及她那充满迷惑力的个性，天生的政治手腕——令人着迷的魔力，追求戏剧性效果的意识，受到鼓励时那无休止的精力和善于玩弄力量平衡的本能。

① 刘少奇本人就说过，他根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陈毅外长说：“要是我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就不存在什么文化大革命了。”——原注

对江青来说，文化大革命包含着个人的意义。她那精神上独立的要求、抗争的意志、渴望复仇的倾向——她年轻时代的这些特点——完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了。

江青有时主张过激，有时又不希望这样，如早在1966年秋，江青就要求形势有所缓和。但是无论采取哪种立场，她的头脑中都没有辩证法的思想。1967年的后期，毛泽东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面收缩，江青变得心情忧郁，这不单单是因为政治美梦破灭了，还因为军队介入了权力中心，必然使她的政治权力受到削弱。

如果说江青穿上军衣不象个真正的军事将领，那么可以说，她更象一个摆在小商店橱窗内的时装模特儿。江青既不是“右倾官僚”，也不是林彪的“左倾”勇士。她为文化大革命这场疯狂的演出所穿的服装可能非常可笑，但她毫不在乎。因为她比别人更清楚，那不过是服装而已。在关掉舞台上的灯，擦去脸上的油彩之后，对江青来说，重要的不是她的艺术，而是她的生活。①

---

① 那些在江青个人的表演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的这一结论面前感到有些惊异不解的读者应注意四个方面。其一，北京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粉碎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但是江青事先并不了解这场运动的政治意图，所以一直未在这方面采取什么立场。其二，她为了整垮她的大多数文革敌人，因而对他们进行的政治观点错误和行径恶劣的指控均是假的。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在江青倒台前就持这一看法（北京现在也这么说，她的指控全是假的）。其三，关于江青成年生活的整个经历充满了主观的看法和复仇的欲望。其四，江青在那动乱的文革期间的讲话中，在她倒台后发现的她在那些年的非正式的谈话中，以及在对维特克谈到她的经历时，都反复强调她的私敌，她的私生活——病、服装、家庭、照片——而不是谈大众的政策（所以，维特克在刻画江青文革经历时，主要依据“文件记录”，因为江青自己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与那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是根本不一致的）。——原注

文化大革命快要收场时，阴影笼罩着江青。她那权力鼎盛的10年结束了。现在，她在这个国家的名声几乎与她50年代的不出名一样引人注目。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这次大会很难说因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表面“成就”而象毛泽东所宣布的那样是“团结、胜利的大会”。因为新生的军人势力和正在掌握实权的左派之间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正箭拔弩张。在“穿军装的”和“坐直升飞机的”①之间的斗争中，毛泽东举棋不定。可是他那位“坐直升飞机”的夫人江青，却成了中国的统治集团即中央政治局21名成员中的第一位女委员。

文化大革命为深深陷入政治斗争的中国进入70年代制定了计划，选好了演员，制定了尔虞我诈的策略。江青，这位文化大革命中搞戏剧的政治人物，当仁不让，成了把60年代的传统带进70年代的最强有力的继承人。

“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曾这样对江青说。江青的所作所为的确常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他已经有点意识到让他的妻子担任高职位是不合适的。“我从来就不赞成自己老婆做办公室主任。”不久，毛泽东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曾这样说。他当时指的是林彪的妻子叶群（叶也是政治局成员）。他可能也指江青。

江青跑到香山公园，去找奇花异草的种子。她认为这些植物将会给她在中南海的花园增添色彩。江青的这一行径也表明了她在政治上的堕落，行为上的做作和思想上的封建专

① 这是邓小平的话，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能力不大却升得太快的人就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原注

制。同时，也反映出60年代末北京的政治局势。

江青是政治局成员，她到香山去游玩，要带上一大帮子警卫和服务人员，而且还要求地方高级官员陪同。一行人到公园时，陪同人员请江青看看佛像。江青此行是为了找些花草来美化自己的花园，因此她严厉地提醒说要注意“革命化”。陪同人员说，五百罗汉的塑像好极了。江青这才勉强来到碧云寺。在那儿，陪同人员非常自豪地让江青看到一组被作为封建迷信物品上缴来的战利品。这是他们用来证明他们“百分之百忠于毛泽东”，也是用来“教育”香山游人的。有佛像、供品、中山服和一顶帽子，还有一尊新塑成的毛泽东的半身像！

看到毛泽东的像跻身于宗教神龛之中，江青非常生气（她对不找种子而到这里来也非常恼火）。她立即下令让公园管理处把所有与毛泽东有关的东西从寺中统统撤走。她虽然涂脂抹粉，但那忿忿然的样子却向人们表明，她已经56岁了。她象演戏一样宣布，她要“买些”食品送给公园里的人——亲自扮演一次救世主的角色——当工作人员争先恐后地把米饭、鱼和甜点心悄悄塞给愕然的旁观者时，江青大声喊着：“吃吧！吃吧！”

第 七 章

想 当 女 皇

（70年代）

谁都不合她口味。只有一个人——她自己。

——毛泽东论江青，1974年

1971年初的一个晚上，江青请几个可靠的追随者在颐和园的听鹂馆吃饭，这是一个世纪前很为皇太后所欣赏的戏院餐馆。江青喜欢历史的联想。那古老陈旧的餐室，有蒙着金黄色台布的厚重餐桌，面对着为慈禧演出京剧的露天舞台。厨师专为江青准备了风味菜点香酥鸡和从湖里打上来的鲶鳡。

饭后茶余，在缭绕着一层淡蓝色暮霭的昆明湖旁，一行人沿着蜿蜒小径漫步散心。忽然，江青在排云殿墙上的巨幅标语前停住脚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每个字有六英尺高。这在当时司空见惯，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生着这种红白相间的意识形态皮疹，因此挂在这里似乎没什么过错。但江青此时却是惊异与气愤交加，象是生了根似的立在这里，一动不动。因为，这些话虽然出自颇有名

气的青年烈士雷锋之口，但这里的笔迹却是林彪的！江青义愤填膺：林彪竟然想给公众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他是这个口号的作者。正象毛泽东几次力图使她相信林彪正在刻意搞个人崇拜那样，这一介武夫正在利用对毛泽东的崇拜抬高自己的声望。“主席的力量就在文字上。”她对随行人员咕哝着，显然在暗示，林彪大肆张扬自己的字迹是一种政治上的犯上行为。

江青没好气地回到她的汽车里。她开始明白，林彪为什么在对真理的圣水器顶礼膜拜时着了魔似的要以“毛泽东思想”去取代单纯的“毛泽东”。在她的轿车不断鸣笛返回中南海的路上，她心情阴郁地想到，这个讨厌鬼是在提示中国人民注意，毛泽东的魅力离开毛泽东的身躯依然可以存在，这种魅力可以以一个新手作为传播媒介。这个媒介就是林彪！轿车抵达她的住宅时，她正陷入一个骇人听闻的幻境之中：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直盯着写在语录牌上的毛主席语录，都是她的狡诈对手林彪的笔体，人们如醉如痴……

在毛泽东的晚年，江青忧虑、谄媚，在发觉难以接近毛泽东时又夹杂着憎恨。她日夜生活在非此即彼的两种未来前景的阴影下：替代毛泽东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从而能在不沦为男人附属品并无拘无束地自由表现这一她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中赢得最终胜利；或者是当某个站在她丈夫肩膀上的暴发户不公正地飞黄腾达时，她却一落千丈。

毛泽东的有些同事真怕他会万寿无疆；另一些人则惶惶不安，担心他去世太快。林彪是第一种人，江青是第二种人。江青需要一个活着但却衰弱不堪的毛泽东。林彪、江青二人在毛泽东去世时间上表现出的不同利益，使他们在力争成为毛泽东最忠实解释者方面的敌对关系无法缓和。

林彪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军队的统帅，但却是个羞涩的人物，除了偶尔闪过一丝迷惑人的微笑外，总是一脸苦相，看上去胆小怕事。他是一个军事家，但在其他领域却相当浅薄。而且，他搞政治的方式是与传统中国的政治方法如出一辙的宫廷密谋。

林彪与江青，这两个人有天壤之别，但与文化大革命的联系却把他们绑在了一起。毛泽东的时代即将结束，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公里土地上，每时每刻都能感到有这样一种明确的意识；林彪和江青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后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接毛泽东的班的愿望。林彪和江青互相利用。以往他们合作顺利，并取得很大成功。但是从7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成了个互不信任的大酱缸，在北京当局四分五裂时，他们的相互利用出现了风波和不确定因素。

毛泽东对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说，象他自己和戴高乐这样的人，没有接班人。1970年，正是林彪发现了，当第二把手犹如生活在死囚牢中，这就象60年代初的刘少奇一样。至于江青，她看到自己可以利用老人的猜疑之心。

当江青正在加强同林彪的联盟关系时，毛泽东对林彪作为中国领袖的观点、性格和能力已产生了怀疑。在1966年春季的一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曾说过，林彪的某些想法使他很不舒服；正是在这一时期，林彪对毛泽东谀辞如潮，企图把毛泽东在政治上束之高阁，使之成为不发挥实际作用的圣徒。在此之前的1月份，江青和林彪的夫人叶群在人间天堂苏州谈过一次话。叶群是个粗俗的女人，既没有江青的姿质，又不具备王光美的尊贵。叶群告诉江青，林彪感到沮丧，糟糕的身体使他无力“为中国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也许只

有江青才能真正理解林彪的感受，她本人也是疾病缠身。江青回答说，她知道这些情况，但她认为，尽管如此，林彪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了。她还特别强调指出，已经59岁的林彪还相当年轻。她在暗示林彪具有接毛泽东班的美好前景之后，紧接着来一番赞美之辞，什么林彪对毛泽东是多么有价值呀，什么林彪如何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的思想呀，不一而足。

正是在这次谈话后不几周，林彪就邀请江青做了军队的文化顾问。江青和林彪开始在政治上互相撑腰，而叶群则对自己的新朋友寡廉鲜耻地吹捧（“保卫江青！”在江青的一次发言时，叶群这样喊了17次）。

江青曾和林彪联手合作反对刘少奇。江青对军内“走资派”的讨伐帮助林彪剪除异己。江青对叶群说：你恨谁，告诉我，我帮你收拾他。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林彪向江青报以干巴巴的、转瞬即逝的一笑，并且说她是“我们党杰出的女同志”。他命令把江青的级别从九级提到五级，这是个非常之高的等级，一级干部只有毛泽东一人，二级只有林彪才是。在一份秘密发言中，林彪解释说，过去，由于江青的身体不好，了解她的人不多。这次，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看到了她所起的巨大作用，看到了她旺盛的创造力。这个发言也许讲了许多毛泽东不愿意说出来的话。在江青办公室发出要求批改的一系列文件上，都可以看到林彪亲笔所写的“完全同意”。

叶群也成了江青和空军首脑吴法宪之间的桥梁，吴法宪为江青行使权力提供飞机、枪炮和人手。叶群的一举一动，恰似江青膝前的一只哈叭狗。她把军事信使从遥远的东北买来的裘皮赠给江青，并向江青提供陆、海、空三军军装，以

便她在重大场合穿戴。一位关注这种关系的观察家说："为了江青，叶群甘愿趴在地上吃马粪，还说这是美味的奶油蛋糕。"

据说，林彪曾以他那直率的方式告诉他的同伙，他一直在为什么事操劳："从1965年以来，为了夺取刘少奇和邓小平交给罗瑞卿（军队头脑，文化大革命第一批受害的高级干部）的权力，我紧跟B52（林彪称呼毛泽东的代号）并同江青建立了联系。"

林彪越来越烦躁不安了，不甘心做毛泽东的继承人。他愚蠢地表现出急不可耐的心情，等不到这个伟人的去世。毛泽东觉察到，林彪正在竭力拥兵自重、仗势欺人，赤裸裸地演习着当国家首脑的闹剧，反对他为尼克松敞开大门的计划。

在1970年和1971年上半年，当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从不自在发展到大祸临头时，江青与林彪的密切接触虽然没有中断，但却大大降温了。她尚不能摇身一变对林彪反戈一击。他们在许多方面要互相帮助，并且始终在密切合作，以抵御文化大革命中死灰复燃的"走资派"对他们的乌合之众进行报复的威胁。而且，如果林彪不能接毛泽东的班，那么，与毛泽东地位不同的江青，也还要在林彪手下做事。然而，江青和林彪之间的竞争还是可以感觉到的。当时，一位精明的中国知识分子私下评论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变成了江青和林彪争权夺利的斗争。"如果毛泽东和林彪最后摊牌，她将揭发林彪。对此，她没有任何糊涂观念。由于复杂的原因，她同中国的很多人一样，对林彪是否有勇气接毛泽东的班也持怀疑态度。

1971年暮春，毛泽东和林彪的最后摊牌已是大势所趋，

难以逆转。在毛泽东反对林彪的艰难作战中，周恩来这位始终在剧情发展中露面的“舞台监督”成了毛泽东最重要的同盟者。他们面对的是握有军权的林彪、把林奉为文化大革命领袖的林的信徒和林已作为毛泽东亲自遴选的下一位中国领袖而载入党章的身份。但是，江青并未放弃她与林彪及其诡计多端的随从们的联系。她并不真的要让林彪接毛泽东的班，但他们之间互相利用的尔虞我诈的游戏并没有完全结束。

4月29日，在毛泽东和林彪久已停止定期交谈之时，叶群对江青说：“每次在困难关头，都是您江青同志给予帮助。对此我万分感激。”江青正与毛泽东的正式副手保持着距离。5月2日，她在给叶群的电话中说：“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林副主席了。他如有时间，我愿去看望他。”或许，江青并不象毛泽东那样深信林彪已经完蛋了。

江青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林彪提出让她给拍一张个人小照。在林彪家中，江青给林彪摆了个坐在椅子上读《毛泽东选集》的姿势。四年前，正是在这里，她用后院的炉子烧毁了关于她以往生涯的一批材料。林彪没戴帽子，这是非同寻常的；按常规，他总是坚持戴上帽子，以便遮住他的秃头。江青对这副照片很满意，批准刊登在7月和8月出版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并加上了她亲笔书写的标题：《孜孜不倦的学生》。

8月份，当毛泽东收紧套在他副手身上的罗网时，林彪写条子鼓励江青承担毛泽东的某些职责——“即使这会给你的身体健康增加一些负担。”同月，江青去她学生时代住过的港口城市青岛旅行，林彪为她提供了一切方便，甚至包括一位老资格的官员在她于该城市旅行期间为她开关车门，在那些古老的风景胜地为她拍照。在青岛礼堂，她让人在毛泽东

像旁挂上了一副林彪的近照——这两人现在实际上都正决心搞掉对方！

9月8日，在林彪和叶群生命的最后一刻，叶群从北戴河的海滨别墅给江青打了个电话。在这里，林彪的随从以度假和庆祝林彪女儿仓促的订婚为借口，正筹备在他们的南方堡垒广东成立另一个政府。叶群不动声色地对江青说："林彪同志向您致以热情的问候，他说很关心您的身体。"叶群还告诉江青，林家给她送去一些绝好的西瓜，是那种她在入夏时最爱吃的品种。在这次令人惊异的通话快结束时，江青说："告诉林副主席不要担心。"

9月12日傍晚，江青在她位于颐和园内的别墅度过了几个小时，茶点中有林彪送来的几个西瓜。在与这里的服务人员分享这些西瓜（这些瓜都是温的，她受不了冰镇西瓜）时，她兴致很高地说："林副主席给我送来这些瓜。我来给你们每人分一块——这是副主席关心我们的象征。"

几个小时后，在北戴河（在北京也许更早一些）经过短暂的交火之后，空军的三叉戟飞机载着林彪、叶群和一些追随者在紧急状态下起飞了，两个半小时以后坠毁在蒙古境内。在飞机残骸内没有发现一个幸存者；林彪和叶群俱已丧生。那天晚上，毛泽东说："让他走吧，他走不远。"四年后，毛泽东又说："如果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与丈夫相比，对林彪死到临头这一点，江青似乎所知无几。

当时在中国，与出头露面的需要相比，追求真理的需要似乎一文不值。几个月后，江青就把林彪说成是她不共戴天的死敌了。那是在12月的一个夜晚，地点是广东的一个宾馆。冬天，她常来这里休息，以满足她不断变换环境、呼吸南方生机盎然城市的空气（这里很容易搞到香港的影片）的

冲动，并能在她的兰花园中信步漫游，享受温馨的夜色。

她的随员不仅包括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而且同她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身份相称，陪同前来的还有她的政治嫡系中的一些人，其中很多是年轻人，左翼分子和生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

晚餐包括她认为对她的健康至关重要的鸡汤和汽锅鱼，还有南方朋友介绍能维持性欲的鸽子。饭后，她开始谈到“僭越者”。说是林彪不仅要当皇帝，而且还不择手段地迫害她！他们是否知道：他在她的食物中下毒；他指示一家制片厂用浅红色的显影破坏她的业余摄影；他派来的破坏分子在1971年春曾折磨她和毛泽东，以致他们不得不从中南海的住宅搬出来，住在一家饭店里。

在说到林彪搞的疲劳战术拖垮了她的身体和精神时，她弯腰按摩着自己的踝关节。连续的不眠之夜使她本身就虚弱的心脏越发疲劳，她几乎听不见声音了，眼睛也直直地凝视着远方。她大胆地提出，在所有阴谋反对毛主席的人中，实际上林彪最阴险，最野蛮。

这是一种旧式的表演，是女演员的职业作风和多疑型精神病的绝妙混和。

是的，江青的捏造掩盖了与林彪有关的事情的真相——其他人也是这样。如果真相是可以改变的，那么，绝对不能改变的东西就是真相的根源：党的权力中心。一些人攫取这种权力的竞争是厚颜无耻的。因为，当毛泽东去世后，一旦如此之大的权力到手，便可横行无忌了。江青尚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但对她来说，林彪倒台的最重大的后果便是：周恩来的威望现在达到了顶峰——没有他，毛泽东就不能战胜他的副手。这位舞台监督将直线前进，出任导演。这是她前

进道路上又一块巨石。

在中国传统中，只有那些在无论什么行业中都证明自己有独立人格的人——这实际上从来与女人无缘——才是肩负振兴社会使命的出类拔萃者。过分自信的江青似乎落在了这类范畴之外。绝大多数不喜欢她的人始终把她视为一位惹是生非的夫人。只有少数人才意识到，在个人心目中，她已把自己置于儒家传统之内；她的自我表现是正当的，因为她为了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始终在训练自己！她早已从中国4000年历史的角度把自己看成这样一个女人：在她身上，个人的自我实现同对中华民族大慈大悲的治理作为一个目标已融为一体。

在为作一个独立的、反传统的女人而争斗多年后，她可以将枷锁转变为羽翼了。甚至可以利用习俗来支持她那独一无二的“英雄主义”尝试。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女人，她曾皇袍加身。

一千三百年前，从一个玩偶上升为女政治家的武则天，与江青的崛起有类似之处。倔强而又美丽的武则天，是从做妃子开始的——这是旧中国女人获取权力的唯一途径，后来她成了中国的凯瑟琳大帝。

她自称“圣神皇帝”，并建立了自己的朝代，改国号为周，使唐王朝一度中断。佛教徒们，象江青时代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家一样，摇唇鼓舌，为一个女人登上以往一直为男人垄断的位置大作论证；他们搞出了一部箴言集，颂扬武则天是赐予中国的最大的福分，并道破天机：她是阎罗派来治理天下的阎魔的化身。

考虑到整个帝国系统内处处有阴谋存在和所有决策实际

上都受到继承问题的干扰这样两个事实，应当说，武则天进行了成功的统治，当她81岁时，她那个女人当家的王朝和某种程度的启蒙才告结束。她实际上主宰了中国50年。

以往对中国历史不屑一顾的江青，现在突然成了如饥似渴学习武则天和其他接近王权宝座的伟大女性生涯史的学生。她的个人图书馆里充满了有关书籍。她那个盲目迷信的忠实小集团中有一伙笔杆子开始迫不及待地准备文章，证明至今普遍认为只是个色欲和权欲同样旺盛的泼妇的武则天皇帝，由于是“反孔孟之道的”，所以也就是“进步的”。江青总是对她的幕僚们说：“女人可以当皇帝，即使在共产主义时代，也可以有个女统治者。”

江青面对的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有两个铁的规律似乎在嘲弄她：从未有人认为女人能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在政治活动的前台，从未有一个女人充当过令人肃然起敬的角色。可以预言，每一位中国女性在这些亘古不移的真理面前都得低头认输。

武则天成了皇帝，但这是绝不会重演的异常情况，而且人们认为，她是用暴力和淫欲扒开一条通向王位之路的。在中国史书中，奉为楷模的帝王之妻都是那些绝不利用本身地位变为政治家的女人；那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行使权力的女皇都被认定是邪恶的，是灾难性的。当北京的知识分子在私下谈话中开始把江青叫做“武则天”时，他们的意思是在丑化她。

江青开始以赞赏的口气提到历史上那些皇太后中的一位——吕雉。公元前206年建立了汉王朝的刘邦是她的丈夫。在丈夫去世后，吕皇后囚禁了原定的帝位继承人，斩断了他母亲的手足，然后把她自己年幼而又温顺的儿子昭帝扶上了帝

位。她治理这个王朝16年，虽然并不特别成功。昭帝长大后，吕雉谋杀了他，从皇族中具有相应身份的儿童中找了另一个男孩子，代替昭帝登上宝座。在吕皇后华丽的长袍下，他只是个木偶；吕雉则是个“口技艺人”。吕后一死，官僚和将军们就诛杀了她的九族，恢复了公认的男性领导。

在风格多样的中国历史道德戏中，吕后是个反面角色。但是，江青不动声色地放出了这种话：对吕后的一生应重新评价。在江青心目中——在涉及历史时她的头脑里不能说有丰富的知识——有三个因素可以抵销吕雉的冷酷无情，这些因素都与江青本人在70年代共产党中国的切身需要密切相关。

第一，吕雉在她身为皇帝的丈夫于公元前195年去世后，表现出足够的能力和勇气，驾驭着中国国家这艘航船坚定不移地前进。

第二，吕雉不是放荡不羁的女人。中国人总喜欢让自己相信这类女人的私生活是糜烂不堪的。但是，吕雉在很长时期一直是刘邦的妻子，她攫取到政权时已经老矣，对性生活不很感兴趣，因此，很难把她描写成一位荡妇加政治家。

第三，在建立汉朝的斗争中，吕雉站在她丈夫一边，同甘共苦，度过战乱岁月，从而证明了她的勇气。

在所有皇太后中，江青时代的中国人尚记忆犹新的一个人物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慈禧（1835—1908年）。她也是从妃子升为皇后的，因为她碰巧是这位皇帝的独生子的母亲。她那皇帝丈夫1861年死去，结果是慈禧对中国近50年的统治；这种统治是以密谋、杀戮和对力量平衡的敏锐感觉为基础的。她利用自己的亲戚，挫败了一伙老臣对她刚愎任性的统治的反抗。在严密的控制之下，慈禧把她自己的儿子送上了

王位，这就是同治皇帝。当同治帝于1870年夭折时，她又挑了自己的侄子续位，这是光绪皇帝；当这位皇帝开始对反慈禧的改良派表露同情之心时，慈禧又幽禁了这位有趣的年轻人。她的统治恩威并施，还选用了一些才华出众的谋士。她的思想没有象武则天皇帝那样迷失方向，她考虑的主要是国家大事，而不是情爱缠绵。要不是她，中华帝国恐怕到不了1911年就寿终正寝了。

江青对慈禧皇太后的观念和权术极感兴趣。但她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赞扬慈禧。这一方面是因为慈禧没能御西方人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以极其光荣的方式埋葬的旧制度中，慈禧是个活生生的组成部分，人们怎么也不能从昨夜的敌人中选出一个奉为自己的楷模。

一位曾在1969年见过江青的熟人说："1971年，当我与她再次见面时，她的声音有了某种变化。"以前，江青时常颐指气使，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充满自信。现在，"她的声音中有某种紧张而又绝望的东西。"60年代末的政治灾难夺去了江青的泰然之态。她常毫无节制地大发脾气。她那种被敌人团团包围的感觉，经常被夸大到荒唐的地步。她已经变得更加爱虚荣、更加自高自大了。

上述那位来访者回忆说："江青象一股小旋风般走进来，喊喊喳喳说个不停。她的声音又高又急。她坐立不安——坐下，站起来，又坐下，用递给她的热手巾擦脸，擦手臂和臂肘，擦脖子和腋窝，好象刚从地里干完活回来……"

这位来访者发现："你问她剧院，她告诉你她的病情；你问她'继续革命'的概念，她给你讲述某某人如何凶恶地对待她。"

象林登·约翰逊一样，江青不可遏制地有一种展示其身体某一部位作为谈话“伴奏”的冲动。她总是扒开她的大嘴让人看一只被打断的牙齿：这是个男人干的——难道作为人类半边天的女性所受的苦难还不令人震惊吗？她总是扯起自己的上衣，向人指点着一处微小的疤痕：这是一条狗干的——革命的敌人是不是无所不在？

江青靠自己的本事成了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一位最不寻常的政治人物。在中国，政治是经济加地理再加枪炮。但是，江青只有几个小利益集团作为她自然的支持者，说到地方的根基，她几乎是一无所有（除上海以外）。她的权力是个人的。她的资本不是政治上的多数、军事部门和工业产品，而是个性。她没有选民；她有信徒。她不擅长搞清谁与谁有历史渊源，也不善于预测下一个经济政策上的斗争可能是什么，但她在发现有野心的年轻人或觉察哪一个重要婚姻正在搁浅方面却是个天才。

关于武则天在其皇帝丈夫走下坡路期间的情况，人们这样写道：“满朝文武已经开始认识到，作为皇后理政的武则天，已不仅仅是对皇帝施加影响的便利渠道，而且是头脑清醒、名副其实的女主人。”江青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对毛泽东施加影响的一个渠道，她是酝酿中的政治行动的名副其实的女主人。人们再也看不到她赠送签过名的《毛泽东选集》、集忠实妻子和临时的公开代理人这二重身份于一身的形象了。

象武则天皇帝一样，江青对高级官员的敌意是与她对低级官员的偏爱相辅相成的。这是这两位身居显要地位的女人偶然相同的“革命性”所在。她们决心攫取权力的包天之胆——中国文化的每一根纤维都与这种念头格格不入，需要唤起一个“新世界”，以弥补“旧世界”的失衡。因此，发掘

出被埋没的“最杰出”、“最能干”的干部，就是她们唯一的希望。

70年代江青所处的地位，就象40年代的罗斯福夫人一样。据记载，当时白宫极其糟糕的膳食就是埃莉诺·罗斯福“有道义根据的平静报复”。“如果她的丈夫非常不愿意吃饭，那么这就是在她也不满意的他们那段共同经历中发生激烈争吵的原因。”江青的“平静报复”采取两种形式。她利用毛泽东的权威打倒那些对她不好的官员，提拔那些忠实于她的官员。文化大革命的上层受害者中有一半人是江青个人的敌人；极左分子的新派系中有一半以上是她个人的门徒。

在地位逐渐上升并研究了那些医阴谋和暴力而荣辱沉浮的皇后之后，江青成了保安狂患者。一个谣言使她对来自中南海上空直升飞机的袭击惴惴不安。军用直升飞机会不会在禁卫军8341部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时趁夜色猛扑下来？炸弹可能会掉进她的卧室；或者是直升飞机的乘员们跳出来，把她拖上飞机，送进一个比武则天设计的刑讯室还要糟的地方。

江青感到，为对付居心不良的直升飞机，需要在她那建于明朝的居室房顶上搞一些“特殊设施”。她小心防范，以致不敢公开地同她的幕僚们讨论她所感到的危险。她召来卫士长，向他一一指出她所预感到的危险所在。这位卫士长是康生派到她这里来的，对康生那一套非常精通。她象是在导演一幕京剧，先指指天空，然后又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胸脯。她的卫士长已经心领神会了，因为他可能听说过军队中有个“反太后”战斗队发誓要把江青杀死在睡榻上的谣言。

对精美的琉璃瓦房顶进行了勘查，小心谨慎地搞来了陆

基回旋炮，大量的钱从修复佛教寺庙的基金中拨了出来，支付这些浩大的费用。直升飞机袭击的事没有发生，但8341部队增加了一个机关炮排的建制（江青倒台后一年才撤消）。

在身体状况不好、越来越依靠各种药物时，江青深信，她的医护人员在搞传统悠久的宫廷阴谋，为了杀害她而给她吃错药，他们服务于某个隐藏在上层的敌人。

一天晚上，一位姓赵的护士给江青送来她每晚必服的安眠药，江青默默无声地服了药。一个半小时以后，江青按铃召唤赵护士：我的安眠药究竟在哪儿？赵护士告诉她，她已把药吃了。但江青说没吃过，并坚持要吃第二次。第二天早晨，她感觉非常不好，四肢几乎不能挪动。她向另一位工作人员肯定地说，赵护士是林彪余孽派来的特工人员，给她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想杀害她。当另一位助理护士嘲笑她这种念头时，她竟然用剪刀戳她。江青命令在钓鱼台宾馆17号楼对赵护士进行长期“调查”，这个姑娘失去了护士徽章和执照。

绝对的权力是人格的放大镜。武则天皇帝的一位传记作者写道：“专制君主就象一个在硕大无比的哈哈镜前搔首弄姿的戏子，这面镜子以夸张的尺寸投射出他的一举一动。”

这一点对江青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她参与政治活动伊始就是搞个人自我表现。70年代初，在中国，她的微笑是大丰收，她的蹙额是大地震，她不点头，整个官僚体制就陷入僵局。

武则天皇帝深深引以自豪的一件事，是她曾训练出一只猫，它可以与鹦鹉在一个笼子里平安无事地共同生活。这种把戏说来也简单，不过是随时供给这只猫大量它所喜爱的食物。一天，她让人把这只笼子拿到议政厅，一一给在座群臣

过目，使他们好奇不已。在武则天心目中，这只色彩斑斓而又驯服无比的猫简直就是她的英明睿智和气度才华的象征。对她来说，让众官员看一看并拍手称奇是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周围环境也许刺激了这只猫，它发动突然袭击，咬死了一只美丽的鹦鹉，并开始吞噬。女皇差点儿从宝座上掉下来。议政厅内窃笑声四起，难以压制。女皇脸色铁青。会有严厉惩罚的，而且绝不仅限于猫。

江青的猴子对江青来说象武则天的猫一样重要。江青对男人的阅历越多，就越喜欢自己的猴子。她给它穿丝绸衣，喂美味佳肴，教它恶作剧。当随行人员在江青那广东的兰花园内散步时，它会突如其来地扑上来，吓唬人们。70年代中期，是否向江青的猴子谄媚，是检验工作人员是否忠诚的石蕊试纸。傍晚在兰花园散步时，这只猴子常出其不意、龇牙咧嘴地窜上人们的肩头，你是否能泰然自若、处乱不惊，这是表明你政治观点正确与否的必不可少的标志。

外国报刊关于江青正在积蓄力量准备接毛泽东的班的评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冲击。对这种冲击，江青颇伤脑筋。后来，她授意设置了一批书刊检查员，在这些刊物送达中国境内的读者手中之前，把那些谈及她的文章从这些外国杂志上撕下来。那些手捧中间缺了一两页的外国杂志的人，只能仰天而坐，慨叹江青的抱负、敏感和任性。

不向全体选民负责的权力不仅会产生腐败，而且由于它允许个人的性格膨胀成一个自成一体的宇宙，不参照超出它自身的东西，不受批评的刺激，不受和解、忍让之习俗的约束，还会宠坏权力持有者的随从们。

大权在握的江青谈论起世界、她的同事和各种政策来，就好象它们都已降格到有她在其中做头面人物的市侩生活层

次上一般。她说苏联人是个讨嫌的邻居，他们污染了空气，而且难保不会钻到她的篱笆内偷鸡。她说周恩来总能恰如其分地把握时机，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林彪是从街头上来的前情人，他的伙计们对她造谣诽谤，散布街头巷尾的无聊闲话，还破坏她在基层戏剧界的工作。姚文元是个俯首贴耳的男仆，从来不找麻烦。毛泽东，她虽然并不总是理解，但需要他的保护，然而毛泽东有时会否决她颇为得意的计划。至于住在附近茅草屋里的“群众”，则只是供她作为市侩式第一夫人登场献艺的戏台子。

驱使江青的政治活动落入个性化和任意武断这一模式的，无论有多少是出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她作为女人而向上爬的个人奋斗，结果是令人震惊的。革命被背叛了；伟大的人民象温顺的绵羊被人驱使；整个民族偏离了经济发展的轨道，转向宫廷政治的愚蠢的模式。

黄华在谈到江青1972年一次非同寻常的自我表露时，愤怒地对他的客人说：“毛主席从不向别人公布他的私生活。”罗克珊·维特克是一位杰出的、意志坚定的中国史学者，她在北京和广东与江青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听江青谈论对生活、中国革命和她本人的看法。“我在你面前作一次自我解剖。”江青愉快地向维特克表示。她的观点同中国传统和共产党人的实践都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

其实，毛泽东在30年代曾向埃德加·斯诺畅谈过他的私生活，以后又多次不那么公开地谈到过。但是，黄华这位前外长所谓“从不”只是加重语气。在这个微妙的领域，毛泽东是我行我素的。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只有毛泽东才可以向别人公布他的私生活。”

然而江青却揭开了她自己的面纱。她又一次越过了可以允许的界限。

这是一个“全新的江青”，她刻意雕琢出一个蔑视她的敌人、中国政治传统以及她自己以往真实面目（令人遗憾）的人物形象。她没有征求毛泽东的许可就会见了罗克珊·维特克；江青一定知道，他是不会批准的。但是，现在她正在超越毛泽东，她的形象不是毛泽东的妻子，而是一意孤行的人。她对维特克并没有过多地谈到毛泽东。她谈到她自己，她说她与毛泽东不同，地位也不那么高，但却是一位“不相上下的革命人物”——她在毛泽东身边学到了很多东西，已经武装起来了，就要从他那双颤巍巍的手中接过整个国家。

这还是那同一个老的江青，淑蒙，云鹤，蓝苹，她要表现自己，要人们理解她的方式，要人们注意到她有我行我素的独立精神。

江青希望，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抹去了她与蒋介石集团接触的蛛丝马迹之后，她在1972年就可以给自己描绘出一副共产主义斗士的肖像了，她好象还在十几岁时就已经藐视资产阶级了。在她假定她已经从历史中撕掉了有关证据（是俞启威最早使她成为政治上的积极分子的；她的魅力和自私驱使唐纳多次想要自杀）之后，她毫无顾忌地把这样一种形象强加给维特克：她是个只事一夫的女人，毛泽东的“支持者”，能够继承他的事业的人。

如果说江青正在为维特克填补她认为因销毁了许多关于她在上海早年生涯的记载而形成的空白的话，她并不是以真实反映她精神和思想的故事去完成这种填补。除了她第一个丈夫——年轻的费先生外，她在谈话中对她的第二任和第三任丈夫缄口不提，而且，她一次也没有提到武则天、吕后和

慈禧太后的名字。她生活中的男人和她梦想中的女人都被省略了，这就象牛排晚餐没有牛排一样。

当然，毛泽东肯定不喜欢江青向一个外国人谈论唐纳或武则天皇帝。他对这次访问谈话的整个主意都不喜欢；他责备江青搞了这次谈话——这实际上使她的个人激情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他觉得这种行动本身就是想要当女皇。

江青对维特克所讲的关于内战的话根本不必注意，只是除了这样一件事：毛泽东吃饭口味不高，总是吃饭桌上离他最近的一个盘子里的菜。她另一个罪过是用红笔在她送给维特克的照片上签字——在旧中国，朱红色是皇帝御笔的标志。

北京是否有这样的高级官员，他们高兴地看着江青自我暴露的行径，并感到她已自投罗网了？江青当时丝毫没有感到不安。她在会见维特克前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周恩来写条子答复她说："谈一个小时即可。"她没有理睬这一建议（这实际上是指示）。但是，当江青同维特克的谈话继续进行时，总理进行了干预，敦促她"只谈文学艺术，不涉及其他"。这使江青大为恼火。她瞪着周恩来的字条，当着送条人的面，冲着不在身边的周恩来大声吼道："你少管我的事！你胆子不小，竟敢包围我，攻击我！"

江青向她的美国客人显示，她既是好斗的，同时又有女人气。她向这位年轻但阅历丰富的学者进言，告诉她怎样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又告诉她怎样喝莲荷酿制的饮料以增加排尿。她认为，她们俩都应在生活中找到一个崇拜的对象——这是个绝妙的观点。当维特克承认，她在这位中国女领导人身上看到了一位老师时，江青欣喜若狂，好似升入九重天。

维特克乘飞机去广东与江青会面，飞机的睡榻上铺着丝绸被单，这种被单曾经是中国前一位女政治家——蒋介石夫人的权力象征。在这两种不同的场合，男性批评家们都认为夫人走入“极端”了。一天晚上，在餐桌上，江青拿出一个纸盒，这是她送给维特克的裙子。江青宣称：“我喜欢裙子，夏天穿上很舒服。”

江青怎么可能既是一位共产党人，又是一位自我迷恋的女皇呢？怎么可能既是一位干掉了许多人的邪恶女性，同时又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旅伴，絮絮叨叨地闲聊天，喋喋不休地谈论服装呢？这是因为，在权力争夺的环境中，她在个性和共产主义事业之间形成了一系列身份的缘故。当她看到她父亲殴打她母亲时就产生的反叛情绪，同无产者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阶级造反融为一体。现在，她看到，她对于维护女人地位这一目标的追求，需要她把中国共产党内的最高权力统统揽到自己手中。

1973年夏末召开的第十届党的代表大会，是江青的激进派和周恩来的稳健派打成平手的结果。毛泽东居高临下，仿佛对这场在他脚下进行的斗争不甚感兴趣，拒不选择另一位接班人来代替林彪。当毛泽东在与林彪的斗争中固守反左的逻辑并把邓小平推上前台时，江青很不高兴。她和邓小平在性情上格格不入，其差距之大，达到了两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可能达到的极限。这位“革命的”女皇怒不可遏地粗声喊道：“他是老反革命头子！”

江青行事象个听天由命的女人。如果历史注定要搞垮她，那她宁愿对反对她的强大敌手视而不见。

人们记得，有一天晚上，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作为主人招

待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过去的几十年肯定会一一浮现在她的眼前。30年代在上海，她曾乞求日本访问者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使之停止对中国的蹂躏；在人民大会堂，她“代表中国亿万人民”接见了打躬作揖的日本代表团，他们心神不安地盼望着中国观众会觉得他们的舞蹈是可接受的。江青喜形于色地送给芭蕾舞团的头目一张风景照片。日本舞蹈家们凝神一望，认出这是一幅著名的照片：李进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背面是毛泽东热情的诗句，题词是“赠李进”。

江青带着炫耀的神气挥笔在照片背面写了几个字：“江青摄”。这是个大胆的行动。多年来，中国读者都知道毛泽东的这首诗，但是因为人们把它当成一首抒情诗，李进的身份也就始终是个秘密。在这个洋溢着中日人民友好情谊的夜晚，江青决定向全世界宣告，李进就是她本人。

1974年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

这场婚姻已到了另一个阶段。1973年间，江青从中南海搬到钓鱼台宾馆一幢豪华的公寓。在对江青越来越发展的任性发了一顿脾气之后，毛泽东决定，今后如果她要来看他，必须事先给他写便条联系。毛泽东在1974年的那封信上继续说道：“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在毛泽东看来，江青同维特克的会面使其受害不浅。

然而，其状况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婚姻，绝没有就此告终；对双方来说，它始终具有个人的和政治的分量。

在60年代，这一婚姻曾热过一阵，因为夫妇双方的期望有共同之处：毛泽东当时需要江青，而江青则紧紧抓住毛泽

东的需要所给予她的政治上的机会去捞到每一种东西。70年代，他们不再作为政治配偶共同工作。毛泽东进行领导，但不再理事。他对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伤心地说："我浑身是病，我同上帝已有约会。"在一种松弛的情况下，江青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她确实没有执行他向她提出的某些建议；她的眼睛盯着毛泽东以后的时代，不再是为丈夫的事业投入全部生命的忠实妻子了。

毛泽东并不总是同意江青和极左派的看法——他也并不总是同意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可能更不喜欢"右派"。文化大革命搞得并不好，但毛泽东不愿承认这一点，不愿原谅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并为其平反。

现在有人说，毛泽东在1970年就"看透了"江青和她的极左派助手，并认识到他们与林彪集团互相勾结。中国人的这种说法不足为信。1970年以后，毛泽东同江青及其左派助手们曾长期共事；假如他真要摆脱他们，让周恩来、邓小平或类似的人控制未来，林彪倒台后那一时期就是最理想的机会。但他没有这样做。那个时候，他仰仗周恩来似乎是出于无奈；而邓小平还被抛在某个村子里喂猪。

江青新的独立权力使毛泽东很不舒服。夏天，毛泽东在南方某处——名称官方至今还保密的别墅会见外国领导人，而江青则在北京趾高气扬。这时，毛泽东严厉地说过：江青到处伸手，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向群众作报告——总而言之，她只代表她自己。

这年年底，毛泽东告诉助手们说："江青有野心。"他同时还宣布："江青想当党的主席。"这是第一次说出了不能说出的可能性。但是，毛泽东当时并未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措施去遏制江青的野心。

古怪的“批林批孔”（一个死于两千五百年前，一个死于两年半前）运动正在继续进行。它象是一只瓶子，对立的派别可以根据当前的政治需要往里面灌各种酒。江青把“孔丘”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兴旺发达的各种政治力量或知识界力量的代名词。她巩固那场风暴的“成果”，实质上是要为她树立“女政治家”的形象。周恩来（他巧妙地给当前这场反孔运动缀上了批林的流苏）则强调林彪“左的错误”。他巩固反林联盟，实质上是巩固稳健派的地位。

自从1966年以后，江青还没有象在1974年下半年那样扮演过如此突出的角色。她到处公开露面，无处不在，她接见所有的来访者。她签署函件的落款是“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这表明她是当时狂热的政治讨伐的主帅。当聚集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露面时，她的名字总是照例排在首位。由于毛泽东有八个月的时间不在北京，她似乎成了整个政府运转的关键，那些心神不安的官员们总是要听命于她。

1964年，她突袭式地介入戏剧改革，在这一举动10周年时，人们把她当作“圣人”来纪念。《人民日报》称她为“毛主席思想的解释者”，这个令人惊愕的称号在此之前一直属于刘少奇、林彪或其他公认的接班人。她发布“指示”，在中国共产主义中，这种东西相当于梵蒂冈的教皇公告。她作为“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塞浦路斯总统，多哥和毛里塔尼亚的总统，以及其他许多外国政府首脑。她以毛泽东的名义向他们表示欢迎，向他们叙述这个国家的光荣与负担。

一打开电视机，就会出现她的面容。她看到满意的事时脸上就露出微笑，看到阴暗面时就神色严厉。一翻开报纸，就会看到关于她活动的新闻报道，在这里解决问题，在那里

耐心规劝，要不就是在什么地方视察工作，并配有她身着中山装和长裤的照片。

毛泽东在中国南方的一座山上向她发出劝告："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毛泽东正在密切地注视着时局，说江青："你积怨甚多……"

与此同时，象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样支系繁多的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突然登出了许多歌颂吕后的文章。那个吕后目标坚定，在她丈夫——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逝世后，独揽大权，执行她丈夫的政策，从而赢得了荣誉。对江青心目中另一位英雄人物，即达到权力顶峰的女性统治者武则天，人们所说的话差不多实际上也适用于江青本人："生死奖惩，全凭她一句话。皇帝垂手坐于王位之上，无所事事。朝野皆称他们为'二圣'。"

北京一位居民回顾说："那年夏天，我看了所有江青接见外宾的电影片和电视，她烫起了头发。在此之前，中国妇女烫起发卷就是犯罪。此后，允许烫发了，很多女人追求这种样式。"

在毛泽东离开北京后不久，江青作为现政权第二号人物志得意满地招摇过市，写下了一首放肆的诗，配之以一幅她自己拍摄的照片，并交给了《中国摄影》的一位编辑。这首诗是咏山的，照片上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不过，这座巍峨秀美、含蓄而又为人们所低估的山峰不是别的，正是江青本人！这首诗不可能得到任何文学奖：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江上”的“江”就是她的姓，整首五言诗都是仿效唐朝的对偶句——她在延安挑选新的名字（以代替蓝苹）时曾从有关唐诗中得到过启发。唐朝对偶句的第二行中出现了她姓名的两个字：江上数峰青。江青无论是否象后来批评家们所说在写到“雾”时心目中所指的是毛泽东，这首诗毕竟传达了她的一种感觉：她没有得到她本应得到的拥戴（她曾使维特克相信，是毛泽东写下了这首诗来歌颂她！）。

江青告诉《中国摄影》的编辑，这首诗和照片要用一个笔名发表，此笔名是她家乡诸城县一个著名历史古迹的名字。她要告诉人们谁是作者——他们必须自己拨开神秘的云雾才能窥探到，但不想以公开署名的方式开诚布公地展示自己的抱负和虚荣心。

江青要在中国伟大的文学和政治传统——盛唐的武则天皇帝曾为这一传统的形成作出了很大贡献——中找到她的自我感觉。她还要提醒那些鉴赏家——其中许多人从她在延安和毛泽东共同生活之时起就知道她的名字出自一首唐诗——使之回想起她与中国革命伟人之间“亲密长久”的伴侣关系，意识到他就要逝世并被取代。

把诗和照片送交给《中国摄影》之后，江青突然撤回了稿子。但改变主意后，她又把稿子送去。如此这般，她送去又取回，往返了五次，就象一只拿不定主意把刚刚偷到的鱼藏到什么地方的猫。最后，她决定不去发表。

或许是毛泽东从长沙返京后批评了这个如此令她振奋不已的主意。但更有可能的是，江青自己越来越心神不宁，最后改变了主意。她虽然非常自信，但在政治这个男人的世界里，她毕竟势单力薄。决心要当女皇，这使她进入了一个不仅对她而且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共产党）的历史来

说都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天地。不管怎么说，枪毙这首诗和照片表明，她已陷入了政治或心理（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布雷区。

毛泽东还在南方时的一天，中国的大报《光明日报》刊出了一篇题为《孤愤》的长篇政论文章，该文是两千二百年前属于法家的政治思想家韩非所著。但是，联系《光明日报》所加的前言来读这篇文章就会看出，它与1974年毛泽东政权的危险状况有着非常明显的关系。

韩非描述了一个因谎言和拉帮结派而日渐衰微、几近毁灭的王国。阿谀奉承的朝臣和“里通外国的大臣们”，尤其是一个“重要人物”，在高级政府职位上安插“奸佞之徒”和“无能之辈”，把皇帝引向歧途。如此对待皇帝是“滔天大罪”，而皇帝允许这位“重要人物”在他的朝廷内“结党营私”则是“极大错误”。

北京的市民们手忙脚乱地抢夺这份7月23日的《光明日报》。至于这位企图使毛泽东的政权走向毁灭的“重要人物”的身份，人们众说纷纭。那篇前言以中国人的方式只提到“林彪一类”坏人，由于这位坏人三年前已经死了，读者们不得不去猜测今天的坏人是谁。他只能是周恩来或江青。这两位敌对的二号人物是两个针锋相对的营垒的核心。这是谁在攻击谁？

在几小时内，7月23日的《光明日报》被收回焚毁。同一天又出了一个新版，在上一版占了两页篇幅的《孤愤》被五条无关紧要的地方新闻所取代。也许是江青在攻击周恩来？然而，这位总理自春季后已住进了医院；人人都知道他患了癌症。如果目标确实是周恩来，那么，反江青集团以极快印出两页新的7月23日《光明日报》的方式显示了他们的力量。

这篇文章攻击的也可能是江青，她作为一位可能把毛泽东政权引向崩溃的重要人物，围绕着毛泽东以后时代的问题，同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其他一批比她具有官僚色彩的人发生了争执。

在《光明日报》引起混乱后不久的一天，江青出席了她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支持者召集的会议。围绕着挑选论文推动批林批孔运动这一主题，会议进行了类似编纂犹太法典式的激烈讨论。会议中间，江青手持一份西方记者从北京发出的电文译件走入会场。“中国当前的斗争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稳健派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之间的斗争。”她向到会者大声宣读电文内容，用外国人的话去转达一种她虽赞成但以目前身份不便自己公开说出的观点。当她放下手中文稿并环视全场时，她的表情象一只正在咀嚼金丝雀的猫。她知道她已拉开了反对周恩来的架式。她渴望斗争。她喜爱“激进派”的牌号。

江青恶声恶气地对她的一位同事说：“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主席。”她的话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一天傍晚，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后，毛泽东与助手们谈及周恩来与江青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说：“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在那场所谓反“黑画”战斗中，江青对周恩来的敌意逐渐表面化。江青声称，总理批准人民大会堂、北京的高级饭店和其他一些公共场合装饰“不健康的”艺术品和摆设。在姚文元的帮助下，她派出一个工作组，利用这一机会大做文章。他们在周恩来想用世界主义格调加以美化的建筑物中搜罗到了700件艺术品和摆设。江青开始用“革命的”油画、雕塑和挂毯去代替它们。它们之中200件被集中起来搞了个“黑

画展览”。召集了政府工作人员和街道委员会的代表到市中心参观展览，为这个为期一月之久的展览助声势。

接踵而至的是电影戏曲片《园丁之歌》一事。该影片写的是两位聪明的小学教师，他们引导年轻人追求智慧与正义。许多观众喜欢看这部影片。它使教师成为英雄，它宣传这样一种观点：辛勤的耕耘才能使百花满园——在中国，这两种观念一直被人们当作至关重要的东西信奉。

但是，在197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江青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陪同下看了《园丁之歌》，并且怒不可遏。

在三位上海激进派人物吃完夜宵坐下来开始评价影片时，江青宣称：“片名本身就是错的，学校老师怎么能是园丁呢？”她一边摆弄着蒸鱼一边嘲弄地说：“只有共产党人才是园丁！”影片中有一首歌特别使江青恼火。歌中唱道：“没有文化，怎能肩负革命重任？”江青认为，这是含沙射影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被扫地出门，教师被送去喂猪。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算她说对了。

这不是对他们一伙人的直接攻击，不是对他们的政治权力的挑战吗？江青对陪同她吃饭的两个人继续说道：“影片的整个环境就是奇特的。天啊，那个女教师还说男教师的好话！”无论张春桥和姚文元会作何感想，对江青来说，这绝不是生活的“典型”状况，在她的王国，生活不会是这个样子。

在江青的圈子里，指责《园丁之歌》的信件和电话纷至沓来。1974年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批判《园丁之歌》，无非是对江青在与张春桥等人吃饭时所提观点大加发挥、添油加醋而已。初澜（江青写作班子的笔名）推出了一篇文章，文中

说，影片“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唱赞歌”。

但是，江青的进攻并非一帆风顺。影片在湖南发行，这里是毛泽东的家乡，于是，首先在长沙开始了反击。在1974年1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毛泽东提出要看个电影。当时，他已离开北京很久，住在长沙附近的一座宾馆里。在长沙被视为地方电影事业重大成功的《园丁之歌》被选中送给主席看。毛泽东很疲倦，看文件使他相当劳累，他对影片表示欣赏。他鼓掌喝彩。看到这一点，一位精明的湖南工作人员凑上去说：“主席，这部影片正受到批判。”毛泽东面色慈祥地环视全室，“为什么批判？你们告诉我它错在哪儿？我想这是部好电影。”

毛泽东深夜的这一番话象炸弹一样击中了江青。她找出了那个在湖南导演这场反击的人。她宣称：“你让主席看《园丁之歌》，你把这部坏透了的片子强加给主席。”但是，考虑到毛泽东的评论和小心翼翼培植起这种评论的湖南官员以及北京反江青官员的力量，江青难以继续进行她的攻击了。

当文化部长打电话询问关于《园丁之歌》的指示时，她慢吞吞地说：“张春桥负责文化事务，他对电影比我有更强烈的感受……”

不久，江青关于自己是持久不散的浓雾缠绕着的奇峰的自我感觉就在港口城市天津表现出来。武则天皇帝厌恶她的京城长安时，随时可以出巡，江青也对北京产生了反感，开始偏爱她在全国各地的各种基地。除了杭州西子湖畔的青萍山庄、广东设有兰园的宾馆和上海前法国俱乐部外，她还有一个“模范村庄”，即中国大城市天津郊外物产丰富的小靳

庄，江青在1927年离开济南后曾到过天津。

中国的领导者们经常搞一些模范社区，作为对整个国家的具体进展实施控制的标志，江青在小靳庄也想以这种方式表现一下自己。王光美（在江青搞掉她之前）有她自己的点，那里人人都讲产量和物质刺激。叶群（在1971年她和林彪与毛泽东决一雌雄之前）有她的点，在那里，士兵们大批出动支援农业。小靳庄是江青自己的点，在这里，她要让人们看到群众文化的繁荣昌盛，并表明艺术将怎样塑造生活。

当她的轿车开进小靳庄，全村600多农民及其家庭倾巢出动夹道欢迎她时，她总是用响亮的声音说："毛主席问你们好。我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来看望你们。"——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公式，由于确立了两个权威系统，她似乎可以背靠大树，对党中央系统发号施令了。小靳庄的头面人物从与江青的联系中获益不少，当江青在圆桌上摆满大鱼大肉的招待宴会上说"小靳庄是我的点"时，他们窃窃自喜。其中有些人还领会了她附带说的一句话的意义："它也是党中央的点。"

江青向顽固的老年人发表讲演，阐述让妇女更多地参与村庄管理的必要性。麦地里，样板戏唱腔四处飘荡；十几岁的小姑娘写一些笨拙的诗歌，告诉人们抵制孔老二的腐朽思想怎样会生产出质量更好的玉米棒子。小靳庄的人们被告知，如果他们象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那样生活，那么，小靳庄——以及有朝一日整个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充满幸福和公正的乐园。

江青从北京带来了礼物：每位公民一顶草帽；小麦样品；每个妇女一枚发卡。与此同时，她的所作所为又象个极其敏感的女主角。她准备上床睡觉时，附近所有家禽和动物

都要关起来，因为哪怕是最轻微的响动也会使她失眠。她还觉得有必要把她那饰以毛皮的有衬垫坐式马桶带到小靳庄来。

该是下地出工的时候了，这时，江青既表现了她的热情，又表现了她的虚荣。她加入了收割庄稼的行列，袖口高高挽起，头发蓬松，大声喊叫着她是多么喜爱体力劳动。然而，她过去从事表演行业的本能却绝没有丧失。她总是拼命干上一小会儿，然后就大声抱怨精疲力尽了。是不是上个星期她在北京总是彻夜不眠，“为主席读文件”？“我不能象你们真的农民那么干！”但是，在村里的摄影师们干完他们的活之前，她是绝不会离开的。

江青是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劳动者”。她把身边的农民当成是一出戏剧——决心当女皇——的演员班底，让他们在这出与其生活毫无关系的戏剧中跑龙套。

江青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天津港。小靳庄令她精神振奋，现在，又有两位忠诚的追随者陪同她参观靠近大港的海岸石油钻探企业。

这次访问的一个原因是，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关于经济发展和其中的涉外关系问题的斗争正在继续。周恩来和邓小平批评江青只会发表意识形态的空论而没有经济上的行动。于是，江青希望让中国公众看到，她也关心中国的收支平衡。

第二个原因是，她希望调查一下专业经济活动这块飞地的社会和文化水平。据她的一位助手报告说，这块飞地可能正在放任自流地摆脱国家的必要控制。

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上午，江青一行启程去大港2号石油钻塔。

“给我唱一支革命歌曲！”江青愉快地对一位中年工人说。此人在她面前小心翼翼站着，两手交在一起，毫无表情的脸上满是油渍。但他一首歌也想不起来。

江青皱着眉头嘟哝着：“只搞生产，不抓革命。”最后，事实表明，整个石油钻塔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并愿意唱出革命样板戏中的任何一段唱腔！

江青声称：“我要见见女工人。”糟糕，整个井台无一女性。当石油公司革委会主任将这一点报告江青之后，她咆哮如雷。“为什么没有女工？”江青冷冰冰地追问道，“你们忘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毛主席教导吗？”讲求实际的石油工人回答说，这个井队是新组建的，第一批能来这里工作的工人碰巧都是男人。她提醒在场的人说：“男人能做的事，妇女也能做。”

江青的话就是法律。第二个星期就雇用了四名女工在这个钻塔工作。江青来访时，整个钻塔无一处厕所；在离开基地后，男人们一直是站在井台边小便的。有了女工，建了女寝室之外，还建起了女厕所。尔后，由于有了女厕所，也就为男人们建造了一个厕所。

油田革命委员会主任默默地诅咒江青。男工们乐开了怀。三个月后，四名女工离去了。

天津的一小批市民在为“女王服”而操劳。一夜之间，它出现在服装商店女装柜台上，半新半旧，半中半西，人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式样。它以唐朝时的一种女装为基础，其特点是装有侧身旧式拉锁的紧腰身，小巧的中式立领，西方风格的宽松裙摆。腰部贴身，装袖。江青说：“这是中西结合。”这是她“脑力劳动”的产物。在1974年的这同一时期，她还在泰然自若地攻击西方音乐是“堕落的”，意大利制

片人安东尼奥尼是“罗马来的小丑”，并说美国文化是“不健康的”。她要为中国妇女的形象增添一点新的娇傲。

这种裙服卖20元（后来在其他城市里更贵些）。准备花相当一二周所挣工资的钱去买这种裙服的女人并不多，除了江青身体力行之外，这种服装的前途得不到任何保证。在特权羽翼下的江青根本不知道这种裙服究竟有多贵。为了吹捧这种服装，她命令文化官员购买了一大批，让那些作为政府服务人员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女孩子们穿。在天津，电视台播音员、音乐会上的艺术家和热衷于时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着此装出现在人们面前，代替了她们的长裤。赴伊朗参加亚运会的女运动员们也发放了这种裙装，穿上它就象是出国访问演出的艺术家。为了解决商店中这种服装滞销的问题，江青批准了一项抛售计划：放下四元钱，衣服就归你了。

在天堂中，或在地狱里，所有女人或许都要穿同一款式的服装，但在人世间，绝不会如此；在中国更不可能。当一位妇女不能以中国通行的方式打开衣襟露出乳房时，她抱怨说：“这种衣服脱不开，我都没法儿喂孩子奶了。”另一个人说：“用五米料子，太多了。而且穿上它我就无法骑自行车和打乒乓球了。”女人们都彼此问道：“多会儿穿上你的江青裙？”以此来相互戏弄和奚落。在炎热的南方各省，这套裙服一开始就是令人窒息的，它上身那么紧，而下摆又那么长。

那些不能接受这种裙服的女人开始在用料和装饰件上搞些变化。穿上一身黑色天鹅绒长裙而显得与众不同的人，衣服上别一枚宝石胸针的人或借此机会穿起一英寸高跟鞋（在中国穿这种鞋就象在巴黎穿五英寸高跟鞋一样）的人，再也不用总是为此作辩解了。这种裙服令某些女人兴奋，令某些

女人恼火，令某些女人疑惑，但肯定令所有人惊诧。

北京一位妇女说："这是出风头。"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对江青来说，自从在孩提时曾被迫穿上她异父兄弟的旧衬衫和长裤起，服装就成了象征着自由的大问题。她的服饰，她的发型，都刻意实现自我表现。

中国文化和共产主义生活方式都同样排斥艳丽，但江青无法抗拒的正是艳丽。在军帽上面，她总要围一块头巾，在她那俏丽的下颏底下打一个花饰。天冷时，她穿一件长外套，紧紧地束在她的腰际。她是否知道，她给毛泽东的国家带来了怎样一种电击似的震颤？

看到江青高高在上，有些中国妇女感到一阵阵战栗；有些英国妇女在看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占据了唐宁街10号时所体验到的，也正是这种情绪。其他人认为，江青已经跨出了普通妇女的行列。在发起穿那套裙装的过程中，江青难道不是仅仅使人注意到，她在历来以男人为主的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摇摇欲坠吗？

一位女人悲叹说："只要她的风度再温文尔雅一些，人们就不会用一种残酷的、性别歧视的方式攻击她。"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新身份，使江青有机会会见来访的外国贵宾。1974年9月20日，江青与菲律宾总统的夫人马科斯·伊梅尔达会面。在国家和党内地位都比江青高的李先念会见时在座，但他却是位一声不吭的陪客。

在随后的两天里，江青热情洋溢地护送着马科斯夫人去看文化展览和参观工厂。这位来自马尼拉的前美丽女王在江青心中激起了兴奋的火花。她们都是为达到今日地位而争斗的机敏女性，然而，在结伴而行的几日内，她们发现，彼此放下架子随便聊聊她们所洞悉的男人世界，是一件乐事。

江青身上总是悍妇和羞涩女孩的混合体。她可以象英国渔妇一样粗鲁，然而，她绝不会把樱桃丢到嘴里，然后再吐出核，她总是用小刀挖出核后才把樱桃放进嘴里。她是个贫民窟出身的女孩，但是变成了一个没有女仆帮忙就穿不上鞋的女人。

与伊梅尔达夫人作伴，她感到能使自己性格中的两个方面融为一体。她发现，自己可以松弛一下，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同时又不必忘了自己是个女强人。江青心目中唯一记住的一件事是：当时菲律宾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有“外交关系”，与北京没有外交关系。她愿意的话，可以把马科斯夫人当作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强硬而又颇具诱惑力，在政治上是成功者，但同时又是成功的女性。

9月23日下午，江青决定向马科斯夫人提出延长访问时间的请求。江青把当天晚上去剧场的计划告诉她的客人之后，请求她能延期（根本不顾是周恩来邀请马科斯夫人访华的这一事实）。“明天我有个出奇的好主意。”她说完莞尔一笑。马科斯夫人同意访问延长。

第二天早晨9点，江青和马科斯夫人抵达天津，接受了数百万人的夹道欢迎。

马科斯夫人的一位随从人员说：“我想，江青是想作为一位女政治家，向另一位女政治家显示，她在这座城市具有多少支持者。”江青这也是对王光美还以颜色，12年前，王光美也曾在此地作为主人欢迎过苏加诺夫人，大大风光了一次。江青驱车送她的客人访问她的“点”，即由农村变为文化节的小靳庄，以热烈庆祝胜利的凯旋使此行达到高潮。

农民们为两位来访的夫人唱歌跳舞，表达他们政治上的好斗精神。在参观牲畜栏、玉米地和面粉磨坊时，江青向她的

菲律宾客人扼要重述了她仲夏时节在天津一次讲话的主题。马科斯夫人是否知道，中国的武则天皇帝在她那个时代“比男人还要有力量”？她是否听说过“伟大的封建女政治家”吕后？

小靳庄之行使“江青的点”在全国有了极高的知名度。本来是周恩来邀请马科斯夫人访问中国的，但江青半路上劫持了她。

江青正在为她的权力大厦添砖加瓦。她走到支持她的人群中去；她同她那个圈子里那些雄心勃勃、放荡不羁的年轻艺术家谈论政治。但她不知道怎样使用权力。军事事务、行政工作、权衡利弊——对诸如此类的事，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假如她真的成了女皇，她将支持些什么？她的政策会以京剧为中心；她的政治旅行的主意肯定是小靳庄一游。

钓鱼台宾馆一座座彼此隔离的别墅点缀在湖畔溪边，它那高耸的围墙挡住了人们好奇的目光。江青自从实际上搬出中南海并成了激进的“上海帮”头目以来，就使钓鱼台成了她个人的专有基地。10号楼是她的住所，她的办公室在17号楼。

在所有专制国家和不少民主国家内，都存在着一些派别，他们有自己的习惯和聚会场所，有喜爱的餐馆和俱乐部，也有小小的腐化圈子；江青的钓鱼台有它自己的情调。当她的权力增长、身边工作人员扩充时，也就有了许多她在外面不能做的事和不能忍受的事。

她喜欢以详细的天气预报作为一天生活的开始，她听天气预报的详细程度令人吃惊，那更适合于飞机场的领航员，而不是总要一早晨在床上读文件的人。风，噪音，光线是她

最头疼的东西。除了每个房间和宾馆花园中每个地方的温度外，江青还必须知道风向、风速和光线可能会有多强烈。她爱吃西式早餐，有两只鸡蛋、两片面包、少许奶油，坐在床上吃。她一直穿着睡衣读文件，草草作些笔记，直到“我要起床了”这一声大喊把她的公务员召唤进来为止。女公务员们忙碌起来，帮她洗漱、更衣、化妆。浴池水龙中的水过热或过凉都会招来有人要“杀害她”的罪名。在她的厕所里，始终供应香港的电影杂志。

江青不喜欢任何人打断她早晨的思路。一天，一位新来的年轻卫士对她说：“首长，早晨好。”江青却大发脾气。张春桥出来平息风波，他告诫警卫说：“首长正在思考重要的国家大事，你怎能对她道早安打断她的思路呢？”

江青回避宴会。在人民大会堂那些冗长的宴会上，到处是繁文缛节，噪音太大，人员太多。在那里，她不能象在钓鱼台的小型聚会上那样控制局面。而且，从人民大会堂那酷似工厂的厨房中送出的数不胜数的盘子对她的健康也是个极大的威胁，宴会厅的工作人员在清理盘子时又弄得噪音四起。

脾气好时，江青总要引用党关于“勤俭节约”和“反对特权”的号召，并坚持要工作人员与她共进午餐或晚餐。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咂咂地喝汤，并在快吃完时用筷子扒拉碗底碰出响声。对这类声音，江青不能容忍。年轻的工作人员总是发现，他们离开江青的餐桌时依然不饱，于是偷偷溜去问厨师他们是否可以在厨房嘈杂而又友好的气氛中再吃一份儿。厨师理解他们的难处，于是他们都坐下来，大吃大嚼一顿，并拿他们令人惊异的“头儿”取笑。

江青喜欢跳舞，但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来说，组织一场

夜舞会却绝非易事。可以假定，一位极端敏感的女人和一屋子捧场的人是要共同消遣光阴，但是，谁愿意并且谁应当陪这位女皇跳舞呢？当那些身居要津的同僚携带着他们年老色衰的夫人来到舞会上时，怎样才能使江青作为一位懂得跳舞的女演员自豪感得到满足呢？

舞会在钓鱼台内举行时，江青是舞会的中心人物，她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力争在她的健康要求和她的自负之间实现某种平衡。如果整个傍晚她跳个不停，就会精疲力尽。尔后，她就会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边脱袜子边责备她的护士："你知道，我的身体不能这么长时间跳舞。"然而，如果邀请江青跳舞的英俊男人太少，结果还会更糟。既然她宫内没有一个男人胆敢在得到首长的信号前邀请她跳舞，忐忑不安的工作人员就总是不得不去揣度江青的想法，观察她的身体。当她看上去精神振奋时，就鼓励某位男士走上前去。当工作人员判断她已经"够量"时，女工作人员就要上去用尽心机哄她高兴，努力使她不去注意现在没人请她跳舞这一事实。当她一段长时间不能或不愿入场跳舞时，局面就甚为尴尬，因为在江青再一次入场之前，没有任何人有胆量开始跳舞。但有时候她忘了宣布她不跳了、其他人可以随便跳。

一天晚上，在就赤脚医生问题同邓小平打了一场精疲力尽的仗（她认为这种医务人员是革命的鲜花，邓小平认为他们最终要让位于经过系统训练的医生）之后，江青的思想转向了夜生活中比较有刺激性的方面：搞一场家庭电影。她已经看过了《豺狼的日子》，很喜欢这部片子；现在，手头上有一部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听说这部片子令人眼花缭乱，毛骨悚然，在同那位强硬的副总理较量了一个回合之后看这种片子也许更为惬意。她想，如果张春桥和姚

文元能来钓鱼台同她一起欣赏这个影片，就更开心了。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两位上海同僚办公室的答复是他们已经看过了。江青只好一人独自欣赏了。尔后，在倦意难耐之前，又同她的护士打了一圈扑克牌。

第二天早晨，江青得知张春桥和姚文元实际上并未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于是怒不可遏，指责张春桥和姚文元办公室的两位秘书前晚对她撒了谎。她把他们定为“反革命分子”，并成功地说服了保安负责人把他们抓了起来。几乎可以肯定，撒谎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而不是秘书们。

在1975年和1976年的政治大战中，最有价值的进攻手段是毛泽东对某一观点或计划的手谕。许多战斗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理解毛泽东的话造成的。当毛泽东亲口说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句话时，邓小平立即行动起来。江青恼羞成怒地喊道：“毛主席绝不会说这种话！”

通过打招呼会或各种非正式渠道，大量由含沙射影的指责、丰富联想炮制的“罪行”和通过监视收集到的各种“丑闻”组成的“事实”，强加在那些已认定虚弱不堪因而无力进行有效反击的敌人身上。搞清楚谁忠实于你的敌人，你的敌人又忠实于谁，这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打狗也要看主人。”

假如这种诽谤困住了对手，就开始搞权力游戏，新闻机构也动作起来（起初是间接的）。一旦敌人最后被打倒，就会作出解释说，他或她实际上从童年时代起就是个坏蛋。对江青来说，这些年来做毛泽东的“秘书”并未虚度光阴；长期以来，她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便于收集情报，传播是非。

“两条路线斗争”的呼唤甚嚣尘上，其意义犹如天主教弥撒之对于中国老百姓一样。文学艺术领域是否有创作繁荣

（江青说有，邓小平说没有）？介入国际经济对中国是否有利（邓小平肯定，江青否定）？江青到处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就象当年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滥用“共产主义”一词攻击别人一样。关键问题是：当毛泽东的权力从手中掉下来时谁能接住？江青在1975年间搞的演习，主要是为了在这一时刻来临时能够保证根本没有或阻止将会出现的影响权力平衡的任命。

有些演习是公开的，如试图阻止邓小平出任军队的总参谋长，尽力使张春桥取代正在受病痛折磨的周恩来。其他一些演习则是阴谋诡计，有些甚至是极其粗暴的。然而，当时在中国，差别并不很大。合法的方法象非法的方法一样，都是完全保密、不受任何制约的，因而，合法的方法也同非法的方法一样，不过是专制政治实践所能利用的无数设施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5000人的注视下，江青步入人民大会堂的观众席。她右侧是笑嘻嘻的尼克松总统，不时与她交头接耳。她左侧是身穿双色调淡紫色长裙的帕特·尼克松。周恩来也在场，不过稍靠后一些。今天晚上演出《红色娘子军》招待客人，女主人是江青——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个神秘莫测的女人，据说，她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首先推行的同美国的联系持敌视态度。

但是，她宁愿表现得有魅力而不是威严不可侵犯，这才适合于这种场合。尼克松是个“肮脏的资产阶级”，她知道这一点，但是毛泽东认为尼克松来访对中国有利，所以，她要做得无可挑剔。与此同时，她自己的有些观点还要坚持，并要为《红色娘子军》争得“国际声誉”。她身穿朴素的长裤

上装，同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一样，邓颖超的座位稍微靠外一些。然而，她看上去与邓颖超和中国其他妇女不一样，她接受人们欢呼时昂首挺立的方式确实与众不同。

“你为什么以前不来中国？”她把这个问题抛向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反华集团的这位首脑时，声音中充满了傲气。对尼克松总统来说很幸运的是，这出表现英雄姑娘反对贪婪地主的舞剧刚好开幕；他假装在全神贯注地看戏，对眼前这位专爱找茬的嚼舌者不置一词。沉默了一会后，江青向尼克松提到了她所欣赏的美国激进作家的名字。也许他不象她那样喜欢约翰·斯坦贝克吧？她还问，杰克·伦敦究竟为什么自杀呢？当尼克松问江青《红色娘子军》剧作者、作曲者和导演的名字时，她向尼克松瞥了一眼，并告知这部舞剧是“群众创作的”。尼克松淡淡地一笑。

1972年2月的尼克松来访，是中国舞台上一出计划周密的戏。这一行人的露面、冗长乏味的谈判和为外国新闻机构召开的寥寥数语的招待会，都与江青无关。她只出来过一次，向尼克松夫妇介绍她的一出舞剧，这天晚上，她可以当“明星”。至于其余方面，美国人的这次来访都是周恩来的事，与她无关。

尼克松后来说，“在创作一种既能使观众得到享受又能激励他们的自觉的宣传性戏剧方面”，这种“尝试无可否认地取得了成功”。尼克松喜欢《红色娘子军》，江青很高兴。她以为事实证明，“她的”艺术已具有广泛传播甚至能够打动一个资本家的力量。

江青在谈到国际关系时，时而声音充满感情，时而冷酷得令人战栗，有时在她那世界主义胸怀中表现出“宽宏大量”，有时又象个中国至上的沙文主义者。出现这种矛盾的

关键在于她的知识相当浅薄，而她的主观意志又不断变动。随便一个外国代表团都能在她的世界观中留下足以充斥整个屏幕的印象。某一位来访者的个人影响——赫鲁晓夫的“傲慢”，马科斯夫人的“庄重”——比10年的外交信件留下的印象还深。

在谈到中印边境战争时，她在一个印度士兵的故事中找到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士兵带着他全部积蓄参加了战斗，但把这笔钱给丢了，于是，他坐在喜马拉雅山上失声痛哭。一位中国士兵找到了这个钱包，并想办法将它归还原主，这位印度士兵喜出望外。中国方面是慷慨的，因为深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所以能够这样做。

江青总是喜欢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把敌人称为“间谍”或“帝国主义分子”，根本不管由之而产生的可怕后果。在前国民党领导人李宗仁返回北京并受到欢迎之后，江青说他是“外国特务”。她讨厌李宗仁和他的妻子，也不满意周恩来接待这位从台湾和美国返回的重要人物的方式。她漫不经心地使用别人难以担待的罪名去称呼李宗仁，实际上发动了一系列最后导致李宗仁过早死亡的事件。

在人民大会堂一次为欢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而举行的宴会上，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都出席作陪，不同寻常的是，江青也在座。她挨着那位风度翩翩的亲王，为了突出自己光临的效果，决定好好享乐一番。她笑语不断，还讲起笑话，令那位快乐的亲王更加兴致勃勃。觥筹交错，她一再起身用茅台酒向首席的每一位柬埔寨人敬酒，茅台是一种劲头十足的饮料。当时在场的一位大使回忆说：“到散席时，她看上去已经步履蹒跚了。”西哈努克亲王也喝醉了。

江青并不特别喜欢喝茅台。但是，在这种场合，她把手

中的玻璃酒杯当作一支杠杆，借此在同僚中出人头地，并把自己个人摆在中柬关系的中心位置。江青挺身而出，标新立异，为的是不使自己默默无闻，成为一大堆领导人中一个消极的成员。也许，正如那位大使所总结的那样，“她是有意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扬她”在这个行将分裂的领导层中的“优势地位”。

一直在同第四机械工业部做彩色显像管生意的纽约州考宁玻璃制造公司，送给该部官员一份礼品，是一套漂亮的玻璃蜗牛。“这些蜗牛从哪儿来的？”江青听说考宁公司的这种表示后大声吼道，“把它送到我这儿来！我要展览它。”她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扩大中国和国际经济交往的政策一直恨之入骨，这下觉得抓住了可以绞死对手的绳索——考宁公司的礼品。她对应召赶来钓鱼台的官员们说：“这是对我们的污辱。它意在把我们描绘成正在爬行。”她发誓要把每一只蜗牛都退还给美国联络处，并扼杀这笔彩色显像管交易。

这在官员中引起极大恐慌。江青对玻璃蜗牛礼品的意义所作的跳跃性的结论，是同她对这样一种礼品在美国文化中的含义（如果有什么含义的话）完全无知相般配的。美国人也许想侮辱“中央之国”？……

周恩来开始进行调查；大量信函出出进进；到香港征询了亲华生意人的意见。最后的报告说：“经调查发现，在美国，‘蜗牛’是一种工艺品，没有任何恶意。”

江青的举动出于极端的无知，以及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敌意。现在，她非常窘迫。她偷偷送回了为搞一场新的批判而留下的玻璃蜗牛样品，并力图消灭她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任何迹象。

江青经常表现出排外的倾向。她到处谈论西方文化的

“堕落”和“海淫海盗”。她论证说，在大庆油田使用“外国设备”是“丢中国工业的脸”，她认为，中国的石油出口“把国际经济危机带给了中国人民……得罪了第三世界，同时却救了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命”。

诚然，当时在中国，政治家们以“卖国”和“里通外国”互相指责是常有的现象。但是，在政策性辩论中，江青站在孤立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一方，都是个事实。

江青似乎不可能成为排外主义的候补人。就习惯而言——她弹钢琴，在电影和服装的口味上抵制种种社会传统——她并不是个典型的中国人。但是，她也是个爱说教的、雄心勃勃的人；当她掌握权柄时，这样两个方面在中国政治环境中的结合，势必导致排外主义。想要根据她对西方的那点知识为别人制定法律，并以拥有民族主义作为自己享有权威的标志，她势必要背弃30年代在上海获得的世界主义和思想开放的价值观念，变成一个中国的沙文主义者。

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她责骂西方的“色情文学”，但却爱看中国古老的性小说《金瓶梅》。但是，对一个自我中心的、雄心勃勃并且正在同“亲西方的”周恩来和邓小平进行斗争的人来说，自圆其说是只值一笑的东西。把它留给“官僚们”吧——他们太缺少其他东西了。

在北京西郊香山宾馆一间奢侈豪华的房间里，中国领事衔以上的外交官员全体集会，满怀希望地等待着。这里将有一次重要发言，他们正是为此才离开办公桌、手拿笔记本来到这里的。踏上主席台的人是江青，她一本正经地身穿深色套装，严肃地把讲稿放在讲台上。

江青论外交政策！如果有人窃笑，也是可以理解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给外交部按部就班的工作带来一些稀奇古怪

的“干预”。毛泽东离京已近八个月了，江青的声音是唯一要听的声音。她在忙些什么？

江青环顾全场。中国外事机构的精英们济济一堂，鸦雀无声。她在调整眼镜时无所顾忌地一笑。她一上来就是那套最为得意的高明手法：退一步，进两步。“对于外交，我是个外行。”她耸耸肩，坦率地说，“在很多很多方面，我要向你们学习。”尔后，她就用尚方宝剑抵住了外交官们：“我只是把从主席那里学来的东西传达给你们。你们知道，他很忙，作为一个党员，我的职责就是把他的口头指示汇集起来，把这些指示奉献给诸位。”

这太无耻了。她的党内职责并不包括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外交机构。但她抓住了她的听众。“口头指示”这个说法是向他们暗示，她将提及的材料超出了文件记载的范围。

江青“奉献”的是毛泽东以前世界观中那些人所尽知的内容。这个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只有斗争才能使光明最终战胜黑暗。中国不要“富人、白人、大国朋友”，它以“穷人、黑人和小国”为友。革命的风暴吹遍了每一个角落。在等待风暴降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们“不仅应在名义上是红的，在实质上也应是红的”，而且还要在他们的外交活动中增添更多的革命斗志。

江青曾看过为数不多的政策文件，她正在努力成为“毛泽东第二”。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活动，目的是把她的权力扩大到对外政策领域，其方式是把她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批林批孔运动同她所知无几的国际关系联系起来。

正象圣经班的小学生懂得死抠《圣经》原本最为保险一样，她也以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基础对付亨利·基辛格。“他的基本观点受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局限。”她说。她根本

不顾毛泽东已认定中国需要美国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拿几颗阶级分析的手榴弹到处甩是最为安全的。她知道，最近毛泽东已对基辛格不耐烦了。无论如何，基辛格是周恩来的朋友，不是她的朋友。

她以儒学伦理说教的精神告诫人们："你们要提高觉悟。"这位主要靠意气用事的女人竟说："不要意气用事。"这次长达一天之久的香山宾馆会议，其实质是江青在国际关系理论这个新领域中松松筋骨，做些准备活动。她似乎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足够多的授权——或假定得到了这种授权——以致可以发表权威性言论。

在发言中，有那么一瞬间，江青的眼睛中冒出了灼人的火光。她在谈到中国外交官在国外遇到外国人对他们发射的"糖衣炮弹"（这是毛泽东用来比喻诱惑的一种说法）时，离开了正题，突然指责起她的一个敌人"没有经受住化装成美女的毒蛇的考验"。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从不以这种方式谈论已下台的同事的性生活。但是，在江青纷乱的头脑中，私生活有失检点和政治上的缺点是没有差别的。她自己也曾有那么一两次是"毒蛇"，但她早已把这忘到脑后了。现在，身披国务活动家外衣的江青，还在玩弄"成者为王败者贼"的简单游戏。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好人是支持她的，坏人是反对她的。

江青说话的口气象个传统的统治者。外国人不可避免一定是邪恶的，只能利用，不能真正地尊重他们。中国之外的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是中国人可以由之得到些小便宜的地方。江青的所有漂亮言论都不能掩盖她的家长式统治，而这种东西，象她的狭隘一样，在中国传统中是根深蒂固的。

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李敏结婚之后，江青成功地把她同自己所生的女儿李讷区别开来。在李讷身居高位到处炫耀时，李敏和她那位不知真情的丈夫却在60年代发现自己身上被烙上了“反革命”的印迹，并被监禁起来。

在对待毛泽东的儿媳松林的态度上，毛泽东和江青依然是分道扬镳。松林已经再婚，她的新丈夫是一位姓杨的空军军官，他们与毛泽东保持着接触，但江青却戒心重重，极力阻止他们到中南海来看望毛泽东。

江青对显然比松林小不少的杨某非常猜疑，怀疑他“有野心”，想作为毛泽东已去世的儿子、松林的第一位丈夫的替身，跻身主席之家。有一次，她当着毛泽东的面中伤说：“小杨和松林之间的年龄差距太大了。如果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那他们就不可能共同生活。”

林彪身亡后不久的一天，松林和杨某被上海警备区拘留。在隔离监押的情况下，分别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盘查，问他们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都了解些什么。这次江青亲自参加——松林声称是由江青领导的调查，目标是搞清楚，他们对毛泽东批评江青的情况知道多少。

松林否认曾对她的新丈夫谈起过毛泽东对江青的看法；她说，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对“权谋”这类高深莫测的问题不感兴趣。杨某一言不发，松林絮絮叨叨地谈一些使上海警备区调查人员不能满意的一般情况，这种僵局持续了40多天。江青直接同王洪文联系。王洪文，这位年轻的上海前纺织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飞黄腾达。王洪文派了一个走狗到拘留所，警告这对夫妇说：“把你们对这一点所知道的一切都写出来，否则，永远不会释放你们。”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儿子毛岸青精神不大正常，他同松林

的妹妹韶华结婚。江青对他们倒没做什么。1970年，韶华在北京的301医院生下一个孩子。江青把这视为一种危险，因它会使这对夫妇同主席之家重新发生接触。在空军头目吴法宪的帮助下，她对韶华在301医院的病房实际上进行了隔离。据这位年轻母亲说，与病房的电话联系被切断了，她自己母亲家的电话号码也被人更改了。婴儿的父亲岸青当时正是精神状况欠佳时期，在70天医院方面音信全无的情况下，他甚至得出韶华和孩子肯定双双死亡的结论！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当时是一位年仅32岁但却令人生畏的政治人物，他把“江阿姨”视为自己的领导。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他升任沈阳军区的副政委，并且成了上海激进派在经济发达的东北地区的关键盟友。

帮助江青发动1973年学校中“反回潮”运动的，正是身为辽宁省宣传部门首脑的毛远新。这次运动的一位英雄是名叫张铁生的风云人物，他拒绝在考试中答卷，他写了一封信，攻击考试和学习书本知识的全套想法。江青喜欢这位年轻人的精神（他声称：“我比牛还倔强”），而这位年轻人则喜欢江青“非官僚式”的领导风格。毛远新把许多张铁生之类的人拉进了江青“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的圈子。

武则天有一位精明强干、野心勃勃的侄子，他自视为女皇的太子。在一段时期内，姑侄互相利用。江青和毛远新的情况也是如此。江青把毛远新看成她的太子；毛远新对毛泽东若即若离，这或者是因为毛泽东对他没给予特殊照顾，或者是因为毛远新发现他“江阿姨”的领导更令人振奋。

为说服毛泽东给她的上海同伙王洪文一个新的工作，江

青动用了中间人。

“王洪文完全听她的摆布。”当时一位能经常见到他们二人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说道，“一次，在为我召开的宴会上，王洪文正要提议祝酒时，江青以非常亲近的方式捅捅他的肋骨，提示他。”客人们留下了他们私交甚密的印象。江青希望，在未来的江青体制中，王洪文能出任一个关键的部长，他年富力强、忠心耿耿。

江青从钓鱼台10号楼发出指示，召唤毛泽东的两位英语翻译前来。江青要这两位翻译带话给毛泽东：已经疏远的夫人敬请年迈的丈夫在国家机构中给王洪文安排一个副主席的职位，同他的党的副主席身份相匹配。这不仅是郑重地鼓励“有为青年”，而且是对在周恩来的国家机关中已经深有影响的邓小平等人的防范措施。

毛泽东驳回了江青关于给王洪文一个政府职务的建议。也许他在想，江青也想要一个高级政府职务。

周恩来走出医院，主持了一系列造成巨大冲击力的政府会议。此后，江青怒气冲天，一再把毛泽东的那两个翻译召来。江青希望从她在钓鱼台的领地向中南海司令部中的毛泽东传达她的牢骚：有些同事正在“向右转”，并且不断地专门向她发难。

两个翻译给毛泽东带回了江青的口信。毛泽东生气地说：“谁都不合她口味。只有一个人——她自己。”翻译之一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那对你呢？”毛泽东透露说：“哼，她对我一点儿也不尊重。”毛泽东似乎也对自己身后的接班问题感到烦恼：“将来，她会同所有人吵翻……我死后，她会找麻烦。”

毛泽东在长沙时，王洪文飞抵该地，向他唠叨周恩来的

“野心”、来自邓小平的“危险”和江青的上海激进派的其他抱怨。根据江青的主意，王洪文暗示，总理“实际上没有病”，正在医院里日夜“策划”重用邓小平，反对毛泽东赞成的政策——主席难道还不认为现在已到起用张春桥当总理的时候了吗？

毛泽东不这么看。他感到，江青和她的三位主要助手（他已开始称他们为“上海四个人”）正在对他施加压力，没有什么东西比让一位在世不久的人疑心他正在受到压力更能使他反感的了。难怪毛泽东拒绝提拔王洪文。

江青虽未能划出一块属于她自己的政治领地，她在毛泽东政权中却享有独立的地位。尽管如此，由于她爱使用高压手段，往往使她和她愿意完全引为同类的人名声不好。

毛泽东对“上海四个人”更是猜疑，他对同情激进派的农民政治家陈永贵说：“你搬走住进钓鱼台，小心别让四人帮变成五人帮。”

虽然有各种名目的党和国家的经费被用于江青浩大的开支——工作人员、旅行、别墅，但她还是需要一笔现金购买衣服和照相器材。毛泽东对钱财不动脑子。他能提供许多钱，因为他的著作的出版商给他送上了丰厚的版税，但江青还是常有囊中不足之时。一次，毛泽东为江青立了个几万元人民币的专款供她使用。江青想让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为她的这笔专款管帐；毛远新是个理解他“阿姨”的年轻人。但是，毛泽东不愿让此事失控。

1975年春季和夏季，江青从毛泽东那里什么也没得到。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我老了，已经81岁，身体又不好，你一点儿也不为我考虑。”接着，毛泽东加上一句对总理私

生活的评价："我真羡慕总理的婚姻。"

江青建议，根据王铁人的事迹拍摄一部电影；王进喜是大庆油田的一名工人，他意志坚定，政治上好斗。但当电影拍好后，她却不喜欢。先进分子居然带有守秩序、讲究合理的计划和忠实于党的组织系统的味道，这些在江青眼里都不是优点。本来就不多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操（诸如"以蓝天为屋、以大地为床"的豪言壮语）又是由"右派"以讽刺的口气说出来的。

更糟糕的是，又让这位英雄对那些"象个多嘴的老太婆，成天在你耳边哇啦哇啦说个不停"的干部进行了尖刻的批评。1975年2月25日，姚文元在一份便函中有礼貌地告诉江青，这位英雄所提到的人"几乎就是你的复制品"。在对该片开列出十大罪状之后，江青就在当年春季命令该片立即停止摄制。

但是，剧作者反击了。张天民在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关系紧张时写信给毛泽东，谈论他的影片。毛泽东在张天民的信上潦草地写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他还没有看过电影，但这丝毫也不会减少他那几乎辨认不清字迹的评论的正确性。他接着说道："不要求全责备。"这是老人家对那总不死心的江青的迎头痛击。

江青厉声斥责张天民给毛泽东的信："他告老娘一刁状，老娘不怕！"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令人惊奇的备忘录、电话通知和午夜会议，涉及的人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文化部长于会泳和其他一些核心人物。江青说这部影片"专业技术术语太多"，"场景联系太差"，而且"歪曲了毛泽东思想"。但是，问题的核心是那句提到"多嘴的老太婆"的短短台词。

尽管江青的政治班子作出了种种努力，但毛泽东的论断是不容反对的。江青退缩了。9月，她在大寨大队的一次发言中轻描淡写地说道："我虽然对这部影片提出了建议，但反对它的十大罪状不是我搞的。"

即使已经改变主意了，江青也不能象康生那样隐藏自己的感情，自欺欺人。她对着包括剧作者张天民在内的广大听众高声喊道："这是个反对我的阴谋！这个人，张天民，写了个信给主席。"然后，她说出了她真正关心的东西："他背后肯定有支持者，也许有坏人。"她用手指着张天民让他站起来。"你多大了？"张天民平静地回答说他46岁。"你还是个孩子。你想诬陷我，是吗？好，今天老娘就教训教训你。"

"谁给你出主意到主席那里批评我？"她当着坐满礼堂的听众东拉西扯地问道。

"没人。"张天民答道。

"那务必请你给主席写个收回声明。你既然有胆量给他写信，那就再写啊，告诉他，你撒谎！"

在钓鱼台宾馆17号楼召开的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议上，江青继续想对她在这次风波中的作用进行论证。她得意洋洋地宣布："张天民写过两封信，一封是给主席的，主席在这封信上没作任何批示。然后，他又送给邓小平第二封信，请他转给主席。"江青觉得她揭露了她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根源，"正是邓小平迫使主席作了那个可气的批示。"

张春桥给他的老板撑腰。"主席遣辞用句是很细心的，"他总结说，"他说此片无大错。但我们可以讲清楚，它有中错和小错。"

毛泽东本人也感到江青太多嘴多舌。早在年初，他就用

那种典型的方式潦草地写下了简单的一段话：三多一少。第一层意思是“周应多休息”，第二层意思是“邓应多工作”，第三层意思是“王（洪文）应多学习”，第四层意思是“江应少说话”。这段话表明了他对极左派很生气。在这一段话后，毛泽东显然还加了一句话：“她应从自然界得到一些提示：耳朵生来就是张开的，而嘴是可以闭上的。”

很少有人在看到江青时不把她视为搞阴谋诡计的女皇。在70年代中期，她正在寻求一种作为个人的新的独立——这是一种她在上海戏剧界中做唐纳之妻时曾经享受过的东西的返祖现象。但是，一种严肃的公众舆论根本不准备赋予她这种权利，尤其是在与日常生活非常不同的政治生活之中。“老娘”声称她不怕；但出于无奈把自己视为“老娘”本身就是不健全的表现。

1975年年中，毛泽东在一次对江青提到她的三个上海同伙时说：“不要搞四人帮。”关于这个四人小团体，当时已有这样的说法：“江青是头，张春桥是谋士，王洪文是腿，姚文元是嘴。”毛泽东当着整个政治局的面批评江青搞不光明正大的手法，批评她的极左观点。江青身受重伤，愤愤不平，并写了一封“自我批评”的信。她事后对一个同情她的听众说：“我并不想削弱团结。我接受所有的批评。”

江青决定去大寨参加一系列政治会议。在这些会议上，高级领导人们进行了激烈竞争，这一方面是为了让毛泽东满意，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们对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未来政治忧心忡忡。江青在100多位随员的陪同下乘专列到达山西省一个丘陵地带的城镇。在为客人准备的宾馆里，她要求挂上黑

色窗帘，以阻止一丝光线泄入，她还要求换一个新的日光灯，因为原来的那个一打开就嗡嗡响，吵人。她发出禁令，在她居留期间，任何使用马达的运输工具都不得进入大队的地界。

为在地方干部中树立自己的形象，江青出了个在虎头山旁修建一个防空隐蔽部的主意，她本人在摄影师的陪同下出面干了前五分钟的活。

她在大寨发言时喊道："我天天挨骂，如果没什么人骂你，你就不能有共产党人的称号。"面对不惜重金从各城市招来听这一周报告的摄影师和"左派"知识分子青年，面对这批精心安排的听众，她暴露了自己的痛苦和她对这一切的蔑视。"北京发生过一次苦战。但你们知道，我不怕。老娘就是不怕挨骂！"

江青向她的听众概述了她所支持的各种政策。是不是有些"修正主义分子"和军人诽谤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的文化艺术？让他们诽谤去吧。"但是，当我看到他们搞诽谤时，我就忍不住要诅咒他们。这些诽谤者是彻头彻尾的流氓！"

"党内有左派和稳健派"，江青向人们宣告。她以一种"凛然气度"抬起手臂，用食指戳着自己的鼻子说："不客气地说，我是左派的领袖。"

大寨这场乱哄哄的政治斗争——按正式说法这是一次关于农业问题的大会——之后，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讲话都发表了。但是，当江青的讲话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时，毛泽东对此持否定态度并且不屑一顾。他在正文旁边批道："放屁，文不对题。不要发表这个讲话。"

毛泽东不满意的，不仅是江青的发言，而且是她大寨之行整个一套哗众取宠的做法。

对中国来说，1976年1月是泪雨滂沱的日子：78岁的周恩来因癌症去世。这位人人奉之为正确之化身的人物竟然与世长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寒气逼人的气氛中，百万人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无言地注视着覆盖黑黄二色花圈的灵车。总理竟在毛泽东之前去世，这对中国是个不幸。周恩来在世，可以顺利地度过毛泽东的故去。

林彪死后，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处于冷战状态。一种武则天式的生硬和斤斤计较，与40年代和50年代令周恩来深得人心的温文尔雅和潇洒风度形成鲜明对照。当江青躺在一家莫斯科医院的病床上受癌症之苦时，周恩来曾经千方百计给她以安慰，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委托他的范围。但是，当周恩来与癌症搏斗时，江青的反应却是冷若冰霜。

实际情况是，周恩来的去世，对江青来说是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此后不久，她对一伙忠实信徒说："我是个被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我可以出来说话了。"

周恩来去世后几小时，江青趾高气扬地大步踱入医院的病房，这使一些其他领导人义愤不已。"小超，我亲爱的。"她对邓颖超说道，对灵床却一眼不瞥。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医护人员，都感到震惊和厌恶，因为，"小超"是只有周恩来才对他夫人使用的爱称。

时年已90高龄的朱德，在文化革命期间蒙受侮辱后刚恢复名誉，当看到江青在灵床前竟然不脱帽时，几乎难以控制自己的愤怒。当领导人们从灵床前散去时，他在接待室声音沙哑地对江青说："你害的人还少吗?你还毁了中国革命!"怒不可遏的朱德回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争执："你还记得吗，在延安，一天晚上，你和毛泽东来找我，求我支持你们结婚的愿望，你说，你将不参与政治？"江青一声不吭。"你简

直不是人！”这位老英雄怒气冲冲，浑身颤抖。

当领导人在紫禁城侧面一座装饰肃穆的灵帐里吊唁周恩来的灵柩时，亿万人通过电视收看了这一场面。邓颖超向前来吊唁的贵宾表示感谢，在邓小平走近灵柩时，她充满感情地接待他。在轮到江青时，邓颖超表情严峻。江青走向灵柩，她又一次拒不脱帽，举国上下对此表现出显而易见的憎恶。在沈阳，一位士兵在暴怒中把坐椅投向了电视机；在广州，在北京路街道的电视机前看到这一事件的人群开始接二连三地喊起来：“揍她！揍她！”

有一个细节没有给广大电视观众记录下来，但一位目击者却注意到了，感到难以置信：江青在浅黑色的大衣里面竟然穿着一件绯红色的罩衣！

中南海的来宾们发现，江青严密监控着任何想接近毛泽东私人住宅的人。与前几年相比，她似乎在与毛泽东住宅毗邻的老住宅里度过了更多的时光。她和毛远新监视着所有电话，过目源源流过的文件，用其他更顺从的人取代了他们不喜欢的翻译。

江青陪同应毛泽东邀请来访的尼克松夫妇一行去剧院，这次没有周恩来在场，不能使她对这个傍晚的主宰黯然失色了。歌舞节目中有一首名为《台湾人民我的骨肉兄弟》的歌曲，歌词中表达了北京解放这个海岛省份的决心。歌曲演唱完了，江青一跃而起，热烈鼓掌。帕特·尼克松随她站起，开始鼓掌；但是，她注意到，她的丈夫（显然听懂了这首抒情歌曲）只是从椅子上微微欠一下身，然后又坐下了。于是，尼克松夫人也突然坐下。江青继续鼓掌喝彩，喜形于色。

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悬挂的这首诗，言简意赅：

某女士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数万市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后聚拢，惊奇地诵读这首抨击江青的诗。其时正值怀念亡人的节日，向周恩来奉献的花圈和鲜花成了对极左派无言抗议的中心。自周恩来三个月前去世以来，这种抗议已经变得相当强烈了。

一伙人聚在中南海里听广场形势汇报时，江青心存忧虑，但这种忧虑并不象以往那样强烈。对于根深蒂固的反对女统治者的“偏见”，她无能为力。但是，她仍然低估了她与周恩来为敌所包含的危险。

颂扬周恩来的那几天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没有人偷自行车，走近纪念碑时香烟都主动熄灭掉，公共汽车路过广场时乘客们彼此互不相视。据有人说，这标志着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作为一种独立因素的公众舆论的诞生。但是，江青的政治判断却太狭隘了。由于多年在宫廷密谋中厮混，她对公众舆论的理解几乎等于零，充其量也只是当宫廷之外存在这类情绪时加以操纵。她愚蠢地要求清除纪念碑前的花圈和鲜花。这一行动实施了。

其结果是，群情激奋但却秩序井然的悼念活动变成了一场骚乱。它持续了14个小时，参加者至少有上万人。汽车被焚毁，人们遭到殴打；许多人受伤，有人丧生。

江青虽然对自己与“群众”的关系津津乐道，但她似乎认为他们是玩偶或小丑，在需要时可以视情况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随意摆布。而现在，这些“玩偶”和“小丑”有象人那样思考、讲话和行动的可能了。

尽管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并非邓小平煽动起来的，但江青的全部心机都用到他的身上。

政治局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中开会，江青一马当先，要求采取强硬措施。毛泽东没有出席，但是，他通过毛远新传达了一项动议：罢免邓小平的职务。这一决定“一致通过”。然而，江青也绝没有挤进接班人行列。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次民意的迸发对她个人的未来是一种毁灭性的征兆。

一时间，政治风向似乎对她有利。文化官员们被召集起来，帮助她落实旨在庆祝文化大革命10周年的各种戏剧演出计划。通过清华大学的团伙，她诱导这所大学宣布，要就武则天皇帝和吕后的生平开设一门新的历史课。

在宴请外国领导人时，江青回忆起她那得意的1974年，言行举止象个爱炫耀的小人。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在和她度过一个傍晚之后说：“她失去了对还在党内的这位或那位领导人发号施令的机会。”坐在江青和她的一些同事身边看完一场足球比赛之后，马尔登若有所思地说：“很容易看出江青是因为什么得到‘嚼舌者’这一称谓的……”

江青安排了一次旋风式的访问，来到麇集着她的支持者的北京三个单位，并且为使新闻界能够全力报道这一行动而事先向某位工作人员打了招呼。值此动乱之际，她是“代表毛主席”出面的，并且显示了她“与人民的牢固联系”。她身穿黑衣，面带忧虑但仍趾高气扬，完全是一副第一夫人的

派头，驱车赶赴清华大学、新华印刷厂和北京大学。她谈到了她对中国未来的种种希望。

当天下午，北京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题为《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慰问首都人民》的电讯稿。但是，甚至连对全国新闻机构拥有职权的姚文元都不敢签发这篇自吹自擂的稿件。江青的工作人员风风火火找到《北京日报》，想在北京市领导下的这份报纸上刊出。编辑们对这篇杂以戏剧情节和杂技表演技巧的东西感到为难，他们拖延时间，使之见报的希望成为泡影。

在去天津旅行期间，江青对成天耽于文化活动的小靳庄农民听众说："去年夏天我就想来看望你们，但他们不让我来。"现在，她自由了，她喊叫着——然而还不能自由地讲话。"我不敢给你们送材料。"她告诉这些对北京的争论细节或许感兴趣或许不感兴趣的农民，"因为他们说我在送秘密材料，这是犯罪行为。"

她在村子里住了几天，也许是想使自己摆脱一下北京的紧张气氛。由于她对伙食非常挑剔，厨师们往返于首都和小靳庄之间，运来天津地区搞不到的蔬菜和水果。晚上，她就发表不着边际的讲话。

"有一个时期，我在政治局是孤身一个，形单影孤。"她告诉一声不吭的农民们。这种说法究竟意思何在？她继续说道："在安排政府职务时，他们不知道怎么安排我——他们不得不接受我。"江青的意思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对政治局来说，是块嚼不烂、咽不下的肉。"大男子主义在那里占上风。"她脱口说出。

北京的局势动荡起伏，毛泽东生命垂危，而这时，江青却在小靳庄批评地方干部让一位男人而不是女人去主持他们

的政治和文化会议上的讨论。

她宣称："在生产领域内，妇女是根本性的。因为，劳动力是生产的基本要素，而所有劳动力都是女人生的。"这就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并且给她的观点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她正在尽力把再生产的事实转变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权力理论。正是躺在产房中的女人，生出了人类历史。"男人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不过是一滴精液。"她总结说，"男人应当靠边站，将来让女人来管事。"

9月2日，江青到达大寨贫脊的荒山下时，宣布说："我是来同修正主义错误作战的。我是毛主席的秘书；我做的事，就是他做的事。"

在"左派"的基地大寨，村民把贫穷视为美德，因此，七辆汽车护送江青来临，并带来四匹马供她骑乘取乐，这简直令人吃惊（事后想起来，真令人气愤）。对那些很熟悉她的人来说，她或者是为眼前升腾起的最高权力的迷雾而欣喜若狂，或者是知道她注定会厄运临头因而决定孤注一掷。

"我的防空洞怎么样了？"她问道。她指的是她前一年的计划。天啊！大寨那些乖僻的现实主义者觉得这种防空洞没有必要而把它改建成了猪圈，虎头山上有很多沟壑和小山洞，可以当防空洞用。"谁跟你们说可以毁掉我的防空洞？"她吼叫起来，声音之大，足以令鸡飞狗跳。"一定是邓小平命令你们填掉我的防空洞的！"

"我们从未见过邓小平。"给江青领路的一名妇女胆战心惊地说道。

江青恼火了，几分钟后，她就进行了报复。她抓起一把鹤嘴镐，帮助挖了一条沟，觉得有点儿累，就退出身来。"我出了一身大汗，什么人来换换？"那位地方的女领导迎

步向前去接鹤嘴镐。“不是你。”江青抢白说，“你不配接替我！”

在村子的商店里，趾高气扬地买一些并不需要的东西之后，江青说她要对工作人员讲话。“拿张纸来。”她发出指示，“写下你们父母的名字。”大多数人都是先写父亲的名字，这时，她告诉商店经理说，“这是错误的。”她大讲起中国很久以前的母权制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尊重母亲，却根本不知父亲是谁。她骄傲地说：“女人掌权，总是先想到母亲的名字，造你们父亲统治的反吧。”

江青在天津和大寨的作法给人以躁狂的感觉，仿佛愈演愈烈的紧张关系使她变得脆弱了。她觉得自己好象是在刀锋上——女皇武则天也有过这种时候，不是飞黄腾达变成女皇，就是一落千丈沦为娼妓（在共产主义世界就是被指责为使无产阶级英雄腐化的反革命女人）。

人们可以认为，她象武则天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雄心。然而，也可以这样看：她象武则天、吕后和中国其他女政治家一样，正在为使自己免遭“压制”或可能的身败名裂——这是宫廷中没有丈夫或儿子可以依赖的女人的命运——而向实力极为悬殊的对手作拼死挣扎。正是这种缺乏安全感和政治手腕的状况，使江青在1976年夏末的活动中有一种在绝望中铤而走险的味道。

1976年9月5日晚9点30分，江青在大寨公寓中的电话铃骤然响起。北京来的电话：毛泽东已丧失神志，江青应立即返回。已经就寝的江青跳起身来，收拾行装。在等候去石家庄的火车时，她打了一会儿桥牌，神情愉快地同人闲聊天。这不是麻木不仁，而是神经质、紧张。

在从石家庄到北京的短暂旅途结束后，她驱车驶入中南海，恐慌、疲惫不堪，扑倒在自己的床上。“我什么都不怕。”她强迫自己不断重复这句话。然而，她确实害怕了。

在毛泽东的居住地，笼罩着一种难以承受的悲痛气氛。工作人员泪流满面。政治局的成员来去匆匆，轮流在这里值班，在深沉悲痛的普遍情绪中隐藏着他们之间的对抗。这种紧张气氛对江青来说，比其他人更难以忍受，象一只铁制头箍套在她的头上。

她召来更多的助手，但又觉得受不了这么多人。她喊起来：“不值班的，都出去！”这使那些新来的人不知所措。她进入卧室，给毛泽东擦背，轻轻活动他的四肢，给他涂上一些爽身粉。然后，她冲出卧室，觉得必须把注意力从这里转移开去，并给文化部打电话调几部影片。

指责江青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挑出她在其后三天中所做的种种错事。有些医护人员抱怨说：“她不应当给主席翻身。主席翻身时面色青紫。”她对一位悲痛的工作人员说：“你应当尽力高兴一点。”这多可恶。

9月8日傍晚，由于难以忍受高度的精神紧张，她驱车来到新华通讯社。她同几位亲信走进防地震会议室，传唤这个记者或那位编辑。她担心这里有受命暗中给她捣乱的“特务”；她希望培植一批“支持者”，他们能在考验的时刻来临时支持她。这是一种不得要领、有害无益的侵扰。

江青返回中南海时并未如愿以偿。时间很晚了，但她并未上床休息。这里灯火通明。医护人员鸦雀无声，仨俩一群地聚在一起。政治局大多数成员都在场，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侄子毛远新也在场，唯独没有他现在还活着的一个儿子毛岸青——江青不让把这一危机告诉他，怕刺激他的神经。忙碌

的笔杆子们，为使人们能以最好的方式理解这一政治震撼而绞尽脑汁——他们正在准备将于明天发表的讣告。要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逝世了。"

陈列着无数花圈的灵堂，成千上万的市民鱼贯而入，痛哭失声……

10月5日傍晚，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极左派提出了一些任命建议，以便补上现有的空缺：江青当党的主席，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新的联盟无动于衷地听完了这些提议，仅仅是为了能够在下一周指控江青用这些提议"篡党夺权"而留了点儿心。会议不了了之，大家一致同意第二天晚继续讨论。

10月6日傍晚，王洪文赶到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会议室参加预期的会议。警卫战士突然从屏风后面跃出，把他击倒在地，给他戴上了手铐。张春桥和姚文元分别落入了同样的陷阱。当时，叶剑英等领导人在旁边一间屋中观看"逮捕"的闭路电视。江青没来开会。

一小时后，一队摩托车和一辆军用吉普静悄悄地驶过北京动物园附近空旷的街道，来到一圈灰墙上的一座高大的铁制大门前——这是官园。8341部队第37支队中挑选出来的一位校级军官和两位尉级军官跳出了吉普车，他们有行动的指令。他们轻手轻脚地走进漆黑一片的官园，在经过认真研究地形图后，他们精确地知道哪个房间是他们突袭的目标。他们足登轻便橡胶底鞋，象猫一样轻巧，摸到了大卧室的电灯开关，啪的一声打开了灯，一拥而入，冲进了硕大的卧室，自动步枪对准了卧榻。

江青象只老虎一样从被单中跳起，吃惊地睁大双眼，睡

袍四下飘起。“不许动！”士兵们齐声大吼。刹那间，死一样的沉寂，似乎听到了阵阵回声。然后，江青瘫倒在地板上，大声悲号起来。压倒她那阵阵呜咽，校级军官粗声粗气地说：“你被捕了！”江青转过泪水模糊的脸喊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胆敢搞政变！”

在需要时，江青同群众——她的听众的关系并未助她一臂之力；事实证明，同她的对手的政治组织工作相比，她访问模范村庄小靳庄的行动一钱不值。叶剑英和其他稳健派在短时间内凝成一股力量，他们共同行动，共挽危难。他们如愿以偿。

看来毛泽东说对了：“江青是只纸老虎。她不堪一击。”

一下子涌现出大批漫画，江青的名字不是用毛笔写的，而是用画出的一根根枯骨拼成的。这位62岁的老妇被画成一个女巫，长舌从口中吐出，左手握着真理，右手攥着谎言。她在镜子前露出了海妖的尾巴，在粉墨登场前正检查自己的西式裙装，噘着嘴在发牢骚。

有些曾把她当作明日之女皇而顶礼膜拜的人，现在也到处给她画漫画，把她当作过街老鼠。有些人则在北京街头参加游行，振臂高呼：“千刀万剐江青！”从此以后，人们就知道江青是白骨精了。

广州有一幅漫画，江青正坐在一把豪华的扶手椅上读一本武则天传，身边散落着一些其他书籍，其中包括《香港美容沙龙指南》和《苏联政变详情》。这幅画要揭示这位邪恶堕落的中国女人的三个特征：她野心勃勃，她想美化自己（以便把男人诱入歧途），她以某种方式与中国的敌人沆瀣一气。

第 八 章

“住口，江青！”

一辆窗帘紧闭的小轿车迂回驶离北京，在微波荡漾的麦海和白杨树间穿行，越过了“禁区，外国人不得通过”的标志牌，来到了秦城戒备森严的大门前。一位检察机构的官员走出汽车，沿着布满了铁制倒钩和电网的长墙疾步行进，走进江青的牢房。

“拘留我？”当这位男检察官郑重宣布江青的身份已改变时，她冒火了，“我已经在这里呆了4年，谁也没来说过什么。”江青之所以发怒，是因为这位检察官说秦城是拘留所。“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拘留所。这是十足的监狱。”她的争辩毫无用处。她接着又对那位身穿灰色制服的来者说：“我不是刑事犯，我是政治犯。”但是，这种吼叫遇到的还是不露声色的、公事公办的脸孔。

于是，江青明白了，她将面临的是一场正式的“三堂会审”，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复仇。

“我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了，”她对那位检察官说，“我只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有另一个角色，我是被告。它不意味着任何其他东西，被告，仅此而已。”

检察官离去后，江青浏览了她收到的报纸。她注意到，四人帮的排列顺序是：王洪文第一，张春桥第二，她自己第

三。“为什么我不是第一？”她对卫兵喊叫起来。

江青是在毛泽东时代告终时被捕的。1980年对她进行审判时，中国已经步入邓小平时代了。

江青身穿男式服装，迈步走向特别公诉人办公室内的一张木桌。她的两侧是两名士兵，他们戴着白手套。江青面对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书记员，桌上放着一沓厚厚的文件——对她的起诉书。

江青俯下身，取出她的眼镜，在一位戴白手套的军人递给她的文件上签上了她那四四方方的字体。在中国，名义至关重要，给江青及其同案犯的名义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不仅把她同她的三个上海助手联系起来，而且把她同林彪的五个军人同伙（他们已在监狱中蹲了9年）及陈伯达联系在一起。

江青接过起诉书副本，卷成一卷，左手握着，象拿着一本电影杂志，然后用右手轻轻地理了一下头发，等着看这位执法者下一步要干什么。

那个冬天，江青之所以修饰得体，很可能是因为她知道这次审判也许就是她的“告别演出”了。她疲惫、沮丧；她百病缠身；她亲朋四散。然而，她觉得，她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戏剧性的时刻。已有4年之久她没有一个观众了；现在，人数众多且全神贯注的观众在等着她。她要让他们看一看“真正”的江青。

是政治，还是戏剧？几十年来，江青一直在这二者的交叉点上玩火。在山东和上海，她在展开她表演生涯的同时，挤进了共产党人的圈子。她利用女演员的魅力和资质冲进了延安社会的核心。她行使在60年代最终到手的权力对付戏剧界的同行。现在，在当今政治强人们把她擒获时，她力求在

最后一个演出季节拯救自己的“尊严”。

“1974年秋，被告江青阴谋阻止邓小平被任命为总理。”这是11月26日，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坐落在正义路一个大院中的公安部礼堂里，35位法官和600名特邀代表正襟危坐。江青身穿黑色套装，从笼子似的被告席的围栏之间可以看见她的手，那手指活动着，一张一合，帮助她松弛下来。她在控制着自己。她的策略是保持“尊严”并“合情合理”。这第一个指控她以为很容易摆脱——中国人肯定都能理解政治斗争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区别。

传唤证人到庭。“谁让你去长沙向毛主席通报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活动的？”这位一脸苦相的男人回答说：“是江青。”他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年轻32岁，要想到将来，于是，他背叛了她，承认了对他的一切指控。一度冲劲十足的王洪文现在几乎面目全非：塌着双肩，短秃的小平头，脸上一副倒运的马屁精相。

有那么一会儿时间，江青沉默不语，听她那位年轻的追随者说话，轻松地左顾右盼。但过了一会儿，她变得不自然了，上身前倾，紧紧按住头上的耳机，对王洪文翻起白眼儿。在王洪文作证期间，她曾大声喊叫让带她去厕所。法庭中断了一会儿之后重新开庭。王洪文有一小段时间没露面，这时，江青当年对他那种颐指气使的态度又忽然闪现出来。“他在那儿？”她吼叫着，“王洪文在哪儿？”

首席法官曾汉周问江青：“1974年10月17日（王洪文去长沙的前一天）晚上，你是否召集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钓鱼台17号楼聚会？”

“没有。”

“什么？”

“没有——我对此一无所知。”

“那次你们四人讨论了什么？”

“如果我对这次会议一无所知，”江青向法官投以表示遗憾的一瞥，答道，“我怎么能告诉你会上讨论了什么呢？”她依然在控制着自己，并竭力使自己表现得“有风度”，但她拒绝朝着向她提示的方向走下去。她这种冷淡的挑战激怒了准备按程序进行的法官们。

王洪文脸上闪过了一丝不安的神色。在招供过程中，他牢牢记着两点：四人帮绝不会重新掌权；他承认的罪行愈多，就会愈受宽大处理。但是，江青断然否认一切罪行，给审判带来了另一种气氛。她的策略在道德上和实践上是否合适，王洪文感到一阵疑惑的刺痛。

1980年12月3日上午，江青走进法庭，她抚平衣服，理理头发，坐在她那固定的凳子上。在每位公诉人和证人面前都摆着一杯茶，江青面前只放着一副耳机。在特别法庭宣布开庭之前，她回身环顾听众席。一位身穿绿衣服、脖子上围块黄头巾的女人正在盯着江青，有那么一瞬间，这两个女人的视线相遇了。这是王光美。

“被告江青，你怎么知道王光美同志是美国特务？”

“我们政府的报纸这么说的。”江青故作愚态，象一堵无知的墙，但她的声音沙哑，嘴唇轻蔑地翘起来。

公诉人一再重申，江青要对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和他夫人被囚禁12年负主要责任。

每个证人都带来一大批对江青不利的证据。证人中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至今已在监狱里住了六年。“我要发

言！”江青沙哑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现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大多数成员和我们绝大多数政府领导人，包括你，江华（法庭庭长），那时都争先恐后地批判过刘少奇。如果我有罪，那你们所有的人呢？”

“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喊道。“住口，江青！”六位法官异口同声。

公诉人拿出了有力的证据，证明江青为了掌握罪证曾督阵抄了刘少奇的家。江青摘下眼镜，举在右手中，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反问道：“抄他们的家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这些卖国贼现在抄没抄过我的家？”她接着说：“破四旧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播放了一段录音带。鸦雀无声的法庭静听江青大权在握、炙手可热时的讲话。“我可以告诉你们，”她当年正对一次表演艺术会议的听众高喊，“刘少奇是个大反革命，坏透了……他应当死一千次，千刀万剐！”

“被告江青，你听清录音带了吗？”

“恐怕没有。”

嘈杂的录音带又放了一次。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着，令人的耳鼓很不舒服；那是个江青“绝对正确”的时代。江青紧紧按住耳机。“这的确是我的声音。”

黄火青检察官说，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规（1954年）第36款，全国人大（议会）代表未经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决定不受逮捕或审讯。那么，你江青有什么理由剥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自由？江青往椅背上一靠，头一抬，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对这次开庭的报道一开始就说：反革命首犯江青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的罪魁祸首，12月3日

上午9时，这个罪魁祸首被两位女法警押上了人民法庭……

在12月的第二周，江青对她的起诉人的耐心进一步下降了。她是否与康生合作准备了一份一旦可能就要批判并打倒的中央委员名单？江青急促地回答："你们有事实，但你们歪曲了事实。为召开一次讨论生死存亡重大问题的中央委员会的重要会议作准备，这样做是正常的、合法的。"

一位女法官斥道："那时你还不是个中央委员！"

"你看……"江青试图狡辩。

"这怎么能是正常的？"那位法官发怒了，"这怎么能是合法的？"在她高声斥责时，江青以一种傲慢的姿态摘下了耳机。

重新提起了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生活。她是否命令追查从郑君里（江青同唐纳结婚时的男傧相）和他夫人黄晨家里取走的某些材料？江青回答说："在我能够告诉你我是否做了什么追查这些材料的事之前，我必须看看这些材料。"她的口气就象是个有什么秘密的女孩儿在对没抓住她什么把柄的父母说话一样。

江青接着说道："你们第一次说照片，第二次说笔记本，然后又讲什么信件，这太混乱了，弄不清你们的意思。"

在公诉人开始指出她30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的时候，江青象只熊一样紧张地蜷缩起来，盯着板凳。一会儿，她又直起身来。"这是什么反革命活动？"她对整个大厅咆哮着。法庭没有答复。当然，空气中的火花不是从政治问题上点起来的，而是从她作为蓝苹的私生活上爆发出来的。

黄晨本人走进了法庭。

当1969年死于监狱的郑君里的遗孀黄晨站到证人席上

时，江青喊了起来："阿黄！"

"我不消与你说话。"黄晨轻蔑地答复，然后，停了片刻。"你曾是蓝苹，对不对？我告诉你，30年代的历史是你自己写的，抹也抹不掉！"

"就因为我们在30年代认识你，"黄晨不是对着法官席而是对着江青说，"就因为那些你想收回的信（其中有一封是给唐纳的），你搞得我家破人亡，我丈夫也被整死了。你太残忍了！"黄晨呜咽得说不出话来。

江青改用上海方言讲话，声音压低了说："阿黄，我真的不知道这些。"

前空军司令吴法宪，有着一个象老绵羊一样的肉下巴，喉咙里滔滔不绝地涌出道歉的话。他告诉法庭，他在1966年10月多次执行了搜查上海艺术家住宅的行动。他同其他军队方面的被告一样，象是个彻底垮掉的人，法庭所说的一切他都同意。"江青是首犯，"他总结说，"我是她的帮凶……我恨自己。"

尽管对自己不利的证据非常有力，但江青仍否认是她指使进行了上海的抄家行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江青在上海时相识的廖沫沙——她曾住在他家但后来吵翻了——被当作"敌特"关押了八年。廖在他的证词中把他所受的苦难同刘仁的苦难联系起来，刘仁的寡妻正作为特别法庭的一位法官坐在他面前。

"你和你的同伙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廖对江青说。"这些罪行比人头上的头发还多。"这位作家停了一停，擦去从眼镜下淌出的泪水。"北京的人民对你恨之入骨！"

……

首席法官曾汉周面色通红，命令把江青押出法庭。两名

女法警急速抓住她的双肩。她推搡她们，但她们很快就扭住了她的手，拧到背后，把她拖出了法庭。听众席上一片欢呼。

江青保持“尊严”和“情理”的计划破产了。五次开庭使她疲惫不堪。两位女法官尤其令她不痛快。而且，观众对满腔怒火的证人的喝彩，她也无力遏制。

在颐和园附近的一片树林里，100多名小学生来这里野餐。他们背着背包，拿着做饭的锅和一捆捆干柴。正在准备午饭时，老师一声尖利的哨音转移了孩子们的注意力，他们看到，在几棵老树下支起了一幅很大的漫画。四人帮的形象以漫画的形式描绘在他们眼前；江青是一只耗子。一位老师历数了江青的罪恶。孩子们从背包中取出石块和装有泥土的纸袋。投掷开始了。每击中一次“耗子”，就引起一阵发自内心的欢呼。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江青正传
作者=(美)特里尔(Terrill, R.)著
页数=322
SS号=10119362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
第一章 序幕：“ 我是他的一条狗 ”
第二章 长大成人 出外发展（1914—1933）
第三章 在上海的舞台生涯（1933—1937）
第四章 毛泽东在延安的主妇（1938—1949）
第五章 失意（50年代）
第六章 康复与报复：以政治为舞台（60年代）
第七章 想当女皇（70年代）
第八章 “ 住口，江青！ ”
附录页